

這一星期

蔣廷黻

國際的風雲和我們的準備

我們不要以為塘沽協定成立及天津與唐山間通車以後，天下從此就無事了。我們不要以為送了日本東北四省，其他各省就自然而然的可保了。我們試一觀察現在國際的風雲就知道我們將來的國難還可大於最近這兩年的國難。

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是國際關係史上的一個大分水界。這一年之內，國際的三大事業都失敗了——國聯處置中日問題失敗了，裁軍會議失敗了，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要告失敗了。這三大事業的失敗就是歐戰以來國際主義的破產，和偏狹的，軍備競爭的，商戰的國家主義的勝利。人類的前途是不可樂觀的。

或說國聯處置中日問題不能算是失敗，因為國聯理事會及大會屢次的議決案始終顧到了盟約，國聯會未絲毫犧牲他的原則和立場。我們若專從理論上着眼，這個看法當然是對的。國聯對於中日問題的努力及萊頓報告書之具有政治家的眼光，這都是我所承認及佩服的。不過國聯的議決案並未推翻日本武力侵略的收穫：這是一件彰明昭著的

事實。國聯未作到這一步就是他的失敗。盟約的中核是第十條；在這一條之下，會員國彼此担保各國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此刻中國尚沒有收復東北四省，直接證明這個担保是無價值的，間接證明國聯在現代的政治上是無威力的。我們所受的損失固大；全國際團體所受的打擊又何嘗不大？我們從國聯得不著安全；別的國家又能够麼？我們感覺以後應靠我們自己的力量；別的國家不是一樣的感覺麼？自國聯在遠東失敗以後，世界的國家，不分大小，都覺得這個世界是個無安全的世界。國聯的失敗雖是光榮的，但仍是嚴重的失敗。

正當中國因無充分的軍備而喪失偌大疆土的時候，日內瓦的裁軍會議開會。世界各國原來就感覺除自己的軍備外別無安全的保障。加上中國因無軍備所受的慘痛，赤裸的擱在各國的面前，除非世界的政治家都是瞎子，裁軍會議當然是要失敗的。不錯，各國雖從國聯得不著安全保障，她們從軍備又能得着保障麼？歐戰以前，德國的軍備豈不是居各國之上？她的安全在那裡？法國是戰勝之國，算

是收到了戰前軍備的好處。現在她不是最講安全的保障麼？這是主張裁軍的人的理論。這個理論的邏輯，如同國聯本身的理論一樣，也是不可破的。無非各國都感覺抵抗而喪失疆土勝於不抵抗而喪失疆土。何況有軍備而抵抗不見得定要喪失疆土？何況有軍備不但已有的疆土或可保，即別國的領土或亦可得？現在各國的軍備既不公平，佔優勝者總把弱者當作魚肉看。在這種狀況之下，裁軍等於自裁，等於放棄侵略及侵略所能得到的發展。軍備不但與領土的保存和取得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且與通商的機會，投資的機會都有關係。日本現在與英國爭印度商場的時候，日本人十之八九無不恨日本的海軍敵不過大英帝國的海軍。換句話說，裁軍會議的失敗告訴我們，在現今的世界裏，軍備是決定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的高低之主要元素。

裁軍會議的失敗暴露了國與國之間猜疑之深，自私之厲，離國際主義之遠。在這個當兒，倫敦世界經濟會議開幕了。這個會議的理論基礎也是非常穩固的。近幾年來，各國的學者，日本的，美國的，法國的，英國的，都有人說世界的經濟不景氣是由于各國的經濟的國家主義。他們說，國家在現代的經濟上不但是無意義，簡直是種障礙物。現代的經濟根本是國際的。因為國際的交換——貨物的

交換及服役的交換——愈多，各國就愈富。但是各國偏拿政治的勢力——如提高關稅，強收戰債，及膨脹貨幣——來阻礙和干涉國際的交換。倘不變更政策，各國均將同歸於盡。這個理論的邏輯也是不可破的。可惜現今國際的空氣絕不讓這個理論見諸實行。倫敦會議的第二天，因為南非及法國的代表大聲疾呼的提倡戰債的取消，美國的代表團就拒絕出席，引起一個大風波。英法意各國所欠美國的戰債，就是在美國，也有許多人主張取消，以為戰債足以阻碍世界經濟的復興。但是戰債數目甚大，其償還於美國預算的均衡不無小補。不信還，則美國人民賦稅的負擔必須加重。一般美國人，在經濟恐慌以前尚不願有此格外犧牲；自恐慌以來，更不要說了。在胡佛總統時代，有人提議倘世界各國願意裁軍，則美國可減少或放棄戰債，因為軍備也是世界經濟不景氣原因之一。後來裁軍失敗，許多美國人就想歐洲既有錢維持和擴充軍備，她們就有錢還債；美國倘放棄債權，這些國家橫直會把這筆款子浪費於軍備。照這樣的看法，放棄戰債不但於歐洲無益，而且有害。所以政治家及學者想放棄債權者都為輿論所阻，無可如何了。

戰債的風波未平，貨幣的風波又起來了。守恩先生在

本刊的上一期已有專文討論問題的意義及法美二國相對的所以然。這個風波一起，延會或閉會的呼聲就傳出來了。就現狀看起來，國際合作以求世界經濟的恢復是不能實現的。倫敦世界經濟會議也告慘敗了。

國聯願意負處置中日問題的責任，裁軍至成爲一種運動，各國至開會以求經濟合作：這種現象都是歐戰以後國際主義的產物。這三大事業的失敗就是國際主義的失敗。從此以後，國家主義將更盛。其演變將怎樣？

第一，軍備的競爭將更厲害。自裁軍會議延會以後，我們會未聽過任何國家裁軍的消息，我們祇聽見日本如何擴充軍備預算，蘇俄如何籌備遠東艦隊，美國如何加築軍艦和軍港，德國如何完成國防計劃。

第二，從此以後，國與國之間的商戰將到肉搏時期。一方面，各國必竭力保護國內的商場，使外貨不能與國貨競爭，一方面各國在工業退化的國家內的競爭必更厲害。膨脹貨幣以求對外價格的低落，政府給與輸出商人的津貼，犧牲血本以求籠斷市場等等現象將成爲通常事情。日英兩國已開始了。印度關稅的問題，我們不要忽視，是富有世界意義的。英國在印度有統治權，所以覺得她在印度應該有通商的優先權。但日本因爲工資的較低，工作時間的

較短，政府對於海外航業的津貼，以及日圓的暴落，反能在印度的商場上戰勝英國的貨品。於是英國就利用她的統治權來提高印度的關稅。此外我們在中國所見的蘇俄與英美的石油競爭也是這個大悲劇的一幕。

第三，列強合縱連橫的局面又將再生。歐戰以前，歐洲的外交就是兩壘相對的局面。戰後，國際主義者都以爲這種對壘的聯盟就是大戰根源之一，所以規定在國際聯盟之下不能有攻守的小聯盟。這種精神始終沒有貫徹。現在國際的形勢將更迫着列強走這條路。此刻最明顯的是英美的合作。因爲英俄的衝突，美國會停止與俄復交的交涉。因爲美國的反對，英國就不加入金本位國家的團體。法國未付六月十五的戰債，英國則付了，但付銀不付金且數目大減少，而美國亦善意接收。現在美俄又恢復通商，而美俄的復交亦在進行。將來俄國在國際上會守孤立，抑與英美暫時合作，我們無從知道。我們所能知道的，這三國的合作必是外交家努力的目的之一。

第四。在這個行將開演的大競爭之中，中國必是主要的競爭場。日本的商業在歐美及歐美的殖民地內既受排斥，她必更努力於中國的商場；日本將把中國的商場更加看作她的生命線。能用和平及友誼的方法固好；不能的話，

日本並不惜出於一戰。無論如何，這個「生命線」是她所必須維持的。在許多日人的眼光裏，這個戰爭是愈早愈好的。在九一八以前，我們習聞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而不置意，不料這個標語背後有這樣多的火藥。此後日本的外交標語一定是：「揚子江流域的商場是日本的生命線」。這一次日本的標語，我們不要如上次一樣當作黨部的標語看，好像無關緊要的。同時美國的經濟出路，既從歐西找不着，一定會在中國及蘇俄來尋求。英國亦然。蘇俄在短期內的外交一定是消極的，但是她的工業化的程度愈高，她的經濟出路問題愈要急迫。我們不要想因為蘇俄行共產主義，她就無須國外的商場，或是她雖須用國外的商場，可不用資本主義的競爭方法。現在蘇俄在中國與英美石油的競爭是我們面前赤裸的事實。她的競爭惟一的不是她的方法比資本主義的方法更加厲害。她的公司就是國家；她是商業競爭是直接的國際的競爭，更加容易引起國際的風波。蘇俄的當局不是瞎子；他們知道共產主義不是閉關主義，等到蘇俄外交轉變積極的時候，那就是說，等到蘇俄內部建設到相當程度而欲出來問鼎的時候，蘇俄進攻的熱烈必不在中古基督教的十字軍或回教徒的新刀軍之下。天下最可怕的勢力是宗教的熱忱及科學的物質設備之合併。在現

在的世界上，蘇俄是這種的勢力。就是全無九一八的問題，二十世紀的太平洋已經是列強的角逐場；有了九一八，我們祇須待國際火藥庫的爆發聲。富源未開闢，工業未發達，而政治力量又薄弱；這三種汲引侵略的資格，我們都齊備了。以這樣的資格，處這樣的風起雲湧的世界；我們要免患禍，其難可比駱駝過針眼。無疑的，最近這四五年是我民族的一個大關鍵。我們處置得當，這四五年是我們翻身的機會；不得當呢，祇有永遭沉沒。國際時局的嚴重不是文字所能形容過度的。

我們能有什麼準備呢？

第一，統一應速求鞏固。中國這個國家，我常想，很像一個破爛的舊船。在風平浪靜的時候，已有不可終日之勢。遇着這種狂風暴雨，惟一的希望在內部團結。不然，倘我們在這個當兒，還要爭誰作船主，誰作大副二副，誰睡上艙，誰睡下艙，或是爭這船應如何修理，如何改造；這就是自殺，是就死。拿世界和民族的眼光來看，察哈爾問題，四川問題，新疆問題，西南問題都不是些極小極小的上艙下艙，大副二副的問題嗎？內鬨不息，船就要沉了。

第二，建設應急速進行。模範省的計劃不錯，完成粵

漢及隴海鐵路的計劃不錯，救濟農村的計劃不錯，導淮的計劃不錯；不過要作，要實行，要快快的實行。實行的時候或這裏要出亂子，那裏要出亂子，我們顧不到這些。借外債的時候，我們在條件上或要吃點小虧，在支配或免不了一點浪費；我們現在顧不到小節。我們現在所須要的是建設，火速的建設，大規模的建設。

第三，社會中堅份子應負起重担。破壞統一和阻碍建設者都是民族的罪人。社會中堅份子何以袖手旁觀？你們怕事嗎？我告訴你們：你們現在出來預聞政事還有一線的

希望；不呢，你們的生命財產都會隨這班搗亂份子沉落到水裏去。兩個人在橋上打架，第三者不能過去，中止橋上，等着他們打完。結果橋破了，打架者落下去了，第三者也落下去了。這是我們現在的局面。

現在的競爭是國與國的競爭。我們連國都沒有，談不到競爭，更談不到勝力。我們目前的準備，很明顯的，是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設一個國家起來。別的等到將來再說。

七月九日。

教部令清華繼續考選留學生以後

薩本棟

此次教部決定令清華大學繼續考選留學生，由兩方面說，是可使人滿意的。第一，在今日青年，特別是大學剛畢業的，苦着沒有出路，而社會仍舊信仰洋貨——雖則只是敷粉的洋貨——不重土貨的時候，派遣留學生，未始不是適合于經濟學中供求原則的。這樣看法是很忠實的，並不存絲毫譏刺的態度。我以為現在有不少很肯刻苦而能上進的青年和大學畢業生，因無出路而苦悶，甚至于走入斜路，得此救濟，雖是杯水車薪，總勝于無。至于以造成專

家爲目的而派送留學生，確是一種補救國內專家缺乏的方針。第二，此次所要考選的，是幾個學習很專門學問或技術的學生，較諸以前漫無限制，或只指定學習普通學科的辦法，確高一籌。在所要派選的二十五人中，理工技術佔了十八，農林佔四，政治經濟僅得其三，（還是以技術爲專修科），也可以表示，雖然教育部長換了學政治的人，政府對於提倡理工教育的政策，並沒有改變，且有更確切的注重一切技術的傾向。知道注意一切技術，是比偏重純

粹科學或工程是又高一籌而值得讚許的。但是決定了派遣留學生以後，和除了派遣學習極專門學問的留學生以外，我們還有數點意見。

此次清華考選留學生，報載是由教部主持，考選委員會是由教部聘任，考試命題員是由考選委員會聘請。我們相信這些人員對於任何團體或私人，是毫無成見，或偏心的，所以無論考取的是誰，我們不願意看見名落孫山的，在報端作無謂的攻擊，同時也希望新聞界不要輕輕的用『不負文責』的招牌，將捕風捉影的馬後轍登在讀者通信或類似欄內。

這次所要考的科目，如應用光學，儀器及真空管製造，兵工，飛機硫酸及硝酸製造等等，都是極專門的技術。對於這些問題，大學初畢業，同一般已在國內作過二三年事（或二三十年）的人，有特別興趣或已略識門徑的，大概寥寥無幾。一方面此事實昭示此種人才的缺乏，又一方面就引起了考選時考題的性質，與錄取標準，應如何決定的問題。換句話說，此次考題的性質，及錄取標準，是以基本的學問，或以專門的智識為主體，很值得注意。若以基本學問（例如考理工的，以理化數學及機械學等）為主體，那麼應試的人，對於所指定的專科，既無須已有特別

經驗或成就，考取之後，有沒有方法保他們不改行？即使有之，強迫有物理天才的（如Dirac之流）學習土木工程，或在文學上或哲學上有成就可能的（如胡適之）學習農林，是否妥善？如果考取之後，沒有必須學習指定科目的義務，那麼指定如是專門的科目，有何意義？倘若考題的性質，與錄取的標準，是以專門智識做主體的，我們根本上就懷疑對於某幾科，具有資格命題的人，國內有幾位？不要鬧出某省考紡織留學生的笑柄！

被錄取的人，既要學習所指定的專門科目，我們還要知道在歐美有幾個地方可以學到所要學的！我們相信在美國的大學（假定先送到美國）與研究學術機關，對於本次所指定的科目中幾門，是完全學不到什麼的。至于非研究學術的機關，如公司或工廠之類，因為他們利害的關係，不但不肯以秘密告人，即極平常的技術也不輕以授人。由政府向此種公司以訂購貨物為遣送實習人員的交換條件，固是一個辦法，但據我個人的經驗，這些人員所學習的，不過是怎樣使用公司的出品，而不是怎樣製造出品的辦法。外國公司，決沒有把搖錢樹的裁法，送給他人的義氣！對於此層，教部與政府有沒有預先的考慮與辦法，才不至使出國的人失望，而迫于走入改行的途徑？

決定考選留學生，與把他們送走（特別經費有的欸），都很容易。我們希望主持此事的教部，不要就以決定考選與送派留學生爲完事。以後的事，除卻上述二段外，還有他們三年學成（如果真學成）歸國後，應如何使他們有安心作事，各盡其能的辦法。否則多費一百萬元，與多造出一批學不得其用而只知享受西洋文明的人，都是不應有的損失。

這回派遣留學生學習上述各專門科目之目的，如果是忠實的造就專門人才，我以爲較有效果的辦法，應當先在國內研究這些專門問題，然後再派人到外國去觀光；最少除了派遣留學生之外，在國內同時要研究此等問題。上面已說過，所派遣的人，或對於專門科目，尙未具有應知的

學識，或已略識門徑而到了國外仍舊學不到所要學的，所以我對於只用此次所定方法來造就專門人才的結果如何很懷疑。如果政府確有決心造就專家，而不是救濟青年無出路，我以爲須令國內學術機關，如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三四大學合作，各派相當人員，各負相當經費，立即起始在國內研究與此次所指定要考科目有關的問題。國內學術機關，雖未必已有現成的人才，對於各問題可以立即作有貢獻的研究，但內中已受有相當科學訓練，及著有成

績而願改行者，亦不乏人。如果經費及設備有辦法，可以使這些人安心研究，或另聘國外富有經驗而願在中國服務者作指導，三年之內，這些人雖不能有完成的結果報賬，他們研究失敗所得到的教訓與經驗，恐怕比遣送一批到外國只學會書本上智識，或只得到畫圖室中經驗有效得多。有了國內研究人員同機關作中心，再看他們的需要如何，而決定派遣人員到國外去觀摩，還不算遲。即使考選留學生是一樁已決定的事件，國內研究這些問題的中心，也有立即設立的必要；因一方面既可供給出國人以國內材料及道地的待決問題，令其合作，一方面也可以由這個中心，負一部份督促出國人對於學問及技術上努力的責任。

這一次所定的學科差不多全爲實用的，比以前徒知注重科學的優點，前已述及。但是除了提倡實用的科目外，我們還希望政府使習實用學科的人，有正常實用的機會。否則學兵工，飛機，同製造硫酸與硝酸的，固可助長軍閥內戰的技能，而學造儀器，及真空管的，又何嘗不能做軍用無綫電以增進內戰的便利呢？

總之，決定派遣留學生以後，及除了派送留學生以外，政府與教育部對於此事應該還有下文。不然「教育部這一道命令，爲國家爲青年的打算，實不足濟事，爲阻碍清

華的發展則有餘！」

國際經濟與中國

守愚

(二) 賠款戰債與關稅

七月一日我在本刊上討論貨幣安定與法美的立場，說明兩國間不同的政策，和對抗的原因。在過去一個星期內，不料國際經濟會議，果然在這個問題上，觸着暗礁。其間會議的存散，形勢真是不絕如縷。我又說起貨幣安定的問題祇是一種做作，非可單獨解決。要是安定貨幣的大前提，一經承認，其餘議程上豫備討論的問題，如關稅，如生產，又如間接提及的問題，如賠款戰債等，便可按序討論。如果像目下情形，把安定貨幣的問題擱開，那末經濟會議的議程，便失了討論的張本，終必將次要問題提出，通過幾個不關痛癢的議案敷衍了事。

何以恢復世界繁榮，非先把賠款戰債生產等問題，一一解決不可？理由是付賠款戰債的國家，要是確實履行條約或合同上的義務，第一須在各該本國內籌措款項，籌措辦法，不是增高賦稅，便是借債，再不了，濫發鈔幣。要是款項數目太大，並且繼續不停，國內的經濟必定破壞衰

退，籌款能力更形薄弱，甚至銷滅，如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三的德國。就使款項能在國內籌足，但是所得的，是本國的貨幣，債權國所要的却是他們自己的貨幣，如何把債務國的款項，變成債權國的款項，這個問題尤難解決。就理論來說，付國外的款項，其來源不出（一）國際收支的入超，包括貨物出超在內，（二）國外長短期借款，（三）黃金輸出。第一項能否實現，還須看本國的工業，是否富有彈性，可大量製造或改造出口貨，同時國內對於輸入品，是否為不可或缺的貨物，出口能否增加，更須看債權國或他國家的關稅政策，要是對方採取絕對保護甚至禁止政策，出口甚難增加，要是外貨大都為人生需要，則出超更難實現。第二項人家願意借不借，在國際間，當然要看借債國的還本付息能力，最後仍在將來出超的可能性，有時還夾雜些國際政治問題。此點太蕪雜了，留待將來再談。總而言之，祇要國際借款，抵達相當數目，無論長期短期，都含政治意味，所以向國外借款，是極有限制，非是源源

不絕的。第三項黃金輸出，要是欠外款項，數目鉅大，繼續不停，一國的黃金有限，決不足以抵付，不待全數流出，國內信用基礎搖動，經濟組織隨之破壞。那末三項同時並進，是否可以抵付國外款項呢？殊不知這是通常辦法，祇因賠款戰債，數目太大，雖三方並進，仍是捉襟見肘，不能彌縫，如一九三一年五月的國際財政恐慌，而引起美國總統胡佛停付國際政治債務一年的提議，就是德國的國際欠款太大，不能支付而起的糾紛。所以恢復世界繁榮，網領問題，是賠款戰債和關稅。要人還債，必須使人能在國外得到款項，要得國外款項必須減低關稅，消除阻碍；再不然還得減少或取消賠款和戰債。這幾項問題，實在是開經濟會議的目的，安定貨幣，祇是討論的張本。要知他們究竟爭的是什麼，不可不知這些問題的背境。

談起賠款，真是一言難盡，簡單說來，是德國戰敗後，強迫繳付的款項。最初並無總數，因為這個總數在巴黎和會時，太難訂了。（最高的要求是二千萬萬金元，最低的是二百五十萬萬，都經拒絕。）最後討論結果，先叫德國付給二百萬萬馬克的債券，一九二一年五月到期，這個債券，按照德國每年所付金款合貨物，逐漸消除。到了

國接受，叫德國交付金馬克債券一千三百二十萬萬，約合美金三百三十萬萬元，在債券未償期內，付年金二十萬萬馬克，約五萬萬金元，另加收德國出口價值百分之二十六，如違反條件，便實行佔據領土。到了一九二三年一月，德國果然不能照付，法比等便佔據露爾流域，強迫徵收。不料結果反比德國自願付出的少的多，並且因此引起協約國間自己的政治糾紛。於是在一九二四年，便有道威斯的專門委員會，將賠款改作年金，前四年每年付二萬三千萬金元，後五十六年每年付五萬六千萬金元，露爾佔據區域退出，其餘賠款條件撤消。這個計劃，到了第五年，又發生困難，於是一九二九年揚阿溫的專門委員會，便應運而生，規定賠款年金，第一年四萬萬美金，以後五十八年每年四萬五千萬美金。付款機關，另設國際清理銀行，辦理其事。不料揚氏計劃施行後，國際經濟恐慌，即行開始，商業衰落，歷年愈甚。所以在一九三一年五月，揚氏計畫年金，即無法償還。中間經過胡佛的停止付債一年到了一九三二年七月後，仍是無法，所以去年六月在洛桑再開會討論。他的決議案，各協約國，還沒有批准，所以現在的賠款計畫，仍為揚氏的。據德國某報的推算，按照道威氏計畫，德國賠款本金，約合一百八十萬萬金元，按

照揚氏計畫，約合一百一十萬萬金元，相比已減少七十萬萬金元，不算不多。並且道威氏和揚氏的年金計畫，原則是根據德國的國家經濟能力的。據一般專家意見，揚氏的年金數額，在德國國內徵集，並無特別困難，所難的完全是怎樣把每年這筆鉅款自德國的馬克，化成美金英磅或法郎。這種困難的根本原因，便是協約國的關稅壁壘太高，德國輸出，不易增加，又逢德國的輸入品主要，是食料不容減少。其次便是因為德國出超甚難，所以借款除因政治關係外目下無法在國外募集。至於黃金輸出，那在德國已經是源源外流，不能再忍痛割捨了。

戰債問題的複雜不亞於賠款。戰債的起原，是歐戰期間各國相互的借債，購買糧食軍火。大致小協約國如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是向法國借，法國又向英美借，英國又向美國借。所以美國在歐戰完了時，不獨變為最大債權國，且為最後債權國。借的時候，各國都向美國政府，立有正式借據，總數約在一百一十萬萬金元左右。美國那裏來這許多錢，這是完全發行國內公債，或外國債票，而由美國政府担保向美國人民募集的。因為有這許多公債，所以美國人民的賦稅，亦就特別加重。歐戰打完，各國都借詞國內元氣未復，請求通融辦法。不料美國國會絕端反對

減低本金，授權政府，祇準在利息上可以酌減。我前次說過，要是這些戰債還本付息，按期繳納，美國政府每年可得三萬萬金元左右的收入。有這樣大的收入，當然美國人民可希望減輕賦稅負擔了。然而事實上這三萬萬元怎樣付，當然不外設法對美國貿易得到出超，或服務運費上得到入超，可是美國的關稅是傳統的保護政策，美國國際貿易，是向來出超，這條路便走不通。輸出黃金呢，那是對於負債國的國內經濟，會發生不良影響，並且事實上亦沒有這許多金子向外運。借美國債呢，商業興隆，當然可以沒法，要是衰落，債券市場，便無人眷顧。然而真正實行債務，是不能到期不付的，並且借債，仍是暫付辦法，將來總須國際收支上得到入超，方算問題解決。現在對美戰債，各國都在推賴着，那末何不拿德國的賠款，還美國的戰債。這先決問題，是德國能否付賠款，這十五年來的歷史，是昭告着極不可靠的，再不然拿德國的賠款作根據，和美國交涉戰債，賠款有着落，戰債亦有着落。這個政策，遠在一九二二年美外相貝爾福的通告書中已談及，就是英國祇要能得到還英國的債權國的款項，其餘賠款大小，儘可犧牲。不幸美國的財部，始終沒有正式承認賠款和戰債的關係，他們的立場，是當初借誰便向誰索債，與德國賠

款的付不付無關。所以歷來關於戰債的談判，是根據各國的本身償付能力。

那末戰債和賠款同時削減，豈非各國都可以稍蘇債困？這個問題，許多經濟專家，都同聲贊許，祇是美國政府不贊成，法國政府在躊躇。何以美國政府不贊成？因為美國是最後債權國，債務國可以削減美國的戰債，美國政府却不能削減歐戰時自人民募得的內債，內債不能削減，當然賦稅不能減輕，結果或成爲債權國人民負擔較重，債務國人民負擔較輕的畸形，這是美國人民所決不容許的。何以法國政府在躊躇呢？德法世仇，法國人日夜所怕的，便是德國完全復興，有這個賠款的負擔，便可約束德國工業和軍事上充分的發展，並可因賠款問題，而得操縱中歐的政治，如一九三二年的德奧關稅聯合，最後仍由法國破壞，所以完全取消賠款，法國必定絕端反對，即使大加削減，以謀世界的經濟復興，法國亦必從中作梗。

如何整頓大學教育？

(續)

君衡

至於關稅和國際貿易上重重阻碍，現在還沒有關稅指數，可資比較。從史的敘述來說，歐戰的結果，中歐東歐新生許多小國家，因此便多了許多國界，許多關稅壁壘。戰後的極端國家主義發生經濟自給的奢望，因此關稅稅率，無論何國，都超過戰前。就是自由貿易主義的英國，亦於去年九月在阿太哇帝國會議中，通過保護政策，偏向殖民屬地，關於阻碍，如輸入品的成數限制，如匯兌的控制，如輸入的運貨方式等，在在排遣外貨，保持國內市場。關稅稅率，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無以復高了。我們看了以上所談的如賠款如戰債如關稅真是如環相屆，不能拆開，要是恢復世界繁榮，除了削減賠款和戰債，犁除關稅壁壘，和貿易阻礙以外，還有那條路可走？但是討論這些問題的總帽，安定貨幣，不經承認，那末這些問題，又往那個目標去討論呢？

七，九，清華園。

(前半見本刊第五十八期)

(三)

(二)教育當局不但要分開治學和治事的途徑，並且

應該爲二種人材謀確定的出路。後者的出路當然在乎任用

賢能以圖建設。這事非待政治上軌道是不易實現的。

（同時這事若不實現到相當程度，政治也難上軌道。）治學人材的出路與政治的關繫較淺。第一，辦教育者要承認學術自身的真價值，給篤學之士以誠心的贊助和獎勵。西洋先進各國對於學術的推崇，學者的尊敬是人所悉知的。在彼處一位對於學術有貢獻的人是常常名利兼收。貢獻愈大，名利上的收穫亦愈大。已死的學者文人，也受政府或人民的榮戴。我們只須一看各國通都大邑中文人學者等的紀念品——碑，銘，像，墓等——即可了然。中國對於學者的崇拜，以較西洋，真有望塵莫及之慨。假如一位西洋游客到中國來觀光，他隨地所見的不是李太白或韓昌黎的紀念碑，也不是蘇東坡或戴東原的銅像。他所數見不鮮的是和尚廟，道士觀，尼姑庵；文廟，武廟，或其他「立德立功」者的生祠專祠；此外惹人注目的還有偉人要人的陵墓，前代帝王的陵寢；有名烈士，無名英雄的紀念建築物；……假如他相信中國文化是以「士」或學者文人為中心，他看見此種現象或許要發生「莫名其妙」的感覺。我並不是說我們不應當紀念偉人先烈。我祇是說中國雖歷來號稱重士，而實際上並不看重真正的「書獃子」。在此種環境中辦大學，自然難得滿意的結果。我們要辦大學，同時必

需獎進學術，養成尊重學者的風氣。

所謂獎進學術，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兩方面。物質上政府可以與學者以種種的援助或獎勵，如研究設備，學術獎金等等。但是精神上的援助也是同等的重要。潛心學術的人很少是為利的，有一部分（也許是很少數）的人，甚至連名也不在心目之中。他們以為讀書自有真樂，研究工作的本身即是他們努力的報酬。不過衆人的欽佩；知音者的讚許，也可以與他們以快意的刺激。社會上如能養成一種尊崇學術的普遍空氣，獻身學術的人數自然增加，研究的興味自然更趨濃厚，學術自然可以進步。不然，學以致用的觀念永遠壓倒學以求知的態度，中國的學術永遠不能與他國爭衡，永遠要落伍。

（四）

（三）我們在上面已經說明大學是培養學者和通人的最高學府，並且主張政府應當獎進和援助治學的人材。現在我們更進一層，建議於教育當局，確定一種積極的政策，培養學以求知的風氣，在大學當中提倡純粹的科學精神。實用教育的重要是不容否認的。但是注重實用已成爲現在許多黨國要人的口號，更無須乎我們治下小民的提倡。至於求知的科學精神，似乎至今尙未爲一般人所重視。沒

有這種精神而辦大學，恐怕很難得著結果。所謂學以求知，就是愛好學術，或承認學術本身有價值，而去求學；至於學是否有「用」，並不在心目當中。

近來頗有人提出「讀書不忘救國」的口號。假如一個學生在讀書的時候，一字一句之間，念念不忘「救國」，我相信他雖手不釋卷，必是「心不在焉」，不知所云。其實「救國」太熱心的人，根本就不必讀書（雖然讀書的人未必無補於國）。況且作一事而別有所為，便是缺乏誠意。缺乏誠意的工作，每難得圓滿的結果。有人說，假如青年為救國而讀書，宗旨豈非極端純正？假如他是誠心愛國，豈可說他缺乏誠意？我的答案是：救國的宗旨固然比陞官發財較純正，但從治學本身方面看來，却是同等的不純正。滅獲亡羊，那有善惡的分別？況且把工作與目的打成兩截，尚有一個很大的流弊。為目的而工作，工作自身便失去了意味。淺見的人，有時急於達到目的，每至於取巧徼幸，以圖不耕而獲。我們如果把國人與西洋人一加比較，更可明白這種淺薄實用主義的弱點。我們不妨拿商人來做一個例。中國商人以賺錢發財為目的，以經營商業為手段，二者截然兩事。所以他們對於商業本身並不感覺興趣。只要可以賺錢，任何卑劣有礙於商業的事都可以做。他們的理想

是發一注大財，退休養老，做「封翁」，享清福。美國的商人往往有發了百萬千萬的財，到了六七十歲，應當退休的時候，依然繼續不斷的工作。他們在從前，固然是為賺錢而經商。但他們對於經商工作的本身也有興趣。換句話說，經商是手段，同時也是目的。到了發財已後，他們顯然不是為賺錢而工作，乃是為工作而工作了。我以為缺乏為工作而工作的精神，正是中國「國力」不充實的一個大原因。有了這樣「自強不息」的精神，國力才有增長的希望。假如國人能忠實誠懇地為做官而做官，為當兵而當兵，為讀書而讀書，為遊戲而遊戲（可憐得很，中國人往往連遊戲也有另外的目的）——如果多數人有如此誠實的態度，全國的事必定好辦多了。我們要培養此種精神，應當先從所謂知識階級做起。最低限度，號稱最高學府中的人，應該有為讀書而讀書的態度。能有此種態度，學術方得進步。學者以學術的自身為目的，所以他的工作和貢獻沒有止境。假如一個學者治學的目的是在學問以外，目的——一經達到，求知的事業即便停止，他自己也成了學術界中的死人。

（五）

我們如能承認（一）「治學」是大學教育的基本工作；

（二）治學治事應當分道揚鑣，不可以治事而害治學；（

三)政府應爲治學人材謀出路；(四)學以求知的態度是急待提倡和培養的；——假如我們承認這幾點，我們便能確定一較合理的大學教育方針。根據這個方針去整頓教育，或者可以更見功效。至於文法學院的學生數目是否不應超過理工；各校某院某系是否應縮小或裁併；私立大學是否應添設文法學院；諸如此類，尙係枝節的問題，一時縱

俄國與亞洲關係之將來

Prince A. Iobanov-Rostovsky 著 鳳岐譯

本文是近來出版的「俄國與亞洲」一書的結論。這

本書 (Russia and Asia, New York, Macmillan

Co., 1933) 是俄亞關係史的一部極好的入門著作。

著者是與李鴻章訂密約前俄國外交總長的後裔，現在美國當教授。
廷蔽識

俄國往何處去？俄國在亞洲的行動將來有什麼可能？

這兩個問題對世界未來的命運是極端重要的。但是，任何肯定的回答在現在仍還太早，因爲俄國與亞洲都正在活動勢力的劇中，改變是很快的。這個運動的步驟與方向是如斯歧異，要想對俄國及亞洲發展的趨勢作任何的調和與比較，那幾乎就不可能。現在能作到的是對於幾種論俄亞關

不能圓滿解決，於大學教育成績的大體并無多大的影響。反過來說，如果我們不能逐漸地養成學以求知的風氣，大學教育終不免似是而非，難於整頓。倒不如老老實實地免唱高調，不辦大學，而專心致力於職業或專門學校，也許能够名副其實，得到相當的效果，不致把得之維艱人民血汗的金錢盡數擲之於無用之地。(一九)

係的普遍觀念加以批評的分析。

現在有兩種觀念似乎非常普遍。第一，是蘇維埃革命的結果使俄國恢復亞洲的本面目，這樣確乎破壞了彼得大帝想以俄帝國爲歐洲國家的企圖；第二，是俄國人并非是一個民族，不過是諸民族的一個混合體，包有一個純粹亞洲的強大分子。

在我們討論這些辯論之前，有一件事必須要記住：一切大革命都產出一類的意念或人生觀，與當時的統治觀念相衝突的，所以便震撼了當世。這種情形在已往有共和時代的清教英國，和「雅各賓」(Jacobins)時代的法國，在當今有共產主義的俄國。但沒有人爲了這種理由就說克

林威耳 (Cromwell) 及羅比斯比爾 (Robespierre) 是亞洲人。

關於俄國退回到亞洲這一點，俄人既曾未從亞洲出來，我們怎能說他們現在是回到亞洲去呢？我們要記得斯拉夫族原來是從中歐遷入俄國的。假設在途中遇到亞洲游牧部落的侵略者——這些部落，我們須要記得，在「大侵犯」(Great Invasions) 時期中，會同樣波濤歐洲其他各處——他們是必須抗戰，有時也為侵犯之潮所淪沒。我們可以很奇異的看到，匈奴族 (Huns) 阿梯拉 (Attila) 的侵犯東西曾達到奧爾良 (Orleans)，而阿拉伯人曾自亞洲經非洲及西班牙進抵都爾 (Tours)。這兩個亞洲侵犯的潮流，一東一西，相隔數百年，它們的終點差不多就要在法國相交了。我們都知道歐洲現代的民族是混雜了這些侵犯者原來的血統，那麼俄國斯拉夫人也很難與歐洲其他白種人的支派有多大分別。

嚴格說來，歐洲的全部應該看作僅是亞洲的延長。我們很難了解，為什麼次大陸的印度有地球上最高的山脈及廣大的海洋使它與亞洲隔離，竟應該稱為亞洲的一部，而無顯明地理界線的歐洲反劃為分立的一洲。

至較近的時期，在俄國有韃靼人的領地，好像西班牙

之有摩爾族領域一樣。但我們必須不要把韃靼的影響估價過高。種族間血統的混合關係并不太重大，並且在文化上俄國也未被消滅，因為當她們來時，俄國已經有四百年的自己文化的結晶了。韃靼人確乎把俄國幾種固有的而與亞洲的觀念相近的趨向給擴大了。這樣的看，東方的勢力的確曾在俄國發生影響。我們必須知道，俄國的生活與文化是以東羅馬帝國為原本的，如果東羅馬帝國可以看作是一個東方國家，那麼俄國也可以如此看。不過羅馬是一個模型，東羅馬帝國是由它脫塑。那麼我們注意東方成分的時，必不可抹殺這個基本事實。

寬泛的說，俄國的歷史與歐洲其他各國的發展大致是同路的。繼基市 (Kiev) 王權而參民治意義的時代，有個分裂的時期，這種情形也就像封建時代的歐洲一樣，雖然我們儘可以說拿俄國的制度和封建相比擬是浮淺之談。統一的俄國之升為強國與西班牙，法蘭西及其他各國如出一轍，同樣，俄皇專制政體的降臨也與西歐獨裁主義之生長完全合調。恐怖的約翰 (John the Terrible) 有英國的亨利第八及西班牙的斐利第二作他的對偶，彼得大帝有普魯士王威廉福祿特耳 (Frederick William) 作他的對偶，威廉也頗有大彼得之風，一意獨行，凡部屬之不聽其命令

者輒管斥之。喀薩林第二可比之馬利特利薩或約瑟第二（*Maria Theresa or Joseph II*），此外不再枚舉。

雖然如此，但以上所舉的幾個俄國人物都比他們對偶的專制權力或殘暴程度更加誇張，在這誇張之中，東方的勢力又表現了。因同樣的原故，俄國歷史的演變還有一個特別，那就是較西歐同樣的進程要落後一二代。這種落後使我們覺得俄國是固立不動，其實如我們單看俄國，不拿歐西來比較，我們就會覺得她的進步是穩進的。譬如，農奴的廢除在普魯士是於一八〇七年，在匈牙利是一八四八年，在俄國是於一八六一年，并且俄國須等到二十世紀之初才有一個微弱的憲法制度，這在普魯士是一八五一，在奧國是一八六一就採用了的。

我們還要注意到俄國發展至亞洲本部之時，就是西歐正在擴展殖民地之日。並且，俄國在亞洲的成功是得力於歐洲較土人的優越技術，當彼得大帝的歐化改革給了俄國充實的軍備之時，這種運動就加速進行了。如此，我們可以似奇而非奇的說，俄國是不能够成爲一個亞洲國家的，除非她先變成一個歐洲化的國家。

蘇維埃革命，因其新政策之撫育聯邦中的亞洲各小民族的文化自治，及其五年計劃中之經濟的發展，給了蘇維

埃亞洲一個新的價值。在帝俄時代，各反抗民族已經淪沒，并且在俄國生活上已經不甚顯明。論國內文化的一致僅美國可與之比擬。當我們橫越歐亞大平原之時，我們感覺到依樣葫蘆的俄國的普通空氣滿佈於相隔有數千英里之遙的城市。在俄國恰如在美國一樣：美國的主要異族人民，甚至於有色的小民族都不能對城市情形有什麼影響，這些都是以美國人爲主體的；我們在極遠的亞洲僻角也常感到在大斯拉夫帝國內，俄羅斯文化的統治。以前被同化的小民族現在在蘇聯的政治上享受平等合羣的新生活。所以在蘇俄境內到處有亞洲民族的存在，使外國的觀察者產生這種印象，說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歐亞民族的混合體。

下列之表（略），引自一九二八年之蘇聯年鑑（頁二二），它指出在聯邦中所居的各民族的地位：

民族名	百分
俄羅斯人（大俄羅斯，烏克蘭人及白俄）	七十七·三
喬治亞人（Georgians）	一·二
希臘人及阿麥尼安人（Greeks and Armenians）	一·三
韃靼人（Tatars）	一·〇
可基斯人（Kirgiz）	〇·五

巴什喀人，喀耳穆克人，布雷特人及雅苦人 (Bashkirs, Kalmycks, Buriats and Yakuts) 〇・八
 烏伯葛人及東土耳其人 (Uzbeks and Turkomans) 二・四
 高加索山人 (Caucasian Mountaineers) 一・一
 猶太人 一・八

雜民族 (非俄羅斯人的歐洲小民族除外) 〇・六

即使我們尊重烏克蘭及白俄激烈的愛國者的要求，不把這兩個俄羅斯族的支派計算在內——雖然她們有血統，文化，及語言的密切關係——我們仍可以看到大俄羅斯民族佔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二・九。關於表中之亞洲各民族，祇有阿麥尼安人，喬治亞人，及猶太人有相當的文化。其餘各族都是極端原始的民族，并且多半都分成若干小部落，漫居於廣漠的地帶，有時他們中間相隔有數百英里。俄國的人口密度在歐洲是每方英里二四・五人，在亞洲是每方英里一・二人。所以，如果說蘇俄將被亞洲的小民族所統治，如某幾位作家所寫，那麼無異於說美國是為黑人及紅人所統治。

現在還勝一個種族互婚的問題。侵犯的結果，韃靼人血統混入，這比較是不關重要的，我們已經看到了。但是，在西伯利亞的殖民當中，俄國的移民會與土人，尤其是

喀薩克人雜配，可是由此在宗教爭執上便發見一個有力的阻碍。俄人對種族觀念并不很深刻，但他們的宗教情熱使他們與土人很有力的隔絕。與異教徒結婚是俄國所禁的，法律和習慣都如此規定；土人改奉基督教的情形比較很少，障礙確乎是有的。

有這些事實在胸中，才能够討論俄國革命和俄國回到亞洲去的問題。蘇維埃制度會致力於剷除東羅馬帝國的成分——這是舊俄國的基礎——并且業已成功。專制政體及正統教是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大基石，現在已經消滅或慘遭打擊了。東羅馬帝國是俄國北方影響的最初來源，現在列的發展程序，好像走了相反的方向。蘇維埃革命是自大彼得發軔革命以來的最後之革命過程，這個假定似乎很真確。誠然，大彼得用傳播的技術學問給俄國的上層社會介紹了西方文化，現在蘇維埃制度在摧毀高層階級之後，亦為下層階級介紹了技術教育。兩方的目的都相同，講求自助和建樹功率。所差者祇是作此試驗的關係人數與階級不同而已。大彼得從國外採取他的理想，參合以俄國的情形，列寧也是如此，他把德國的馬克思主義移植到俄國的土壤上。

俄國與歐西的關係從來沒有比大戰以後這樣的密切。當然，俄國因為標榜共產主義的逐被擯棄於國際團體之外

。實在的說，我們觀察大戰以後的俄國地位，就可以看到她的西南兩邊界，在已往足以阻碍或打擊她與西歐交際的諸大帝國，現在已經衰弱——如德國——或被削毀入於二等！

如奧國與土耳其，之列了。小國自波羅得海至博斯普斯（Bosphorus）蜿蜒如鍊，她們是不能代替那些强大帝國的。二百年來，俄國與這些帝國鬭爭，精力消耗殆盡。

因此，大彼得，喀薩林，以及十九世紀中諸俄皇所遇到的難題現在已告解決，並且是利於俄國的解決，那變俄國因大戰而失掉土地總值得了。

第二個要說的因子是俄國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從來沒有像現在那樣的強烈。這原因或是由於俄國的文學，藝術，及科學的直接傳佈，也許是由於俄國逃犯的行動，他們的歷史上的任務似乎是向其他各國說明他們自己的國家。所以我們可以有希望的假定，當俄國遲早在國際間恢復她的正當地位時，她對歐洲的地位將比以前提高。

但是這裡有問題發生了，俄國是否要很小心的去佔有這個地位？從反面回答，我們可以說在俄國歷史上的確已經展開了一個新頁。不僅是俄國的重心向東方移動，向殖民的新地帶和亞洲的經濟企圖方面移動——這我們已經看見——，而且在太平洋的對岸又興起了新的文明，這些文明比

較歐洲的文明更合乎她的需要。所以為將來着眼俄國必將逐漸東向，因為歐洲對她貢獻了一些過去的陳腐的東西，她對它們已經沒有興趣了。

但是在這裡我們必須再看看亞洲的均勢。土地方面，俄國已經不能再有更遠發展了，她現在的問題是去保守和開發她的所獲。這樣祇有為建設一個新文化之心所驅使，始能從事經營。僅靠歐洲帝國主義時期所用的暴力是不能保障俄國在亞洲的土地，去反抗一個從亞洲襲來的新的可能的猛擊；現在是日本，將來也許是中國。假設俄國在亞洲有新的話講，使亞洲各國都樂於聽從，那麼她的土地即可保持。

這個新文化，俄國必將去發達它，必將成爲一種折衷的文化，與過去的歐洲文化不同，過去的歐洲文化是僅合乎白種人的需要的。在這一點，我們可以引兩個作家的預言來玩味，雖然他們的觀察大不相同，但都是具有俄國的親切知識的。回溯至一八五〇年，俄國著名的革命家兼著作家黑爾茲恩（Hertzen）氏曾寫過這樣幾行：「插上社會主義的雙翼，俄國可以飛遍歐洲達於大西洋。俄國與歐洲之間的此種鬭爭是不能避免的」，這個預言者的眼光是值特書的，他在七十年前就看到蘇維埃諸領袖的內心宏願，

和俄國以現在的政治制度向歐洲舊有的秩序挑戰。第二個預言是現代德國馳名的哲學家克載林 (Count Keyserling) 所作，他說：

「我敢斷言俄國有一個偉大的前途，是，在各方面都是最偉大的。在這個富有精神及活動力的可驚的天賦民族中，人類最重要的文化要開花了。但是這個燦爛的未來，我預斷須於數百年後方能出現。在這以前，混亂是不可避免的。」

這個光亮的預言一面太樂觀，同時也太悲觀了，但是對俄國却提出了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叫她去創造一個獨立的新文化，不然她必致於陷入無政府的狀態，并且將為亞洲的侵犯所征服，或受併入各先進國統治之下。至於這種

新文化將為黑爾茲恩氏的預言所說，及現代一般相信蘇維埃試驗終必成功的作家所稱的社會主義的呢？抑將為一種綜合的，包有革命以前的殘餘分子難以蘇維埃竭心盡智的創作的文化呢？只有將來可以告訴我們。不過在已往的諸世紀中，俄國是致力於向外發展的，現在她必須聚精蓄神

的去創造和發達一個新的文化。這樣一個內部發展的主見須要與其他各國講和平；同時，為生存起見，俄國人必須兼用歐亞兩洲的元素來培養他們的文化沃壤。如此則此種新文化將同樣強烈的影響到亞洲。現在亞洲對世界的影響既日大一日，那麼俄國因為在亞的影響，將能够轉移世界的命運。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報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業已售完。現在第二十六期至五十期亦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特價如下：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定縣社會概況調查

定縣秧歌選

精裝實價三元八角
平裝實價三元二角
郵費另加二角三分
精裝實價二元五角
平裝實價二元二角
郵費另加一角六分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發售處 1. 河北定縣考棚街本會 2. 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本會 3. 代售處北平神州國光社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報價目

「本報」每月一元
「體育」每月五角
「學園」每月五角
「藝園」每月五角
「社會新聞」每月二元
「外埠通訊」每月二元
「經濟界」每月二元
「教育界」每月二元
「體育界」每月二元
「學園」每月二元
「藝園」每月二元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這一星期

鎗口對外不可亂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初稿

鄉村運動之政治的意義

國際經濟與中國

三、生銀與中國

中國縣志的改造

太平洋國際學會

蔣廷黻

燕樹棠

芝生

守愚

吳景超

衡哲

寄售及代定處

鎮江	南京	上海	天津	平西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	張記書
鎮江書局	中央書局	新中華書局	現報部	天津大學	成府書局	永華書局	堂文社	宣內社
樓山書局	新中華書局	新中華書局	現報部	天津大學	成府書局	永華書局	堂文社	宣內社
樓山書局	新中華書局	新中華書局	現報部	天津大學	成府書局	永華書局	堂文社	宣內社

徐州	漢口	武昌	廣州	汕頭	廈門	漳州	青島	濟南	天津	北京	上海	南京	鎮江
徐州廣告社	漢口廣告社	武昌廣告社	廣州廣告社	汕頭廣告社	廈門廣告社	漳州廣告社	青島廣告社	濟南廣告社	天津廣告社	北京廣告社	上海廣告社	南京廣告社	鎮江廣告社
徐州廣告社	漢口廣告社	武昌廣告社	廣州廣告社	汕頭廣告社	廈門廣告社	漳州廣告社	青島廣告社	濟南廣告社	天津廣告社	北京廣告社	上海廣告社	南京廣告社	鎮江廣告社

獨立評論

第十六號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廿三日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這一星期

鎗口對外
不可亂

「鎗口對外不對內」這標語當然是民族覺悟進步的表現。如果從此以後國內的鎗口永不對

內，那這二十年的內戰犧牲總算得着了一點的代價。可惜這一月以來的察哈爾問題竟有因鎗口對外引起風波致轉而對內的可能。這是何等悲痛的事。

馮玉祥氏此次行動的背景如何，我們不知內情的人不願有所論斷。馮氏與中央及北平政委會交涉的經過，因雙方部份的守秘密，我們亦不能加以任何審判。據馮氏方面所發表的言論，他這次所爭的是政策，是要繼續抗日；他的具體目標是收復多倫。其意志之能引起民衆同情這是很自然的。不過從國法上講，鎗口對外亦不能亂。倘國內握兵者可隨時隨意向外開槍，這就不成一個國家了。國與國之間的和戰問題是與民族存亡最有關係的問題，是故近代憲政的國家對講和宣戰的權利慎之又慎。國家的元首尙不能亂用此權，何況私人？

塘沽協定是我國的國恥，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不過一九一九年的維爾塞條約何常不是德國的國恥？一八七一年的佛郎克佛爾的條約又何常不是法國的國恥。但是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國恥，如同法德國的國恥一樣，不是你今天打一下，我明天高興又打一下所能雪的。這種局部的，無充分軍事，經濟，政治，及外交預備的戰爭，縱論得着一時的小勝利，終久徒給敵人蠶食的機會。中日的問題，我們不要看錯了，是世界歷史上的第一等嚴重的問題。日本武力所創造的大陸帝國非用更大的武力是不能消滅的。日本的武人非弄到家破國亡是不甘心的；他們也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塘沽協定以後，華北的局勢很像九一八以前的東北四省。現今河北省的東北隅就是九一八以前的南滿。因為從條約——協定——所得的權利——內包括駐軍的監視，排日的禁止——及地域的接近，日本在華北已得着了一特殊的地位」，正如九一八以前日本在東北自說有其「特殊地位」一樣。根據這個「特殊地位」，她說她有干涉的權利（Right of intervention）。我們倘以九一八以後所得

的經驗來處置九一八以前的東北問題，我們的辦法必會與張學良氏當時的辦法不一樣。我們必會一面竭力避免衝突，一面竭力充實內部。我所說的充實內部是指維持地方治安，減輕人民負擔，獎勵及推進移民，調濟漢滿蒙的權利和感情，實行普及教育。換言之，就是寓富寓強於民。對於日本，我所說的避免衝突是指妥協：她所已得的權利我們不必過問；她如要求新權利，我們就向她要求交換條件。在這種妥協之下，我們所求的是：她的權利進一步，我們自己的權利必須進一步。那時民政在我們手裏；北滿的日本勢力尚屬有限，我們大可有為。張學良氏不此之圖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初稿

國民政府立法院所草擬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初稿，於去月七日由其主稿人吳經熊委員，以個人的名義在上海發表。憲法問題何等重大！而草案發表之後，到現在經過了一個多月之久，國內的輿論界迄未予以相當之注意。社會上這種冷淡而不注意的態度，自然又構成一個嚴重的問題。因此反而引起我們的注意而感覺到對於憲法問題有討論之必要，借以明了這個問題肯綮之所在。

：對幣原的外交則竭力抵抗，對內則政治不求修明。九一八事件一爆發，他對日本軍閥的侵略則祇知不抵抗，亦祇能不抵抗。張氏在中國武人中，論愛國心思，並不在他人之下。他自己也說過：如張氏父子不愛國何至有今日？這句話是很忠誠的。不過為國家當權缺少愛國心固不可，僅有愛國心而無政治家的眼光和能力亦不可。以鎗口對外自豪者不可不深思。我們從九一八所得的經驗不可又忘了。現在河北省及全華北的急務不在繼續戰爭，而在寓富寓強於民。我們所應督責當局者就是內部的充實。這是我們對華北的治本。

七月十七日

燕樹棠

憲法是法律，我們必須明了它的內容。法律的效用和效力依環境而定，我們必須明了它的背景。茲就這兩點略加討論如左：

一，草案的內容

這個憲法草案取材很豐富。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歐美憲法的通例，德奧憲法的新例，以及民國以來所已經頒布的憲法，都是構成這次憲法草案的

淵源。草案共五編，計二百十四條，可謂洋洋大文，把國民黨的主義，及世界新舊憲法的前例，都包括在裏邊了。但憲法不是教科書，不是公民常識，所以內容的系統和規定自然要特別的斟酌。

這個草案可以認為不妥之點，簡單的說，有五點：

第一，編名太平板。 憲法是含有政治性質之法律

——不是政法上佔優勢者理想之實現，便是兩三勢力互相讓步之辦法。所以成文憲法之規定，其要着不在形式上系統之整齊，而在能夠定明爭執之要點，這個草案全部分為總則，民族，民權，民生，及憲法之保障，五編。這些編名，若用附會三民主義，自然未嘗不可。若用這種方式寫五權憲法的草案，未免不甚確切。我們都知道：五權係指立法，司法，行政，彈劾，考試，五權而言。歐美憲法普通的方式是以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為主幹，而附之以人民之權利義務，法律案，財政，教育以及其認為必要的事項。我們起草五權憲法，若採這種普通的方式，豈不簡單，明白，直接，了當；又何必拉用不應拉用的三個名詞呢？況且總則，民族，民權，民生，憲法之保障，五個編名，容易使人聯想到民法法典，總則，物權，債權，親屬，繼承五個編名，狠不容易使人一目了然其要義。所以我說

這憲法草案編名似過於平板而不切實。

第二，關於政策之規定太多。 憲法是法律，不是理想；是短時期之內能夠施行規則，不是狠遠的將來可以實現的政策或政見。這是狠要緊的區別。法律的力量，法律的尊嚴，法律的信用，法律的神聖，全靠它實行的程度之高低或可能性的多少。各種法律案的起草人應該注意這個區別。憲法本是含有政治性質之法律，亦有偶爾參雜政策的規定，但這種規定不可太多——太多就是近於宣言，而喪失了法律之性質。這憲法草案之中關於政策之規定以民族民生兩編為多。例如，第十條——『中華民族以正義和平為本』；第十三條——『中華民國與各友邦締結條約，應基於國際平等互尊主權之原則；其有違反此原則者，應設法修改或廢除』；第十五條——『國內之弱小民族，應扶植之，使有實行自治之能力，與充分發展之機會』；

第十一條——『民族地位之提高，端賴教育，為父母者於其子女之德智體三育，應注意之；孝敬父母，乃中華民族固有之美德，為子女者應遵守之』；第一百七十二條——

『為發展農村經濟，政府積極實施左列事項——（一）墾殖荒地，開發水利；（二）設立農業金融機關……』；第

一百八十七條——『實施教育時，人格之培養與其他目

的并重」；等等條文。這都是關於政策之規定。若偶有幾條，還不致大影響全部法律之效力；若像如此之多，全部憲法之力量必大受不利之影響。

第三，不必要之條文太多。起草法律案不像作八股文章那樣的要啟承轉合，湊成篇幅。文字務求簡明，不必要的字句，固然不可用上去；不必要的條文，更不可用上去。文字簡明，正所以保存法律的力量。草案中可以認為是不必要的條文，例如：第三條——「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人民」——此點在國籍法裏邊已有相同之規定；第十七條——「婚姻為民族發展之基礎，應受國家之保護」——民法親屬編關於婚姻專章之規定，都是對於婚姻制度之保護；第二十條——「非婚生子應由國家保護之，使與婚生子享有生存及發展能力之均等機會」——此點在親屬法中已有明文規定；第一百七十八條——「重利之借貸及動產不動產之重租，應以法律禁止之」——此點在民法債編及地土法均有禁止或限制之規定；第一百七十四條——「勞資雙方之關係，以協調互利為原則」——勞資爭議處理法完全以此為原則。諸如此類之條文，既經多有憲法或專條之規定，又何必在憲法之中再把舊話重提呢？

第四，條文有與五權原則衝突之點。按五權之原則

，凡屬司法之事項，都在司法權之下，都歸司法法院管轄；凡屬行政事項，都在行政權之下，都歸行政院管轄。但按草案之規定，所謂「國事法院」却獨立的行使一種司法權，而不統屬於司法法院。這國事法院，不僅對於憲法有解釋權，並且對於行政訴訟有審判權，對於被彈劾之官吏有懲戒權。特別法院解釋憲法之權，這種辦法雖有奧國新憲法之前例，然畢竟是違背五權之精神。其餘兩項不歸司法法院而歸獨立之特別法院，更與司法權獨立之原則不合。還有一點是關於行政權。按草案之規定，行政院為國民政府最高行政機關，而行政院正副院長却由總統提交國民政府任命。其中的問題即是行政權是歸行政院院長呢？還是歸總統呢？第二點是關於總統之規定。總統在五權原則之下，是處於「虛君」的地位，不是行使行政實權之人。但按草案之規定，總統既長行政權，又統帥海陸空軍。這種辦法顯然與五權原則衝突。

第五，全案綱領不清。因為草案的章節太平板，因為關於政策及不必要的條文太多，所以全案缺乏綱領，令人讀之而不知其要點之所在。既依五權之原則而起草憲法，即宜以五權為全案之主幹，無須競奇立異牽強附會。

二憲政運動的環境

憲政之目的，是在防止政府濫用國家大權，保障國民個人之權利自由。憲政運動，是社會群衆企圖達到此項目的而所爲的改革或改造行動。憲政的成功即是目的之達到。憲法即是因憲政運動的成功而所制定的基本的規範。歐美憲政的成功，自有其成功的背景。他們改革政治的理想是因適應他們社會本身的需要而發生的，他們的領袖和大多數的民衆，在成功前對於理想之信仰與在成功後對於理想之信仰沒有什麼大差別；他們的民衆是受過二三百年的自由思想之薰蒸和培養——所謂自由思想不是個人隨便爲所欲爲而其要點是在保護自己之自由并尊重他人之自由。因爲他們這種社會化的自由思想，所以他們個人的主張和行動也隨着客觀些，隨着社會化了；因此，社會上大家的政治行動却受了自己的限制，所以都有一個止境。這幾句話可以簡單的說明西洋憲政成功的背景，至少可以說英美德是如此。

我們看看我們中國憲政運動又怎樣呢？自從前清光緒年間的所謂『戊戌政變』，直至現在，仁人志士以改革政治爲己任，繼續的不斷，業已三四十年了！假若我們說：憲法是憲政運動之結晶，是民衆所希望的理想之實現，爲什麼一般人對於堂堂中央政府所發表的憲法草案完全不理

會呢？一般人這種消極的態度是事實，是失望的表示，是三四年的憲政運動失敗之鈇証。一般人這種態度不只是因爲這幾年府政政績之影響，實在另有特殊之原因：

(一) 代議制度實驗之失敗。代議制度是民權代替君權之辦法，是人民參政與執政之辦法。人民所選舉之代表與政黨之組織雖爲內事而實在有不可離的關係。代表與政黨在政治上之存在與成敗，全以民意爲歸宿。這是代議制度之要義。我們中國在前清末年及民國元年大家信仰代議制度可以救國可以保民。於是中央有國會；省有省議會；縣有縣議會。一層一層的都是人民所舉之代表。不久，選舉與被選舉，公開的舞弊，威嚇利誘，無所不用其極。人民之代表勾結官廳，爲人民謀利益之代表，反成官廳之爪牙。在中央之人民代表——國會議員——自民二以後，日趨分化亦日趨惡化，至民十二曹錕賄選爲大總統，代議制度爲一般人所鄙視吐棄至此達於極點。一般人對民主主義即喪失了信仰。

(二) 歷次憲法等於廢紙。自從前清光緒三十四年，以至現在，前後二十五年之間南北所頒布之憲法，和類似憲法之大法，總計不下十三四種，隨頒布隨失效方。前清光緒三十四年清廷爲迎合主憲之要求而頒布『憲法大綱』

宣統三年爲緩和武漢革命而頒布『十九信條』。辛亥革命而有『臨時政府組織大綱』。民元南京政府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北京政府頒布國會組織法及參眾兩院議員選舉法。民三北京政府袁世凱頒布大總統選舉法；又頒布『中華民國約法』。民七廣東護法非常國會通過『中華民國聯合政府組織大綱』；民九雲南護法非常國會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民十二北京曹錕政府頒布『中華民國憲法』。民十四北京段祺瑞政府頒布『臨時執政府組織令』及『國民代表會議條例』。民十七國民黨通過國民政府組織法。尤可怪者——這些根本大法之中，經過最久之討論而形式上最完備之憲法是民十二賄選總統曹錕所頒布之『中華民國憲法』。中央所頒布根本大法之外，在民十一還有湖南浙江兩省宣告省自治而頒布『省憲』。這些根本大法，無論是部分的憲法，也無論是全部的憲法，

總是不久即作爲廢紙。若由這種歷史的陳跡，而聯想到現在所發表的憲法草案，自然令人灰心！

其餘，如武人的專橫，社會的紛亂，內爭的迭起，國難的延長，都是使社會秩序不安定原因。法律爲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工具。社會若長期的不安定，法律的效力消滅，一般人對於法律自然失掉不少的信賴，憲法當然不能成爲例外。那麼，我們就無怪乎一般人不理會這堂堂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了！

現代的憲政，畢竟是西洋制度。現代的自由思想，畢竟是西洋思想。果然如此，我們若想得到略可滿意的憲政，恐仍須時間的經過——歷史的教訓。漫說這憲法草案有些可以批評之點；假設它是一個理想的草案，也恐怕無補於時艱。

鄉村運動之政治的意義

芝生

全國從事鄉村運動的團體，共同組織了一個鄉村建設協進會，於上星期在山東鄒平鄉村建設研究院，開成立大會。近來鄉村運動漸爲國人所注意，不過對於鄉村運動的

看法，各人不同。即主持鄉村運動的人，對於他自己的工作之目的及價值，亦各有不同的見解。本來歷史上一個大運動之發生，主持的人，對於他所主持者是怎麼一件事，

往往有不自覺的。環境逼人造成了一種運動，主其事者但覺爲環境所迫而不得不如此。至於事情作了以後，大家回想了一下，才一齊說：『哦，我們原來作了這門一件事情！』照海格爾意思，哲學家的任務，就是在歷史上替人類，或者替『宇宙精神』說這門一句話。

鄉村運動在現時正在進行中，但他是怎麼一件事情，大體上已經可以看出來。以下就是指出他是怎麼一件事情。主持鄉村運動的人對以下所說或有不能同意的，那只能等歷史來證明了。

有許多人說中國人善忘。數十年來，中國受了屢次的大打擊。每次都是打剛挨過，馬上就又忘了。這話至多只有一部分的真。中國人有些是善忘的，有些不是的。中國近幾十年的擾亂，有些是由於中國人之善忘；有些正由於中國人之不善忘。我們一看中國的現代史，我們就知中國民族無時不在設法自救之中。自救必須自強；自強必須要改革內部，這是一定的理，也就是中國民族現在所走的路。

談到改革，又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因舊有者而逐漸改之；一種是完全推倒舊有者馬上以新的代之。換言之，一種是進化；一種是革命。借用佛學的兩個名詞，即一種是

漸，一種是頓。

在清末我們改革的時候，同時有兩派的改革運動：一派主張用漸的方法，首領是康有爲；一派主張用頓的方法，首領是孫中山。用漸的方法改革，事順而犧牲少；用頓的方法改革，事逆而犧牲大。但用漸的方法有一必要條件，就是必須得被改革者之合作。康有爲得不到這個條件（他從清德宗手裏暫時得了幾天），所以他失敗了。後來朝廷雖也『預備立憲』，但其誠意不爲人所諒。以後中山所領導的用頓的方法的運動就一發不可止了。從大處看，這種運動，中間斷斷續續，是直到民國十七年才告一段落的。中山的靈樞，在南京紫金山下葬，成了一個中山陵，其所象徵的意義，就等於一朝的太祖高皇帝，初次坐太和殿。國民黨政權取得，而建設之成績未著。擁護當局者說：因爲內憂外患，紛紛而來，所以政府不能建設。反對當局者說：因爲政府不能建設，所以內憂外患，紛紛而來。這兩方面的說法，都不無理由，因爲歷史上的事情，本多互爲因果的。

無論如何，國民黨之成績未著，乃係一件事實。於是一般人感覺需要更深刻的改革。主張更深刻改革者又有兩派：一派是主張用漸的方法，一派是主張用頓的方法。前

者是鄉村運動，後者是共產黨。（本來國民黨之民生主義，若實行起來也是一種甚深刻的改革。不過國民黨自從放棄了聯俄，容共，農工，三大政策以後，對於此方面很少注意，而差不多完全回復到民元時代之景象。再鄉村運動及共產黨均不始於最近數年。但近數年所以大引人注意者，因現在人始覺有更深刻改革之需要也。）

在河南省內，平漢鐵路兩邊，有兩個不同的區域。在鐵路西邊，鎮平，內鄉，浙川三縣，在全省及全國民不聊生的狀態中，真作到家給人足道不拾遺的太平景象。這三縣的人本來是以辦民團爲出發點。後來採取辦鄉村運動的各種辦法。他們很用點社會政策。（如果不是社會主義）。

例如他們所行的收捐辦法是用累進制的。一家（按一夫一婦三小孩計算）有五畝地者免捐。有五畝地以上者，從第六畝起，每畝收捐三升。有一頃地以上者，從第二頃起，每頃除上數外，多收一石。若田地再多，則捐數更加，這些糧食收來作爲全縣的公產，一切公共事業，都用此糧爲財源。政府若派有苛種雜捐，能商請免除者則請免除，否則即由自治公所由此公產內代全縣交納。惟對於政府之特稅（即鴉片公賣）及鴉片煙地畝捐，則絕對不承認，因爲他們嚴禁鴉片。他們對於經濟也能統治。能入他們境

內的貨物，只限於本地所無而又日用必需之幾樣，例如鹽糖紙等。人民穿衣服，只有綢及土布；這是他們本地出產的。衣服顏色只有藍白兩種；藍是本地所出的靛染的。他們真能組織民衆，什麼調查戶口，清丈地畝，都辦的很清楚。三縣三百餘里的地方，一個命令下去，一兩個鐘頭內可傳遍全境。他們是軍號傳令，村村相傳，所以有如是的神。徐向前及賀龍都去攻過他們。他們用堅壁清野的辦法，四境的人都集中起來，糧食連走或燒了，并用土填了。『無人之境』人進去是沒法辦的。（因此我們可了然何以江西的紅區，有數十萬人圍住而總是攻不進去的緣故。）

在平漢鐵路的東邊，商城固始等縣是紅色區域。去年蔣委員長調了幾十萬兵攻進去，把徐向前趕到四川。但是軍隊一走，聽說殘餘的共黨，又有恢復原狀之勢。現由安徽省政府主席劉雪亞帶了十一個帥在那裏圍住。至於紅色區域內邊的情形，我們不很清楚，不過裏面民衆是有組織的，這是大家所公認的。

這兩個區域，中隔一條鐵路，相映成趣。他們對於現狀都有所改革，但是一個就舊有者逐漸修正，一個是完全推翻現狀，尤其是在風俗習慣方面。一個是用漸的方法，一個是用頓的方法。

我們都希望現在的狀況能用漸的方法改革下去，因為他事順而犧牲小。不過上面已竟說過，用漸的方法之必要的條件，就是得到在有當局之合作。現在當局也漸知道鄉村運動之重要，但政府下面也有視主持鄉村運動者為眼中釘的。例如河南鎮平之設施，江西省政府派人去參觀學習，而河南省政府却將鎮平的村治首領彭雨亭一度通緝，因為他抗拒特稅。現在彭雨亭被人害死了。一般人對於鎮平村治的前途，不慮後起之無人，而慮政府不能容他下去。

政府現在以乎也注意於復興農村。中央也設了委員會

國際經濟與中國

守愚

(三) 生銀與中國

過去一星期內，經濟會議的進程，真是慘澹已極。如作者所料，自從貨幣安定問題擱淺後，其餘大的問題，如關稅，戰債，賠款等，一個都提不出。我們所看見的，祇是一些枝枝節節的小麥、糖和錫的生產限制問題，並且還是零零落落的來解決。到了現在，還沒有十分確定。休會的聲浪，却是瀾漫世界，日期據今日報載已定在二十七日了。在這個關頭，我們忽然的聽見八國協定限制生銀出售

，有些省也派了調查員，國聯也派來了專家。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必研究，不必調查，不必等專家發表意見，而人人都知必需要立刻辦的，就是孟老先生那句『省刑罰薄稅歛』老生常談。要是這一句不辦或是辦不到，而只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那就是上帝派了專家來也復興不了中國的農村。時候稍已久了，所謂復興農村，恐怕要與清末之『預備立憲』得同一結果。這是我們所不勝憂慮的。

數量。我國便是八國中之一。又忽然的聽見這個協定，因為金本位國家，為報復起見，設法破壞。所以到如今，還沒有簽字。我們究竟應當跟着國內報紙的宣傳，先喜而後憂呢？還是另有意見，認為這種協定我們雖然參加，亦不必喜，亦不必憂呢？在沒有答覆這些問題以前，我們先得把生銀問題，幾個要素弄清楚，纔可以把因果和影響說明，討論起來，便有意義了。

生銀出產國家最重要的，為墨西哥，美國加拿大。這

三國的銀產，佔全世界產量四分之三。其餘如秘魯，澳洲，波立維亞，印度，德國，日本，西班牙，智利，合佔百分之二十一。生銀又大都為其他金屬的附產品，如鉛銅錫銻金等。所以即使不專為生銀而開採，每年由附產品所出的生銀，即佔全產量百分之七十。除了由開鑛所得者外，還有東亞民間的藏銀，（如首飾銀幣銀塊，隨時均可變買，並且生銀本身的價值，和化成標準銀條的成本相比，差得很遠，要是市價合宜，狠值得溶化的）印美法等國庫存生銀，各金本位國減少銀輔幣成分的賸餘生銀，和改採金匯兌本位國家的多銀。除民間藏銀可以出售的數量，無法推測，和美法兩國的庫存生銀，輕易不動者外，其餘悉為銀市場上可以供給的生銀。關於銷受，歷來中印兩國，佔全世界鑛銀出產百分之八十，或世界銀市供給量百分之六十六。自一九二八年以後，東亞銷銀趨勢，中國較多於印度，其次為工藝銷耗，最大用途是硝酸銀，為製照像底片的基本原料。此類銷耗，不獨與銀產成正比例，且數量總在五千萬兩左右，約合鑛銀出產百分之二十一。或銀市供給量百分之十八。歐西各國銀輔幣的鑄造約銷銀市供給量百分之十。

就生銀的產銷和銀市的性質看來，生銀的價格，極難定。第一，大部鑛銀既為附產，銀價的高低，和生銀的

產量，無直接的影響，反而同銻銅鉛錫的關係，比較密切些。第二，生銀的銷場，大部在中印兩國。我國的銀子，是拿貨物換來的。輸出的大小，須看國外市場的榮衰，和國內出產的伸縮。印度生銀的吸收，須看氣候的好壞，目下生銀在印度，完全為一種貨物，並且是一種常期跌價的貨物，何以每年還有一萬萬兩左右銀子的輸入呢？一則大部人民，智識淺陋，生活困難，再則習慣難改，不能得金，還可用銀。試看近年來印度的金輸入率，較比銀輸入率為大，可見大賈豪商，未常不知生金較生銀來得穩當。第三，印度自採取生金本位和安南採取金匯兌本位以來，極力設法想把準備庫中生銀脫手，換成黃金。其間脫換手續時間和數目，極守秘密。因為秘密過度，反而大家猜疑。銀市場中，頓加一重不可思慮的風險。尤以印度庫銀為甚，因為數目常近全世界數年的產量。要是忽然放出，銀價真是不可收拾。第四，生銀為物，不臭不爛。因為如此，所以賣空買空的保證金，和一批生銀的總值相比，真是微乎其微。倫敦和最近的紐約期貨銀市，孟買的生金銀市場，和中國的金業交易所，都在做生銀的投機事業。固然投機是一種推測未來市況的手段，但亦是引起銀價短期間變動無定的原因。所以安定銀價，就生產着想是沒有辦法

的。因為除非世界不要鉛銅鋅等，如要，生銀便大量的出

來。就消耗來說，光指定中國和印度，這兩個國家，固然

是生銀最大銷耗窟，可是完全看生產和商業的興榮。誰都

不能保生產和商業能穩定，那麼又怎能保生銀吸收，不起

變化？那麼如美國參議員畢德門在聳動的中美印西秘波墨

加的八國限制生銀的出售協定，又有何用？據我看來，祇

是消弭銀市場上忽然的不可捉摸的變動，其餘因產銷而起

的長期銀價變動和生銀投機賣空買空短期變動，截然沒有

効驗，亦沒有揀擠。換言之，協定祇是希望沒有鉅大急促

深入直出的變動而已。所以我們對於協定的成立與不成立

，就安定銀價而論，就提高銀價而論，實在沒有愛喜的必

要。要是真正安定銀價，除非全世界重要國家聯合起來，

採取國際金銀本位制，但是在這種國際的情形之下，祇是

幻想，沒有深論的價值。我們順便提起以前有人主張各國

中央銀行準備金，應參用生銀，或回復銀輔幣以前的含銀

成分，或以銀輔幣替代紙輔幣，這些主張都希望藉此提高

銀價。可是沒有出來，便早已悶死。原因很簡單。中央銀

行拒絕價值不定，愈急愈跌的生銀準備金。輕質銀輔幣，

和賤貨輔幣，成本來得低，而效用同於重質銀輔幣，政府

又何樂而不用前者？就是實行，効用亦微。看看鑄幣的生

銀消耗和全世界銀市供給的百分比就可以知道了。

那末銀價的上落、和我們的國計民生，又有什麼影

響？要答復這個問題，須先把字義弄清楚。生銀有兩種

用途，一是貨物，一是貨幣。除中國外，生銀在各國完全

是貨物。生銀的價值，又有三種看法。一種是生銀在銀本

位國家的購買力。一種是生銀在金本位國的金價。一種是

金在金本位國家的購買力。一般物價在銀本位國家，要是

跌落，就等於銀的購買力加高。物價要高漲，就是銀的購

買力減低。金在金本位國家內，亦是如此。生銀在金本位

國家內，是一般貨物中之一，金的購買力增加，拿銀子換

金，當然銀的金價要跌。這幾年生銀產銷的長期變動，並

沒有特殊的過度，但是銀價下跌，則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頗

形劇鉅又有什麼原故呢？我以為是因為一九二九年以來，

歐美物價驟跌，並且繼續不停，換言之，就是金的購買力

增加。所以生銀市價，除長期的產銷變動外，還受金的購

買力增加的影響。短期內銀價的變動，是常有的事，除非

把生銀期貨市場和金業交易所勒閉，我們在國內聽見銀價

跌落，議論紛紛，這都是商埠內少數大商家和銀行家祇往

自家門內看輸贏，不往海外瞧真像的緣故。

我以為生銀的金價跌落，就理論上來說，應當於民生

不但無碍，（國計另說）並且有益。何以呢？我們的國際貿易，向來是入超，但是每逢出口增加，銀的輸入亦隨之增加。這完全是從外國看來，彌補他們的增加輸入，以輸出生銀，任比其他貨物都要便宜。生銀的跌價，在繼續跌落期內，最足鼓勵我們輸出，因為我們的輸出品成本，並未增加，海外的金價仍舊，以金合銀，頓覺贏餘。並且因為輸入品，以金價合成銀價較前增高，更可以鼓勵本國產業，仿製洋貨，代替舶來品。假使我們的工業，具有彈性，那麼除了擴充出口工業外，還可以新興出口工業。這些推想，要是能成事實，那末生產者的購買力，當然有進步，因為除了必須的入口貨的消耗，因漲價而稍受損失外，其餘大部土貨，短時間內，價格變動甚微，生產者的相對購買，必然增加。可是事實上，我們並沒有得到這樣好處。國民的購買力，反而日蹙。我以為這不是理論與事實矛盾，實另有幾種重大原因。第一，我們的出口貨，不幸大部為原料品。凡是原料品，無論何國出產，在現今世界市場上，價格的跌落，都比半製品或製成品來得劇烈。第二，我國連年兵災匪禍，洪水旱被，交通阻塞，無以復加。出口品的成本，因苛捐雜稅，重疊關山，較比以前實高出數倍。就是有出口增加的機會，亦早已失掉。試看連年出

品量值，便有眉目。第三，我們的入口貨，又不幸是不可或缺的衣料食料及工業製品。雖然在外國的金價，已經一跌再跌，到了中國，化成銀價，我們還覺得太昂。就是做製洋貨，許多原料，還是外國來的，於成本上並無多大的縮減。所以還有贏餘的，祇因舶來品價格太高。在這幾種情形之下，我們還能有有多大輸出的增加。生產者的購買力，又何從增進起？讀者祇要離開沿江海的商埠，往鄉下或內地看看，禾田綠茂，時近收穫，而耕者逃田，不敢收割，便知道我們的民生，和購買力的去向了，我以為幸而銀價低落給我們維持出口，鼓勵土產的些微機會呢。

那末銀價低落，於我們的國計，我們財政上的收支怎樣？我們的外債，大部份是金款，所以外債的負擔，完全看國外金的購買力。換句話說，就是能得金款，現在國外物價日跌，金的購買力日漲，所以籌措國外的款項，如本利前期所說，非設法減低成本，增加出口不可。要是強制的減低成本，於生產者的購買力，將發生不良的影響。所以我以為外債負擔的輕重，實際上是應以國內生產力和購買力作標準。拿金銀比價來衡測，還是膚淺之談。對內呢？要是就理論上說，銀價跌落引起生銀輸入，生銀輸入，引起物價澎漲，物價澎漲，則付稅負擔減輕，因為假定稅率

不變，那末以少許物品，便可換得相當銀元，以便完糧納稅。可是政府支出，大都用於物力的消耗，物價騰高而政府收入固定，當然吃虧。所以銀價跌落，以常理論，不利政府，便宜人民。但是像我們各地方政府，隨便加捐，先十年五十年抽稅，那末這些理論，又要打破了。

生銀的前途怎樣？我們又當作何對策？我以為，生銀的金價，到如今還能維持我們的銀本位，是有相當幫助。可是犧牲太大。銀價的不能安定，在目前的形勢下，幾可擊掌而睹。就長期的變動來觀察，我們祇看見四週圍的國家，隨時隨地，在預備出脫生銀，却絲毫沒有設法增加消

中國縣志的改造

現在研究中國社會的人，所感覺到最大的困難，便是缺少材料。雖然搜集材料，是研究社會現象的人的最要職務，但如把這種職務，專門委託給研究社會的人，成績一定是很壞的。理由是社會的現象，很複雜繁瑣，而從事研究社會的人，數目并不很多。以這數目不多的，來搜集社會上複雜繁瑣的事實，如何能夠有完備的貢獻呢？近來美國有許多學者，在烏格朋教授(W. F. Ogburn)領導之下

費的形勢。銀價的趨勢，前途是極黯淡的。所以我們的對策，亦應隨時隨地，準備一切，待有機會，便應採取金匯兌或金本位制度。不然我們中國不獨為傾銷生銀的最大尾閘，並且將為唯一尾閘。一八九二年以前國印度和以後的印度雖然情形不是完全相同，却值得我們國內材智之士深切的研究。我再申述一遍，印度現在輸入黃金率比較輸入生銀率來得快。我們和印度生銀的銷耗，佔全世界產量百分之八十，銀市供給量百分之六十六，可是印度的生銀輸入，自一九二九年後，已經比中國少了。

七，十六，清華園。

吳景超

，出了兩大本的鉅著，名為最近社會趨勢，其中把美國各方面的情形，如人口，富源，交通，經濟，教育，鄉村，都市，家庭，宗教，娛樂，藝術，財政，政府等等在過去數十年的變遷及將來的趨勢，原原本本的加以描寫及分析。我們看完了這一部書，對於美國各方面情形，真是懂了不少。後來有幾位研究社會學的朋友，聚在一起討論，以為我們不妨以這部書為法，在中國也作一個同樣的研究。

討論的結果，認為這種研究，目下在中國舉行，還嫌太早，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我們缺少基本的材料，以為研究的基礎。烏格朋教授等能够成功，一方面固因為他們的學識豐富，方法謹嚴，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的社會中，早有一些基本的材料成在，可以給他們利用。假如沒有這些現有的材料，他們的研究，是不會成功的。

不但研究社會的人，感覺到材料缺少的困難，就是實行社會改良的人何常沒有同樣的感覺？澈底的社會改良，須根據于事實，否則只是隔靴搔癢，張冠李戴，于實際毫無裨益，這是大家都承認的。現在中國最風行的社會改良運動，便是復興農村。但中國的農村社會，至今還是一個大謎。有好些根本的問題，與復興農村有關的，現在還沒有一個人能回答得出。譬如中國農民，佔有職業的百分之幾？農民的分配，狀況如何？農民每年的收入，平均約有若干？農民的生活程度，現狀何似？有多少農民在貧窮線之下過日子？農民所負擔的捐稅，佔他的入款百分之幾？農村中有多少失業的人？失業的原因安在？諸如此類的問題，沒有人能够用事實為根據來答覆，我們所看到的，上焉者只是一些片段的調查，下焉者不過是一些臆測，一些武斷的偏見。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欲定復興農村的政

策，正如古人所謂閉門造車，出門想他合軌，一定是不能的事。有眼光的人，對於這一點是看得很清楚的。譬如七月十三日的大公報，因為鄒平鄉村建設協進會之成立，會對他們作下列的建議：

願明日鄒平之會，決議一項：即由此二十餘團體發起一總調查。尤注意田賦差徭及種烟區域烟畝罰款之實際狀況。然後與鄉村人家平均之生產消費，作一比較，呼籲全國，發起大規模之整理稅捐運動，吾以為此乃今後鄉村運動之第一義也。

這種見解，代表實際的社會運動，須建築在穩固的事實之上，乃是我們所贊同的。但是從此也可看出中國關於社會事實的搜集，是怎樣的缺乏。便是這種對於民生最有密切關係的事實，現在還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參攷。這真是中國文獻界中一大恥辱。

但中國人對於地方上的社會事實，并非不加关注，可惜的只是沒有得法。中國的縣志，表示我們的祖宗，對於地方是很關心的，但這些縣志的內容，却表示他們雖然關心而沒有得法。我們無論是研究社會的，或是想要改良社會的，如想從縣志中得些材料，結果總是失望的時候多。社會上有些極重的事實，在縣志中并找不到，我們所看得

到的，無非是一些詩詞歌賦，一些古蹟的名目，一些忠臣烈女的名字。這些不相干的東西，至少要佔一大部份的篇幅。清朝的章實齋先生，是最注意方志之學的。他對於當時方志的內容是不滿極了。他曾說過：

方志久失其傳。今之所謂方志，非方志也。其

古雅者：文人遊戲，小記短書，清言叢說而已耳。

其鄙俚者：文移案牘，江湖游乞，隨俗應酬而已耳。

。——章氏遺書卷十四，地志統部

我們對於章實齋先生的批評，是同情的。對於他的見解，特別是講方志的功用及州縣應立志科諸點，尤為佩服。但他終是清代中葉的人，他的主張，無論如何高明，在今日看來，應當修正的地方，還是不少。即如方志的內容，他所規定的，雖然高人一籌，但我們用社會科學的眼光去看，似乎還有增減之餘地。譬如他所編輯的石首縣志，共分八門：一編年，二方輿，三建置，四民政，五秩官，六選舉，七人物，八藝文。另以「序例圖考，冠于編首；餘文賸說，綴于簡末，別為篇次，不入八門。」這個目錄，我們如與最近李景漢先生所編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相比，便可看出今人勝于古人的地方。李先生的書，共分十七章：一地理，二歷史，三縣政府及其他地方團體，四人口

，五教育，六康健與衛生，七農民生活費，八鄉村娛樂，九鄉村的風俗與習慣，十信仰，十一賦稅，十二縣財政，十三農業，十四工商業，十五農村借貸，十六災荒，十七兵災。這本書除文字的描寫之外，還有三百十四個表格，六十八張照片。看完了這本書之後，對於定縣社會的認識，真比親身到定縣去參觀半個月，還要深刻。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縣志，這真可以作別種縣志的模範。

舊縣志所應修改的，不但是內容而已。修志的年月，也應重行規定。雍正年間，曾令各州縣志書，每六十年一修，着為功令。這種六十年一修的辦法，當然要加以修改。特別是在目前這種社會變遷劇烈的時代，六十年前的情形，對於研究今日社會及改革今日社會的人一無用處。六十年一修的法辦，既不足取，那些過了六十年還不重修的，更是要不得了。我們以為最好的辦法，是隔五年或十年一修縣志，正如歐美各國每隔五年或十年，調查人口一次一樣。假如這一點能夠做到，那麼我們隔五年或十年，便有二千冊左右的新縣志出現。這二千冊新縣志，是全國民生狀況的寫真，是我們研究社會科學者的寶庫，是改良社會者的指南針。他的貢獻真不是幾句話所能說得完的。這種改造縣志的辦法，也許大家都很贊成的，但是實

行起來，有沒有困難呢？我們上面所說那本縣志的模範，是在李景漢先生指導之下編成的。像李先生這種專家，中國並沒有幾個，但中國的縣，却近二千。我們看看這種情形，豈不是要發生才難之歎麼？我們承認這是一個困難的問題，但非無法可以解決。我們以為在那模範縣志中，最有價值的。是那三百十四個表格中所告訴我們的統計。製造這種統計表格，是一件難事，是要出于專家之手的。但是有了這些表格，然後根據這些表格去調查各種社會事實，并非很難的事情只要受過相當的訓練，便可舉行。至少在大學中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學生對於舉行這種工作，是不應當感到很大困難的。李先生的助手，就沒有幾個會受大學訓練的。所以我的私見，以為中央政府的統計局，應該起來領導這種新縣志的編纂。我們稱這種工作為編輯縣志，不用社會調查等名稱，因為縣志是一個舊制度，編輯縣志是易得當地人民之贊助的。所以我們希望保存這個舊酒瓶，不過酒瓶中要盛新酒就是了。

中央方面，既已有人負責，地方方面，也應有相當的籌備。章實齋先生以前曾提議在各州縣設立志科，如用現在的術語來說，就是在縣政府之下，設一縣志局就是了。按現行的法律，縣政府下設教育局，建設局，財政局，及

公安局。如感需要時，得呈請省政府設置衛生局，土地局，社會局，糧食管理局。在法律裏面，並沒有提到縣志局。近年財政困難，如想在全國各縣，都設一縣志局，那是做不到的事。所以不如因陋就簡，在各縣的教育局下，設一縣志科，其職務在受中央統計局的監督，搜集該縣中各項社會事實及統計。在逢五或逢十之年，這個縣志科，可以多請些助理，編纂縣志，在指定的日期之內，編輯完成，交由中央統計局即行發表。平常的年份，可擇縣中主要問題，作精密的研究，研究的結果，或附于縣志之末，或交由中央統計局發行專刊，如美國勞工局所發行之專刊相仿。不過勞工局的專刊，只限于勞工問題，縣志科的專刊，可以包括社會中各種問題就是了。縣志科的科長，最好用致試方法選用，資格是要在大學畢業，曾研究社會科學的。這樣又可為大學生多闢一條生路，真是一舉而數便了。

假如這個提議可以幫助研究社會問題及實行改良社會的人，解決一個先決的問題，——搜集材料——那麼我很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政府的當局，能夠使這個提議實現。

二二，七，十五。

太平洋國際學會

衡哲

今年八月十四至廿八日，將在加拿大西岸的班府城（Banff）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會議，是本會第五屆的雙年會。我既忝在第二三四屆的三次會議中做過代表，今年又在濫竽充數之列，在出國赴會之前，對於這個會議似乎不應該沒有一言。至于本屆會議的情形，且待將來會畢之後，再詳細的報告給讀者們吧。

有一位美國的學者，對於各種的國際會議，曾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國際會議之所以失敗，一是由于一般人對牠的期望太大了，二是由于參加的分子所求于牠的太奢了」。太平洋國際學會之所以不能滿足一般人士的期望，毛病也在這裏。我也是對於牠有相當的不滿意的，但我却不忍過分責備及牠的分子——國家或個人——。因為我深知道，這個學會的性質不過是限于交換意見，而意見的交換又是一件微妙的事體，誰都是不容易斷定牠的失敗或成功的。因此，我對於這個學會，便向來不曾存過多大的奢望，所以也很少失望。

但是折扣打夠之後，我們却也不能說這個學會是很可

以不必有的。我們應該知道，在許多驅除國際間障礙的努力中，這個學會也自有牠的一席之地。至于能否成功，却又另是一個問題。我們若是留心國際情形的，便能明白，種種國際會議和機關，現在尙都在牠們的試驗時代。國際聯盟不用說了，即以現在正在開會的軍縮會議和世界經濟會議而論，牠們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少？我說這句話，並不是替太平洋國際學會辯護，不過是要證明，在現代國際情勢之下，國家主義的勢力尙不肯對於國際的勢力作些微讓步的時候，所有國際會議與機關所能做的事，亦不過是一些拔除蕪莽的工作而已。至于鋪路造橋，植樹建屋之類的種種之建設工作，現在恐怕都還做不到。但是我們若先把山中的蕪莽掃除乾淨，一切的建設工作也就無從下手的。我們明白了這個意思，則對於太平洋國際學會以及其他一切的國際會議與機關，自然便不會有過分的期望，讚美，或咒詛了。

關於太平洋國際學會本身的幾個基本情形，現在不妨也向讀者們簡述一下。至于以前各次年會的詳細內容及程

式，因為都已成爲明日黃花，不必再爲牠們來多費筆墨了。

此會的第一個基本情形，即是『太平洋國際』。因爲組成牠的分子，乃是沿太平洋諸國及在太平洋沿岸有屬地之國。這些國家可以分做四系，即是中國，日本，美國，及英國和她的子國，如澳洲，紐西蘭，及加拿大。英國的本身不在太平洋，但因爲她是加拿大等的母國，又是印度等的殖民國，故她也成爲會中的一個強有力的分子，而爲英國系的領袖了。高麗在本會宗教化的時代，本有獨立代表團，但到了一九廿九年，會議漸漸政治化之後，不但高麗的代表團完全取消，即菲列濱的代表團也不獨立，而成爲美代表團的一部分了。有人說本會是帝國主義的喉舌，這個控告自然是極不公平的，但若斷章取義的單就這一件事而論，太平洋國際學會也就不免具有一點帝國主義的嫌疑了。此外如伊國，因爲她有一個濱海省，而她與中國，日本，及英國在亞洲的屬地，又都有重要的關係，故也應該爲組成此會的一個分子。但因爲許多原因，邀請俄國加入會議的計劃始終尙不會實現過。聽說在今年的年會中，幸而有伊代表參加的可能。果然，那也就不能不說是一個好成績了。

此會的第二個基本情形，即是『學』。因爲牠所討論的問題，雖然大多數是關於國際政治的，但只有討論，沒有決議，更說不到執行的權力。牠的主要工作，仍在研究，及學說意見的交換。在這兩方面，牠的成績是很不錯。牠所出版的種種參考品（Data papers），有許多是研究太平洋各種問題所不能缺的好材料。

第三個基本情形，是『會』。此會每二年開一次，是太平洋國際學會實行意見和學說的交換的唯一工具。許多人有見此會沒有顯然的成績而相責的，即因不曾明瞭牠的這個特性的原故。至于會中所討論及交換的，則有政治，經濟，教育等各種問題。自一九二七年以後，政治問題尤成爲屢次會議的中心點。最初注意的政治問題，是治外法權，關稅自主，和租界的收回。在討論這幾個問題時，英帝國主義是中國的最大對象。但自一九二九年以後，東三省問題又成爲全會的注意點，而日本也就代替了英帝國，成爲中國方面辯論的對象了。今年四省淪亡，政治的重心點，不知道又將轉到那一方。寫到這裏，真不免百感交集了。除去政治之外，會議中占到重要位置的，尙有經濟方面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在今年的會議中，大概還有蔚附庸爲大國的希望。其他如文化，教育，藝術，等等，也能

得到一點可憐的位置。婦女問題却是一點地位也沒有的，這大概是因為沿太平洋諸國尚另有國際婦女會的一個機關，故很可以不必附屬於此。

本會的會期常是兩個星期，大抵是在夏天舉行，間或在秋天，地點則由與會各國輪流作東道主。比如第一及第二屆的會議，是美國在檀香山作東的；第三屆是日本在東京作東的；第四屆是中國作東的。今年的會議，本有菲列濱和加拿大兩處代表的邀請，後來由此會的國際主腦團的決定，方在加拿大舉行。

因為討論的中心點大抵在國際政治方面，故每屆會議時，大家雖然明明知道所討論的沒有實際效力，但會場中的空氣，却總是那樣的緊張。一九二七年的會比較要和緩一點，但一九二九年在西京開會時，各國代表間的空氣便

緊張起來了。最大的原因，是因為會程的特別注意點是個東三省問題，而日本又是那一屆會議的東道主人。前年在上海開會時，正在九一八事變之後，而東道主恰又是中國，故情形更為緊迫，衝突的危險也更大。懸想今年之會，正在中國失去東北四省之後，不但空氣的緊張要較前更甚，恐怕還有許多意外的糾葛要發生，而成爲本會的一個試金石呢。

將在今年會議中所討論的問題，有三個大綱。其一是經濟的衝突與管轄，其二是國際調協的工具，其三是教育問題。以這個會程與上數次的會程比較，似乎已能由表入裏，漸漸的講到國際間的根本問題了。至于結果如何，以及本屆會議的進行情形，我不是「穿了硬壳八卦衣」的先知家，不敢在此亂說！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業已售完。現在第

二十六期至五十期 亦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特價如下：

-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 丙種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定縣社會調查

概況

定縣秧歌選

- 精裝實價三元八角
- 平裝實價三元二角
- 郵費另加二角三分
- 精裝實價二元五角
- 平裝實價二元二角
- 郵費另加一角六分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
發售處：1. 河北定縣考棚街本會
2. 北平石驢馬大街二十一號本會
▲代售處：北平神州國光社

這一星期

蔣廷黻

建設與廉明政府的先後問題

東京的警告

一個關於理科教科書的調查

任鴻雋

政治領袖的私心

君衡

日本佔據長城的歷史意義

OWEN LATTIMORE 著 孫毓棠譯

感言三則(日內瓦通信)

王冷樵

獨立評論

第十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三十日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東安市場	佩文齋	張記書
天津	成府書局	天津分社	燕大
上海	新華書局	華英書局	亞東
南京	新華書局	正中書局	花柳
鎮江	鎮江書局	天一書局	

徐州	徐州廣告社	現代書局	金城
漢口	漢口書局	真美書局	
武昌	武昌書局	胡正	
廣州	廣州書局	現代書局	
汕頭	汕頭書局	新華書局	
廈門	廈門書局	新華書局	
福州	福州書局	新華書局	
杭州	杭州書局	新華書局	
雲南	雲南書局	新華書局	
貴州	貴州書局	新華書局	
重慶	重慶書局	新華書局	
成都	成都書局	新華書局	
萬縣	萬縣書局	新華書局	
蘭州	蘭州書局	新華書局	
西安	西安書局	新華書局	
開封	開封書局	新華書局	
太原	太原書局	新華書局	
濟南	濟南書局	新華書局	
青島	青島書局	新華書局	
威海	威海書局	新華書局	
煙台	煙台書局	新華書局	
安東	安東書局	新華書局	
瀋陽	瀋陽書局	新華書局	
長春	長春書局	新華書局	
哈爾濱	哈爾濱書局	新華書局	
大連	大連書局	新華書局	
營口	營口書局	新華書局	
安東	安東書局	新華書局	
吉林	吉林書局	新華書局	
遼寧	遼寧書局	新華書局	
黑龍江	黑龍江書局	新華書局	
山東	山東書局	新華書局	
河南	河南書局	新華書局	
湖北	湖北書局	新華書局	
湖南	湖南書局	新華書局	
江西	江西書局	新華書局	
福建	福建書局	新華書局	
廣東	廣東書局	新華書局	
廣西	廣西書局	新華書局	
雲南	雲南書局	新華書局	
貴州	貴州書局	新華書局	
四川	四川書局	新華書局	
陝西	陝西書局	新華書局	
甘肅	甘肅書局	新華書局	
山西	山西書局	新華書局	
察哈爾	察哈爾書局	新華書局	
綏遠	綏遠書局	新華書局	
熱河	熱河書局	新華書局	
遼北	遼北書局	新華書局	
遼南	遼南書局	新華書局	
冀東	冀東書局	新華書局	
冀南	冀南書局	新華書局	
魯南	魯南書局	新華書局	
魯北	魯北書局	新華書局	
豫南	豫南書局	新華書局	
豫北	豫北書局	新華書局	
蘇南	蘇南書局	新華書局	
蘇北	蘇北書局	新華書局	
浙南	浙南書局	新華書局	
浙北	浙北書局	新華書局	
閩南	閩南書局	新華書局	
閩北	閩北書局	新華書局	
粵南	粵南書局	新華書局	
粵北	粵北書局	新華書局	
桂南	桂南書局	新華書局	
桂北	桂北書局	新華書局	
滇南	滇南書局	新華書局	
滇北	滇北書局	新華書局	
黔南	黔南書局	新華書局	
黔北	黔北書局	新華書局	
川南	川南書局	新華書局	
川北	川北書局	新華書局	
滇南	滇南書局	新華書局	
滇北	滇北書局	新華書局	
黔南	黔南書局	新華書局	
黔北	黔北書局	新華書局	
川南	川南書局	新華書局	
川北	川北書局	新華書局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這一星期

蔣廷黻

建設與廉明政
府的先後問題

本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的社評，以「國聯開技術合作委員會」的標題，發了一段這樣的議論：

據吾人不變的見解，以爲中國現在之政治，尙不適於接受外國之投資。在開發經濟以前，必須先改革行政，澄清吏治，財政入軌，計畫確定！否則外控之來，或者無利而有害也。中國行政，浪費而無效率，機關存廢，朝夕變更，法令如毛，實行有待。預算決算不實行，會計制度不統一，黜陟不公，賞罰不明。故凡涉金錢，皆有弊竇，購料不實，管理不精，中飽甚於滿清，國營徒便私利。政況如此，無錢則虐民，有錢則浪費，雖億兆外資，源源流入，結果恐徒於租界增加若干宏壯之邸宅，富吏荷包，更見充滿而已，國利民福，皆虛話也。

這個議論提出中國當代一個大問題，不是幾月幾年所能解決的，同時牠的解決與民族的前途有莫大關係。這段社評在形容現狀方面，我想讀者無不稱快。在主張方面——

先建廉明政府，後求經濟開發——也許是多數人的感想，我自己原先的意見也是如此。因爲行政不廉明問題的嚴重，我近年常加以注意。我的意見就步步的改了。我以爲欲建廉明政府必先求經濟開發。

廉明的政府，在西洋，是極近代的產物。在農時代，政府的腐敗是常態，政府的廉明是例外。現在論行政，英國政府算是比較好的，英國官吏的舞弊是絕無僅有的。但是在十八世紀，英國政府是以舞弊馳名天下的。農業經濟是受報逐減公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的約束的。除非人口稀少，處處之地極多，在農業的社會裏，專靠種地是不能發大財的。這種社會裏的大富翁都是出身政界的。做官是這種社會惟一發財的機會。同時這種社會所須要的政府助力是很少的。政府如能維持治安，天下一太平，人民就富庶了。於是文化長進；生活的奢侈亦隨之長進。奢侈與文化程度的高低是成正比例的。到了這個時候——人口加多，平均地產減少，生活遂加困難，文化程度較高，奢侈程度亦較高的時候——有志氣，有作爲的人

更加想做官，做官更加想舞弊。不問古今中外無不如此。其根本理由在農業經濟的本質，不在道德也。

我們這民族的歷史觀素來是道德的，倫理的。官場風氣不好的話，我們的解釋不外「人心不古」。我們總想黃金時代在上古，好像古人都是聖賢。其實道德雖有關係，在農業社會裏，一到人口過多，生活困難的時候，道德的約束力就減少了。在中國近代史上，康熙時代的政府要算一個廉明政府。那時正經大亂之後，人口頓減，土地極多，天下太平，人民可以不做官，做官也可不舞弊，其身其家仍可過舒服的日子。加之滿人在入關的初年尚未學會漢人的奢侈習慣。以明朝所遺的宮殿，略加修理，已夠滿足他們的慾望而有餘。朝廷所須既者少，各級官吏就可少括些。就是如此，那時的官吏仍不免舞弊，不過因為人民富庶，被摑被括尚不感困弊而已。到了道光時代，天下就大不同了。彼時的人口已到三萬萬。道光帝，依我看來，可說是個小康熙；其生活習慣之勤儉，其用心於民生的救濟之苦，祇有過而無不及。雖然，處他的時代，他就一無能為。總之，農社會的循環律，我們歷代的政治家是無法解決的。天下總是一治一亂。其治也，自然的治；其亂也，自然的亂；政治家的功過實在無多大的關係。在治世，

人民富庶而官吏亦少舞弊或舞弊而社會亦能負擔；到了亂世，民生困苦，而官吏亦因之多舞弊。

自我們與西洋發生了關係，我們得着了一個能夠解決我們歷史上大問題的秘訣。這個秘訣不外以工業來補農業之不足。我們得着了這個秘訣而不實用；我看不出任何道理來。先建廉明政府後開發經濟等於說：等到我的病好了再吃藥。當然，政府不廉明，建設要受阻碍。正當的辦法是一面開發經濟，一面澄清吏治。不然，如必須先澄清吏治而後開發經濟，那我們祇有等着民族的死亡。

東京的 警告

正當中國與國聯的技術合作將要具體化的時候，東京就給了我們一個不可忽視的警告。本月二十日電通社自東京發的電報說：

各國間之商戰，勢將隨經濟會議之停頓而日趨激烈。因之，中國市場現已成爲各國注視之的。且當茲中美間五千萬美金借款已告成立，並傳華方正與美國銀行團進行四千萬鎊借款交涉，而致各國之對華投資競爭漸烈之際，國聯亦決定爲中國經濟之再建，而予以技術的援助。關於此事，日外務省方面雖亦表示贊意，但仍認爲此種援助，殊有助長以夷制

夷主義之嫌。矧此中國與各國間之借款交涉，既行於醉心歐美派之宋子文之手，則於彼歸國後，亦有使此派復盛，而予漸形好轉之中日關係以惡影響之虞。因之，日方現頗注意此事，惟當局以刻尚未至作積極活動之時，故似將暫持靜觀主義。

同日新聯社的電報措詞更嚴重，更富有政治的意義：

關於國聯改革中國經濟一事，在我國固素所希望，然如今回之議決案，勢有進展至中國之政治共管之可能性。我國對今後其於中國之活動，不得不深加注意。即國聯派遣專門委員使干預中國全般內政，且其委員長一席又以排日著名之衛生股長拉西曼充任，其意安在，已略可推察。以故若專門委員此後之活動，如脫離經濟的性質而進展至政治的策動，則在以隣接國而有緊密利害關係之我國自有採自衛手段之準備也。

概括言之，日本所顧慮的有三點。第一，日本怕中國得着歐美這種技術及資本的援助，因而對日強硬起來。第二，日本怕歐美借投資及技術合作而籠斷中國的市場，至少在此市場內佔優勢。第三，日本怕技術合作可以「進展中國之州政治的共管」。第三點全是有意中傷的。日本人

知道我們的目的在圖自強，國聯的目的在幫助中國自強。日本人也知道中國近三十年的主要發展是民族的覺悟和民族主義的長進。因之，日本人應該知道技術合作與國際共管截然是兩件事。國際共管是中國國情所不容，歐美政府所不能且不願。不過日本人知道中國現在反對中央者大有人在。「共管」二字是日本人給反對派貢獻的利器。我敢斷定，不久國內的愛國志士就會有人響應新聯社者！

至於第一、第二兩點的顧慮，在日本方面是很自然的。不過也未免神經過敏。這種建設事業的完成總須若干時日，而收效總在十年二十年之後。我們中國人不盡是小孩子；我們決不會想因為我們加建了一道鐵路，或是疏濬了一道河流，我們就能抵抗日本了。我們也不會想因為美國借了我們五千萬金元，英國借了五百萬鎊，英美就是我們攻守同盟的國家，就會把她們的海軍開到遠東來與日本作戰。我們更不會想一個國聯衛生的股長，名叫拉西曼，因為到了中國來作技術聯絡員，就能左右英美法俄各國的政策。我們知道在過去這兩年內，他並沒有替我們得着一個兵一元錢的實力幫助。

我們既不會因得着歐美的資本及技術援助而轉強硬，也不會因得不着的話就更趨退讓。第一，我們已經退讓到

無可再退讓的田地了。第二，日本若再進攻，若再採取所謂「自衛手段」，她或者能迫着當局與她簽訂更嚴重的城下之盟，但是中華民族道德的屈服，她是得不着的。九一八以來的成績，無論是事實的或法律的，都得不着中華民族道德的承認。我們不如老老實實的告訴日本人，如果他們尚不知道的話。

至於中國關內的商場，在以往並沒有因英國的投資過於日本的使日本的貿易不能長進，在以後也是如此。以中日間運輸之便，日本工資之低，政府維護商業之積極，日本絕無不能與英美競爭之理。

日本所謂「自衛手段」不外三種。第一，她可以進攻長江。其影響我已說過。第二，她可以外交的方法阻撓歐美的援助，如光緒末年她阻撓新法鐵路，宣統年間阻撓錦粵鐵路一樣。據我所知，現在世界的大局遠不如歐戰前六七年大局之利于日本。彼時她所能行者，現在她不能行了。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讓關內的中國蹈關外的中國之覆轍。

第三，她可以強迫政府辭退宋子文，如拿破侖強迫普魯士辭退斯坦安（Stein），德意志強迫法國辭退笛爾克美（Delcasse），不過宋子文下野以前，他的政策因私人派別的關係尚有各種阻碍，被迫下野以後，他的政策更將成爲全民族的政策。

我們固應知道東京警告的嚴重而更加小心謹慎，同時我們也應記得我民族的出路全在于建設，而建設非有外來的投資和技術不可。因東京警告遂停止建設，那我們只有坐以待斃。

本文將脫稿的時候，又在報上看見日本使館須磨先生在上海與中國記者的談話，其旨趣大致與電通社的電報相同，惟與日本的對策一層，更加具體。他說，第二「滿洲國」的出現或第二上海事件均是可能的。足見中國與國聯合作將成爲此後中日間的大問題。

七月 二十三日

一個關於理科教科書的調查

任鴻雋

約十五年前，作者在外國時，與國內做大學教授的朋

友某君通信，討論到大學教育問題，曾經有過這樣的一段

話：

「近聞國內各大學教授科學課程，多用外國課本，且用外國語講授，此吾期以為不可者。吾所以反對用外國語文講授之理由，不特因語文隔閡，學者不易了解，即了解矣，亦用力多而成功少。抑且言及科學，學者本有非我族類之感想。設更用外國語教授，則此種學問將終被歧視而不易融合為中國學術之一部分」。

這一段話，是因為當時的理科教育尚在萌芽，程度稍高的課程，便非依靠外國教本不可。因為用外國教本的原故，教者也就自然而然的用外國語來講授，以圖清楚與省事。但是這樣的教法，於中國的科學教育前途有極大的障礙，是不消說的了。理科課程的中國化，非先有理科的中國教本不為功。而在當時科學教育方在萌芽的時候，用外國課本和用外國語講授，或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目下中國的理科教育情形，是不是比十五年前有了相當的進步，這是我們急欲知道的。因為這個原故，我們曾經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我們調查的目的，是要知道目下大學一年級和高中二三年級（等於從前的大學預科）理科課程中，究竟有若干科目是用中國課本講授。我們不涉及初中，因為我們曉得以初中的程度，中國的教本出版的已經不少，似乎決無取材他國的必要。我國也不涉及大學一年級以上，因為我們承認大學一年級以上的科目，多為

各科細目的專論，在今日科學不發達的中國，我們也不敢

希望這些科目在用書方面都能獨立而自給。我們闢了西學三四十年，闢了科學亦二三十年，至少對於大學一年或高中二三年的普通科學課程，有一個希望用自編教本的權利

調查的結果是怎樣，留着以下再說，我們現在先說說調查的範圍。全國公立大學的理學院辦理已有規模的，據我們曉得的約計有三十處，此次發信而得到回答的，共有二十處。全國立案的高中，約有二百處，此次通信調查而得到回信的為一百零九處。故此調查的結果，可以說代表全國大學的三分之二，全國高中的二分之一。調查各校性質的區別，我們可列表如下：

共計	私立		官立	大學	高中
	立創會教	立創人國			
二〇	六	五	九		
一〇九	二一	四三	四五		

其次，當說我們所調查的科目。據教育部頒布的高中普通科課程標準，規定屬於理科的學科，為化學，物理學，生物學及算學。算學中應包括代數，幾何，三角及解析幾何。大學一年級的普通理科，亦以這四科為最重要。故此調查，也就專以這四科為範圍。關於調查的結果，我們要先加說明的，就是在大學理科一年級中，大概俱設有普通物理學及普通化學兩科，且均有指定的教本，但普通生物學一科，則有數校尚未設置，或已設置而未指定教本。故關於此科的教本數目，較少於學校的數目。又算學一科，因各校的需要不同，設置極不一致。有的設方程式論及近世幾何學，有的設平面解析幾何學及三角法。此次所統計的，專取初等微積分一科，其餘的算學科目，或以程度與大學一年級不合，或以設置的學校過少，俱未加以統計。

根據以上的幾個說明，我們得到大學一年級理科教科書的統計表為下：

表一 大學一年級理科教科書統計表

學 科	教本總要	英文教本數目及其所佔百分數	中文教本數目及其所佔百分數
普通物理學	二〇	一九（九五%）	一（五%）
普通化學	二〇	一九（九五%）	一（五%）
普通生物學	一三	一一（八四%）	二（一六%）
算學	一一	一一（一〇〇%）	〇（〇%）
共計	六五	六一（九三%）	四（七%）

關於高中調查的結果，我們以為也有幾點應該先加說明。（一）高中的化學物理兩科，設置期間多為二年，故其教本數目俱超過學校數目。（二）生物學的設置期間，雖也有在一年以上的，但未設此科的高中，有三十五處之

多，以致教本數目少於學校數目。（三）算學一科課目較多，而在高中課程中俱有同等重要，故只可分別統計，不能混為一談。（四）有些，好高騖遠的學校，在高中時代便採用大學教科書，以表示他門程度的高深。此次調查也

確能證明此點。現在我們把這一類的教科書，另列一項。根據以上的說明，我們可得第二表如下：

表二 高中普通理科教科書統計表

學科	教本總數	英文教本數及其所佔百分數	中文教本數及其所佔百分數	大學教本數
物理學	一六七	一一七(七〇%)	五〇(三〇%)	五〇
化學	一六六	一〇五(六四%)	六一(三六%)	五五
生物學	九〇	一九(二二%)	七一(七九%)	三七
代數	八二	六七(八二%)	一五(一八%)	五三
平面幾何	四三	二八(六五%)	一五(三五%)	
立體幾何	五三	三九(七四%)	一四(二六%)	
三角法	七八	六五(八三%)	一三(一七%)	
平面解析幾何	六一	五六(九二%)	五(八%)	
共計	七五二	四九九(六八%)	二五五(三二%)	

(內有九十五譯本)

看了上面兩表，使我們驚訝不已的，自然是各科的外國教本所占成分的高大。照第一表，大學第一年級的物理，化學，算學，幾乎完全是用的外國教本。照第二表，高中的八種學科之中，除了生物學一科以外，無有一科，外國教本不占百分之五十以外。這個現象，不能說是偶然的，是無關宏旨的。牠的至少的意義，是證明我們這十幾

年來，儘管大吹大擂的提倡科學，而學校裏面這一點最小限度的科學教育工具，還不會有相當的努力。牠是證明我們在大學高中教課的先生們，對於課材，只知展轉負販，坐享成功，絕不會自己打定主意，做出幾本適合國情的教科書，為各種科學樹一個獨立的基礎。牠是證明我們學校組織的不完善，使我們的許多科學家，把他們所有的時

間精力，都消磨在課堂教室口講指畫之中，絕不讓有多餘的時間來從事著述的工作。他是證明我們多少的教育家，寧願把他們的閒暇時間，消磨在馬將電影裏面，絕不會把科學教學的工作，當作一件重大的教育事業。無論牠的原因是那一樣，可是事實總是在這裏的。我們除非有法子改變事實，再也想不出一個方法來替原因辯護。

或者有人說，以上的說話是錯的。我們近年出版的大學高中的理科教科書的確不少，無如教者不願採用，也就無可如何。關於這一層，我們又可以用調查的結果來證明理科教科書出版已多的話實在不確。我們雖經把大學及高中理科各科所採用的中文教本種數加以統計，所以結果如下：

大 學 一 年 級				
科 別	物 理 學	化 學	生 物 學	初 等 微
教本種數	一	一	三	○

高 中				
科 別	物 理 學	化 學	生 物 學	代 數
教本種數	七	二	七	七
				平而幾何
				立體幾何
				三角法
				解釋幾何
				三

看了上表，可見吾國近年出版的大學高中理科教科書，實在不如我們想象中的那樣多。即使實際出版的種數，不如調查表所示的少，但出版之後，得到教授先生們的採用的，不過寥寥幾種，也就無可諱言了。這個現象，又只有兩個理由可以解釋。一是教者及學生們還不會擺脫崇拜西文的心理，以為凡學科能用西文原書教授，便可以顯得牠的程度特別高深。於是即使在中文裏有同樣可用的書，他們也寧願舍中而用西。二是中文出版的書實在太差了，而且選擇又少，不容易滿足各個學科的特殊需求，所以不得不取材於異域。這兩個理由，當然都有一部分的重量，但我們以為第二個理由似乎更重要些。不信我們且看近年中國的生物科學，比較其他的物質科學稍為發達一點，生物學的教科書也多出了幾本，於是中文的生物學教本，在大學與高中裏面，比任何科學所占的百分數都高。這不是證明我們只要有相當的努力，不怕沒有結果嗎？這不是指示我們從事物質科學及算學的朋友們，對於教科書的編著，還有特別努力的必要嗎？

關於西文教科一方面，還有一個有趣味的事實，為此調查所指示的，就是凡大學高中所採用的西文教科書，都是美國出版品，絕無歐洲各國的出版的教科書據雜其中

。這在有些國，如像德，法，因為文字的關係，他們的教科書不易受我們的光顧也能了，至於英國出版的各種理科教本，未必就無一本比美國出版的好些，可供我們的採用？這可以見得我們即在採用他人現成的教本一方面，也不會盡得採訪選擇的能事。無怪乎國聯教育考查團對於美國教本的流行中國要失色驚顧，而要建議中國政府，派員專

家前往歐洲研究教本課程了。此事在我們看來，雖然無關宏旨，但也是目下國中理科用書的一個特殊情形，故為記出於此。

二十二，七，二十三，

附言 此文中所用各統計數字，由林君伯遵編次整理，特記於此以誌謝意。

鴻雋

政治領袖的私心

君衡

在外侮內亂交攻的時候，一般人對於中國的政治，大致是偏於悲觀。他們對於憲法，主義，黨治等等似乎都不很熱心；對於政府和政府中的人物，時常加以言論的攻擊。回想辛亥時代民衆對於革命和革命領袖的希望，信仰，或崇敬是如何的熱烈而真摯；再一想現在我們對於中國政治前途的希望是如何的冷淡；兩兩相較，真不免令人有今昔之感！

近年來「輿論」攻擊政府的焦點往往集中於政治首領的自私——爭權利，奪地盤，為一人一系或一黨謀利益而置國家公衆的利益於度外。因為有私心，所以無公德。有人曾說笑話：古時理想的政治領袖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善天下」。現在實際的政治領袖是「達則獨善其身，窮則兼善天下」。這般政治家在野的時候無不激昂奮發，以澄清天下為己任；對於補救時艱，改善政治，說來頭頭是道。在旁人看起來真不免有「此公不出，如蒼生何」的感想。這就是所謂「窮則兼善天下」。一旦時機來到，活動成功；大權在握，居然換了面目。他們的政治地位，成為營私利己的使利；地位愈高，營私愈甚，因為國法（甚至軍法）對於他們是不生効力的。萬一政局轉變，被迫下野，他們在外國銀行存有存款，在租界裏（或者在外國）有邸宅，儘可悠哉游哉，安享河閒之福。縱使人民恨之刺骨，對他們亦無可奈何。這就是所謂「達則獨善其身」。如此譏

笑政治領袖雖不免謔而近虐，然而究竟言中有物，不是完全憑空捏造。

好爲「誅心」之論，本是中國士人的習氣。但是我們要注意：能使被批評者心服而發生效果的批評，必須對症發藥，恰中其病；必須近情近理，不強人以不能。我們如果指摘政治領袖不能福國利民，政治沒有成績；如果事實上確是如此，他們受了指摘，是咎有應得，無辭以解。倘若我們不從具體的治績著眼而以有私心，無公德去責難他們，恐怕是近乎隔靴搔癢，似是而非，不容易使被指摘者心服。

我以為中國政治無顯著的進步，與其說是由於領袖之有私心，無寧說是由於他們才能和器度之不足。而器度褊狹，更是普遍的一個缺點。許多執掌大權的，往往能精細而不能寬大。不能放心用人，放膽做事。不能像漢高祖的豁達大度，而頗近乎唐德宗的猜忌褊狹。陸贄曾把猜忌的行爲在他的「上封事」裡面繪影繪聲地描寫出來。他說德宗：

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游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

謗；——凡此種種，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

在此種情形之下，有能的人，很難爲用。苦心爲用的人大半是庸劣之流，仰人鼻息，毫無建樹的「走狗」。他們既無力量去替他們的首領謀久安，自然也無力量去爲人民致福利。結果水山易倒，政治難安，演成了走馬燈式的局面。所以就用人方面說，我們不必希望執政者的無私心，而必須責難他們的不善於營私；不必指摘他們引用私人，而應該批評他們不能有寬大的態度，遠大的見識，放眼看人，放心用人，使有用的人爲他們所用。

不能放膽做事也是近年來政治領袖缺乏器度的一種病徵。在一個號稱民治或黨治的國家裡而做事，當然不能像專制君主的順手。在地大物博，情形複雜的中國辦事，事實上也許不能夠痛快，澈底。然而勇於攬權而怯於負責，寧可誤國而不肯抗罵的心理，照我看來却是我們政治領袖的一個慢性的流行病。他們辦事不澈底的惡習，隨處都表現出來；他們只圖眼前的「下得去」，不顧將來的無辦法；事例甚多，無庸枚舉。假如現在有人，握住了政治的機樞，大刀闊斧，努力建設；步步腳踏實地（不事宣傳，不貼標語），由近及遠，由小至大；按照精密的計畫，十年

或五年 繼續不斷地前進；不怕反對，不畏艱難；能實際襄助推行計畫的人，推誠任用；阻撓，搗亂的人嚴厲處置；罵他爲獨裁，就是獨裁；罵他爲反動，就算是反動；完全以實際的效果，做他行動的辯護，而不爲惡名虛聲所挫懾。——假如有如此大膽強項的執政者，一掃從來退縮畏葸的態度，和我做事人負責，我掌權人挨罵的取巧心理；我想中國的政治或可大放光明。中國是一個博大的國家，只有量大，膽大，才大的人方可以解決她的問題。我以爲「壞人」可以在政治生活中做好事，只要他是個才識兼長的大壞人。中國現在似乎有許多「竊鈎者誅」一流的小賊，笨賊，和少數「竊國者侯」的準大賊；至於具有席捲天下野心天字第一號的大賊，雖亦有之，然而器度魄力似乎都不夠程度，所以往往不能實現他們的野心，而終於「敗則爲寇」。總之，政治領袖不妨有私心，不可無大度。放心用人，放膽做事（做事，腳踏實地的建設，利國安民的工作），是雖有賊心而不負賊名的惟一途徑。

我們不妨更進一步說，中國政治家的失敗不是由於營私，而是由於不善營私。本來執政者的地位與國家的安危治亂有密切的關係。除了實際的，具體的政治成績以外，沒有任何物事可以維持一個政治家的政治生命。有功而失

敗的政治家固然也有，無成效的政治家而久居其位的可以說是絕無。中國的政治家（或者我們應該說政客）當中似乎很少人能夠參透這個道理。他們做政治的工作，而不能（或不願）按要政治工作成功的必需條件去工作。他們雖有「領袖慾」，而不能把政治工作認爲他們的事業。他們對於政治，更沒有一種職業的榮譽心。他們想做領袖，做主席，做部長，……不過是藉此以達到另外的慾望，例如虛榮，財富，享樂；他們對於政治的本身何嘗有真實的興趣？嚴格地說，他們並沒有領袖慾，也不是「政治的動物」。

達官貴人們的非政治心理和行動，我們可以不談；近幾年來監察院所提出的幾件驚人的彈劾案或者可以給我們以相當的暗示。我姑且舉我所直接知道的一件小事，作一個具體的例子。三年前我有一個不很親近的親戚，依賴某處的「奧援」，弄到了山東某縣烟酒稅局的事情。他做了不過半年便下了臺，居然手上有了大洋三萬元左右。這位先生，原來是「執袴子」，志氣，知識，才能，經驗條件都缺。解職回家之後，因爲宦囊充裕，便狂嫖濫賭；又因爲身體不健，斷喪太甚，竟於今年春間疾終外寢。像這樣的人如何談得上有政治慾？這不過僅僅是一個例子，與他心

跡略同的大小官吏，當然不乏其人，所以我以為中國政治的不良並不是由於政客有私心，而是因為他們的私心不是政治的。

總結起來，我的意見是：

(一) 我們對於政治家不必責其為好人，而必須責其為能人。換句話說，我們不問他們的心術，只看他們的成績。同時自命為政治領袖的人也應當覺悟，只有實際的政治成績，可以維持他們的政治生命。

(二) 在中國現在非常的時勢中，器度宏大的政治領袖

日本佔據長城的歷史意義

OWEN LATTIMORE 著 孫毓棠譯

原文見六月號之 *Asia* 雜誌。著者曾遊歷蒙古東三省，致力於當地的研究。前著一書 *Manchuria, Cradle of Conflict* 深為西人所稱許。 廷徽識

『太晚了』——這個標語應該用大個的中國字遍寫在長城上面。現在長城以北正飄着日本和『滿洲國』的旗幟。當初曾有一個時代中國向滿洲蒙古有過驚人的發展，並且人們常說總有一天中國農人會到西伯利亞去殖民——但是現在太晚了。對於一般中國官員的昏庸愚魯實在給他們想不

較心思精密的人更為需要，更為難得。能够放心用人，放膽做事的人，縱然天下為私也可以治國安民，得到成功。猜忌褊狹，退縮畏葸的人，雖能取巧一時，勢必終歸失敗。政治家的成敗不在乎有無私心，而在乎是否有才能氣魄。

(三) 自命為政治領袖的人應當以忠實的態度發揮他們的政治慾，而不把政治事業作為滿足他們非政治慾望的工具。我們不怕政治家有私心，只怕他們的私心是非政治的。

起再合適的一句話，他們不但引起了蒙古人的反抗，並且把長城以北的熱河察哈爾各省的人民也激起了反感。對於中國軍隊的畏葸無能也實在想不起再合適的一句話。我在熱河九天的旅行中所見的只是日本人像賊一二三一樣的快，從熱河的邊境上風捲到省城又飛擁到長城邊上。

從我離開北平進了古北口的那天，我就看見中國軍隊開拔出去，每隔五十，六十，或一百英里一簇人，在寬不能並轡的山路上，許多載重的牲口，騾車，牛車，和運貨

的汽車，各自速度不同，擁擠着走。這時距離日本人佔領瀋陽已經是十八個月了；可是現在纔有軍隊輸送到熱河去保守這滿洲的第四省。奇怪的是日本人真就這麼快跑到了長城頂上一坐，把兩條腿懸在長城以南的中華國土裏遙望北平，不過在六十英里以內了。

雖然旁人看來很奇怪，其實對於邊境上的人並不奇怪；他們不用思索，本能的就知道什麼時候應該可以坐在長城上南望神州。他們覺得中國向北發展到長城以外適足以使世界的均衡破裂。他們覺得長城是世界上最古的疆界，他們很自然的想把他重變為最新的疆界。他們以為長城和歐洲的萊茵河一樣：這種疆界可以因一戰而變遷，又可以一戰而恢復的。

宦官在現今的中國已經是過時的了，但是目下中國混亂的政治和以往中國歷史上每朝代衰亡時的宦官政治確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當我在熱河看見中國軍隊那樣摸索又害怕又無望的狼狽而滑稽的狀態，我屢次想到那些古老的勒着口的破砲疏星似的散放在長城上和各地頹朽的城牆上。這些砲身上常常刻着以前宦官將軍的名字，他們都是因宮庭陰謀得被命為保守邊疆的人物。把這些宦官的名字拿來解釋滿洲的箭手當初戰勝了以大砲守衛的中國邊疆，

當明朝因陰謀，政亂，內戰而衰弱，同時滿洲人與蒙古人携手北下掃盪中原的時代，比任何歷史上的條約都來得有力。

有人講中國因兵甲之不堅利不得不敗於人；但是凡在熱河旅行經歷過那樣險峻的山巒的人，就可以知道歷史上如果能有以弓箭戰勝飛機的話，那麼就應該是這次的戰爭。中國方面以地利而言實足以抵禦日本的軍隊，坦克車，和裝置着槍礮的兵車。在那樣荒野峻峭的山地裏，以飛機投炸彈實不如以臭彈擊象。幾百里的叢山峻嶺中國大可以毫無危險的用最輕便的山礮（中國軍隊裏山礮很多）或竟用迫擊砲以抵抗敵方的坦克車一類的利器。許多山路地方中國隨便就可以用少許炸藥烘炸山石來阻礙日本軍隊的前進，使日本人自己去費力開路，或是另尋途徑，那時中國又可以施行同樣的方法。

只要克若傑（Kruger）的包爾兵（Boers）一萬人，只帶一些手槍和炸藥，來把守熱河，不會損失一兵一卒，比十五萬中國軍隊和義勇軍擁擠着所把守的熱河邊疆還可長十倍。可是在原田將軍下所指揮的日本摩托兵軍隊在三天半之內竟從朝陽長驅直入，走了二百多英里路，直抵熱河省城，兵士只死了三個傷了五個。當我看見日本兵在

熱河行宮前卸輜重的時候，『天下爲公』的標語帶着老大東方不可侮慢的氣派還懸在早已逃跑了的湯玉麟的官府的門首，日本兵帶着很舒服的糧食，連鹹魚都在內。中國人山戰的技術絕不能與日本人軍隊運輸的速度相較量。我曾在熱河很近的看見中國軍隊五萬人，其中找不出一個傷兵。熱河省城失守時唯一的損失是兩個洋車夫，因爲不願給中國兵拉行李逃走而被打死了。

有些地方中國軍隊在這種悲劇之中也表現一些精神——雖然宋子文罵他們『這羣土匪逃回到北平城門前面了。』我永遠不會忘記張學良部下的一些年青軍官的決斷，勇氣，和內心的失望，他們竭力要教他們的兵士抵抗，或竟像中國歷史上每次最後的抵抗一樣，在自身犧牲的熱情中情願以力殉國。如果他們是守城，他們或者可以管理一般兵士；但是在那種荒寂奇偉的亂山之中他們實在無法談軍紀。我看見過中國兵士，四十英里以內還沒有一個日本兵，只因爲看見一輛載重汽車一閃，就連忙從前線上跑下來了。

我更永不能忘記孫殿英的蠢笨的農兵，在赤峯已經失守後他們向赤峯前進的情形。有時二十英里內在路上遇不到一個高級軍官。兵士們的軍械訓練雖好，但衣服穿得很

單薄；糧食輜重又遠在後方。他們在這奇異的山野裏疏散得很不容易後退或集合，他們雖然忍耐着向前走，但是臉上都癡着不情願的顏色。剛退下來的一簇簇難看的義勇軍正遇着他們。這些義勇軍看着他們這些正式軍隊的槍械心裏充滿了覬覦，他們都是馮玉祥的『基督教兵』，因爲行軍紀律好到處受農民歡迎的。中國人久識陰謀的就說，如果這般人被日本兵打亂了逃回來的時候，他們時時有被中國自己的義勇軍設埋伏而消滅的危險。

類似當初宦官陰謀的政治把中國軍隊分化開了。每枝軍隊的長官都宣言自己願意打，可是明白表示他們不能信任他們的同僚。最利害的是一般義勇軍——這一些自動從軍的人，中國美其名曰義勇軍者——他們賣了中國。這些人，對世界挑着廣告說是愛國志士拚死要奪回滿洲的，他們弄到熱河人民對他們切齒深恨而不得不歡迎日本人來作救星。

我在熱河遇見的農人，一談到義勇軍都低下聲音回頭張望惟恐被人聽見。少數的義勇軍是以前滿洲軍隊的兵士被日本人打散了的，多數是舊日的強盜，爲了吃人這些強盜沿着邊疆愈聚愈多。他們以愛國爲名造成了一個恐怖時代，任意搶掠他們所『保護』的村莊。他們不僅搶掠而已

，在這些義勇軍敗退的時候，我看見軍上滿載了婦女，當地的人說她們是被一般愛國的強盜從各村擄掠了走的。

因此，當日本人進來的時候，一般平民都穿起好衣服到街上去歡迎他們，不但不害怕，而且明白表示好容易得到一個寬仁的統治者來救黎民於水火了。中國領袖也毫不遲疑地說明其所以如此實因治理不良。這種情形恐怕一個外國旁觀者比中國人會看得更清楚。

另外一般人就大不同了——智識階級，職員，商人。他們臉上只有死樣的沉默，蒙蓋着深刻的真實的悲哀。這一階級的人懂得一些民族和國際的情況，並不只求地方的平靜和稅捐的輕減。他們家庭的傳統觀念是賺錢和送子弟到學校讀書。他們同時受過中國舊式教育思想和西方文化的洗染；他們知道以法律公道來建設世界和平的意義，他們知道幾年以前中國因工商業進步國際地位增高而幾乎能所謂達到富強的好處。他們覺得到異邦人來統治的恐怖，自家統治者不善治理的省分竟歡迎侵略者的這種恥辱。

他們雖痛苦，但是這樣人並不多。在中國，滿洲，和蒙古這種地方，人民大半都不識字，他們祖先的歷史只是用神話由口頭傳下來的。我們和書籍一起生活的人，每星期都有新的理論；每次戰爭發生，隨着就有一堆堆的新理

論印出來。他們和傳統的習俗一起生活的人不會這樣容易改變。他們把傳統的歷史和生活縮攏在一起，他們也不會有多少複雜的理論。他們只知道一個簡單的輪迴，戰爭，生長，腐蝕，再是戰爭而已。

因此，當他們的世界充滿了混亂和不公道。他們就知道歷史的輪迴又到了衰頹的時期了，他們自己知道什麼時候戰爭會來。長城邊界的人都很知這種歷史，他們本能上就知道潮的進退——是中國像以前歷史上多少次的往前進，還是中國像以前多少次被逐後退。今日自滿洲以至全國的人，大家都感覺到潮是又往後退了，長城又得重新作爲國家的疆界了。

地圖和教授科書一向告訴我們中國這個國家有四五萬萬人，土地比北美合衆國還要大。我們在地圖上看，長城是穿過中國，不是在邊界上。我們是不知道這本來是因爲中國被異族若蒙古人和滿洲人者來征服，中國的邊疆才擴充到長城以北的。中國在純粹的中華民族統治下若明朝者，中國想侵略長城以北的土地，結果是年奉金銀與異族的領袖才得保持國家的平安。

如果我們再看西藏，新疆，蒙古，滿洲，佔全中國地圖的八分之五，我們就可以明瞭除了滿洲的居民三千萬外

，其餘這四五萬萬的中國人都住在這八分之三的土地上。西藏，新疆和蒙古的居民實在不是中國人民，就是滿洲的三千萬人也只住了滿洲土地的一半。那裏直到今天，三分之一的土地仍爲蒙古人所佔踞；其餘的地則或是無人居住的森林大山，或是爲和滿洲族有關的一些部落所佔有。

這些自邊界直至亞洲沙漠的人民完全不知道有所謂日內比，也不知道戰爭是正式宣戰還是非正式接觸，這層對於他們是毫無分別。他們只知道又是打仗而已。當美國與歐洲正辯論辭句上定規怎樣把侵略者的名字加在日本的頭上的時候，這個名字反沿着長城直到西藏傳遍了，人們都說現在對中國反抗正是時候了。蒙古人想活動，亞洲中部的土耳其人正要對在哈密雅克蘇，及和闐的『中國帝國主義者』革命；青海部落也對甘肅反抗，在四川邊疆上的西藏人也一步步收回他們幾十年前喪失給中國的領土。

我在熱河的時候就聽有傳說：『熱河以後就是察哈爾錫林郭勒及烏蘭察布』——在中國殖民地和在蘇俄勢力下的外蒙古，這中間的一些蒙古人的自由聯盟。這些對於美國和歐洲人民都是些蠻荒的名字，他們也許看了報紙會奇怪這一次日本竟要佔居這麼多土地；但是在長城以北的混亂的土地，人民不過相信又是一個侵略時代降臨罷了。

當我們爲世界和平破裂而憂鬱的時候，他們正互相說舊日長城的戰爭又起來了。他們在日內瓦沒有代表能撤回。他們只說：『我們如今可以把中國人趕進長城了』。——他們就開始作這件事。中國本可以制服他們，可是中國對他們太苛刻，現在是太晚了。因爲怕破壞我們好容易由威爾遜十四條，國際聯盟，華盛頓會議，非戰公約所建設的新理論，我們反對這次中日衝突，但是他們却歡迎，因爲他們覺得他們又可重得自由了。

那麼，在歷史的均衡上，長城既是中國的天然疆界，爲什麼中國一個因內戰，飢荒，內政腐敗而漸弱的國家，反能向北發展得那麼遠，得到蒙古和滿洲呢？在海約翰宣言門戶開放主義並以美國的勢力涉足以後，特別在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以後，各國都宣揚不願趁中國之羸弱而圖謀不義，我們常談中國恐怕算是世界上最沒有希望的國家了。爲什麼這一羣沒有領袖的農民，這一個內政混亂，爲兵匪蹂躪摧殘的國家竟能殖民於滿洲，大豆的出產寫在世界報紙上第一頁，趕走了隨時就可以南下牧馬並且在中國立過朝代的蒙古人呢？

原因很簡單，就是西洋的許多從事於鐵路材料的製造和軍械的製造的人在中國作很好的買賣。以前蒙古的騎士

和把守長城的步兵弓箭手的軍械是一樣的。無論什麼時候他們都可以侵犯中國，他們總知道守長城的軍營堡壘在什麼地方，可是中國人不易知道蒙古人的行踪和軍幕所在。西洋人來後，運來現代的軍火，鐵路材料，再晚有汽車。用了這些東西，就是不好戰的中國人也可以抵禦蒙古一類的民族了。

大家都不甚知道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以往二十年間中國在滿洲殖民地不是用的滿洲的荒地，而是趕走了的蒙古人的土地，這些蒙古人曾經發展到離瀋陽不到一百英里了。雖然蒙古人馬隊敏捷也決不是鐵路的敵手；中國人介於蒙古人與大海之間，竭力設法不使蒙古人多得現代的軍械，只有在外蒙古，距離中國鐵路很遠的地方，蒙古人因得俄國人來幫助軍火，才可以和中國人較量。

同樣，在西藏，從印度可以得到軍火，中國人就被逐回來了；英國許可西藏人自由買軍火以自衛，很引起中國的厭惡。可是英國近年來也許可軍火自印度輸入新疆，中國人用以制止新疆本地土人的革命。如果沒有這批軍火，恐怕今天新疆已經沒有中國官吏了。

當一個日本樣的民族用槍刺想來重整長城以北，中國的紙老虎立刻就被穿破了。在以往幾十年間，中國勢力，

臨時擴充到長城以北，事實上只是西洋各國給與中國的一個商業信用而已。日本干涉的意義就是日本已無須給中國幫忙，並且離棄了所有願意等候中國能還這筆商債的國家。日本現在是竭力要把亞洲內部的諸民族集合起來反抗中國，意在中俄兩國之間重收長城作為一個民族的地理的國家的分界嶺。如果日本此舉成功，中國又將受控於北疆。從長城建築之日起直到二千年後，中國歷史的機軸是在這個北疆；二千年後，西人航海到了遠東，然後中國才受制於海疆。日本大陸政策的成功實使海上有霸權的諸國不能再干涉中國，這些國家自然要去掉在中國的許多特權，重變為十九世紀初葉的一些商人而已。

我們可以議論日本怎樣破壞世界竭力所造成的和平；我們可以指責日本在殖民的競爭中來得太晚，現在在一個不合適的時代才想起要作歐洲人在十九世紀所作的工作。可是，歷史最後要表現的是一個偉大的力量怎樣把一個海上霸國變成一個大陸霸國。這就是日本的回返亞洲運動的意義。日本的命運就要看他在制服蒙古以前俄國能否統轄海洋。

感言三則

(日內瓦通信)

王冷樵

一、海外亡省官費生

鄉友自倫敦經巴黎返日內瓦。他說，九一八以前東三省的留英及留法官費生，仍繼續領官費。他更申明一句地說：「不是國民政府的官費，是滿洲國的官費」。「滿洲國」教育部會通知各生，如欲繼續領收官費，須接收三個條件。第一，須承認爲「滿洲國」的人民。第二，須簽具志願書，申明將來願爲「滿洲國」服務。第三，領到官費以後，須以家庭爲担保。以上的條件，聽說多數的東三省學生業已接受。我的朋友常有人問我，他們此舉於人格有無傷損。我一時不知如何以解答，但事後想起來，不僅自己感到亡省之痛，更替他們痛哭。他們如果不接收，豈不成了官廢生？除了中途輟學，還有誰來接濟？是靠政府呢？還是靠行將築室於勒曼湖邊的張將軍呢？這是我們亡省之痛呵！

二、「責人」與「責己」

一句很普通的話，却是人們很好的針砭：當我們要「責人」的時候，最好先攷察一下自己有何可責；若是自己

有可責的地方，最好還是「責己」。所以說：「責人不如責己」。但是在這所謂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時代，不但責己者少，責人者多，而且「忠言逆耳」之外更想「文過飾非」！

最近張學良將軍到了羅馬。此間不少的記者曾往訪問，詢及張氏去職的原因及感想。於是倫敦，柏林，巴黎各處的報紙都有張氏的言論發表。其大意不過說，此次的失敗原因，在於政府不發給軍費及軍械。倘軍費及軍械充足，熱河或不致於失守。所以熱河之失其過在於政府。

哀莫大於心死。張氏去國，爲將來報國，爲個人恢復人格着想，吾人深望其有覺悟，努力考察研究，此不之爲，而尙文過飾非，豈其心已死了嗎？

近聞張氏有築室勒曼湖邊之議。張氏昔日以無軍費而不抵抗。然而若使以此築室之錢移爲熱河軍費，或捐助捨身報國不顧身家的東北義勇軍，未必不能得國人諒解。此不之爲，而欲高枕而臥於勒曼湖邊，不知勒曼湖邊有多少。爲自由，爲民族而犧牲，留光榮於史冊的英靈，豈不笑煞

記者籍隸吉林，更不禁興亡省之痛。謹以衷心所動以勉張氏，並以勉效法張氏者，固無任何作用也。

三、「滿洲國」的郵票

自傀儡政府成立，劫奪郵務以來，歐洲的收藏家與好奇者競相搜尋「滿洲國」的郵票，甚至有出重資而買不得者。記者因為是東省的人，所以會有主顧過問。可惜自家鄉淪亡以後，家庭消息斷絕。每讀：「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久不答，况乃未休兵」之句，真有愁見「滿洲國」郵票之心，何況會來沒有呢？同時更想到「滿洲國

」的郵票因為國聯不承認「滿洲國」，恐怕還到不了國界。不期剛巧於國聯顧問委員會不承認「滿洲國」附委員會通過「滿洲國」不准通過國際郵政一節的時候，翌日便有一位鄉友贈送給我不少「滿洲國」郵票。國聯此舉恐難有效。我會傳給國聯顧問委員會的主席 Lange 及其同事一看。他們祇有以笑容。

這郵票我祇有兩種，一種有溥儀的小像，一種有遼寧省城九門寶塔的景。記得去國之先，曾遊以下數次。不期十年後重見塔景於日內丸。一國破山河在！

六月十一日于日內丸

本刊前數期要目

第五十七號

這一星期

暗殺與政治——派遣留學生
北平的前途及古物的保存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農林教育
答覆青年朋友幾段的通信
煩悶與大學教育
史汀遜主義與世界大勢（續）
從小孩說到大人 橫田喜三郎著

蔣廷黻

布詠江

叔永

永修譚
濤鳴

第五十九號

這一星期

國際的風雲和我們的準備
教部令清華繼續考選留學生以後
國際經濟與中國
（二）賠款，戰債，與關稅
如何整頓大學教育？
俄國與亞洲關係之將來
Prince A. Lobanov-Rostovsky 著

蔣廷黻

薩本棟

守愚

君衡

鳳岐譯

第五十八號

這一星期

蘇俄出售中東路
國際經濟與中國
（一）貨幣安定與美法立場
如何整頓大學教育？
吾國現行財政監督制度之運用
近代工人生活的保障（三）

蔣廷黻

守愚

君衡

吳景超
溱廉

第六十號

這一星期

鎗口對外不可亂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初稿
鄉村運動之政治的意義
國際經濟與中國
三、生銀與中國
中國縣志的改造
太平洋國際學會

蔣廷黻

燕樹棠

守愚

吳景超

衡哲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報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業已售完。現在第二十六期至五
 十期亦存書無多，欲購從速。特價如下：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北農叢書

日本法西斯運動

日本法西斯運動，邇年來殆呈舉國若狂之狀態。此書共分五章，首為概觀，次述歷內，
 次陣營展望，次各黨政策，最後詳論中心活躍之各人物。讀此一冊，於日本政情，
 瞭如指掌，而暴日何以強佔我東北，亦思過半矣。全書二百餘頁，用上等道林紙精印
 總發行所：北平宣外大街北平晨報社 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每冊七角。外埠加寄費七
 分，郵票代洋八十一分。

北平晨報
 大張每日三
 市每月一元
 外埠每月一元三角

第十卷

國聞週報

第二十九期出版

本期刊目

華北運動會詳記	世英輯
南京政府之經濟基礎	盛祖康
英國地方財政制度	崔敬伯
老新黨王小平先生	陳光庭
世界經濟會議(六)	記者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芸生
一週間大事日記	記者
凌雲一士隨筆	記者
記丁玲女士	從文
二十一年度國家普通歲入歲出總概算案	從文

△每週一冊全年五十冊
 △定閱郵費九元五角
 △每冊零售一角五分

社址：天津法租界三十
 號路一百六十一
 號

社會調查所

出版

王士達著

民政部戶口調查及各家估計

▲社會科學雜誌抽印合訂本▼

價 全書每冊價洋一元五角
 目 單購附錄每冊價洋九角

清查民政部戶口調查常引起研究近代中國民數者之爭論。本文根據
 二年來搜集之各項文件編成。對於該部辦理調查之緣起，調查章程
 之規劃及奏定，各地之辦理情形，以及各家所作之估計，均加以詳
 盡之說明及深切之評判。

全篇已分期登載於社會科學雜誌三卷三期及四卷一期。茲為便利讀
 者起見特抽印合訂本，並將有關此次調查之文件，擇其重要及向未
 經人引用者附印篇末，以供參考。現已出版，書印無多購取從速。

總發行處
 北平文津街三號社會調查所

哲學之改造 次譯界名著

杜威著 許崇清譯 一冊 一元二角

蘇俄制度·汎繫制度與資本制度

社會科學叢書 Conns等著 林光徵等譯 一冊 七角

蘇俄之歐洲國際關係 新時代史地叢書

徐道知著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各國待遇華僑苛例概要

王爾摩編 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戰後歐洲經濟史 經濟名著

Sharp著 林光徵譯 一冊 一元八角

公法的變遷 漢譯名著

狄驥著 徐砥平譯 一冊 一元五角

國際公法論 大學叢書

李聖五著 一冊 定價二元八角

中國民法總論 大學叢書

胡長清著 一冊 定價三元六角

植物園 植物園小叢書

矢部吉賴著 許心芸譯 一冊 一角

動物園 動物園小叢書

小泉丹著 王式丹譯 馬培文譯 一冊 二角

廣韻研究 國學叢書

張世祿著 一冊 定價七角

中國算學之特色 國學叢書

三上義大著 林科棠譯 一冊 二角五分

二次方程式 代數算學

林鶴一著 鄭心南譯 一冊 四角

三角函數 三角算學

林鶴一著 駱師曾譯 一冊 四角

微積學發凡 算學叢書

鄭太朴著 一冊 定價四角

商務印書館

最近出版新書

日期星期除外

高級農業教科書 植物病理學

夏詒彬 許心芸編 一冊 定價七角

種菜法 農學叢書

黃紹緒編 一冊 定價三角

菜園經營法 農學叢書

吳耕良編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養鴨法 農學叢書

吳德銘編 一冊 定價三角

鋼琴學 第一集

張玉珍 百獲梅合編 一冊 二元

中國文藝變遷論 國學叢書

張世祿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元曲概論 國學叢書

賀昌莘著 一冊 定價四角

元劇聯套述例

蔡登述 一冊 定價七角

中國小說研究 百叢書

胡懷琛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分

世界的大河與文化 少年史地叢書

Dakin著 柯蘇民譯 一冊 四角

朱筠年譜 中國史叢書

姚名達著 一冊 定價六角

奧里昂的女郎 世界名著

Chambers著 一冊 七角

這一星期

蔣廷黻

論妥協並答
天津益世報

七月二十六日天津益世報的主筆先生發表了一篇社論，批評我在本刊第六十號所寫的「鎗口對外不可亂」那篇短評。益世報這篇社論，據我看來，前大半不是誤會，就是文字之爭，值不得多辯。後半講本刊「妥協」的是個主張問題，政見問題，實在值得再加以討論。

我說鎗口對外不可亂的理由有兩個，一個是法律的，一個是政治的。我尤其注重政治的理由，所以原文論國法者不過數行，而論政治者則佔全文的三分之二。我的主要的政治理由就是益世報的主筆先生所引的那一段：

我們要認清楚，我們的國恥，如同法德的國恥一樣，不是你今天打一下，我明天高興又打一下所能雪的。這種局部的，無充分軍事，經濟，政治及外交預備的戰爭，縱能得着一時的小勝利，終久徒給敵人蠶食的機會」。

對這個理由，益世報既說：『蔣先生說得很對』和『這段

話我們不否認』，那末我們的看法大致相同了。

關於法律問題，我的看法是：「倘國內握兵者，可隨時隨意向外開鎗，這就不成國家了。」益世報社論謂「此意甚是」。可見我們關於此點的意見亦相同。不過益世報要進一步說：『然在我們看來，倘國內握兵者，可隨時隨意「不」向外開鎗，此亦不成國家了。』這一點我完全贊成：我在短評內未說這句話，因為我所要討論的不是這個問題。我不主張不抵抗；我沒有說鎗口永不可對外。據我看來，在過去這將近兩年之內，我們在錦州及熱河是應作死戰的。在錦州全未抵抗，在熱河僅有兒戲的抵抗，這不但是張學良氏之罪，更是中央政府之罪。益世報又說：『倘國內握兵者，可隨時隨意向「內」開鎗，那更不成國家了』。關於這一點，我也是完全贊成的。我在短評的開端就說：『如果從此以後國內的鎗口永不對內，那這二十年內的戰犧牲總算得着了一點的代價。可惜這一月以來的察哈爾問題竟有因鎗口對外引起風波致轉而對內的可能。這是何等悲痛的事。』民國以來，軍人隨意不向外開鎗和隨

意向內開鎗者實在太多了。不過我們作政論的人絕不可因為以往非法的事太多，對現在的及將來的非法行動就默無一言了。

至於中日近兩年的戰爭是否戰爭及中國現在是否根據憲政的辦法來決定和戰：益世報的批評或者是好文章，確全無意義，我們用不着費篇幅來答辯。但其中有一句話很表現幼稚的觀察。這句話是：「對方既以「隨時隨意」開鎗來對付中國，我們當然只能以「隨時隨意」開鎗自衛。」日本的行動，在中國看來及從國際公法看來，當然是隨時隨意的，確從日本的國法及國政看來，絕不是隨時隨意的。所以日本的開鎗能得成績，我們的不能得成績。等到我們的開鎗也是依照國法和國政——換句話說，也有全盤的計畫，和充分的預備——到那時候，我們才能有效果。沒有國法和國政，日本人不必作大陸帝國之夢，我們亦不必作收復失地之夢。這一點國人萬不可忘了。

益世報的社論最值得全國人士注意的是論妥協那一段。在原則上，益世報的態度與我們是一致的。牠認清我們不是消極的妥協。「他們是一方面「竭力避免衝突，一方面竭力充實內部」的妥協。這種見解，我們不敢認獨立評論是錯」：這是益世報的原文。但是益世報在這個原則上

要加兩個條件，一個是我們實實在在的求充實內部，一個是日本人願給我們充實內部的機會。我承認這兩個條件是必須的；同時我也承認對於這兩條件達到的可能，我不是樂觀的。我以為第一個條件比第二個條件還要緊，還難達到。我覺得中國的困難十之六七是中國人自造的；中國復興的障礙大部份是在於自己，而不在彼白色的或赤色的帝國主義者；這些障礙的掃除大部份須靠我們自己的努力。譬如：論吏治，我們不能說，官吏的舞弊是帝國主義者指使的；論教育，我們不能說，學潮的爆發，教員的兼課和缺課，學生的求學位而不求學問等等是帝國主義者指使的；論出版界，我們不能說，辦報和辦雜誌的人之拿談戀愛及罵人來迎合讀者的心理，是帝國主義者所指使的。這些我們可以自動改革而外人絕不干涉的事太多了。至於日本，她雖要一個不反日的中國，她並不要一個窮而無知的中國。中日的衝突一部份是中日的衝突，一部份是日本與西洋的衝突。中國對西洋如有權利的喪失，就危害日本在遠東的地位。所以此中我們尚有活路可找。益世報主筆先生以為我所提出的妥協方案過於忠厚，是「說夢話」。其實這個方案我得自楊宇廷，是他在東北曾經實行而有効的。我們如以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張作霖及楊宇廷在東北的努力

，我們不能不說，中華民族在東北的基本努力大部份是他們培養的。張楊二氏去世之前，東北的形勢是極利於我們的。

我們同時須再想一想，除了這妥協一路而外，還有別的路可走嗎？我看不出別的路來。至於繼續作局部的，無計劃的，無預備的戰爭，我覺得是條死路。今年宋哲元在喜峯口，商震在冷口，及中央軍在南天門的戰爭，論兵士犧牲的精神和實際，恐怕在中外歷史上都無可與比的，但是成績在那裏？成績不外嚇跑了一些資產階級及智識階級，同時給了河北省的小百姓們無窮的痛苦。這樣的戰爭，如繼續下去，只能使日本造順口，因為小百姓們將歡迎日本的「王道」了。東北四省義勇軍的成績也不過如此。至於想拿這種戰爭來刺激民族精神，我敢說，充其量不過如同打嗎啡針。爲什麼呢？因為我們的身體已太不健全。除非先恢復康健到相當程度，這種刺激是不能收效的。

益世報的主筆先生又說：「獨立評論今日妥協的主張，亦不過四十年前李鴻章贊成妥協，十幾年前袁世凱贊成妥協的議論而已。」袁世凱的時代太近；其主要史料尙未出版。我們不能加以論斷。至於李鴻章的時代及全十九世紀的中國史，毛病並不在於妥協。第一，在十九世紀，中

四

國對外的政策並不是妥協。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有鴉片戰爭；二十年後，到咸豐末年，有英法聯軍；二十五年後，在光緒十年，有中法戰爭；十年後，有中日戰爭；五年後，又有八國聯軍之役。六十年內，已有五次對外的戰爭，不能算少了。如果中國的近代史能給我們一點教訓的話，其最大的就是在中國沒有現代化到相當程度以前，與外人妥協固吃虧，與外人戰爭更加吃虧。第二，李鴻章的大失敗——甲午之役——正由他的不妥協。稍知中日戰爭外交史的人都知道在戰前，李對日本的外交是絲毫不肯讓步的。第三李鴻章及奕訢文祥諸人全盤事業的失敗，與妥協不妥協絕無關係。他們的失敗，一則由於他們自己不深切知道現代的政治是什麼，二則由於時人不知道現代文化的性質和重要因而常常掣肘，三則由於疆吏畛域之見之深，四則由於官吏舞弊。現在呢？第三及第四兩種障礙雖尚存在，第一及第二兩種——根本就是知識的缺乏——可說是過去了。所以我雖對前途不抱樂觀，我還覺得有一線的希望。

處今日而作政論的人的第一責任，據我看來，是集中力量來幫助和督促政府實行現代化。不走這條路，我們不妨光明正大的內政問題來批評政府，推倒政府。至

於外交，無論是誰來當權，也不過如此。我們大可不必幫助那班借愛國的美名來割據，來破壞統一者。若拿外交的問題來作內爭，那不但是騙人，簡直是誤國，因為是教人

民失了國事先後及輕重的權衡。

七月三十一日

再論銀協定

守愚

在本刊第六十號內，我曾經討論生銀和中國的問題。

那時協定還沒有成立，但是我的意見是協定的成立與否，和銀價的安定，或提高銀價，截然沒有影響，亦沒有抹濟。我說協定的功效，祇是希望銷弭忽然的不可捉摸的銀價變動。供求兩方長期的變動，和銀市期貨短期的變動，還是存在。在過去一個星期內，生銀出售的限制協定，居然

六十五萬，合計三千四百八十萬，約等於印度在協定期內，可以出售的數目。不過這個協定，經各國於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以前批准，如購買規定之銀量，一經批准國承認，即使有一國或一國以上的產銀國未予批准，該協定仍為有效。

成立，並且加入澳洲，變成九國協定。主要的條文，是印度於四年內，庫存生銀的出售，每年限三千五百萬純盎司，四年出售總數，不得超過一萬四千萬盎司。西班牙在同期內，每年售量，不逾五百萬盎司，四年合計不得超過二千萬盎司。中國在同期內，不將任何鎔毀貨幣所得的生銀出售。產銀國政府担任不出賣生銀，並準備收買自己每年出產的生銀分配的辦法，是美國二千四百四十萬盎司，墨西哥七百十五萬，加拿大一百六十萬，秘魯一百萬，澳洲

這個協定公佈後，國際輿論，並不怎樣熱心。如作者前期所說，對於安定銀價或提高銀價，亦並不怎樣樂觀。何以呢？第一，印度政府出售生銀，最近四五年來，每年售量約三千萬盎司，和協定規定的數目相近。所以這種規定，祇是國際間承認他是個既成事實。進一步說，就是把印度出售生銀數量的秘密，拆穿公開，省得銀市場中瞎猜，多出一種不可思議的風險。第二，西班牙的生銀出售的限制，祇是防備他掃數拋出，至於每年出售的數量不多，不足影響銀市。第三，各主要產銀國準備吸收印度政府拋

出的庫銀的數量，表面上似乎增加生銀用途，其實和各國的鑛銀年產量相比除美國外爲數甚微。（美國約佔百分之四十，墨西哥百分之七，加拿大百分之七，秘魯百分之五，澳洲百分之六，）於提高銀價的前途，影響不大，反而各國政府多一層生銀購價的負擔。所以我們前次看見加拿大政府代表，在猶豫不決。那末美國政府代表何以如此熱心於協定，又何以如此肯犧牲？原因是一則抬高物價的辦法，是羅斯福總統所主張。祇要有一綫希望，能幫助生銀鑛主，當然贊成。二則參議員畢德門自己就是代表美國產銀省納凡大的銀鑛利益，並且政府原有收買生銀的提議，在參衆兩院中，鬧得很兇。所以美國政府肯出代價，吸收鑛銀。一則民主黨的政策，再則是政治的壓力。可是銀協定能不能在其他國家順利通過，還是一個問題。即使協定成立，各銀產國比例購進生銀，那麼到了一九三八年後，各國不是又多了許多庫銀，豈非仍是銀市場上一種新的不可捉摸的潛勢力，仍足以影響到銀價鉅大的變動麼？所以協定惟一的成功，祇是設法使印度的生銀出售數量公開和限制，產銀國的鑛主，祇是在銀市場中，得到不受意外的狂跌驟漲的風波。又難怪產銀國人民覺得費九牛二虎之力，而所得僅滄海一粟了。

我們研究不出賣鎔銷銀幣所得的生銀的條件，是否吃虧，加入協定，是否得便宜。我以為第一無所謂吃虧，自從國府發佈國幣條例後，我們的幣制政策，是暫時把金本位或金匯兌本位等問題，一起擱開，先把銀幣統一，在這四年中，我們除了鎔銷舊幣，改鑄新幣外，還須輸入鑄幣銀料，何況我們原本是個銀輸入的國家呢？但是本位問題，總是懸着，所以我仍如前期所說大家應把停鑄銀幣前後的印度來作參考，預備改制，雖然他們國內情形，不和我們完全吻合。

那末第二從協定方面我們是否得着便宜？據顏惠慶大使說，銀協定對於中國，似有相當利益，有助於穩定銀價，可附帶的提高物價，中國的購買力，自然大增，假如我們不完全迷信一個辦外交的人，在外交上得到地位，其餘的學問便自然而然的成爲權威的話，（不幸我們偏中此病，半生戎馬的武夫，高談國際政治經濟，或鑽營祿位的政客，大唱改良高等教育，國人居然聽從，這與聽梅蘭芳談中西文化，問賈波林未來世界大戰何異？）銀價的穩定的程度，祇限於消弭自印度來的不可推測的風險，提高物價，不知是中國的物價，還是外國的物價。生銀在外國是一種貨物，其價格的變動趨勢，與一般物價相比，雖稍有先

後之別，而大致相同。別的物價不提高，光靠一紙協定，生銀從何提高起？要是中國的物價，銀價真個從此安定，就理論上來，說生產消費沒有變動，物價不會抬高。要是生銀的金價，從此下跌，就前期所說，應當引起生銀輸入，因此一般物價抬高。要是生銀價漲，國內物價的趨勢，理應下落。我們以前曾經說過，銀協定決不能安定銀的金價。銀價趨勢，短期內有漲有落，長期看，不但不容樂觀，還應保持些悲觀態度。所謂提高物價，就中國來說，實在是個幾方面複雜問題，還是暫時提高，還是永久提高，還是繼續提高，這幾種每種對民生國計有何影響？我們還可將問題反過來說，就是怎樣將物價壓低，這樣又有什麼影響？我在六十期內稍有涉及，要是真個詳細說來，將漫無邊際。至於提高外國物價，我們儘可不必操心。

我們中國人，是最善於說能統話的。譬如談財政，當然不外「開源節流」了，談政治，當然不外「安內攘外」了。所以談銀價，就有「銀價抬高，購買力增加」。銀價怎樣可以抬高？抬高了又怎樣可使購買力增加？要是銀價不抬高，祇是平定，購買力是否漲，跌，或不動？要是銀價下跌，購買力是否必跌？還是不動？還是有上漲的可能？購買力究竟指什麼？銀價怎樣可以抬高，我在本刊六

十期「生銀與中國」一文內，已經說及，銀價是否可以安定，還是下跌，我亦經再三縱談，所以我們現在祇在解釋購買力的謎。我前在本刊五十八期內，狼簡單說起，購買力有對內對外的分別。拿本國的收入，購買國內的物力，所得的叫做對內購買力，要是購買國外的物力，叫做對外購買力。購買力的來源，是生產，生產的因素，是勞工資本和土地。生產的大小消長，一方看生產因素的配合，是否適宜，一方看外來勢力對於生產因素的配合，還是幫助，還是破壞。所謂外來勢力，並不光指國外波及的勢力，凡是經濟以外的勢力，如政治軍事社會法律等都是。從此看來，購買力的增減，最有關係的，最為緊要的，還是國內生產的消長。談購買力增加的人，他們心目中，大概是針對外購買力，以為我們是藏銀國，又是用銀國，銀的金價漲高，我們便可拿同數的生銀，換得較多外國的貨品。我以為我國同外國交易，不是拿銀子去買的，乃是拿本國的貨物，去交換的。我們將貨物輸出，得到金款，拿金款再輸入外國貨品。拿生銀直接去換，不是沒有，但是為數微乎其微。所以我們國際貿易，是否得到便宜，對外購買力，是否增加，第一須看我們輸出的多少。這個更須返看我們的生產能力如何。第二須看由輸出得到金款的多少，

這個便須看國外金物價的漲落。更進一步說，應當比較我們輸出的成本，和外國輸入品的成本，亦就是比較我們和外國生產的因素和這些因素的配合。所得到的輸出入貨物數量上的比較，和成本上的比較。總括簡單的說，一個國家對外的購買力，不是看國內藏銀的多少，不是看生銀的金價的上落，亦不是看生銀在國內的購買力的漲跌，（即國內物價的跌漲），乃是看生產出來的貨物，生產因素配合的方法，和國際間貨品貿易交換的條件。生銀的金價，要是上漲，祇有引起物價下跌，壓迫生產，間接的影響，物價漲跌，祇有引起國內財富的分配變動，和全國的生產方法與產品，沒有直接的，立刻的影響，更沒有與對外購買力必須有的，正比例的消長。我們聽見提高銀價，增加購買力的澎湃聲浪，實在是商埠買人，計算目前利益，觀察淺近事實而起的空氣。至於外來勢力，影響到生產，我們不必侈談，祇須環顧國內社會政治的混亂黑暗，就能心領神會了。

智識份子下鄉難

近來有好些提倡或實行鄉村運動的人，一致的主張智

話說回來，銀協定的成立，總算國際經濟會議唯一具體的成績，但是我的意見，以為這種協定，祇是暫時敷衍的辦法，絕不足解決增加生銀的銷費問題。並且就是協定可得各國批准，將來產銀國庫銀增加，仍為銀市場中一種不可思議的潛勢力。換句話說，祇是把以後四年內印度的庫銀，換成產銀國的庫銀，四年內印度出售庫銀的數目公開，四年後產銀國的庫銀，留待解決，將來仍足引起銀市場上深入直出的變動。我們呢，現在正在統一國幣，銀的需要，當然可以維持。協定簽字，於我們現在沒有什麼吃虧。可是四年後又怎樣？世界銀價的趨勢，就長期看，是要下跌，待印度把不需要的庫銀脫手，每年輸入的生銀又逐漸減少，銀的消費市場，便年復一年的狹窄，銀的前途愈加黯淡，我們改制的機會，亦愈加困難，因為我們的庫銀，以後無從脫手，要脫手便吃大虧。那末，我們又當怎樣的迎頭趕上，加緊改制的準備工作呢？

七月二十九日清華園。

吳景超

識份子下鄉。「回鄉村去」這一類的文章，在報紙及雜誌

中，時常看到。他們眼見中國的鄉村破產，農民是那樣的愚弱，在政治上又受種種的壓迫，以為只有智識份子，特別是受過大學教育或專門教育的份子，一齊回鄉去拯救他們，農民才有復蘇的希望。我們對於這些主張智識份子下鄉的人的善意，自然只有敬佩，但他們的主張是行不通的，事實已經很明顯地昭示我們了。智識份子不但不肯下鄉，而且還有集中都市的趨勢。有一天我在班上與學生討論這個問題，我問他們畢業後有幾個是擬下鄉工作的，結果在三十人之中，只有一個人舉手。這是事實，我想別個人的觀察，大致當與此相同。

智識份子，為什麼不願意下鄉，而願意集中于都市呢？這個問題當然是很複雜的，但重要的原因，據我的分析，不外以下數種。第一，智識份子的出路，在都市中比鄉村中要多若干倍。換句話說，都市吸收或容納智識份子的力量，比鄉村中要高得多。關於此點，我們如把社會中各種職業的性質分析一下，便可了然。世間的職業雖多，但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供給原料的，如農業，礦業，林業，漁業皆屬之。第二類是工業，他的作用在把原料製造一下，使其適宜于人類的消費。工業的名目繁多，我們不

必細舉。第三類是商業，包括買賣，運輸，銀行，保險，堆棧，交通等等。第四類是自由職業，如教員，律師，醫生，工程師，藝術家等皆是。以上這四類職業，除開第一類外，其餘的三類中，凡是重要的位置，以及需要專門知識的位置，多集中于都市。所以智識份子，如想在後三種職業中謀生，就不得不住在都市裡面。第一類的職業，雖然是散在鄉村，然其中如鑛業，林業，漁業，在中國或因沒有十分發展，或因墨守舊規，智識份子，在這些職業中可以插足的機會，是很少的。至于農業，在中國雖然是最要緊的職業，而且是容納人口最多的職業，但因中國農場太小，用不着新式的人材，在農科中出身的人，回鄉村去，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我的朋友學農的很多，但我細察他們的分佈，大部份還是在都市中。這些農業專家，有的是在農學院中當教授，有的在農事實驗場中研究，有的在政府的機關中辦事。雖然他們的工作，直接間接的可以嘉惠農民，但他們本人，以及他們的家室，大部份還是住在都市中，並沒有下鄉去。

鄉村中缺乏容納智識份子的職業，是知識份子不能下鄉的第一個重要原因。讀者請勿誤會，我所說的，乃是鄉村中缺乏容納智識份子的職業，並沒有說鄉村中缺乏智識

份子可做的事。智識份子在鄉村中可做的事，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說，是很多的。他們可以教鄉民識字，為鄉村增耳目；他們可以呼喊鄉村所受的禍害，為鄉村添喉舌；他們可以謀畫建設事宜，為鄉村添腦筋。這些都是智識份子在鄉村中能做的事，我們一點也不否認。但我們願意指出的，就是這些事都不成爲職業，都不能作謀生的工具。孫末楠曾說過，人類的第一件大事，是謀生活。智識份子也是人類的一部，所以也有他的生活問題。假如他回鄉去教鄉民識字（不是教鄉村的兒童識字，那是一種職業，有小學教員負擔。），去呼喊鄉村所受的禍害，去謀畫建設事宜，乃是去做改良鄉村的事，而非去就職業。這時他的生活，試問將如何解決？

智識份子難于下鄉的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爲鄉下缺乏研究學問的設備。我們雖然不敢說，每個大學生在離開大學之後，還繼續研究他的學問，但至少有一部份人是如此的。這些對於學問有濃厚興趣的人，知道今非昔比，假如他在鄉下住五年或十年，他的知識便要落伍。以前住在鄉村中的人，頗有些經學大師，文壇鉅子，都市中好學的人，有時須不辭辛苦，不憚跋涉，到鄉村中去就教。但今日的學者或專家，沒有幾個住在鄉村中的。他們如是研究自

然科學的，便離不開試驗室，如是研究社會科學的，便離不開圖書館。試驗室與圖書館，都是設在都市中。研究自然科學的，因爲採集標本，考察地質，研究社會科學的，因爲發掘古物，實地調查，有時也要下鄉，不過這都是搜集材料的工作。材料搜集之後，進行分析，比較，及撰述等事，便不得不在都市中舉行，因爲都市中有友朋切磋之利益，有書籍參考的方便，是鄉村中所得不到的。不但是研究科學的人，要住在都市中，就是那些以創作爲事業的文人，那些吟詩，作小說，寫戲劇的人，似乎可以沒有住在都市中的必要了，實際他們也都集中于都市。上海是中國最大的都市，那兒文人也最多。他們雖然不一定需要試驗室與圖書館，但他們需要印刷業以及同情的讀者，而這些却多集中于都市，因而他們也離不開都市。

第三，智識份子所以難于下鄉，乃是因爲鄉村中物質文化太低，不能滿足智識份子生活程度上的需要。智識份子的生活程度較一般農民爲高，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他們在鄉村中住下，便感到不舒服，也是許多智識份子所公然承認的。有些人目擊這種情形，便作文攻擊今日的智識份子，以爲他們的生活太貴族化，不能與平民共甘苦。我們暫時不管這種攻擊是否正當，我們所敢說的就是事實不

能因攻擊而消滅，假如這種事實，是有很深的心理基礎的。「人類在歷史上的進化，從一方面看去，無非表示人類希求一個更高的生活程度，并努力去達到那個更高的生活程度。捨人類全體而言個人，個人一生的活動，也無非在那兒追求一個較高的生活程度。所以多數的人，對於降低生活程度的勸告，總是不肯容納的多，因為這是與他心理上的要求相衝突的。我們這樣說法，并不否認社會上有少數的人，受了一種主義或宗教的影響，肯爲他的主義或宗教，犧牲他的生活程度。像中國歷史上的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便可代表這種少數的例外。既然這是例外，所以我們便不能以此希望多數的智識份子。

智識份子不肯下鄉的第四個原因，便是因爲他最親近的家庭宗族，親戚朋友都不希望他下鄉。那些生長在都市中的智識份子，此時姑且不談。就說那些生長在鄉村中的智識份子，他們的家庭，培植他到大學畢業，對他有些什麼希望？他們希望他回去種田麼？回去耕地麼？決不是的。他們希望這位智識份子，在學成之後，在外面做點事業，最好是做官，否則也做點別種揚名聲，顯父母的事，使得一家的人，都感覺到光榮。家庭中這種希望，當然要影響到智識份子的行爲。所以他們在學成之後，決不作回鄉

之想，如要回鄉，一定要「衣錦回鄉」，否則「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假如有一位智識份子，學成之後，在外面找不到相當的事，因而束裝歸里，他在家庭中所得到的待遇，一定是像蘇秦在兄嫂手中所受的待遇一樣。結果，凡是有丈夫氣的人，都要離開鄉村，到都市中去謀事了。智識份子，在中國還是很少的，所以鄉村中如出了一位智識份子，不但他的家庭中人對他抱奢望，就是其餘的宗族親戚朋友，都天天熱望着這位智識份子做點大事業出來，然後去提拔他們。曾文正公家書，有一段說他的舅舅，對於他的希望：

己亥年至外家，見大舅陶穴而居，種菜而食，爲惻然者久之。通十舅送我謂曰：外甥做外官，則阿舅來作燒火夫也。南五舅送至長沙，握手曰，明年送外甥婦來京。余曰，京城苦，舅勿來。舅曰，然，然吾終尋汝任所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寄六弟）

我想這一類的舅舅，不只曾文正公的家裏有罷？豈只母族的親人，對於一位智識份子發生這種寄生的慾望，別種親人，抱有同類的冀求的，正多着呢！在這種冀求空氣的壓迫之中，豈容智識份子回鄉服務？

以上所舉的這四種理由，雖然未能詳盡，但在這些勢力的影響之下，我們至少可以看出知識份子何以不願意下鄉而願意逗留于都市中了。至于這種現象，對於鄉村發生何種影響，假如發生一種不良影響，又有何補救之方，容當另為文討論。

二二，七，二七。

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批評

周炳琳

中國學生青年經過了民國八年五四運動以後，覺悟到改革政治實際活動之不可無組織，遂紛紛成立團體。雖大都以研究學術或問題相號召，其目的要在於藉此培養自身力量以從事于實際政治活動。在此要求日見普遍化之中，經陳獨秀李大釗諸人之提倡，產生了以蘇俄為典型之中國共產黨青年團及中國共產黨之組織。此類組織之產生有以下三事為其特殊的背景：一，打破現狀之情緒；二，社會主義學說中平等觀念之得人心；三，蘇俄革命成功之被理想化。組織成立之後，為探求革命方略之需要所驅策，該黨中人始稍稍對於馬克思主義對於蘇俄革命作切近的研究。但因其志在摹仿，又受蔽于第三國際，故其研究止于鈔襲，而不能進而以批評的態度衡其利弊得失。

該黨中人之了解本國情況較深者知道初步運動不能不憑藉已成之革命勢力，蘇俄派遣來華之代表憑其觀察與接

觸之所得亦建議應採取此途徑，於是有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以完成「國民革命」之議。國民黨自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以後，外受歐戰後世界思想潮流及蘇俄革命之刺激，內感充實新分子創造新生命之需要，對此議亦十分贊同。決策後，賴孫中山之豪邁，共黨分子居然得在國民黨幹部中取得重要地位。賴孫中山之才略，同時共黨中人亦確有為國民革命忠誠努力之分子。自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本是精神改組後，革命聲威益振，無論國民黨抑共產黨胥受其利。當時國人亦不辨兩黨之分野，而統視之為「國民黨」或「革命黨」。兩黨之分野果安在？粗言之，國民黨以「國民革命」相號召，共產黨以「社會革命」為目標。此其一。國民革命全民革命也，故崇尚全民政治而不主張階級獨裁。社會革命階級革命也，故主張階級鬥爭與階級獨裁，而反對普通民主政治。此又一分野。國共合作之初，

兩黨之有識者，皆諱言此分野。大概兩黨當時在朝之北洋當局言均是在野的革命黨，其遭遇相同，其反抗壓迫之壁壘相同，彼此並無利害之衝突。即有體認到此分野者，亦覺當時不必有此顧慮。國民黨負責者則自信德威足以感人，共產黨發言人亦自認彼黨若斬然露頭角當在「國民革命」成功之後，在現階級中彼此絕無衝突可言。初不料事勢推移，分野之意識逐漸顯現，以合作始，曾幾何時遽以分裂終，且成爲不解仇也。

民國十四年孫中山逝世後，共產黨人大發展其利用國民黨操縱國民黨以握得革命實權之野心，國民黨人中無復能鎮攝之者，遂稍稍存畏懼心。共產黨人乘虛抵隙，頗收分化國民黨內部之效。時蔣介石氏聲望日隆，國民黨人中少壯派羣集其下，大爲共產黨人所嫉視。明爭暗鬥之勢已成。當時所以未至決裂者，以共產黨人之勢力已滋蔓，國民黨之北伐軍事準備已將完成，若爲懲罰共產黨徒致影響北伐之軍事準備未免不智。在國民黨固似非忍不可，但共產黨人則從此張皇，準備先發難矣。先以重苦人民爲口實反對北伐。無效，則分遣黨徒隨軍出發以求奪取民衆，至欲威脅主帥以遂其劫持之野心。不成，則另組政府，劫黨以制軍。仍不成，則公開叛亂。如是一幕一幕揭開，至

南京清黨，武漢繼起分共，結束了國共合作一樁公案止，與國民黨出師北伐，黨軍自廣東出發不到半年伸展其勢力至東南各省，寧漢分裂，寧漢合作，同爲民國十五年十六年國內大事記之重要項目。

國共合作之局告終之時即兩黨相對抗之幕揭開之時。此後兩黨勢力之消長雖不盡由于在相對抗之局中就敗孰勝，要可憑此測計其大概。先言國民黨。國民黨由容共而分共，其所蒙之損失有三：一，黨內意志因此不統一，斯力量減少；二，由共黨之惡意宣傳，思想左傾之青年對黨離貳；三，因共黨叛亂，各種事業受牽制，一般人民見革命之利未見而秩序日亂，捐稅負擔日重，對黨治減少信仰心。此皆屬損失方面。然亦有兩種收穫，即，一，黨之理論從此復歸單純齊一，不再參雜不相干之分子在內；二，黨之運用政權從此把握得住目標，雖環境不利，自信心反增強。誠能利用此兩種收穫而邁進，將見損失各端隨時間而俱逝或減少其尖銳性，則對抗局中勝將誰歸似可斷言。

次言共產黨。共產黨由見容于國民黨而見屏于國民黨，由絕對有利之地位降到害多利少之地位，其損失多屬實質的，無待詳舉。其收穫乃在觀聽上，厥有二端。一，從此斬然露頭角，以急進之思想號召青年，以在野政黨之地

位攻擊在朝之國民黨，其吸引力之大，破壞力之強，大足自豪。二，宣傳國民黨之革命爲右，標榜該黨本身所領導之革命爲左，使人人心目中無產階級革命將來總有一日來臨之印象。但自取暴動政策，採流氓行爲以來，人民厭惡之心與日俱增。故此觀聽上之收穫亦歸烏有。既失憑藉，復不能得人心，對抗局中有制勝之望否？恐無人敢作肯定回答。

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批評是：該黨年來政策上最大的錯誤在於中途不忠于原來的認識，妄想超越「國民革命」階段而突進。此舉無論在理論上在利用機會一點上均屬錯誤。在理論上，憑你如何曲解馬克思主義，終不能說今日之中國已具備無產階級革命之條件。在利用機會一點上，

讀「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後

黃平凡

獨立評論週年號載丁文江先生「評共產主義並忠告中

國共產黨員」一文，顧名思義，立場可見。惟細讀之似覺

原文評論共產主義一節，多爲枝節的檢討而少理論之反辯；於忠告中國共產黨員一段，則亦止于散漫統計之羅列與夫中國情形之漫述而已。原文要義不無：一因不欲中國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乃反對整個的共產主義；二因上述之

苟不能以兵力在短時期內統制全國，自然休想步蘇俄之後塵，在兵力控制下，部署全國力量，自上而下，以齊赴共產化之程途。若夫不能攫奪政權到手則爲流氓爲匪，以擾亂秩序爲能事，違反大多數人求安定之心理，則更屬下乘矣。今日之中國，共產黨惟恐天下不亂，國民黨則以「攘外必先安內」相號召，一逆人心，一順人心，勝負之數似可逆觀。

雖然，中國共產黨若不願與流氓同終古，自有其不可侮之力量在。該黨中人誠能明瞭該黨之天下在將來，迅放棄其暴動政策與流氓行爲，取得法律上地位，循憲政常軌以與國民黨或其它在朝黨抗衡，則屈伸轉變之時正是奠定其社會基礎之時。是在該黨之善自處耳。

故，遂抹殺共產主義之真理。

吾人亦反共論者，然吾人之反共爲反對今日中國之共產主義化而非反對其根本主義；共產主義風靡全世，馬克斯之學說深入一般社會改造運動家之心，自有其理論之根據，科學之立場，絕非空洞之幻想所能同日語。吾人尤覺反共產主義與反對中國共產主義化爲兩件似同而實異之

兩件事。前者爲共產主義本身之是非問題，後者爲不論共產主義是也非也——即假定其爲是——然是否能以適用於救中國之問題。丁先生原文立義良好，際此國難日深之時，誠可爲對中國共產黨徒之常頭棒喝，促其反省。惜因輕于前者，重于後者，乃至前者之真理爲附會後者而隱避不聞。以此立論恐非但不足以折共黨之心，或更使之乘隙而反攻。蓋吾人今日首應解決者不在共產主義本身之是非，惟在是否適于中國一點上；尤不可因反對後者之故乃一併前者之真理亦概行抹殺。

著者不揣譾陋，茲將管見所及就原文一一加以討論，本理愈辨而愈明之意請教于原著者；然後附個人一己之見，俾供公開研究；倘能拋磚引玉則幸甚矣。

「價值是從這種複雜的社會關係產生的，很難追求每人製造之部成。分工合作的結果使得生產的價值超過每個人生產總量的價值。沒有問題交換——供給和需要——能增加物品的價值」——馬克斯價值論謂物品之價值決于社會勞動，意即一切生產品均賴勞動之加工而成。資本家出定量之原料經勞動者加工之後，其原有本身之使用價值變，隨之其交換價值——價格亦變；此生產品價格之決定則依于其所需之勞動大小而定。資本家未曾參與此新生產品

之勞動，其所出原有之資本，今則轉而存在于此新生產品中，與其價格之變化無關。所有此新生產品之價值——較多于原料所值之部分均應歸諸勞動者所有。此間所論之商品價值乃指其製造價格，而不及于其他之人爲的關係。馬克斯所指每人之製造部份原與分工合作無關，蓋每人製造成分爲生產品之內含勞動量，而分工合作則爲勞動集約方式之一種；於此方式下每人製造成分之勞動量並不因之而消失——其價值自仍依此而定。至于交換能使價值增高，此外生產品製出後之社會人爲之關係與勞動價值無關。蓋物價之決定首依生產費——其他因時間之前後，地方之轉移，需供之情形，競爭之有無而起價值之變化，固不能影響其原有之生產價格也。今假設A生產品之生產費爲十元，設因人爲的關係至其市場價格降爲一元，能否因此即謂此生產品不含勞動價值？總之，馬氏價值論之對象乃生產價格，逾此則非其範圍矣。

「托洛司基做他的自叙傳。銷路極好，他的收入比普通工廠的經理要高的多，托洛司基是否勞動家？資本家坐享利息之外或管理工廠，或從事專門技術——究要歸到那一階級？」——經濟平等之要求即分配不均之反響，故凡一國一地果其分配不均，依此社會全體依其所得之來源同否

？經濟利害之分別乃自然的形成兩大集團，一即剝削的榨取級階，一即被剝削的受治階級；是為階級之簡單定義。

於是資本家之來源所得全依勞工之剩餘價值，地主之純收入則仰仗于農佃之榨取上，自為一剝削的有產級階；反之，工農大眾亦因利害之共同而形成相對時之無產階級。托洛司基賣文所得純為各人勞動之報酬，毫無榨取之意味，自為勞動者之一。資本家管理工廠或從事專門技術，就前者言當其管理工廠時則為企業家，企業家為指揮勞動者，亦為勞動者之一，自有其應得之酬報。就後者言則當其從事專門技術時則為工程師，其地位固無異於前者也。

至所謂「許多英國工人多少不等有點積蓄，有股分證券之類的財產……是否資本家？……七八十年來西歐北美的工人生活程度遠高于當年馬克斯的時候……英國失業工人的津貼尚遠高于俄國工資之上」則不免過于贊揚資本主義國家之現狀。第一：英國工人亦有掌握股份證券者，意似因此難定工人所立之階級究屬何方？大勞動報酬法有四，其一日持分報酬法，意即資本家於發給工資時留其一部而用之購買本廠之股票，俾使勞動者引公司之利益為自身之利益，於是努力勞動，階級意識乃日漸喪失以底于無。此誠資本家狡黠手段之一。此區區之勞動者所握之證券，

充其量不過九牛一毛。而其生活來源仍賴勞動報酬之維持，其為無產階級必矣。

其次八十年來英美工人之所得幣量固然增加，然不可即斷為生活程度之增高也。夫勞動者之工資有名義所得，實質所得之別。吾人試一參考八十年來物價指數之增加率，是否「資增加率所能追及？八十年前歐美正值海外侵略緊張之時，自由貿易仍殘存于世，關稅之壁壘尚不森嚴，故生活之必需品價廉；——今日則正相反是。是今日之名義所得增而實質所得減。縱或不然，一方面部份之工人工資提高，而他方面則失業工人羣集街頭行麵包之示威運動，如此豈可謂生活程度提高也？

第三，英國為帝國主義之急先鋒，殖民地遍于全世，所謂失業津貼，失業救濟，勞動保險等仁慈性之旗幟，不過統治資產階級之温情主義而已！若與俄國比較則更有不然者。蓋俄國自革命以來，一面慘淡經營刻苦自勵，一面則求大眾生活之普遍安全。對於人民不但子女教育醫藥所需全由國家供給，而于勞動者舟車之乘坐，食料之購買亦較官吏，律師他人受三分之二以上之優待（見莫斯科印象記）。其工資固低，然所謂工資低，不過就貨幣數量少一方言之，然就其對物之購買力言之，其少量之工資固較歐

美之購買力尤大也。

「馬克斯謂資本主義的結果窮人越過越窮。」蓋根據階級對立的情形之下，一方面加緊剝削，一方面日漸困苦，長此以往，勢不至無產階級全部餓死不止。事實俱在，以上原文所舉三例何足以解釋之？

馬氏唯物史觀以經濟制度之發展為歷史進化之依歸，丁先生則謂思想亦能左右經濟制度並引羅素「政治生活之大事件是由物質環境和人類情感所決定」為證。大人類慾望有五，生存慾為第一；所謂經濟制度，物質環境無非人類生活所依之方式而已，一定之物質環境產生一定之思想則是，若謂一定之思想能產生經濟制度則大謬。自私自利人人如此，然其個人之標準與程度則不同。至所謂因時因地乃不同其感情，此至論也。然苟同時同地則其感情必同。如是，時在資本主義盛行之際，地在同為資產階級所統治剝削之歐美，則同階級之工人必有同一之階級意識。以此證之，思想左右環境耶？環境左右思想耶？

階級鬭爭是否能免，事實可証，毋庸贅言。至英國不禁止馬克斯資本論之出版，實以該書內容尚未為人所深知，而無產階級中因之而怦怦思動者尤少；且英國為多黨政府，言論自由，正當之主義宣傳法律所許，故未之禁。焉

可即謂階級鬥爭之必難實現。統治階級千方阻撓階級意識之滋長，已無可諱言。萊茵新聞之被封，可証明矣。

共產黨行動激烈，是革命必須流血，奪政必須暴動，輾轉相傳，乃成一驚心刺目之名詞。然暴動武力奪政之謂也。試以軍政時期武力北伐較之為如何？一九一七年莫斯科之十月暴動與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九日之黃花崗起事相較非名異實同乎？夫世上絕無和平革命之可言，蓋革命寓革新之意，舊者不除，新者不立；兩相調和固好，然政治權利之衝突，經濟地位之利害絕不容如是幻想也。原文謂：「大革命恐怖之後，歐洲各國都和和平的將政權由封建貴族手裏轉移到中產階級手中……」當時工業革命之際，各國國內一切階級隨經濟制度之演進，舊生產關係之崩潰，均普遍的要求「自由」，「平等」，「博愛」；蓋自由所以謀企業之急進發展與競爭；「平等」所以去法律上特權之約束；博愛所以謀和平俾向外之發展力集中；封建制度之崩潰實由于新興工業之市場擴張，本身存立不住——新的生產力與舊的生產關係衝突——經革命之流血乃不得已退出政權。勢逼處此，不得不然，豈真「和平」哉？

原文更引馬氏預言三則，反覆論其不能成立之點，所

言理由多不健全且不免因噎廢食之病。第一：「馬氏預言

共產黨一定勝利。……何以無一定勝利呢？……」馬氏此論

根據正反合之辨證法而下定語。驟視之未免武斷。然凡一

思想是否爲真理全視其實踐性如何而定。在資本主義制度

之下，少數資產階級全部寄生于無產階級之血汗上，此而

不足，尤懼其反抗也，乃豢養一部武裝軍士爲自衛之用。

此勢之下，勞動者反抗自是不易。不過馬氏於鼓吹階級關

爭之時尚有喚起階級意識一點爲前提。夫現代一切被剝削

者——工人，農夫，兵士，失業者——及一切從事革命之

智識份子均屬之，不論其現時是否爲温情主義所麻醉，或

爲白色恐怖所鎮服，倘一日全部起而抗上誰謂其有可能

之實踐性而無成功之望也。茲舉三例，以實吾說：一，俄

國革命之時克塞克軍士投降民衆方面，昔日政府用爲自衛

者今乃因階級意識之故而舉刃相向此其一也。二，今日帝

國主義國家爲一階級，而被壓迫之弱小民族——中國，印

度，朝鮮，爲一階級。倘能即日聯合共同奮鬥——帝國主

義之砲火非不可畏也——然中國，朝鮮復興之機必有一日

。三，國民黨常謂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封建軍閥

，最後勝利，終屬吾輩。凡此亦均依實踐性而斷也。吾人

只應認清革命救國爲有實踐性之必要，即當行之。是否必

成一語不能因之即放棄革命救國之意也。

第二，「勝利以後，自由平等之社會一定實現，是否

可信？」此首爲第一預言成立後之次步。現代之不自由，

不平等皆由于經濟制度上之剝削關係未廢除；共產主義首

以無產階級消滅有產階級，而後圖階級之消滅。在此過渡

期間一切事業收歸國有，剝削關係已不存在，勞動者各出

其力取其所值，將來則進一步各取所需。自由平等之社會

當然可以實現。且無產政黨專政其統治形式爲自下而上，

全異於有產階級之由上而下之形式。共產黨員于蘇俄其義

務上之犧牲誠過于權利上之享受。共產黨名義上爲專政者

，然其施政則在謀大衆之福利——自由，平等——不啻實際上

全國大衆之公僕——換言之：即大衆本身而已！

第三，「馬克斯說共產革命一定在工業最發達的國家

先發生，然而實際上却在最落後的俄國」。細察馬氏此言

之論據爲：一，壓力愈大，反抗力愈大「大前提」，二，

工業國家統治階級賜予無產階級的壓力大「小前提」，三

故工業國無產階級之反抗力大「結論」。進而闡明之則反

抗力易于成功。

此就理論上言之實千真萬確，至于工業先進國未成功

，俄國却成功。此非馬克斯之罪實客觀環境有以致之也。

第一：歐美各國羣相共同壓迫革命，勞動者爲砲火之威武壓伏；俄國則否。第二：列強均有自殖民地取得之膏脂以暫時安撫無產大衆之反感；俄國則否。第三，歐戰時各國麻醉于愛國心理故階級意識爲所掩蔽；俄國則否。

關於忠告中國共黨之見，吾大不略贅同。惟丁先生謂中國共黨應退出第三國際之意，尤非抓住核心澈底之論。蓋當首先問中國可否用共產主義救國？如可「第三國際既非單爲伊國謀利益」則共黨加入類似于國民黨之「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相同。有益無害，何必退出？國際聯盟爲資本主義之大本營與我國之立場正相反對。與之論正義，不異與虎謀皮。然尤爲權宜計而加入遵從不敢稍違。人不我睽，我強趨之；人不我助，我哀求之。又何爲獨令共黨退出第三國際。若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則中國共產黨根本無成立存在之必要，又何第三國際之有？

茲爲篇幅所限，不及細論共產主義對於中國如何不適宜，謹將其要點列下，俾作異日之討論：

一，中國現以農村經濟爲主，仍處封建經濟與前期資本主義之過渡階級中；目今中國農村經濟之破產係因于一國際金融資本之侵略，二，商業資本之侵蝕，三，高利貸資本之吮吮；四，地主之租稅，五，苛稅，雜捐，六，天

災，七，人禍。其生產之形式爲原始的；其剝削之方式爲封建的。故不若歐美資本主義生產式之單純的爲地主租稅所剝削。——並無壁壘森嚴之階級對立。

二，中國工業異常幼稚，手工業苟延殘喘；輕工業則受制于條約苦不能發展；重工業則絕無，因是大異于歐美之狀況。——同樣無階級之顯著的分野。

三，馬克斯之階級鬭爭僅適于階級已成立，漸相矛盾，相衝突，底于不可調和之時。中國無階級之對立，更談不到階級意識——距「革命機會成熟」尙遠。故中國不需階級鬥爭之說。

四，中國爲產業落後未經開發之國，其患在貧，非在不均，救濟之道，捨民生主義之外其他均不適用。倘欲立即廢除私有財產制度則就現有碩果僅存之幼稚工農業亦將全部底于破產不可。蘇伊革命後新經濟政策之實行可爲前車之鑑，况中國尙不如俄乎？

五，中國現當一嚴重之關頭，禦侮爲第一大事，統一的政府團結的人心爲最急需。無論任何主義均當先有其立足之地方可實現其計劃，民族主義實爲世界主義之先驅。

六，共產主義如有國際之分，則中國不適于爲其試驗之對象；如無國際，則中國尤不足爲世界共產革命之策源地；——中國僅能爲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之策源地而已。

(完)

報月交外

版出期六第卷二第

希特勒上台後之德國形勢 (續本卷三期) 關數質
 甲午戰役之回顧 (續本卷三期) 劉奇甫
 巴爾幹外交關係之檢討 張慶泰
 進代中國國際貿易之分析 李作藩
 世界經濟貨幣大會議程的概要 羅世安
 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三年的戰債問題 (續前期) 蔡維藩
 日俄外交關係 (續本卷四期) 張鳳歧
 日印通商貿易之危機 王明璋
 十五年來的紅軍 張乃強
 日本各方對於日本退出國聯之意見 (續前期) 吳永
 中國各方對於塘沽停戰協定之意見 吳永
 日內瓦通信——論中日停戰之利害 吳永
 倫敦通信 吳永

此外撰譯稿件尚多，不及備載。

目價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五分
 半年六期 全年十二期
 國內一元五角
 國外二元五角
 郵費五角

各大大書坊均有代售

社址 北平西城府右街運料門裏
 外交月報社經理部電話西
 局二四一九號郵政信箱五
 十七號

書叢晨北

日本法西斯運動

日本法西斯運動，邇年來殆呈舉國若狂之狀態。此書共分五章，首為概觀，次述歷史，次陣營展望，次各黨政策，最後詳論中心活躍之各人物。讀此一冊，於日本政情，瞭如指掌，而暴日何以強佔我東北，亦思過半矣。全書二百餘頁，用上等道林紙精印，總發行所：北平宣外大街北平晨報社 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北平晨報 每日三張 每月一元
 大張每月一元
 外埠每月一元三角

本刊前二期要目

第六十號
 這一星期
 鎗口對外不可亂
 中華民國憲法草案的初稿
 鄉村運動之政治的意義
 國際經濟與中國
 三，生銀與中國
 中國縣志的改造
 太平洋國際學會

蔣廷黻
 燕樹棠
 芝生
 守愚
 吳景超
 街哲

第六十一號
 這一星期
 建設與廉明政府的先後問題
 東京的警告
 一個關於理科教科書的調查
 政治領袖的私心
 日本佔據長城的歷史意義
 OWEN LATTIMORE 著
 感言三則 (日內瓦通信)

蔣廷黻
 任鴻雋
 君衡
 孫毓棠譯
 王冷樵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本報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現已售完。現在第二十六期至五十期亦存書無多，欲購從速。特價如下：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獨立評論 第六十二號

這一星期

中國應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君達)

政府與娛樂(廷獻)

經濟建設與技術合作

君達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

關謬

嚴仁慶

中國長城作用之恢復

William Martin 著

劉學濬譯

獨立評論

第六十三號

日三十月八年二十二國民

每期待價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郵票(一角以下爲限)代洋九五折。

寄售及代定處

鎮江	南京	上海	天津	平四	北平
鎮江書局	中央書局	新華書局	精華書局	成文書局	東安市場
樓書局	新華書局	新華書局	精華書局	成文書局	東安市場
樓書局	新華書局	新華書局	精華書局	成文書局	東安市場

徐州	常州	蘇州	無錫	鎮江	揚州	南通	蕪湖	安慶	九江	長沙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西寧	太原	濟南	青島	威海	煙台	濰縣	臨沂	濟寧	德州	滄州	保定	石家莊	張家口	歸綏	包頭	西安	蘭州	西寧	太原	濟南	青島	威海	煙台	濰縣	臨沂	濟寧	德州	滄州	保定	石家莊	張家口	歸綏	包頭
徐州廣告社	常州廣告社	蘇州廣告社	無錫廣告社	鎮江廣告社	揚州廣告社	南通廣告社	蕪湖廣告社	安慶廣告社	九江廣告社	長沙廣告社	重慶廣告社	成都廣告社	西安廣告社	蘭州廣告社	西寧廣告社	太原廣告社	濟南廣告社	青島廣告社	威海廣告社	煙台廣告社	濰縣廣告社	臨沂廣告社	濟寧廣告社	德州廣告社	滄州廣告社	保定廣告社	石家莊廣告社	張家口廣告社	歸綏廣告社	包頭廣告社	西安廣告社	蘭州廣告社	西寧廣告社	太原廣告社	濟南廣告社	青島廣告社	威海廣告社	煙台廣告社	濰縣廣告社	臨沂廣告社	濟寧廣告社	德州廣告社	滄州廣告社	保定廣告社	石家莊廣告社	張家口廣告社	歸綏廣告社	包頭廣告社

這一星期

中國應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

遠東局面的不自然，危險，正像箭在弦上砲已燃火的形勢，這是誰都看得見的。有許多著者早已

大聲疾呼，喚起他們本國人的注意。最近美國記者克羅斯

(Upton Close)說得更為透澈。他在未到中國之先，已發

表一文，專對美國人說話。他的大意是說：『美國人還常

說什麼條約，其實條約都已破壞了。美國如果要擁護他的

政策，只有趕緊備戰。如果不願戰爭，那只有乾脆承認他

的政策和一切原則已經完全失敗。』他到了中國之後，又

在大陸報上發表一文，更極力提明國際間及黃白人種間的

大奮鬥之已經開始。他指出日本真是有意識的要征服中國

，併且侵略到南洋羣島，打倒白種人在亞洲及太平洋的勢

力。他又說經過太平洋的時候看見美國人在檀香山做戰事

的準備。他們計劃如何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將三萬名日本

男子包圍圈禁。他聽見日本在太平洋委託管理的羣島及婆

寧島上積極建設海軍根據地，禁止遊人登岸。

俄國呢，外交上儘管退讓，儘管出賣中東路，實際上他們已在西南兩面用不侵犯條約及侵略者定義築成極堅固的長城。第二個五年計劃正在努力開發烏拉爾以東的富源，充實他們向東部發展的基礎。最近甚至顯明的調動軍隊，在東部西伯利亞或外蒙古大操。

英國雖說是日本的舊同盟，這會可真鬧翻了。在印度棉織物市場的競爭弄得無法調和。英國在中國最大實業——開灤煤礦——也是英美人在華一切工業動力之源，因最近灤河附近的新形勢，已被日本拿在掌握之中。日本人甚至倡聯美抵英的論調，他們的感情破裂可想而知。

日本人退出國際聯盟的將來影響，直是不容易預見。這個舉動的意義不但是脫離了這個有形的國聯，而且無形的對於歐戰以後辛苦建設的許多國際道德和法律的原則，都一概否認。日本的立場似乎是說國際聯盟非戰條約那一類東西都是西洋腦子的產物，至少在亞洲，尤其在亞洲人與亞洲人的關係上，都是不能并不准適用的。他們的理想是要完全排斥西洋人過問東方事情，他們以為只有日本人

纔是真正的東方主人。這種原則其他各國能夠就此承認麼？但日本人却準備拿武力來擁護這個原則。日本現在軍人政府和以前的政府所用政策的根本分別便在於此。以前的政府一樣是侵略的，但他們還承認日本是世界國際中之一員，一切行動多少應受國際通則的約束。現有的日本乃把許多國際約束都看作西洋列強欺騙弱小國家和束縛新興民族的工具，日本要發展國族的生命，抵抗一切可能的敵人，只有根本擺脫這種羈絆，趁西洋各國經濟衰落紛糾未清的時候，在國際上特立獨行蠻幹一下。所以日本人的心理，一方面把其他東洋民族都看作無組織，低等，只配做他們的奴隸，比西洋人輕視東方人還要利害幾倍。另一方面日本人要與其他東方人認爲同種，硬要做共同對待西洋人的領導。所以遇見其他東方人偶與西洋人略爲親近，他們便格外憤恨與嫉妒，深怪人家不肯領受他們的親善。這是日本人自私欲與自大狂兩種心理的矛盾。

中國便是日本這種矛盾心理的最大犧牲者。日本一方面真要中國與他親善，真想在中國有親日的政府。在他們對美對英對俄這樣的抗爭形勢中，中國的好意於他們當然是極有價值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人又時時害怕中國好起來，時時要把中國分裂，屈辱，剝削，要把中國政府（即

使親日）弄得不能穩固。在這樣的侵略與侮辱之後，偶逢中國人與西洋人稍有合作，他們却又反怪中國人不肯和他們親善，又要想用武力教訓。

中國向來所以能勉強保存者，在歐戰以前多靠列強的均勢，在歐戰以後多靠國際和平的條約。所以一遇日本侵略如九一八事件，中國政府即便告訴國聯，乞靈條約，這是極自然的。因爲在以上所說日本態度之下，中國人萬不敢放棄在國際組織及條約上中國應享的權利。如果中國放棄了這種權利而直率的和日本講親善，這正如自己縛了雙手跪到在劍子手的面前。中國萬不可上此大當。美國人的門羅主義是消極的，他們不許歐洲人干涉美洲，但美洲各國還能獨立。日本人的亞洲門羅主義乃是積極的，他們不許西洋人干涉亞洲，但他們却自己要來佔盡一切，創立他們的大亞洲帝國，如成吉思和忽必烈征服亞洲大陸一樣。所以中國如果屈服於日本便是中國國家和民族的自殺。但如果不肯屈服，則日本又不肯干休，中國免不了吃眼前虧，時時受他們的武力的教訓。所以中國的局面，真是極危險的。

世界各國共認的國際組織與約束是否從此破壞無人過問？六千萬日本人是否真能打倒四面的敵人建立日本的世

界？歐美列強是否肯輕輕的承認了日本的門羅主義，束手不問亞洲的事？這都不是輕易可以解決的問題。現在即使不解決，在不遠的將來免不了有一番極猛烈宏大的爭鬥。這種爭鬥愈劇烈，中國的地位也愈困難愈危險。

在這種嚴重的局勢中，中國將如何自處呢？我以為有四個必要的條件。

第一，中國必須要統一。經過九一八事件，甚至如上海和華北這樣的戰爭，中國還沒有真正統一，真是可痛心的事。廬山會議的大事不是應付遠東大局的政策，而是對付察哈爾的方針，這又是如何的痛心。當然政治的意見各人名派本來是不必一致的。但對外的行動萬萬不可不一致。對外的行動不一致，口頭上也許是搶着嚷恢復失地或誓死抵抗，實際上必會弄到爭着投降，或爭着送禮。整個的對外，即使不得已而屈服，也許還可以講一些條件。各派各黨爭着佔便宜時，便會弄到講條件都來不及。塘沽休戰協定與上海休戰協定，在這上頭也是顯明的分別。如果塘沽協定不即簽字，恐怕平津的第二偽國使出來簽認更嚴重的亡國協定了。所以我們要求國內的政客軍人大家要嚴重的覺悟，切不可分裂國家的政權和治權，更不可各自對外的動活。萬不得已，寧使在國內自己吵鬧，不可用外交做口

實，更不可搶著向外國接洽。這真叫『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敵國對付中國最毒的辦法是化分，中國應付國難最妙的方法是統一。

第二，中國對外要取獨立的態度。中國的外交政策，往往不免受外來的影響，看重了一方面，而忽略了別方面，這是狼危險。現在對中國關係較為密切的如國聯，英美，日本和蘇俄，中國都應該格外注意。國際親疏本無一定，只看實際利益，不必一定偏重于那一方面。中國在國際上應該有中國自己的立場，不必完全跟著人家走。這個立場是什麼呢，這當然需要政治家的研究。目前我能想到的是應該注重擁護條約的尊嚴，武力的限制，國際的合作，和主權的完整。我們切不可有像日本所咒罵我們的「日本派」或「歐美派」，我們只應有「中國派」為中國的存在及獨立而奮鬥。外交態度要獨立，這便是減少紛爭與猜忌的一個方法。

第三，我們真要趕緊建設我們的國家。對於建設的意義，近年來過于偏重蓋洋樓，修馬路，這一類事業。進一步便說到造鐵路與辦幾種基本工業。我以為目前最切要的是嚴定各級政府的財政制度，要使他們的收支都受一定的範圍和統制。這一層辦到了，然後政府纔能廉潔，各種事

業方能成功。第二切要的是要立定各機關之間以及政府對於人民職權的範圍。並且治吏以嚴，待民以寬，要使政府所做的是於人民實在有益的，不要使許多無聊官吏借名建設，反而剝削人民。其實這都是建設。這至少應與造路開礦一類的建設同時並進，政治清明了，人心也會安定。國內安定了，統一了，外交上一定也便利些。我們至少要叫各國承認中國已在組織和進步的道路上，給他們一些希望，引起他們一些同情。

第四，我們不要忘了最低限度的國防。國不可一日無防，況在這樣危局之中。我們想到南京砲台自前清以來直到一二八事件一年之後，纔在試砲；九一八事件一年半以後熱河還是毫無防守，長城各口還是毫無設備；我們如何能不痛心。中國每年都費巨大的軍費，至少一半應該立即做國防的設備。遇到外敵侵略應該抵抗，這是全國民民的要求，甚至有人要明文訂在憲法上。但抵抗必須有設備。從前俄國人在旅順，德國人在青島，尙且建築強固的砲台，能以少數兵士固守多日。比利時是約定的中立國，兵力甚薄，但歐戰初起時，列日砲台尙能抵當德國的強兵好幾天。中國偌大的國土，四周有日俄法英或他們的殖民地接界，內地有外國的兵船可以通行，何以一點不做防守的設

備。現在必須趕緊做起來，這決不是對外國挑釁，也不是特別對那一國，在原則上我們的國境到處都要防守，這是中國應有的主權。

在這樣危局之中，我們想想中國所以自處之道，決不是空談，更不是高調。我們希望大家認定幾個目標，努力邁進。

君達，二二，七，二五，北平

政府與娛樂

北平市的袁市長在就職之初嚴厲的取締北平的舞場，好像跳舞是北平市最大的罪惡，禁止舞場是市政府的最先急務。這未免太滑稽了！

國人對於娛樂，尤其是國難時期的娛樂，有不少的中國觀念。我們總想娛樂不是所謂「正經」事業；這是我們傳統的人生觀。同時我們——從孔孟程朱到日常所見的人——因為都是人，就都不能不有娛樂。所有的聖賢，倘其日常生活沒有被後人聖賢化，偶像化，我想與普通的人並沒有什麼分別。因為我們的人生觀是違反人生的，所以我們更加作出許多醜事情，虛偽事情，矛盾事情。這類的現象各國皆有，拉丁及斯拉夫民族比較最少，盎格魯撒克遜較多，而孔孟的文化後裔要算最多了。究竟西洋人，因其

文化有上古希臘，文藝復興，及近代科學的成分在內，能有比較康健的人生觀。他們相信一個身體及神經康健的人不至有不康健的——那就是說，不道德的——娛樂。康健的人都必須有娛樂，且其所要享的娛樂都是康健的——換句話說，都是道德的，正經的。娛樂問題成爲康健問題。所以在上次歐戰期間，各國政府及社會領袖不但不因國難而取締娛樂，反而爲前方戰士及後方人民添設了許多的娛樂。因爲娛樂能够提高功作的效率。

孔孟的後裔，因少見多怪，不免對於跳舞搖頭。其實在西洋跳舞早已成爲社交的最正經事業。上自宮廷的宴會，下至村莊的喜事和節期無不以跳舞爲主要娛樂。當然，跳舞與舞女是兩件事；我們可以有跳舞而沒有舞場的舞女

經濟建設與技術合作

君 達

無論如何，在中國現在情形之下經濟建設確是迫不可緩，但經濟建設應該如何及從何進行，恐怕很少有人能圓滿答復。有許多人似乎以爲中國只缺少的是錢，只要有錢，一切都可辦成。尤其是若干政界中人往往有此言論，彷彿以爲計畫經營都很容易，只要有錢。因此便有人只希望

。同時我也承認舞場可以發生弊端。不過舞女制度也是各國常有的。最好防弊的方法不是禁止，是提倡美術化的跳舞。我們若把跳舞作爲正經事看，把舞女的職業作爲正經的職業看，久而久之，舞女自當自敬而人亦敬之。若徒恃禁止，有些人惟有設法享受比跳舞更要壞的娛樂。

政府干涉民間的娛樂失敗者多，成功者少。中央政府的禁鴉片，從道光時代到現在；廣東省政府屢次的禁賭；美國的禁酒；以及各國禁娼的試驗，不是完全不能達到目的，就是引起更嚴重的社會的不安。我們要爲人民謀幸福，不在乎今天禁止人民作這個，明天禁止人民作那個，而在乎積極的爲人民謀康健的生活。

廷 黻

外國人肯來投資或借款。

但是中國經濟事業在外國資本家輿論中早已失去信用。譬如有借款或欠債的鐵路，除了少數例外像正太鐵路，都是本息未清，毫無償還的日期。鐵路是經濟建設最要緊的事業，也是照理應該利益最可靠的事業，尙且如此。舊

債不能清償，新債自然難借。其餘一切實業，除非租界商埠或外國勢力可以直接保護之地，外國資本尙肯進來。否則他們絕少肯來合辦或借款。因為外國資本家的意見以為中國不但是少錢，而且是不會用錢。他們並不是不願借錢，乃是認為機會未到，就是說照中國各種情形，還不敢貿然借貸，恐怕借了錢中國把來胡化了，於中國無益而於他們有損。美國銀行團代表好幾次曾有這樣的公開說明。

在最近日本壓迫之下，歐美各國的確有人很抱歉似的，以為雖然不能實行國聯盟約用武力來幫助中國，至少應該幫助中國來做經濟建設。但是因為上節所述的理由，他們認定幫忙的方法第一步並不是借款。他們大家承認中國人自己還沒有用錢的經驗，必須先來幫助中國人研究計畫經濟建設的方法。就是說經濟建設之能否進行，能否成功，還是要先有相當的計畫和組織，錢却不成問題。有了相當計畫與組織之後，中國資本也有不少可用，外國資本當然也並不難找。這個意見正與中國一般官吏只知要錢的心理相反，其實却是對的。

近來國際聯盟與中國的技術合作便是這種意思。這種合作的提議本在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前，而到現在實行的希望更近了。但合作的真正的意義似乎各方面還尙未完全明

瞭。在日本人一方面自始有點懷疑。在國聯理事會最初討論此事之時，芳澤代表便提出不涉政治的條件，這是他們早就有亞洲門羅主義的意思，不願意其他勢力過問中國政治。而且日本代表當時還提出加入日本專家的願望。現在日本退出國聯却無法再有這樣要求了。在中國一方面，惡意批評的人也許要說是國際共管，的確，如果要使技術合作真能成功，在若干事業一定範圍之內，中國似不能不付予外國專家以相當實行的權責。但這種權責是由中國政府自動付予，中國政府有隨時伸縮予奪之權。平心而論，這樣辦法實在不能說是共管。另一方面似乎容易把技術合作與國際借款看做一事，以為合作就是由歐美各國借許多大款立刻來替中國政府開辦許多經濟事業，許多中國人的希望以及日本政府忘形的警戒都在此點。其實技術合作與國際借款並不能當作一事。國際介紹來的專家決沒有直接借款的能力，他們可能的成績惟在幫助中國政府造成經濟建設的環境和基礎。有了這種環境和基礎，為中國真正的利益起見，似乎最好還是先用中國自己的資本來建設，實在需要時方可借用外款。至少為中國的真正利益起見我們希望是如此。

似乎現在中國政府之中，仍有許多對於此事觀念不甚

清楚的人。他們不是希望合作即是借款，便是以爲請幾位外國專家考察計畫不過是借名宣傳爲借款的工具。除此以外似乎很少有人真心信認技術合作的好處。因爲如此，所以直到現在中國很少受到二年以來已經開始的技術合作的利益。照例的事情是這樣：國聯介紹幾位有名的專家，中國政府不論費用多少一律歡迎。專家到了中國，中國政府除了宴會應酬借重客套以外，便是派定幾位能做普通翻譯及招待客人的漂亮職員，陪同他們到滬漢平津參觀一趟。參觀之後便請外國專家編一本報告或計畫。這本報告或計畫大抵很費苦心，但是因爲觀察時期很短，所能說的大約也不外是幾個重要原則，這種洋文大著照例要翻成中文，茲事體大，大約至少要三個月纔能成功。但是臨時選定譯名，雖經潤色文辭，終不免有些佶屈難讀。這種文章讀者本少，能讀懂者更不多，還有若干人以爲也不過是老生常談（其實天下真經道理往往不出老生常談），而且無論何人做一篇大文章，的確也不免偶有錯悞隔膜之處。其結果當然是束之高閣。在此時期外國專家早已打道回國，即使還住在南京也就無事可做了。如果所謂技術合作不過如此，那末這也不過是中國政府對於各國專門家應酬招待，擺一下闊架子。日本人吃驚打怪，真是庸人自擾，而中國要

希望從此經濟建設也真叫緣木求魚了。

我們並非高興隨意批評人，深知辦事人都有他們的難處。我們是希望既然要技術合作，大家總要明白這件事的實在意義，與誠意的設法利用，要使他對國家真正有益。具體的說，我們化了許多巨款（在這個許多國民都要餓死的時候）請了許多外國專家，我們應該叫他們能夠實際工作，盡其所長，並且要使他們的工作集中於幾個一定目標，於中國的經濟建設真正有益。以下是我們貢獻的意見。我們以爲工作的目標可以分爲以下三類。

第一是整理。中國財政雖然經過實在要算最能幹的宋部長的努力整理，大約可以整理的地方還有。最重要的例如會計審計制度還沒有能上規道。其中原因也不盡在政治不統一，也是因爲制度上朝令暮改，太務瑣細，不得要領。這種幼稚毛病都值得請專家診治。再如國營的事業，何以鐵道不能賺錢，郵政反有退步，……諸如此類，不但請外國專家做一本報告書使束之高閣，是真要請中外專家專心負責去改良救濟。又如政府天天說提倡工業救濟農村，而事實上農工各業正在破產，不但軍事省份不好，即在並無軍事的省份也不見得有何進步。這種現象決不是政府辦一個模範試驗場，或發表幾個基本工業計畫便能救濟。根

本原因是在近幾年來的政府當局雖然不少充滿救國救民滿懷熱心的好人，但是大多數實在缺乏中外古今任何行政的訓練。報紙上天天看見的藥不對症的宣傳，便是他們書生空論缺乏經驗的明証。中國舊經驗既然失去信用不能利用，也許請幾位外國有行政經驗的專家來指導一下也能有些益處，只要政府當局真能虛心延納裨善而從。一個國家行政如太不好，一切事業是決無希望的。這是中國最需要建設的第一件事。建設的途徑也只要中央各部以及外省各廳每一處都有一位有經驗的當局或是有力的顧問（中外人都好，中國人更好），不必新奇高論，只要老生常談，也就可以引上相當的規道。

第二是計畫。假使有錢了，中國經濟建設究應從何做起，的確並非容易。我們不要以為十幾年來中國政府時常鼓吹的許多計畫已經只嫌其多不嫌其少，實在講來大多數的所謂計畫，不過是小官騙大官，大官騙國民的敷衍空文。自從俄國的五年計畫傳遍一時，中國的經濟計畫也是風起雲湧。但是中國經濟背景以及自然富源從來沒有調查清楚，近幾年來雖然已有若干開始工作，但是結果尙非甚多，更非盡精，而能够利用這種材料作爲根據的人更是極少。所以大多數的計畫都是紙上空文聊以快意，決不足以稱

真正計畫。本來要計畫一個能大複雜像中國的國家大非容易，做一個切實可行的全體計畫比逕直辦一二件部份的事業還要困難幾倍。這正可以證明『知難行易』。譬如建設委員會所舉辦的建設事業在中央各機關之中真是最有效率最爲切實的了，以其經費與事業做比例，他的成績。鐵道交通實事各部都望塵莫及。但試看建設委員會所發表的東南西北好幾冊的建設計畫，真不免令人氣短。

但是國家大事究竟要有計畫，不能全憑一時衝動。所以請外國專家來幫助一下也是好事。不過有二件要注意的事。第一必須使外國專家與中國專家聯絡。因爲近幾年來中國人專門研究的確不是沒有進步。新到中國的外國專家有許多事非先請教中國專家不可，這是他們所承認的。另一方面中國專家大多數的確還是幼稚，缺少經驗，所以要請教外國專家。實行方法是須使外國專家與中國專門機關及專門人員有密切的接觸，使他們能互相利用。這種專門機關不必完全另起爐灶，一一設立。國內現有的調查所研究所都應該儘量利用，一則事半功倍立刻可用，一則也使這種研究機關多加幾分爲國努力實事求是的意義。而且使中國專家可以得到外國專家的幾分教益，這種教益當然只有研究有素的人方能領受，決不是普通人員所能得到。第

二各種計畫必須以中國原有經濟背景及需要為基礎，而不可專造空中樓閣。例如辦一種工業，必須先查明現有基礎應如何補助救濟以資利用，然後纔論得到新創事業。譬如政府如果只知努力國營一個煤礦，而任憑甚且促成其他許多公營私辦的煤礦一概虧累停頓，這當然不是好事。其實這種毛病中國青年專家往往難免，外國的老成專家大抵似還不至如此。然他們不明白中國情形，還須中國人自己留心。

第三是組織。中國經濟事業最缺少的是組織。從前外國專家留下來的鐵道郵政管理方法，一到中國人手裏便日見退化。中國人自己似乎從未建設起真正圓滿的組織，雖然若干著有成績的事業，但都是全靠個人做中心，人亡政

息，永也不能長久。似乎近來銀行界比較還有一些組織的力量，至於政府經營的事業真還有一些看不見組織的進步，一切非以個人做中心不可，這是很危險的事情。這一方面也許外國專家真能有許多幫助，比專門的計畫更為可靠，而且更為重要。如能在短時間內樹起一點規模，則一切經濟建設將來自然容易進行。

這一次技術合作也許就是中國自主的經濟建設最後一次試驗。準備工作如能成功，經濟建設便不成問題。這次試驗如再不成功，也許第二次便是真正共管或獨管式的外力干涉。世界形勢已不容許我們中國政治經濟屢次試驗，屢次失敗。連試驗的機會都不是容易再得的，所以必須好好利用。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闢謬

嚴仁康

一，近者日人以英文發表偽國一九三二年對外貿易之狀況，送交國聯，以為對外宣傳矇蔽真相之工具。其間妄謬附會之處甚多。誠恐世人為其所欺，特為文以闢其謬。

該文大意謂「一九三二年滿洲國之對外貿易額較之一

九三一年劇增。以大連一埠為代表言之，則其出口自日金

188,449,000元驟增為302,191,000元，入口亦自97,519,000元一躍為206,920,000元；計出口增60%，入口竟增112%。設依月別觀之，則僅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月貿易額略形減退，迨後即扶搖直上，日趨孟晉。再依品別觀之

，則出口物品除某種機械與燃料（煤）以外，均較一九三

一年有增加之勢。至於機械出口之減少，與其謂為「滿洲國政治經濟不穩定」之指示，毋寧謂為其「工業發展」之徵象；燃料出口之減少，則半由於日本煤業者與滿鐵磋商定關於撫順煤運日之協定，亦半由於中國內地各處之抵制日貨有以致之。入口方面，則除牲畜，機器及礦產外，亦均有相當之進步。關於輪船之泊於大連者，一九三二年較一九三一年多408艘。至於海關收入，則自日金9,198,343元增為20,372,884元，一年間增收一倍有餘。縱觀上列各數字，吾人可知滿洲國一年以來和平秩序日趨穩定交通日見進步；人民之購買力日增，工商業亦日臻興盛。於是此新興之國家，其奠基益形穩固矣云云。』

二：基於上列諸點，吾人可為論辯如下：該文內所舉

各數字皆以日金為標準；殊不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日金匯價受金再禁之影響，為極劇烈之變動，故是項數字不可視為可恃。例如以海關兩核算一九三二年一月份對日貿易之出口總值，僅當上年者之78.15%；若從日金計算則為113.22%。六月份出口從銀計算僅及上年之63%，而

從日金計算則均超過上年平均數。又如入口貿易四月以後從銀計算，最高不過84.98%，從日金計算，則均超過上年平均最高達129.32%。今暫假設日人所舉之日金數額為可

算，另以兩年中，日金對美金之比價分別計算之，亦可略示如下：一九三一年平均日美間匯價為日金百元合美金80.85元，一九三二年日金百元合美金81.11元。用此兩數以計大連一港之進出口貿易，略如下表：

大連對外貿易 貿易額(日金數) 折合美金數 百分比

一九三一		一九三二	
出 口	188,449,000	92,057,336	100%
入 口	97,519,000	47,638,032	100%
貿易總額	285,968,000	139,695,368	100%

出 口 302,191,000 84,945,890 92%

入 口 206,920,000 58,165,212 122%

貿易總額 509,111,000 143,111,102 102.4%

觀上表，可知大連對外貿易依美金計算，一九三二年出口較先年減8%，入口增22%，貿易總額不過增2.4%而已。

更據日人發表東北對日貿易統計，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十一月入口為日金11,367,000元，出口為36,529,000元；一九三二年同期間之入口為日金14,847,000元，出口為39,386,000元。計入口增30%，出口增8%。若以前法計

美金數，則一九三二年之進出口爲美金 2,523,000 元及 17,824,000 元，一九三一年者爲 4,113,000 元及 11,071,000 元；入口較前減 15%，出口減 37%，貿易總額減 35%。至於東北對歐美之貿易亦多較前逊色，即如以大連對美貿易觀之，一九三二年之入口爲 1,000,000 元，出口爲 300,000 元；一九三一年之入口爲 516,000 元，出口爲 481,000 元，計入口較前年縮 33%，出口亦縮 13%。

以種種方法計算大連對外貿易兩年中之比較觀，所得如此。以與日人所舉一九三二年較一九三一年出口增 3%，入口增 12% 者比較相去甚鉅，即此已足示其報告不正確之程度爲如何矣。

三，日人恒言「值茲世界經濟不況，各國關稅壁壘高築之際，非依自給自足之經濟政策不爲功；且日本近鑑於物質之缺乏，故日滿間之關稅障礙應即行撤廢，締結同盟，以交換商品爲原料。」是以日人既以東北爲其國之生命線，則必竭力吸收其原料品以救濟其國內失業問題，更努力推銷其製成品以解決其生產過剩問題。故東北對外貿易，其入口貨之來自日本者，平均佔全額 36% 強，出口之運往日本者，亦佔全額 50% 弱，（全額內包括中國內地貨物之出入東北各關者）。一九三一年者，出入口且均在 50%

以上。曩者日本在東北之一舉一動，處處受中國之牽制；今既據爲己有，則得暢所欲言，盡全力於其貿易之增進，以圖救濟日本國內諸般問題。去歲一二八滬變事發後，華南一帶元氣大傷，人民之購買力大形減落；加以抵制日貨略見成效，俄貨傾銷不易競爭。日人既不能售其計於此方面，遂不得不向東北方面進展以資挹注。更因上海事變，蘇浙各紗廠停止工作，日人遂乘機輸入東北大宗原料棉紗。又一九三二年下季，日政府及商人乘日幣狂跌之機會，向外傾銷存貨，故其時對華輸出激增。民國以還國人鑑於日人在東北之經濟侵略步步進逼，遂努力建築鐵路，以與南滿鐵路相抗衡。國有各路銳意改良，更以金價猛漲結果，北滿物產多改由北寧打通諸路運輸。日人既攫得東北，則必本其復仇之心理，挽回滿鐵之勢力範圍。且自一九三二年來，金潮漸趨緩和，金價回跌，於是大連港口遂復增其對外貿易之重要程度矣。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對日貿易受抵貨之影響收前大形減退。據日本商工省調查，一九三一年九月至十二月間對華貿易較上年同期內減少 64%，工商業上損失達 185,000,000 兩，向以「居對華貿易第一位」誇耀於世之日本，至此遂不得不退居第三位。迨至次年（一九三二）則情勢逆轉，根據海關貿易冊上數

字觀之，一二兩月以滙變關係，貿易仍無起色。二月以後，則入口漲勢甚猛，計三月較二月漲 51%，四月復較三月漲 53%，漸有恢復東北事變以前之狀態。出口雖九一八後未見減落，但較一九三〇年同時期者亦大形減色。至一九三二年首，始增加漸速。再以東北一地而言，其一九三一年七月至次年五月之日貨入口數，略如下表：

日貨入口額（單位日金）

一九三一年七月	1,111,000
八月	1,198,000
九月	1,149,000
十月	927,000
十一月	806,000
十二月	507,000
一九三二年一月	676,000
二月	765,000
三月	1,291,000
四月	1,120,000
五月	1,429,000

據此，可以審知一九三二年五月東北對日貿易額已超

過事變以前之狀態。至九月復增為1,978,000元。

根據於上述諸項事實，則一九三二年東北之對外貿易，實應較一九三一年增加，非可即視為其「和平秩序日趨穩定，交通日見進步；人民之購買力日增，工商業亦日臻興盛」之徵象。抑是項增加之原因，又強半由日人以爲方法造成，非盡自然之趨勢也。至所謂「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月，貿易額略形減退」一語，實爲日人自曝其對東北貿易上罪惡之自供。苟無九一八之事變，則東北貿易興盛之程度，恐尙不止於此也。

四、至關於出入口品別之增減，則以該文未曾舉出其各個之數額，無從斷其是否可靠。今吾人可從旁觀之，以示其所論之妄。

按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六日日本由閣議決定，施行臨時議會通過之關稅改正案。其中對於東北農產品，除一律增收從量稅三成五分外，並對每百斤小麥之稅一元五十錢改爲二元五十錢；高粱本無稅，今每百斤稅一元；玉蜀黍每百斤由二十錢增爲一百四十錢，日本既手造偽國，並欲實施所謂「日滿經濟統制」；揆理似應次第撤廢彼此間之關稅壁壘，而完成其所謂「親善之極，融爲一體」之經濟單位擴大之理想。今計不出此反而增加關稅，原因如下：（一）爲補正金再禁從價稅增額之結果及從量稅所失之均衡

；(二)世界高率關稅戰之對策；(三)日本農村恐慌之尖銳化，由於年來之歉收及貨價低於生產費，因此以為保護政策；(四)國家之收入增加策，用以彌補財政上巨大之破綻。因日本提高關稅，對東北農產物之貿易究有若干影響，固難確切指明。但祇就東北方面負擔增徵額而言，日本竟預期能有「500,000元之增收，可見一斑。茲將各農產物所受影響之強弱舉之於次：

A 影響較大者——大豆，稻米，粟，落花生，玉蜀黍。

B 影響較小者——小豆，豌豆，高粱。

C 影響微弱者——藁豆，蘇子，大麥，燕麥。

今就A,B兩項加以說明：

大豆——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二)度輸出日本 508,000

噸。其中250,000噸為製油原料，故無稅，與此次提

高關稅不生何等影響。此外如製醬油，豆腐等用者，

則由每百斤七十錢增為九十五錢。共所以如此者，一

方為刺激朝鮮反日本大豆之栽植，一方為減少東北大

豆相當之輸出。

高粱等——高粱於昭和六年度輸出日本86,000噸，此

次每百斤徵收一元，玉蜀黍於昭和六年度輸出日本27

、000噸，此次每百斤改徵一元四十錢。然日本為保護

養維業者，組織養維飼料販賣購買組合，可特別照無稅辦理。故高粱受影響者僅一二成，玉蜀黍則約五成。他如澱粉及酒精原料，則受顯著之打擊。據「滿洲重要物產組合」調查，一九三二年八月間大連主要特產物輸出量，除大豆一項外，各品均有減退，茲列表為下：

一九三二年八月 一九三一年八月

大豆(單位噸)

日本	6,93	13,754
歐洲	121,164	92,754
美國	18	—
南洋	3,075	7,652
中國	6,621	6,318
朝鮮	—	—
合計	131,571	120,478

壹餅(單位噸)

日本	10,470	24,680
歐洲	5,857	3,910
美國	685	2,311
南洋	28	—

中國	9,917	468
朝鮮	21	2

合計 16,978 31 371

荳油 (單位噸)

日本	19	11
歐洲	208	2,528
美國	—	—
南洋	—	—
中國	3,161	3,594
朝鮮	—	3

合計 3,388 6,136

高粱 (單位噸)

日本	505	1,499
歐洲	1,830	3,162
美國	—	—
南洋	—	—
中國	280	594
朝鮮	—	3

合計 2,615 5,258

三一年同時者期爲少。至於輸入於日本者大荳較前減9.5%，荳餅減8.5%，高粱減6.7%。迨至同年十月，則大荳輸口量爲7,817噸，荳餅爲11,559噸，較之先年十月大荳爲23,817噸及荳餅爲32,000噸者，前者減68%，後者亦減64%。

更就海關貿易冊上大連關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六月及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出口大荳，荳餅及荳油之數量，比較如下表：

大連 出口	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六月	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
-------	------------	------------

大荳 (單位担)	12,554,194	24,686,456	9,615,10
荳餅 (單位担)	9,788,789	14,267,806	7,388,539
荳油 (單位担)	1,244,443	2,295,76	411,093

農產品如大荳等，爲東北出口之大宗。其出口數額一九三二年一月至六月較一九三一年同時期內，大荳減24%，荳餅減25%，荳油減67%，六月以後，更因日本對東北輸入品增加關稅之結果，乃一蹶不振。故日人所謂「除某種機械與燃料以外，均較一九三一年有增加之勢」一語，亦大有可質疑之點。

此外，機械輸出之減少。其爲「政治經濟不穩定」之指

觀上表，可知一九三二年八月間之農產品輸出較一九三一年同時者期爲少。示，抑係「工業發展之徵象」，吾人稍加思索不難立辨是

非，毋庸再作無謂之辯爭。次則燃料輸出之減少，日人謂由於日本煤業者與滿鐵磋商關於撫順煤運日之協定及受中國內地各處抵貨之影響而然。今吾人可就此二事依次分析如下：

(一)日本煤業者與滿鐵之協定——撫順煤礦年產煤1,350,000噸。其中1,850,000噸運往日本，約合全出產量 $\frac{3}{4}$ ；1,100,000噸供滿鐵會社之用，約合全出產量 $\frac{1}{7}$ ；1,740,000噸在中國各地銷售，約合全出產量 $\frac{1}{4}$ ；其餘則運銷東北境內及南洋朝鮮等地。按撫順煤之輸入於日本者雖僅占日本內地總產量10%。但以其品質優良，價格低廉，遂使日本內地礦業受甚大之威脅。於是於去歲八月間以「筑豐石炭礦業互助會」名義呈請政府制止撫順之輸入。唯時滿鐵爲己身利益着想，竟拒絕此議。日政府恐事件遷延日久，問題愈生糾紛，乃成立調停委員會解決之。其調停案如下：「撫順煤減300,000噸，即本年度（一九三二）運往日本內地數量之1,850,000噸，減爲1,550,000噸。內地減700,000噸，即內地出煤協定量之2,449,591噸減爲1,749,591噸……。」嗣復依滿鐵之要求，又改爲滿鐵減少200,000噸，日本內地大煤礦業者減少800,0

00噸。由於一九三二年日煤商與滿鐵之協定，撫順煤之輸入日本者，較前至多不過減少200,000噸占其出產全額僅27%而已。

(二)中國內地抵貨之影響——撫順煤運銷於中國各地者年達1,700,000萬噸其40%以上銷售於上海一帶。故上海煤市中撫順煤之勢力絕大，華煤反日就衰頹，推其原因，不外：(一)我國煤礦大都在荒山僻嶺之中，交通不便，運輸困難。據聞保晉公司之煤運至附近之鐵路約二十餘里。每日運煤兩噸須車費二元。此僅係至裝出之埠，裝車後之運費尙未計入焉。保晉如此，其他類此者甚多。(二)鐵路運費過高，低者每噸哩一分五六，高者三分有零。(三)地方捐稅太重，每噸煤產銷稅有抽至一元以上者。因上述種種之原因，故由產地運煤至滬成本極昂。用煤各戶，反不如用洋煤之爲愈。但自九一八事變以後舉國一致拒用日煤，撫順之進口上海者大減，故其年十月之輸入量，僅及往日四分之一。不過影響所及，上海煤荒問題驟現深刻化，一般工業大形恐慌，遂使抵貨成效不能持久。故自一九三二年歲初起，撫順煤之輸滬量復漸伸矣。查日煤在滬售價每噸僅八元左右，而國煤以柳河溝者

論之，須售至十八元始免虧累；相差一倍以上，無怪其難與競爭也。滬停戰約簽字後，撫順煤入口量復增。計六月為29,890噸、七月為39,503噸、八月為45,582噸，九月則因金價節節上升遂降為27,670噸。此外漢口煤市，年來亦為日煤所壟斷。蓋日煤售價每噸僅十元左右，而國煤則非十三四元莫辦，他如洋煤亦在十二元以上。

茲將撫順煤在東北及上海，其售價與運費等雜項開支以及煤礦淨得之價，列表如下，(單位日元)

地名	售價	鐵路運費	裝卸費	海運費	折合煤礦淨得之價
瀋陽	7.70	1.20	—	—	6.50
大連	10.70	3.50	1.00	—	6.20
上海	7.50	3.50	1.00	1.10	1.30

今每噸開採成本以日金一元五十錢計之，則盈利僅四十錢而已，其他費用尚未計入焉。至是年十一月，上海日煤暗價復壓低為四元，約合日金三元五十錢，是則低於總成本者，至日金三元有奇。

按吾國頒佈之傾銷貨物稅法，規定傾銷貨物之標準為三：

(一)較其相同貨物在出口國主要市場躉售價格為低者

(二)較其相同貨物運銷中國以外任何國家之躉售價格為低者。

(三)較該項貨物之製造成本為低者。

凡有上項情形之一者，即認為傾銷，徵之以傾銷貨物稅。今撫順煤之銷售合於上舉諸標準，其為傾銷之意，已昭然若揭矣。日人以此卑劣之手段，設法推銷其國內及撫順之煤，使中國煤業者咸失憑藉，奔走呼號，籲請救濟，日人遂夙願得償。故度以恆情，昨年撫順煤之銷華成績，必須優於一九三一年方與情理相合；但事實適得其反。觀夫一九三二年間日煤(包括撫順煤在內)之運華銷售者，不過僅及先年之半數，可以明矣。其間原因，「由於中國內地各處抵制日貨」之成分，定甚微少。吾國累次抵制日貨之成效，奈難持久，今次復非例外；對人言之，倍覺汗顏，然亦可以持之證明日人託詞撫順煤出口量減少理由之不足置信也矣。且傾銷一事，非國際貿易上之常態抑且為其病徵。今撫順煤之售價低於成本者甚多，營業顯見虧累。一九三三年滿鐵社會之預算案，預計煤礦之收入不敷支出者竟至日金二百五十萬元之鉅。日人揚言

「振興滿洲實業」「開發滿洲富源」其誰信之。

(未完)

中國長城作用之恢復

WILLIAM MARTIN 著 劉學濬譯

本文的著者瑪丁先生是日內瓦日報的前任主筆。因他是國聯的忠實信徒和擁護者，他給了我們不少的言論幫助。原文見Manchester Guardian Weekly。編者識

祇說中國有一道萬里長城，在歷史上看是錯誤的。中國長城至少也有三道。其一在蒙古大沙漠中，四分之三類毀了，祇有利用飛機才可以尋得出城址來，這道長城是中國的蒙古帝王建造來保護他們發祥地的。其二是在張家口附近。能照現在日人圖察哈爾的形勢，中日正在多倫一帶激戰，則不久日人當會佔據這道長城。最後才是外人在北平附近游覽的長城，位於中國土地之中心，現在兩軍正沿着它來爭戰。這第三道長城是最短的，可是也長過二千公里。它是最古的，秦始皇遠在紀元前二百二十一年開始建築。如是古老的年齡在任何國家內都是令人崇敬，其在中國更得莊嚴動人。

中國人很喜歡說中國保有世界上最古的文化，從一方面說，這是真的。因為就算中國文化的真體，並不比西方我們的文化更古，它至少也比較西方文化更綿延，經過較少的湮滅，中斷，及革命。按理說中國文化應當遺留下來許多悠長文化的痕跡。但不幸它竟未如是。真正的古蹟在中國並不多。中國缺少古代建築的遺跡的緣因一部分是為中國人總用木料建築。石料不適用於中國曲線的建築式。此外，中國人並不愛戴修繕。過了房舍要倒塌下來，就拆了它照着原式重建。無疑的，我們可以看見與古式意義極近的建築物，但其本身則不是古的。由此可見那長城不獨長度值得注意，它本身的年齡也值得注意。它是與羅馬大帝國所建造的國界衛城(Limes)同時，並且功用亦同。要說中國人建造長城自己閉居其間，與外界一切影響隔絕則未免欠公允。原來並沒有這種用心。建造長城無非是要保衛國境不受夷狄的侵略，正與羅馬大帝國利用國界

衛城一樣。當時的中國帝王祇知自己的文化而不知其他，所接觸的也沒有別的文化，所以對於防禦外來文化侵略他們毫不知道。並且當時更不怕外界的接觸反而樂於接觸。觀乎當時亞洲大陸路上商務正盛可以證明。

一直到了歐人由海路來華利用他們的蠻力與技術上的優越，中國帝王才焦急起來，才考慮閉關自守的辦法。可是長城的功用無益於閉關策略。而海岸線一帶則可受侵害。長城自古以來都不過是一道防線而已，凡從北平向南口攀登過長城的，都能够確知長城在軍用上的險要。

中國的山是從平原忽然突起的，並沒有高原，脚山來陪襯。左邊一望無際的單調的平原，右邊則懸崖峭壁。這種的山脈把河北省（即從前我們在學校讀地理所稱的直隸省。中國國都改到南京後始稱河北省）從西北方封閉，使與蒙古隔絕，而奔臨到中國北部的大平原。從山口一進來立刻就到一帶高下不平的地域之中，其間並無間接的階段。所見的都是棕黃色的石山，山邊很多的交互已乾了的澗底，此外別無他物。在此有時令人想到身在加斯提爾（Cassite），有時又如在可西可（Corsica）或是在希臘，那等境地。沒有樹木的山，山石的顏色及藹藍的天色含有令人回憶到地中海風景的意味。

山上如無炮樓，則長城上炮樓多至無數。各山峯均有城牆及敵樓，各山谷各小丘及各山口，城牆均橫貫堵截。各處雉堞炮樓密佈，山口各地戒備週全。

這樣嚴密的警備，從前是必須的。數千年來中國與外界交通唯一孔道都是從這方面起的。從這條路，中國的絲茶賴長毛駝輸運到歐洲。從這條路西方的勢力影響到遠東來，影響雖然不大，却是很有意義的。馬可波羅（Marco Polo）曾經走過這條路，他大概是夜間走過的，因為他竟未看見那道萬里長城！這倒是怪有趣的。也是從這條路那蒙古人最後傾注入來中國，像洪水衝破了防堤一樣洶湧。他們佔了中國，成立了一個國家，命運雖然短，可是偉大得很。從維斯多拉河（Vistula）伸張到黃河流域。

此次蒙古入寇成功證明任何炮壘的防守也敵不過堅決的大軍。然而長城昔有的力量是多麼大呢！橫過山谷矗立天邊令人生畏。城牆下，內則屬中國平原，外則屬蒙古平原。自此端迄彼端脚接無間，長城之功用不獨為外夷侵略之保障，其最重要之點更在其能成為軍運之大道，使全國邊界運輸無阻。所以最荒的原野，最難攀登的山崖，及看着似乎無須城垣的地方，都有長城經過。

這種勇武的設計及建築的天才使此技術上的神跡得以

完成，主其事的人，無論從那一方面說也堪與設計建造「*imes*」或「*Pont Du Gard*」之人齊名。他們都是屬於勇敢及奮鬥的一類人。

現在還可以得到更深切對於此長城功用的見解，須知目下它正在千百年來沉睡之餘，表露其功能的偉大。由南口沿城向東北不遠即至古北口，再前即至喜峯口，其間數處日軍大炮隆隆正向華軍攻擊，華軍則俯伏先人建造之長城又作保衛中國領土之壯舉。

在這裏應該討述一下，長城並不是沿着中國國境建造的。紀元前三世才是這樣。自那時之後中國政治地理起了不少變化，目下沿着長城一大部分，尤其是中日交戰的一帶長城，都是遠在河北省內。

日人用武力佔據東三省及熱河省是成功了，但日本在一切外交上却失敗。日人在日內瓦敗訴了，連在中國方面，雖因盡了手段也沒有引誘中國政府與之直接交涉或簽定條文成功。反正東三省的強佔一天不成爲合法的，則一天不能安定，仍要受事態演變的操持。這就是爲甚麼現在的戰爭嚴重性的緣故，此次戰爭的嚴重性實超過一般人的想像。有些外人久居中國慣聞中國內爭的戰事，內爭戰事頗爲奇怪，時常雙方無死傷的，所以輕視此次的戰鬥。有人

告訴我說，「北平軍醫院除了凍腳的傷兵外並無別的傷亡。」這可是再不確實沒有了。我自己曾深問過北平的軍醫院，至少也深問過其中的一部分，現在至少有二千傷兵。我曾經見過這些受傷的兵士，他們臉上露着痛楚的神色。持刀割治的醫生我也見過。從我的經驗，我可以說如果兵士們凍了腳也不是因爲如造謠中傷所謂他們後退的不快，所以凍傷了腳，實在因爲他們受了傷後，仍然長時間的不離開冰天雪地的前線。

在中國必須壓抑作預言的誘惑的。但是下述的是將來大概會發生的最低度的估價。要是日人真決心要侵入中國的平原，他們手中既有技術上工具，將來一定是會佔領的。可是佔了之後又如何呢？到了那時候，中國人的才智就會顯出來了。他們的工作就是放棄領土之一部分，在某方面言之，是最重要的的一部分，由外人管理之，不走錯一步，不令頭昏目眩，不開談判，不簽任何文字，而專等國聯決定旨趣，執行國聯的約章。

中國人會這樣辦嗎？如果有別國，我們就不能無疑。但中國人民對於時間久暫是不理會的。因此很有好的理由來希望中國人能站穩脚步，等等，等等，等到將來有一天別國決定了實行他們的工作，來幫助中國以報復國聯約章的破壞。

造亂與止亂

任鴻雋

目下的中國是亂國，這是我們不願意而又不能不承認的事實。但是甚麼叫做『亂』？『亂』的特徵是些甚麼？却是值得我們討論的一個問題。在常人的心中，『亂』必定是水火刀兵，流離死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一類的慘劇。如明朝末年的李自成，張獻忠，清朝末年的義和團，紅燈教，（我們姑且把有革命性質的戰爭，如太平天國之類，放在計開之外），是亂的代表現象。這些歷史上希有的浩劫，民族上不可泯滅的污點，說他是亂，當然是無可致疑的了。可是他們都是亂的已成的現象。在這些現象尚未成功以前，亂的根源或動機早已存在，也是無可致疑的。譬如一個大波，是由無數的小浪合成的。我們只看見一個軒然大波，而忘記了無數的小浪，不算能懂得亂的真象。

那末，小浪又是些甚麼？有的人說，饑饉與橫徵暴斂，最是造成大亂的好材料。再拿明末的事來說。史稱：

關中大祲，三輔盜賊縱橫。是以青徐民饑，樊崇以起；長垣歲凶，仙芝作亂；蓋揭竿之徒，往往由於請磬

之匱也。李自成以驛卒失職，值饑民不沾泥等倡亂延安，因往從之，旬月之間，衆至數萬。潰兵得饑民，嚮導既清，饑民得潰兵，壁壘益厚。

這可見饑饉與亂事關係的密切。說到橫征暴斂，當然比饑饉更進一層。因為常人的觀念，饑饉是不可抵禦的天災，橫征暴斂是人為的虐政。天災有時尚可以忍耐，而人為的虐政則常常有揭竿而起的反抗。古人所說的『苛政猛於虎』，也是這個意思。我們若是要找一個歷史上的實例，不妨再把明朝萬歷時代礦稅之弊來徵引一下。明朝徵收礦稅的結果，弄得天下騷然，暴動四起。史稱：

高淮激變遼東，梁永激變陝西，陳奉激變江夏，李鳳激變新會，孫隆激變蘇州，楊榮激變雲南，劉成激變常鎮，潘相激變江西。當是時也，瓦解土崩，民流政散，其不亡者幸耳。

照上面所說，饑饉與橫征暴斂，無疑的可以造成亂事的背境，可以成爲亂事的導火線。不過設如當時的社會尚

有秩序，政治還算清明，那末，雖然有了導火線和背景，亂事也許不至發生。那就是說，雖然一方面造亂的力量在那裏進行破壞，同時在另一方面又有止亂的力量在那裏彌補維持，結果還可以暫時相安無事，或竟可以消患無形。我所謂止亂的力量，就是在政局一方面，有實施牠的意志或維持牠的法律的權力；在個人一方面，有尊重法律，道德，及一個有所不爲的態度。有了這兩種力量，互相補助，上下合作，纔能維持一個社會的秩序。這些話說來似乎過於老生常談，平淡無奇了，其實在實際政治上是應該首先討論的問題。比如說罷，我們現在不是在草擬憲法草案嗎？設如我們的政府，根本上就沒有力量施行牠的意志，維持牠的法律；設如做國民的，根本上就沒有把法律放在眼中，而一天到晚在營謀法外的利益以使其私圖；那末，即使我們有一個世界上最完美的憲法，又有甚麼用處？

讀者不要誤會，我們所說的政府不能施行其意志，維持其法律，是指的察哈爾的抗日救國軍和釋放漢奸郝鵬一類的事。這一類的事，雖然足夠暴露政府的無能，因為多少與軍事和外交有些關係，我們情願把牠放在存而不論之列。我們所說的，乃是明明的紀律問題（與軍事無關），明明的法律問題（與外交無關），而政府也對之束手無策

。這樣，直接的表示甚麼軍紀法律都是無用的長物，誰也不必對牠有所顧慮，間接的便是獎勵作亂。舉兩個實例來說，一是青島三艦的自由南下，二是上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楊杏佛君的暗殺案。

關於青島三艦的自由南下，事情似乎很簡單明瞭。那便是說，此次事件的發生，完全由於部下的軍人，不滿意於其長官的行爲或待遇，於是遂以反對長官的原因，做成變亂的結果。（長官的行爲對與不對，乃是另一問題。在這一件事情裏，據我們所知，長官的行爲乃是對的。）這件事情發生以後，我們以為政府總應當有一個相當的處置。處置的方法，第一應當命令逃去的三艦歸還原隊，第二應當澈查此事發生的原因，看責任在那一方面給他一個相當的處分。但是我們看見政府所做的都不是那麼一回事。三艦逃到廣州，便聽他在廣州了。如今要問廣州還是不是中央政府的領域？如其是的，中央政府當然還可以命令牠照中央的意思，處置三艦。如其不是，中央政府便應該明正三艦叛逃之罪。但是這兩層又不見中央政府有所舉動，這是我們所大惑不解的。

第二楊杏佛君的暗殺一案，更是糊裏糊塗。照常例說來，楊君曾做過大學院的副院長，現任中央研究院的總幹

事，他的被暗殺，明明是對於現政府的一種沒視與挑戰，政府應當風行雷厲的辦一個水落石出，纔足以表示政府維持法律的決心與自己尊嚴的存在。但是這件事情發生以後，除了中央研究院幾個迫切的電報呈文和中央政府幾個照例的轉行公文外，其後便無聲無臭了。尤可怪的，有些自命爲宣傳革命的出版品，還在那裏鳴鑼打鼓的批評楊君怎樣的同情民權運動，破壞國法，似乎是死有餘辜的樣子。我們現在要問的，楊君果然是破壞國法，那末，國法具有，何不把楊君拿來明正典刑，而必假手於幾個流氓，出以卑劣的暗殺手段？我們以爲不言國法則已，一言及國法，這些自由的動輒把法律來放在自己手中的，纔真正是國法之敵。現政府對於這些國法之敵，既然沒有辦法，更何怪亂事的層出不窮呢？

關於個人方面的造亂行爲——就是處處營謀法外的利益，不管法律道德有甚麼限制，這類的事情太多了，真是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我們現在姑且舉一個報紙上的例子來說明我們的意思。讀者大約還記得在不久以前上海的中學會考，曾經鬧過罷考的風潮。據說，事情是這樣的：

上海市教育局的主考人員，爲慎重起見，特派兩個局

員把試題帶到南京去印刷以防洩漏。偏生到試題印好，局員要起身回滬的時候，因爲打電報擔保的原故，被某報的職員謝某得知試題在某處印刷。又因爲謝某有弟在上海建國中學讀書，亦將在會考之列，於是謝某便費上一點心機，到某印刷所去弄得剩試題一份，來滬交與其弟。豈知其弟因成績不良，業已扣考。謝某於是向該校的某校董疏通，以轉給試題爲許考的一個交換條件。某校董既得試題，則拿來分給與他有特別關係的學生。少數學生既先期得了試題，行動異常，遂動了大多數學生的疑心。他們分頭偵詰，竟得大概，於是羣起向某校董要求，試題公開，均霑利益。某校董不堪要挾，卒如其請。這樣知者既多，事益不秘密，大夏中學，遂於會場中發難了。（天津大公報上海通信）

一個考試的題目被竊，雖然是一件事，但是我們讀了這一段記事，只覺得這一班讀書的人們，老的，少的，做先生的，做學生的，心中除了占一點考試的便宜之外，一切世間的道德廉恥，國家的法律制度，社會的公益秩序，都不在意中。這樣的心理態度，正是一切混亂紛擾的根源，不可當作小事看待。我們試想，設如替國家經營財

政的人們，都存了一個有便宜必占的心理，而沒視一切法律，國家還有財政可言嗎？設如替國家辦理實業或軍事的，人人存了一個先小己而後公家的態度，國家還有整頓實業或軍事的希望嗎？我們曾經說過，上面所引的會考事件，不過是一個例子，其實和這個相同的事體，一天到晚在那裏搗亂社會的組織，掏虛社會的基礎，正不知尚有幾多件，可惜我們不能一一指出罷了。

照上面所說的，我們可以明白，在一個國家之內，不

農政局——一條智識份子下鄉之路

吳景超

但軍閥交闖，盜賊縱橫，饑饉荐臻，民不聊生，是亂；就是國權不立，法律無效，人懷私圖，不顧社會秩序，也是亂。止亂的方法，有的要靠政府，有的要靠個人。一個社會的成立，不但要組織的分子人人有為，并且還要他有所不為。這有所不為中間，小部分是由於法律的制止，大部分是由於道德觀念與做人常識的限制。這一點限制，是社會組織的最後堤防。倘若這一點也不能保留，那只好讓洪水來泛濫了。

二十二，八，十三。

智識份子集中都市的情形，以及下鄉的困難，我在本刊六十二期中已略有論及。這種現象，有許多人認為是可以痛心的。他們把都市與鄉村，看作兩種不相關的個體，好像住在都市中的智識份子，只能為都市中的住民服務，假如他們欲為鄉民服務，便非下鄉不可。這種看法，無疑地是錯誤的。都市中的智識份子，與鄉民發生關係的地方很多，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三點來說。第一，我們知道有一部份智識份子，雖然住在都市中，但他們對於市民與鄉民，是有同樣貢獻的。如新聞記者在都市中辦報，鄉民也可看他的報；醫生在都市中開醫院，鄉民也可來住他的醫院

藝術家在都市中演劇，鄉民也可來聽他的戲，此外同樣的例，不勝枚舉。第二，有一部份智識份子，雖然住在都市中，但他們却是為鄉民服務的。舉一個淺近的例子，如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中那些智識份子，我看他們對於南京住民的貢獻，是微薄的；但因為他們改良育種，提倡合作事業，對於附近農村中人民福利上的貢獻，却是偉大的。再舉一個有趣的例。前一個月，國內許多從事農村運動的人，在鄧平開會，最後他們要舉兩個值年的人，負責辦理明年年會的事。這兩位值年，對於農村運動是很熱心的，他們也曾辦了不少對於農民有益的事，但這兩位值年，却都是

住在都市中的。由此可見住在都市中的智識份子，也可專心爲農民服務。第三，有許多農村中間的問題，只有靠都市中智識份子的努力，才可解決，下鄉去的智識份子，對於這些問題，幾乎無能爲力。譬如苛捐雜稅，是農民生活中的致命傷，但免除苛捐雜稅，不是下鄉去的智識份子所能作到的，我們須覓住在都市中的政治家，來爲他們想法。又如鄉村中的人口過剩，以致產生大規模的失業狀況，這種現象，不是在鄉村中努力所可消滅的，須在都市中從事於工商業的智識份子，在發展實業上努力，去吸收鄉村中過剩的人口，然後鄉村中的失業問題，才可以得到解決。本此三點，所以我對於智識份子集中都市一現象，並不如一般人那樣悲觀。我認爲智識份子，雖然住在都市，如能在他們自己的職業中盡責，鄉村中的人民，也可以得到他的好處。

以上數點，是一般人所忽略的，所以我願意先提出來說一下。不過主張智識份子下鄉的人，自然也有他們的理由。都市中的智識份子，無論如何爲鄉民服務，但總還有一部份工作，非下鄉去做，便做不成的。爲完成這種工作起見，我也贊成一部份智識份子下鄉。但是智識份子，如何便肯下鄉呢？勸導他們下鄉，也許有一小部份人肯去，

但對於整個的鄉村問題，是無補的。以辦慈善事業的方式，請智識份子下鄉，也有一小部份人肯去，但對於整個的鄉村問題，還是無補的。如欲解決整個的鄉村問題，使全國各地的鄉村，都有智識份子的足跡，非用政治及職業的力量不可，這便是我想提倡於各縣設立農政局的意思。

中國政府的組織，無論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有一點頗使人覺得奇異的，就是沒有一個爲大多數農民服務的一個機關：中央政府沒有農部，地方政府沒有農政局。就從這一點上，我們可以看出現在的政府，還不是一個服務的政府。爲補救這種缺點起見，中央政府應有農部，縣政府應設農政局。我們現在不談農部，只談農政局的組織，職務，對於農民的影響，以及這種機關設立之後，智識份子，如何便可有一部份下鄉。

我理想中的農政局，當然是屬於縣政府的，與公安局教育局等佔有同樣的位置。不過農政局中的人，都是爲服務而去的，他們不是去做官，更不是去發財。他們假如年費國幣二萬元，便應當給農民做二萬元的事，否則只是添了一個剝削的機關，不如不辦。農政局的組織，不必要像別個局中那樣繁瑣，用不着設立許多只吃飯不做事的科員位置。局中至少要用三個受過大學教育的智識份子，一個

辦理鄉村社會調查的事，以爲一切改良，一切設計的基礎。一個辦理推廣事宜，他把國立或省立農事試驗場所得的智識，推廣於各鄉村中，使其與農民的生產，發生關係。我們要靠這個推廣的人材，來加增農民的生產，拯救鄉村的破產。第三個受過大學教育的智識份子，應盡全力於鄉村組織，使現在鄉民所過的那種一盤散沙的生活，轉變爲有組織有秩序的生活。關於調查與推廣兩點，討論的人頗多，不必贅述。關於鄉村組織一層我還有幾點意見可述。

現在談進行鄉村組織，第一要定組織的單位。以縣爲單位太大，以村爲單位又太小，折中的辦法，應以市鎮及其附近鄉村爲單位。這種單位的範圍，可以調查出來的，現在已有固定的技術可循，不很費事的。把全縣分爲若干單位之後，便由這個對於鄉村組織曾有訓練的智識份子，下鄉去幫助鄉民組織。其步驟大略如下。第一，邀集這個單位中的領袖，聚於一堂，討論組織的重要，及應當組織的生活。這些領袖，或由縣政府指派，或由當地人民選舉，應視各地人民智識的程度而定。農政局中的職員，所要注意的，就是他當利用這些領袖，使成爲地方上組織事業的重心。領袖團成立之後，便可由他產生許多委

員會，每一個委員會，負責組織農民某一方面的生活。委員會的性質及多少，當然要顧慮地方上的情形而定。

但有幾種委員會，我想各地都可組織的。第一是娛樂委員會，他的職務，在把地方上的藝術人材，組織起來，使本地的住民，可以享受本地人材可能的貢獻。譬如在鄉村中，會唱西皮二簧的人不是沒有，會變戲法的人不是沒有，會說笑話的人不是沒有，會講故事的人不是沒有，只因缺乏組織，所以這些人的貢獻，只有他們家庭中的人享受到了，別人得不到他們的益處。一有組織，他們便可在大眾之前，一顯他們的身手，對於表演者及賞鑒者，都是有利無害的。試想寂寞的鄉村中，有這種娛樂委員會，人民的生活，要豐富多少。第二是演講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職務，便是在相當時期內，請外間的智識份子，來爲農民演講，以增進他們的常識。現在全國各縣，有很多都有在平津滬漢各處讀書的學生，他們有許多受縣政府或省政府津貼的。這些學生，于暑假或寒假中回家，應當爲鄉里盡一點義務，至少他們應灌輸一些新智識到鄉村中去。但因爲鄉村中缺乏組織，所以他們雖有服務的志願，也無服務的機會。假如全國各縣，都有演講委員會的組織，那麼這些大學生，假期中回鄉，便可到各地去演講，這不是一個成

人教育極好的辦法嗎？農政局不但可以於事先與本縣在外讀書的大學生接洽，請其於假期中回縣作巡迴演講，他還可以在都市中敦請專家，請他們有暇也到鄉村去演講一次，或數次。總之，有了這樣的委員會，便可充分利用本地在外間讀書的大學生。以及非本地人而學有專長的智識份子了。美國各鄉村中的教堂，實際上便盡這種職務，許多在都市中讀書的中國留學生，便常給他們請去講中國的問題。假如中國各地有演講委員會，也可達到同樣的目的。

第三是圖書委員會，鄉村中雖然也有讀書識字的人，但因為經濟的關係，買不起外間出版的書報，因而得不到新的知識。如有圖書委員會，一方面可以藉合作的力量，購置幾種報紙與雜誌，幾本新出版的書籍，成立一個小規模的圖書館；一方面可以寫信給本地人在外面讀書的，當教授的，經商的，請他們把看過的書報，願意捐助的，都捐給這個圖書委員會。這樣辦下去，鄉民便不會有讀物缺少的恐慌了。第四是信用合作委員會，他的職務，在組織當地的農民，成爲一個信用合作的團體，然後以團體的名義，與本地的富戶或外面的金融機關，接洽放款事宜。用信用合作社借來的款子，利益一定比較的低廉，這樣，農民便可免除高利貸的剝削，可以減輕他們生活上

一個最重的負擔了。以上這四種委員會，都有一定的職務可盡，別種類似的委員會，可以組織的還多，這兒不必枚舉。不過我們要記得，這種委員會能否組織成功，要看各單位中的領袖團是否盡力，而有幕後推動這些領袖團，監督並且指導這些領袖團的，還是農政局裡面的智識份子。假如農政局這個機關可以產生，農政局中主持事務的人，是受過大學教育的智識份子，上而所說的理想境界，遲早都可以實現。

農政局的職務，既然在服務農民，所以他的存立，一定可以吸收一些志在改良社會而不在掠奪社會的智識份子。同時在農政局服務的人，並不是去辦慈善事業，他們是可以支薪的，而且所支的薪水，不妨比較一般大學畢業生還要高些，以鼓勵那些肯下鄉服務的青年，並且也可表示社會上對於這種職務的重視。只有用政治的力量，在中國各縣安設這些位置，才可吸收很多智識份子下鄉，否則智識份子，一定都是向都市去，結果鄉村中有一部份的工作，必因缺乏人材而無從進行的。

中國的雜誌界

畢樹棠

去年清華政治學報編印論文索引，我曾寫了一篇關於雜誌的短文約略述論中國自有雜誌以來的變遷。把近四十年分作四個時期，從戊戌政變到辛亥革命為鼓吹憲政時期，民國成立到北洋軍閥專政為政論失勢時期，五四運動以後為思想解放時期，醞釀國民革命到北伐成功為學術研究漸入軌道時期。此後就是最近五年的光景，因為正在演變之中，不好下斷語，所以略而未論。現在本刊囑我續作一文，當然是注意這最後一個時期，這却很難，恐怕怎麼說都不容易得當，姑就管見所及，再作約略之論。

首先應當弄清楚的，是中國雜誌到底出了多少種？其次是其中有多少種是有價值的？答覆第一個問題，就不容易，政府沒有註冊的統計發表過，書店沒有聯合的刊物記載過，只有各大圖書館盡力搜集，當然不能完備。何以呢？有的雜誌壽命很短，出不到兩三期，就不見了。有的立場各異，剛露頭就被政府禁絕了。有的暗中發行，出沒無恆，求之者也就捉摸不着了。所以結果不免有遺漏，統計的數目也就不大可靠。於是只得在第二個問題上作去，便是一般認為有價值的雜誌總設法弄到。依照北平圖書館協

會出的雜誌聯合目錄上看，北平各圖書館除去革命刊物都沒有相當的收藏以外，普通的搜集已不差甚麼。最近清華圖書館印的中文雜誌目錄，包括自前清光緒二十二年到民國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一一九三三）出版的雜誌，統計有六百七十餘種，其中停刊的有三百種，差不多去了一半，其餘將近四百種，算是最近雜誌界的精華。這個數目並不算太小，若每種都在學術上有地位，也就很可觀了。近幾年，美國和加拿大合起來，每年的報章雜誌統計總在兩萬種以上，數目似乎很大，然而實在有價值的雜誌也不過五百種。歐洲各國，更不過此數。俄國雖有驚人的統計，而宣傳品居多，又當別論。若中國的宣傳品和中小學校的刊物都算起來，至少也有兩千吧。

這近四百種雜誌的成分如何，是個很該研究的問題，有的是純粹學術刊物，有的則不無雜亂，標準有的很高，有的則不無淺薄，若嚴格的別擇起來，站得住的實在有限。現在姑就出版的來源，作個分別的考察，大概可以分作七類。第一是政府機關出的雜誌就是公報一類的東西。在清末，這種刊物很少，內閣官報算是最重要的。民國以後，

各院部都有定期刊物，內務外交農商司法交通教育各部的公報都辦得不錯，到十四五年，就都沒了生氣，及至革命北伐，算告了一個段落。南京政府成立，刊物可就多了，除去院部以外，又加上屈指難數的各色委員會，有一個機關就有一種刊物，在形式上很見發達。據十九年國立中央研究院編印的中國政府機關刊物目錄的記載，連中央黨部在內，有定期刊物八十種。其中除去公報公佈各項條文可供查考以外，當以各種調查和統計的刊物為最有價值，例如統計月報建設季刊，及水利委員會工商訪問局商品檢驗局等刊物是。其次各省政府機關出的刊物也不少，當以教育廳和建設廳的東西較為重要。九以幾個特別市的市政刊物為以前所未有，廣州的市政公報，上海的社會局月刊，武漢的新漢口是比較最有價值的。中央政府的刊物在發行上沒有一個統一的機關，是個缺點，採集起來，得沿着衙門去請求，往往不得要領。若能像美國在華盛頓設一個中央出版部（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總理一切，且按時發佈新刊目錄，就便利多了。各省市有一個共同的毛病，就是出版沒有一貫的計劃。三天兩天的調換人，每一個新官到任，必有一個口頭的新政策，一轉身，言猶在耳，人已他去了。一個公報離不了是那些材料，今天改一個名

稱，明天換一個出法，北平的市政公報不到五年改了三回，回了，教育局月刊也改了幾回，現在索性連局也改沒了。政治不上軌道，這些小節都沒了秩序，旁的更不必說了。

第二是文化機關的雜誌，也是政府所辦，而以研究上作為主。規模最大的是中央研究院，內裏各所都有集刊專刊印行，東西都很專門。唯有心理研究所似乎還沒出過甚麼刊物，物理化學兩所也很少。其次國立北平研究院也沒出過重要的雜誌。社會調查所的社會科學雜誌，地質學會的會誌，營造學社的彙刊，北平圖書館的館刊，都是標準頗高的刊物，出版的情形也比較最有規則。這類雜誌的壽命全在學者安心致志，政府永遠維持，日子久了，自然可以列于世界學術之林。試看英國的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法國的國家學院（Institut Francaise）德國的普魯士科學院（Preuss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出的雜誌代表一個國家的文化也非一朝一夕之故了。

第三是大學出版的雜誌，當推北京大學和東南大學為開風氣之先。北大的大學月刊國學季刊和社會科學季刊是資格最老的大學雜誌，同時東大極力與之抗衡，而力終不逮。現在各大學都設有研究院，工作的努力和政府的文化機關，可謂分工同力，不相上下，所出的雜誌，都極可觀

。例如清華武大中南大開燕京輔仁金陵廈門嶺南各大學所出的學報，都很精彩。只是多半偏于文科方面，爲歷史考古文哲社會等門，也是近來學風的趨向。理科一方面，則較爲遜色，因爲科學不是只翻書本，就可以代表工作，是要藉重設備，還得和西洋先進有點來往。而現在的大學多半變成破落戶，有氣沒力的設備都不易辦，所以科學雜誌勢成了幼稚陪腳。清華比較有點規模，出的理科報告，據說很不差，只是年限太淺，希望還在將來呢。

第四是學會出版的雜誌，這是學者自動集合的團體，作學術或事實的研究工作的。前一項當推地學會爲最早，其次是科學社，可是地學誌，和科學，都是很平常的雜誌，也許是時代尙早的緣故。近來學會雜誌似乎進步多了。例如工程季刊，農學會報，鑛業週報，化學會報，水利季刊，經濟學季刊，社會學刊，法律評論，合作月刊，史學雜誌戲劇月刊……都頗具規模。後一項的組織在從前很少，近來如村治月刊，新亞細亞西北研究，西南研究，南洋研究，日本研究，俄羅斯研究，都是應事實而起的團體雜誌。可是比起來，和前面文化機關和大學的東西便差等了。原因是學會的組織往往不是以研究工作爲唯一目的，精神不容易團結，幾個重要分子一旦高飛騰達，學會就算完

了。再則學會多半沒有公款的扶持，往往會費無着，自然辦不出的有力事來。所以學會的雜誌在目前只可佔第三等的地位。

第五行業機關的雜誌，是因事業上的需要而辦理的。內容不尙空談，專載事實，東西都很純粹。從前北京的銀行月刊，漢口的銀行雜誌和現在的上海銀行週報，問于財政金融市場貿易的記載確有永久的價值。其次爲錢業月報商業月報，火柴月刊，組紡織週刊等都各有其專行的功用。這一類在外國很發達，例如汽車保險藥材電料及種種生產製造的專行雜誌出版很多，銷路也很廣。這完全是工商業發達的關係，中國物質進步落後，所以這類刊物也就少了。

第六政論社的雜誌。中國似乎沒有政黨的永久言論機關，也沒有長期的清談政治的雜誌，像英美的政黨似的時時有一貫的主張和言論。總是內政外交有了變動，政論便勃然蠶起，國家苟安了，就消聲匿迹起來。這或者是政治思想不健全的証據。回想四十年來，政論雜誌出的不算很少，生命却都很短促。前清的時務報，國風報，民國以來的庸言報，大中華，甲寅雜誌，現代評論，中外評論，革命評論，努力週報，……都長的不過兩三年，短的六個月，就完了。論價值，論力量，都不算小，只是不肯長進，似乎也是一個缺點。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新興的政論雜誌，

又很不少。時代公論，獨立評論，鞭策，再生，及其他好的週刊，都生氣勃勃的起來批評政府，鼓勵民心，是國民黨執政以來的一個言論熱烈時期。我們沒有工夫一一讀過，不敢亂下斷語，大概除去上面幾種態度嚴正的以外。多半不能「言必有中」，便是空口責難的多，實事策劃的少，宣傳恐怖的多，洞察深情的少，鼓動同情的多，指導實行的少，終究有多少益處，是一個問題。出版都很快，生命有多久，則不得而知了。

最後是書店的雜誌，當然以上海為中心。書店的組織都以漁利為目標，以趨時為能事。出的雜誌大半都是空倡主義的社會文字和描寫青年心理的文學作品。東方雜誌，新中華申報月刊，現代算是標準最高，出版最好的。餘如大東，世界，北新，光華，黎明，神州國光社等書店，每家必有一種以上的雜誌，東西好壞無定，出版是極隨便的。再次一般野鷄式的書店，不足置論。海上的文人學者，作作他們的食客，互相利用，精神方面是極不堪的。可是單就這類雜誌的本身而論，却也有幾個好的特點，第一成分雖雜，而主持的多半是青年，生氣十足，很能接受外來的新思想。第二作品雖亂，而很大胆，放筆創作，常有天才出現。第三上海是中國都市生活的代表，情形本是無

雜，而在整個的表面上，却是時代的前幕，因之在這背景裏產生的刊物也現出同樣的魔力來。

雜誌界的情形略如上述，總看起來，有進步的幾點。

第一是出版增多，多了自有好的東西出來。第二是學術文字已漸入軌道，久了自有成績可待。第三是印刷廣告已形改新，如文字插畫的編排，封面圖案的繪製，都有點美術味，似乎是法國和日本的影響。第四有的頗能模仿外國雜誌，材料自然有很多是從外國雜誌上抄來的，編製也有些相似的。例如國聞週報，時事月報是學Current History，東方雜誌申報月刊類似Harper's and Scribner's，新月有些像Atlantic Monthly，獨立評論時代公論有點像Nation和New Statesman，這些雜誌都是很有希望的。至如缺點，則似乎很多，最顯著的是出版太不規則。這很可代表近代的中國人辦事沒有計劃，沒有恒心，甚至如投機取巧的劣點。這種精神不改造，甚麼事都難成功辦，雜誌是文化事業，更不是偶然可以從事，隨便可以放下的。但是有一個例外，便是各學會和大學的雜誌，因為經濟的關係，多半不能按期出版，在事實上委實有困難，外國這類雜誌也有同樣的情形。然而因為東西是好的，將死不救，實在可惜，例如北大的國學季刊，三兩年出不了一本，未免太慢了；北大

似乎不是很窮的，應當設法整頓。最不可恕的是上海那些小書店，幾乎沒有一家肯誠意來辦幾種雜誌的，有的簡直近于欺騙，這真是罪惡了。其次講到雜誌的內容，一般風頭虛尾的淺薄東西，不去管他，單就純粹學術雜誌來看，也有一個共同的缺點，便是缺乏書評一類的文字。書評在外國雜誌裏是佔很重要部分的，專門雜誌每期必把新出版的書籍，來個擇要的評定，使讀者不致去按本摸索，自然有選讀的便利，這樣學力上的經濟關係很大，同時可以制裁那些劣等的作品，不能在學術界隨便擾亂。比如有一種傑著出來，不幾天的工夫，便可得到相當的地位，完全是靠雜誌上書評的力量。英國的 *Criterion* 是文學上最高的一種雜誌，而每期竟有一半的篇幅是書評。*New Saesman* 和 *Nation* 一類的週刊，每期有書評專欄，每季還副載書評特刊，至如倫敦泰晤士報的文學副刊之為英國書評專報，更不用說了。我國的出版界，比起來，固然是貧乏，可是近來文學史哲和社會科學的書籍，出得也不算少了。有根基的學術雜誌都不肯注意，作幾句評語，鬧得書攤上滿目淋漓，石玉雜陳把青年的思想，擾亂得個不可收拾，這是不小的一個缺點。從這一樁事可以看出，現在的青年不肯安心讀書作學問，內裏不充實，當然作不

出評書的文字來。又可以看出一般學者無意領導青年，他們只顧他們自己的成就，認定新出的青年讀物都是無價值的，正眼也不瞧一下，任他們去自亂。美國耶魯大學 *William Phelps* 教授每月在 *Scribner* 雜誌上作一篇書評，題目 *As Like it* 每次總論到二十幾種書，每月新出的英文文學書籍，差不多都提到了。這頗可以作我們的大學教授一個標樣。現在教育部辦的圖書評論，是專作這個事的，內容不大精密，上海的中國新書月報，就更差了。北大清華武大的幾種雜誌確有這項文字，惜乎太少，又偏于西書，而略于本國刊物，是極應擴充的。

現在離開雜誌的本身，來談談與雜誌相同的兩樁事，第一是雜誌的索引工作。現在利用過去的雜誌，有一個困難，就是要作一個專題研究，材料無從查起，所以索引是不能缺少的。這個事不能靠個人的力量去作，應當有一個公家或團體的組織，共同繼續作去。美國紐約有個 *I. W. Wilson* 公司是專做這個營生的，出了六種定期刊物，專編印雜誌論文索引，定價極貴，而學者很感便利。其次關於提要的工作也要緊，例如 *Social Science Abstracts*, *chemical Abstracts*, *Biological Abstracts* 等在外國已經成爲學者手邊離不開的工具。我們這種工作也已有些成績，如

國學文學心理學教育政治都已開始作了，有的也加提要。定期刊物中，最早是上海同文書院出的支那研究附有雜誌論文索引，最近人文也很努力編纂，中國銀行印的每週重要書報論文索引更是專一的工作，只是限于商業一面的東西。還有一個特別的困難，是中國字沒有一個統一的次序系統。用分類法，查尋的時候，比那外國以字母編排的索引麻煩得多。甚麼四角檢字等方法都不適用，這在事實上

論博士考試

報載教育部有舉行博士考試之議，年試一次，每次以十人為限，及第者得稱某科博士。在外國得有博士學位而未與國家博士試者，只許稱為某國某校某科博士，而不得僅稱某科博士。某科博士之榮名，惟應國家博士試及第者為能享之。此誠學術界盛事，教育部能見及此，亦可謂差強人意之事也。吾國辦大學歷三十餘年矣。然關於頒給學位，教育部始終持慎重之態度，不但不敢授與博士學位，

（惟北京大學曾授歐美學者數人以榮譽學位），即大學畢業生亦僅「得稱學士。」吾國名器素濫，於此抑又何嚴也。實則學位不過一種學業之證明，固不容輕視，亦不可過於重視，至學子無以獎勵。至於學士學位尤非甚崇，以擬

時是沒有辦法的。

第二是政府檢查一事，這關乎言論出版自由，現在似乎很受限制，雜誌出版之無秩序，這也是原因之一。實則言論常是在事實前面的，一時辦不到而總要作的，常是話已先說了。若是言論毫無波瀾，處處順着不合理的事實成一鼻孔出氣，那就用不着牠了。這事用不着舉例，只有希望當局能作合理的解放才是！

八月，十一日。

胡先驌

舊日科名，不過秀才而已。驟視之，學士之名甚高，實則秀才之名又何嘗不高。在科舉時代，秀才之多如鯽，在美國學士之多又何嘗不如鯽？故前此教部始終不令大學畢業生正式稱為學士者，實失之過於謹慎也。

吾國大學畢業之後，除得稱學士外，更無較高之學位。在成績優良之大學，教授能指導學生施行研究者，學子除得求學之志願外，並無得更高學位之機會。欲求與昔日科舉時代孝廉相若之榮銜尚不可得，更無論金馬玉堂之翰林學士矣。在篤學之士，固不斤斤計較此種虛榮，然為國家宏獎學術計，則不可不有此種學士以上之碩士博士學位也。且教會所立大學，皆授與碩士學位，而國立大學如清

華大學所辦之研究院，雖在其中研究三年，不但不得博士學位，甚且不得稱爲碩士，將何以獎勵篤學之士乎？吾國大學畢業生有特殊研究成績者固不多，然出類拔萃者亦大有人在；如以身殉學之趙亞會，使生在外邦或會一度出洋留學，則早膺博士之榮銜矣。又有某國女士某，從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葛拉包研究古生物學，在理可得博士，而以中國無此學位，乃返其祖國以取得此學位，此非國家之損失乎？此外研究有特殊成績而無緣得碩士學位者當非少數，除治自然科學者外，治國學有特殊成績者亦大有人在，如羅福裒王靜如之治西夏文，顧劭剛之治古史，蕭一山之治清史，其著例也。凡此諸學者，在外國早得有博士學位矣，在中國則除在大學占一教席外，社會上無所獎勵，則何怪吾國學術之事之落後乎？

教育部所擬博士考試制度，殆取法法國與日本。法國有所謂，大學博士與國家博士之別，日本素來惟國家能給與博士學位，至近年大學始有授博士學位之權。此种從嚴之意甚善，至若干年後，大學研究院程度已提高，學術權威已樹立，再自授博士學位尙不爲晚。惟似宜授已辦研究院之大學以授碩士學位之權，蓋碩士學位本不崇高，初不至於過濫也。

與此相關者另有一事，教部似宜注意；即對於學術界有地位之學者，將如何以獎勵之也。考諸外邦各大學皆有榮譽學位之贈與，凡著名學者或大政治家或於社會有大貢獻者，雖與該大學無淵源，皆得贈與榮譽法學博士文學博士哲學博士科學博士等。教育部令擬重視博士考試，凡未經此試而僅在外國得有博士學位者，不得獨稱爲某科博士。似此輩得有國外最高學位者，尙須經本國博士考試始能得最高之榮名，初意未嘗不善；蓋國人在外邦每有欺騙外人獵得學位者，如某文學博士至以陳衍與陳三立爲一人，即其著例也。然我國學者在國內學術界已有特殊之貢獻而爲斯學之權威者，將謂彼等尙肯應教育部之博士試乎？若不然者，則在外邦尙享有特殊之尊崇者（如胡適，林可勝，李濟，柯劭忞，羅振玉，王寵惠，陳錦濤等）國人乃漠視之乎？又如舊日耆宿，如陳三立，柯劭忞，章炳麟，陳衍，陳曾壽，趙熙，皆吾國文史之光榮；而社會事業家如陳嘉庚，張伯苓不皆國人之模範；亦宜由國家或大學頒以榮譽學位者也。前此在舉國大學不授博士學位時，可不置論；今既試博士，則榮譽學位制亦宜定之也。

抑尤有進者，在外國除榮譽博士外，尙有學士院或國家學會，凡舉爲學士院或某國家學會之會員者，其榮譽尙

在榮譽博士上。如英法德奧俄意諸邦所稱學士院會員 (Member of Academy) 或國家學會會員 (F. R. S.)，其榮譽殆等山中宰相。近年各國又有國家研究評議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則身其間者亦為莫大之光榮。吾國中央研究院之西文名為 Academia Sinica 其義似為學士院，而實際不過中央研究所直轄諸研究所之總稱，在此諸研究所任職諸

學者，未必皆為國人治斯學之最有成績者。則除中央研究院外，尚宜另設中國學士院與中國國家研究評議會，一為學術上之崇德報功之所，一為國家科學研究最高之指導機關，庶能網羅衆彥，發揚國光，其重要又在博士考試之上。至於詳章如何，各國自有先例，可以參訂，毋庸辭贅。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闕謬(續)

嚴仁賡

本文的前半見本刊第六十三期 編者識

五，至若入口貨方面，則機製品入口之增加及機器入口之減少，足為工業衰落之朕象。其理甚明，無須更作進一步之檢討矣。

間內之 827,017,000元，僅合其 $3\frac{1}{4}$ 。出口之運往日本者為日金 823,727,000元，較之一九三〇年同期間內之 38,085,000元，亦僅當其67%九月以後，出口較先月略長，但人口則較前更疲矣。茲列表如下：(單位日金)

六自九一八事變以還，國人激於愛國熱誠，羣以抵制

東北對日貿易

日貨互為砥礪，故以一九三一年對日貿易與一九三〇年者相較，則其總額自日金 687,197,000元突降為 494,3070,000元，於是可見其影響之深。東北三省適當事變之衝。當事變之初發，各地義軍揭竿四起，日偽各軍遍地皆是。轉輾應戰之結果，使農工商各業咸難維持，貿易之衰落亦事實所必然。對日貿易則自萬寶山事變發生後，受抵貨之影響，已顯動搖，遭此更難支持。計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八月東北日貨進口為日金 8,485,000元，較之一九三〇年同期

1931	一月至八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對日輸出	26,727,000	2,567,000	2,340,000	2,508,000	
日貨輸入	8,485,000	1,199,000	1,149,000	929,000	
1930					
對日輸出	38,058,000				
日貨輸入	27,010,000				

且一九三〇年爲世界經濟極端蕭條之年。舉世貿易衰落，吾國自亦不能不受其影響。一九三一年承前二年凋敝之餘，不惟毫無起色，抑且每况愈下。其年世界各大國之出口值，較一九二〇年減少12%至60%，入口亦減13%至47%。全年平均，世界貿易總額，較一九三〇年減21%中國處此逆境對外貿易已感跬步難行，內復天災人禍，層出不窮。維持現狀已屬勢所不能，何能更有進展。益以東北處此非常時期，貿易亦呈異狀。今日人以一九三一年爲基年用，爲測視並比較一九三二年東北貿易之狀況，其準確之程度不問可知，吾人詎可據之以爲可靠之論據哉？

七，至於輪船之舶於大連者之增加要亦不外由於上述各理由。且歐美船隻之舶於大連者，爲數僅52艘，較之一九三一年僅增13艘。其所增18艘之中，日船爲26艘，即占其64%以上，是更可以不言自明矣。

八，次則關於海關稅收，亦以日金匯價漲落無定，而使其數額不確。今再以日人所舉一九三一年及一九三二年大連海關收入之日金數，折爲美金，則一九三一年者應爲美金4,493,400元，一九三二年者應爲5,728,500元，僅較前增27%。去歲金價大落，故實際增加尙不及此。所謂「增加一倍有餘」一語，復可以不攻自破矣。再則日本新

聞聯合社，曾於去歲（一九三二）八月間發表所謂「關東租借地政府編製之統計報告」，內稱去歲上半年大連海關稅收大見增加一節。財長宋子文氏對之，曾有下列之談話：『該關之稅收，若以銀位論則已低減。據總稅務司報告本年（一九三二）自一月一日至六月二十五日，即在日本去攫取大連海關以前，其稅收之總額，爲關平銀6,628,218.77兩。若以滿六個月計算之，其總收入當在關平銀5,812,000兩之譜。比較數之去歲上半年之稅收，實減收2,716,000兩之譜。因去歲上半年大連稅收總額爲關平銀7,062,730.1兩也。而日本報告中，乃用日金計算，表示稅收之增進。實則該關之稅收，毫無增加，而徒令人駭悉日金價格之大落：』（銀行週報第七六五號）

綜觀前述各點，可知日人所擬之數字，幾無一處可取，亦無一言可信，故吾人可大胆斷曰：「東北各地於一九三二年間，社會秩序紊亂不堪言狀。兵匪遍地，人民倒懸，商業垂殆，農戶斷炊。」如此說法未免稍涉武斷之嫌，茲爲證明前言起見，仍請讀者讀竟下列諸節。無據之言，效力固甚小也。

九，概自東北三省被日人武力強占後，消息隔絕，既

或偶有情報發表，又儘係日人宣傳之資料。故去歲一年間

東北各地之真像，亦僅由少數自日人鐵蹄下逃歸之逸犯口中得之。彼輩大都謂東北各地受日暴力之擾亂，農村經濟已實行破產，商業爲之彫敝，財源爲之枯竭。境內除鐵路沿線駐有日軍嚴爲防範，似稍覺安寧外，其在路線以外各地，即距鐵路數十里之遙，日軍亦不敢前往。因此三省僻遠各縣，現已混亂不堪。吉江兩省除省城外，幾無處無兵，無地無匪。因此播種多違農時，而未耕之田在二分之一以上。其幸而耕種者，亦時受兵匪蹂躪不敢回鄉耕耘。上等之戶，收穫僅供自給，中下之家，立陷凍餒之苦。於是一方面破產無食者人數增加，社會秩序愈難維持；一方面因社會無購買力，銷納洋貨陷於不能。遼寧於表面上似甚平安，實則除鐵路沿線外，隨處皆有義勇軍之踪跡。胡匪乘機滋擾，尤爲巨患。日人僅在各鐵路衝要處深溝高壘，嚴加防禦，決不敢稍越雷池一步，作進攻之準備。遼東一帶各縣，如臨江通化等處，田地多未耕耘。其被義勇軍占領各縣尙能勉強秩序。然經日人羽翼下匪軍入據之城市，人民均逃避一空。商停於市，農輟於野，雖欲勉強生活亦不可得逃也。

二十二年一月三十一日十月份中行月刊載有「遼寧商民苦况」一文，內稱「去歲九一八變局發生，由津輸往棉

布，棉紗，麻，絲製品，洋廣雜貨等類，循例掛賬付款者，當此紊亂局面，賬款無法收回，且不敢緊逼。乃用維持面目，希圖轉機，俾得原璧歸趙。但此種情形，至今並未稍露佳象。收回欠數依然困難，試一統計，當有二三百萬元之鉅。是項損失刻仍在津地市場含蓄中。不過彼此來問，均暗諱「相逼過甚，恐引起市場上巨大風潮」，故隱示互助。交通上貨物運輸瀋津間雖設法可以通行，但因拒絕掛賬慣例，皆存警戒之心。貿易驟形減少。近期内東甯購進核桃仁，較過去數量銳減，即具一端。而銀錢業中心，則多集中大連。再就瀋垣貨物輸向外方觀察，主要之土產貿易如皮張，豬鬃，馬尾等，與津市貿易並未中斷，刻仍有洋商數家，駐城內活動。惟金融奇緊，買賣均趨重現款。近期匯撥，非具有絕大信用不辦。以故除洋商直接設莊收買轉道哈爾濱出口外，華商向外販運較前大減。現當城內一夕數驚緘口噤聲，猶恐不能免禍。其營生稍與前任局涉有聯帶嫌疑者，時加逮捕。最近某貨棧經理，一度鎖被拘，即爲一例。此尙係就現在情形而言，倘日方經濟枷深入中心，華商營業將不堪設想云。」

廿一年六月，國聯調查團赴東北觀察。到瀋數日間，收到人民哀號之函件二千餘封。其他對日人強力有所顧慮

，未敢明言聲訴者，尤難數計。當時顧維鈞氏任該團隨員，偕赴東北。歸述彼方情況謂，東三省半年以來，經濟日益凋敝。瀋陽長春等都市，商業大都歇業，除少數當地商人外，客幫盡已離去。各地愛國同胞紛紛加入義勇軍。一切工商業均無人經營。同胞固受莫大損失，即日商店亦多倒閉。對一般無槍階級之人民，為所欲為，言論機關統由彼輩（日人）操縱，行動自由亦加取締。人民生命概無保障，任意逮捕施刑。學校方面，中等以上學校皆被軍隊占用，小學雖仍上課，但課本盡被改訂云云。

吾人試翻閱九一八事變後之報紙，固無日不載有東北義勇軍與日僞軍混戰之消息。馬占山蘇炳文李杜諸輩，無日不在風雪雷而下指揮軍事，保持寸土，使日僞各軍幾致疲於奔命。混戰停止後，日本更以精銳之師調赴東北期於早日肅清義軍於境外，免生後顧之憂。但事與願違，匪特進攻無效，各地農民更紛紛投効義軍，增厚勢力。南滿路沿途常因義軍之襲擊不能通車，瀋陽且於八月二十九日被義軍攻入，並燬其糧站與飛機廠。北滿諸地戰事尤烈。直至十二月中旬，蘇炳文與馬占山兩將軍始以糧盡彈絕相率忍痛退入俄境，義勇軍之聲勢始稍殺。綜於去歲一年中東北三省固無時無地不在戰事之狀態下也。

去歲八月以後北滿水患嚴重，嫩江及松花江沿岸各地無一處倖免；北至齊齊哈爾，南至吉林，東北三分之一均被災。松花江流域被浸三萬戶，災民二十萬名。中東鐵路交通全部斷絕，貨物運輸尤難，物價陡漲，食糧尤感奇缺，人民生活艱苦已極。

日人既手造僞國，復施愚民政策停辦中學，改變小學課程。曩之用於朝鮮者，復依次施之東北。更訂立鴉片法，實行鴉片公開制度，輸入大宗毒品，以麻醉其人民，消沉其士氣。其於東北三省，儼然目之為殖民地；所謂滿洲國者，不過「一羣日本文武官吏，圖謀組織，並實施此項運動，以為解決九月十八日以後滿洲局面之辦法」而已（語出「國聯調查團報告書摘要」第六章）。

以上所舉皆係根據中國方面可靠來源所得之消息而云，頗足示一九三二年東北情況之崖略。其他關於日人在東北之獸行，如九月十六日在撫順平頂山屠殺農民三千人等類事，更書不勝書。

此外日本及歐美各國之報章雜誌，所載去歲東北之實況，與前文所述均無甚出入。茲為避免煩贅起見，僅擇其較要者一二列下，讀者可自為參攷。更可以之証以上所言

之不誣矣：

日本方面：

1, 「藏前工業會誌」一九三二年八月號，載有前日本駐俄大使田中都吉氏發表「我所見的滿洲」一文。譯文見同年八月十四至十五日大公報。

2, 「協和」雜誌一九三二年十月號卷頭語。譯文見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大公報。

3, 「改造」雜誌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號，載有矢田原忠雄氏所著「滿洲見聞錄」一文。譯文見同年十月二十九日大公報。

歐美方面：

1, 美人主編之密勒氏評論週報 (China Weekly Review) 於去歲一年間，恒繼續不斷登載其哈埠通訊員報告東北情狀。關於其政治之腐劣，軍事之延久，農業之荒蕪，商業之蕭條，日人之暴行，羣醜之劣跡等，敘述綦詳，於北滿一帶之情形，更爲深切之刻畫。

2, 英國 "Manchester Guardian" 週報第二十七卷第二十二期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載有「入冬之滿洲」(Facing Winter in Manchuria) 之通訊

一，述東北於去歲一年間局勢之混亂及人民生活慘苦之情形，有如目睹，並申述形將入冬之東北，其情形更將不堪設想。該文末謂「不過嚴冬反能解決北滿問題之一部，蓋經此，則人民多凍餒而死」，實傷心慘目之語也。

自中西及日本方面所得東北情況之一與如此。因彼此所述，皆不約而同，故可斷爲確實可靠。是以東北各省在一九三二年一年間，秩序紊亂，兵匪遍地，農民不得施耘，買人不得操業，鐵路時遭襲擊，營業頗受影響，人民難以謀食，購買力大形減落。至於日人所謂「一年以來和平秩序日趨穩定，交通日見進步，人民之購買力日增，工商業亦日臻興盛。…」等語，直自欺欺人掩飾醜態之談。事實擺在人人面前，固不容任何人輕蔑之也。

十，總之，日人斯文之作，其用意殆欲掩盡世人之耳目，以爲更進一步侵略之進階。依上文所論，一九三二年東北之對外貿易，理應有長足之進展，而實際並無若何進展；既或略有進展，亦較應有之進展不逮遠甚。

按東北一隅，實吾國之寶藏。每年對外貿易總額，約佔全國四分之一海關稅收計關平銀二千數百萬兩，佔全國海關總收入15%以上。就中尤以大連一港爲最要，貿易額

佔東北三省之66%，稅收亦佔其半數以上。在全國各港中之地位上，僅列於上海之次。更因東北發展極速，其對外貿易，亦因之逐年累增無已，今後貿易之旺盛，自亦意中事也。

海關，停匯稅款於中央。國外貿易遂受重大打擊，不能依序發展。日人此種海關貿易之報告，完全為宣傳之作，以誇耀於不知遠東情勢之西人而已。設識者詳為分析指摘，真相不難自明也。

溯自九一八事發，日人武力攫奪東北，強方接收其各

七月廿二日完稿

本刊前二期要目

第六十二號

這一星期
論妥協並答天津益世報
再論銀協定
智識份子下鄉難
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批評
讀「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後

蔣廷黻

守愚

吳景超

周炳琳

黃平凡

第六十三號

這一星期
中國應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君達）
政府與娛樂（廷黻）
經濟建設與技術合作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
關謬
中國長城作用之恢復 William Martin 著

君達

嚴仁廣

劉學濬譯

平明雜誌

第二卷第十六期
第八十期
六月十六日出版

世界經濟會議的失敗
蘇聯遠東政策之方向的轉變
四強公約分析及其評價
國際紡業恐慌與中國紗廠
中英貿易的縱橫斷
回教統一運動
英國社會運動的轉變（續完）
世界論壇二則

小田

肇章 含銘 因給 郝戈 止蘭 兆平 孟連

漫讀三則
北平文藝界不景氣的原因

太陽禮讚
嘉德橋的市長

出版發行處

價目

北平西長安街大柵欄
半月一冊每冊二角三月一元一角
半年二元全年三元八角郵費在外

郭垣等
蕭然
高素
熊式

北農叢書

日本法西斯運動

日本法西斯運動，邇年來殆呈舉國若狂之狀態。此書共分五章，首為概觀，次述歷史，次陣營展望，次各團政策，最後詳論中心活躍之各人物。讀此一冊，於日本政情，瞭如指掌，而暴日何以強佔我東北，亦思過半矣。全書二百餘頁，用上等道林紙精印

總發行所：北平宣外大街北平晨報社 代售處：本市及外埠各書店

每冊七角。外埠加寄費七分，郵票代洋八十一分。

北平晨報
大張每日
市每月一元
外埠每月一元三角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業已售完。現在第二十六期至五十期亦存書無多，欲購從速。特價如下：

甲種 二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元二角 郵費八分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第十卷 第三十二期 國聞周報

要目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章 鍋山 親進

日本左翼運動小資產階級之氾濫.....劉 階 平

最近我國市場之煤油戰.....勝 歷 滄

捷古人斯長貝尼斯傳.....外交 部 譯

赤區中男女的關係.....沈 從 文

國聯宣布否認「滿洲國」辦法.....

記丁玲女士(四).....

對國文諸君之研究大貢獻

本社所創造之「活葉國文」，純用中國紙料，延聘專家，加以精校，加以詳註。其苦心孤詣，裨益讀者；為他家所不及，更他家所未有。故發行以來，為時將及三載，而銷售逾數萬萬紙。受讀者之歡迎，可謂盛哉！蓋以本社之「活葉國文」，根據必求善本，校對必求精審，註釋必求詳明。雖至印刷，墨色，以及紙張，亦未嘗不三致意焉。用功既深，故收名也遠。

舊日總集，過於繁重；現今教科，過於板滯。究不如「活葉國文」，選擇隨意，購買最輕。彼此無牽連之苦，篇幅有自由之便。年久之班次，為用不窮；速成之班次，不致積壓；不定期之講授，尤覺有左右逢源之樂。有志國學之士，盍與乎來！

備有目錄 函索即寄

北平君中書社發行

社址 西單游藝商場

黃河的警告

詠電

關於民族復興的一個問題

希聲

高中畢業生國文程度一斑

佩弦

聽聽人家罵我們的話

君達

還是心理與人的問題（歐洲通信）

閔仁

寄售及代定處

鎮江	南京	上海	天津	平四	北平
鎮江書局	中央書局	新華書局	大華書局	天津書局	東安市場
樓書局	鐘山書局	新華書局	華英書局	華英書局	景華書社
江書店	大華書局	新華書局	華英書局	華英書局	佩文齋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張記書
天一書局	天一書局	天一書局	天一書局	天一書局	張記書
花牌中	花牌中	花牌中	花牌中	花牌中	張記書

獨立評論

第六十五號

日七廿月八年二十二國民

每期定價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
 郵費一元六角；半
 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
 郵票（一角以下爲
 限）代洋九五折。

衡州	廣州	汕頭	廈門	福州	杭州	寧波	上海	天津	北平	濟南	青島	威海	煙台	濰縣	臨沂	徐州	開明書局	現代書局	真美書局	金城
衡州書局	廣州書局	汕頭書局	廈門書局	福州書局	杭州書局	寧波書局	上海書局	天津書局	北平書局	濟南書局	青島書局	威海書局	煙台書局	濰縣書局	臨沂書局	徐州書局	開明書局	現代書局	真美書局	金城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代定）

黃河的警告

二

詠霓

治河從古以來是中國最大的問題。黃河問題的重要，在古代更爲注意，到近代而不及從前的重視。因爲從前南北交通全靠河道，水利或水害之外，還有漕運的影響。所以從前政府莫不以治河爲全國第一大事，每年都要費幾百萬兩做治河的經費。近代有海運及鐵道交通的利便，黃河只要，不發大水災，幾乎無人注意。近代這種輕視黃河的心理，與從前特別重視的精神，恰相反對。這種心理確有事實的證明，例如河北水利委員會至少在幾年以前曾經花了不少的經費，至今還在繼續工作。淮河水利自建都南京之後，更被重視，正在籌備巨款，極力進行。所以重視的原因，在河北是因爲關係天津的商埠，在淮河亦因爲希望可以開闢許多田地，增加許多收入。黃河呢，也曾設立了一個名義上的委員會，至今尙未正式成立。更從未費錢做了什麼工作。

因此我們對於黃河的知識也遠不及他河的完全。河北水利委員會對於河北五河，導淮委員會對於淮泗諸河，揚子江水道整理委員會對於長江，都會經或方在測量研究。他們的坡度流量流速砂量等等都已有相當的紀錄。只有黃

河——中國有史以來最被重視的黃河——反至今不大有人理會！一切水文紀錄都不及上述諸河之比較略有根據。

這種短視的政策，政府與國民都不能覺悟，只有等黃河自身起來喚起他們的注意。民國以來黃河總算安靜。雖然河北山東之間也曾經遭着好幾次不狠小的水災，但究竟只關一地的民生，沒有牽動全盤的國計，所以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今年黃河乃稍稍表現一下他的威力。

今年黃河水災的地方雖然尙未經有人具體報告，但就報紙上的消息綜核起來，也大致可以知道。最上流被水的尙在平汝路綫以西，在武陟以南，鞏縣以北，溫縣紀水一帶，河水漫溢約佔七八百平方公里。但這還不過是局部的水災，天氣一晴，水也就退下去了。最足使人驚心的便是平漢路的黃河鐵橋，因黃河水漲流急，河底衝刷力大，橋柱基礎多被衝刷，這便要影響南北的交通，一般人們不能不注意了。自此以下，河在蘭封附近決了口，水向南流。如果水量足大，狠可以從此由惠濟河，流入渦河，合於淮河，如果實現，則黃淮又要合流，豫皖之間有水災，而蚌埠一帶更將大受影響了。幸而這一股水並不甚大，不過稍來一

一下，提醒我們記得黃河由此南下的可能，事實上却並未實現。再下去便到河北山東之間，沿河二旁南北均決，十足表現出黃河南征北伐左右咸宜之威勢。此次成災之大在此，將來更大的危險似乎亦在於此。

長垣濮州之間向來是黃河容易潰決的地帶，民國以來已有好幾次水災，這次也潰決了幾處，證明黃河狠有從此處更爲北遷的可能。如果黃河由此北遷，他有好幾條路可走。他可以從濮陽內河流入衛河，也可以直接流入運河，如此便可以直灌天津。天津的海河，有一條泥沙太多的永定河，已經受不了，黃河的水量砂量比永定河大二十五倍，那末海河整個堵塞，天津的商埠一定從此毀了。但黃河北決也可以流入徒駭，馬頰，捷地等直接入海的河道，那還只成局部的水災，而不至毀壞華北的大局。

另一方面，這次黃河又在東明一帶向南決口。溢出的水量比北決的更多。所以山東西部以及河南東邊如東明考誠荷澤鄆城定陶城武曹縣單縣一帶都成爲水災最大的區域。單這一塊面積至少有五千平方公里。這一片水一方面流入虞城碭山咸豐五年以前的黃河故道，又一方面流向山東的運河，恰巧有獨山微山諸湖可以承受。如果水勢真大的

話，這二股水都向徐州瀕流，那末隴海路與津浦路都不免大受影響，東西及南北的鐵道交通都可以爲此中斷。如果真的再往南流，最方便的是循運河南下，第一步導淮，第二步入江。現在導淮的計劃很多主張導淮入江，很有替黃河做先鋒的危險。如果真的黃河流入長江，不但蘇皖之間水災加重，而且在長江四萬萬噸泥沙之上再加上黃河的大量的沉澱，長江下流不久也要淤積壅積，中國中部的繁榮也就大受影響了。幸而這一次黃河發水時間已晚，所以不過是一種警告，叫我們想到這種種的可能，但却並不至就此實現。

但是以上種種往南或往北改道的可能性確是很大的。黃河在西歷紀元前七世紀以前經過濬縣滑縣，直往北流，貫通大陸澤或寧晉泊，由天津附近入海。後由濬縣西南決口，約循今之衛河及南運河而至天津。紀元前第七世紀周定王時河向東遷，但仍由天津入海。到西歷紀元之初王莽時代，河決魏郡，從滑縣東走，約循今之徒駭河，至利津入海。以上幾次遷移都是從西北而移向東南，所以黃河出海之處常由北向南移動，最古時據說是在天津之北（確否待考），次之即東周嬴秦及西漢時代河口在天津，幾經遷移到王莽時河口乃在利津，與現在的河口地位差不多了。但

是這條路還是並不穩固，幸虧東漢王景自滎陽至海千餘里修築築隄，治理得法，勉強保全到十一世紀，歷時一千年，總算是很好的成績了。十一世紀中葉即北宋仁宗時代，黃河又改道向北，分爲二股，一股由運河回到天津，又一股循馬頰河入海。但這北遷時代比較是短的，暫時的，常常有向南潰決的事情。到十二世紀末葉即金章宗亦即南宋光宗時代，他便又向南移。當時河決陽武，從開封過曹州直到當時的梁山泊（即鄆城以東之水泊，爲以前河水南侵所成）。從此分爲二股。一股合濟水入海，與今道同，這在當時爲北河，其實已較以前諸道南遷得多了。又一股更向南流，循連河而入淮河。這在當時爲南河。這一次變遷在水道歷史上確是極重大的事情。本來河濟淮江是古代中國的四瀆，瀆者獨也，就是獨立入海的意思。這一次濟淮二水都被黃河所奪，都失了獨立性，而且連河貫通長江，河既入淮，連長江都受他的威脅了。此後黃河還是不斷的表現他的南侵的趨勢。沿河的人也只得因勢利導，所以到十三世紀末葉即元世祖時代，黃河又改從蘭封東流，經過徐州入淮。到了明朝北河遂絕，祇剩南河，這便是現在許多地圖上所畫的黃河故道，亦曰舊黃河。黃河故道甚多，何以地圖上不畫別的改道而獨留這一道呢？因爲這是最末

一次的故道，而且中國地圖都是抄襲十八世紀即康熙乾隆朝的舊圖，在那做圖時黃河確還走那故道，所以圖上都有此線。以後經過咸豐五年（即一八五五年）河決銅瓦廂，方始走入現在的河道，畫地圖的人也就把康乾時代的故道直抄下來了。

從以上所說的歷史看來。黃河改道的趨向是向南的多，向北的少。由南向北的大徙移只有二次。一是北宋時代，只經過一百四五十年，便又極力向南徙移。其二便是咸豐五年的北徙。到現在還不過七十八年。其他都是由北向南的徙移都，是歷時更久。這種趨勢。在歷史上看來很爲明白，向來似乎不大有有人注意，這是值得提出來供水利家參考的。因爲現在華北及淮河長江許多水利機關治水的計劃，都是照現在的流量砂量做根據，因而算定應說疏濬或修治到如何程度，他們都沒有預備黃河改道來加入他的水量和砂量。但是事實上黃河北侵海河流域或南侵淮河流域的可能性一點不是理想的，所以對於他的徙移方向的推測，便很有實用意義的了。

這種推測當然不能專靠這一些歷史指示。但是關於黃河本身的水文紀錄，地形測量真是缺乏得可憐。黃河在濟南的水量平常大水時據說不過每秒七八千立方公尺，特

別年份也曾經到過一萬立方公尺。今年這次大水據說在陝州流量多至一萬四千餘公尺。這在流域六十萬方哩的大河也不爲甚多。長江漢口流量，便有五萬立方公尺以上。黃河的特性是他的泥沙特別的多。黃河水雖不多，但他的全年流下來的砂量比長江的全年砂量，只多不少，都是四萬幾千萬噸。這巨量的泥沙大部份是夏秋大水沖下，到了平原大部份都要在地面上沉澱。沉在河床以內，他便將河道愈填愈高，無論隄防如何堅固終有一天要被他的潰決。潰決之後，濃厚像泥漿似的水流一處一處的淹漫過去，田地廬舍都要被他埋沒。久而久之，黃河所經的地方，終要高出其他地方，一遇機會他便又要遷移了。雖然他的北遷或南遷在一定時代內似乎略有一些趨勢可尋，但是潰決的方向既是兩可，專防一方他便可改向他方，所以元明勤於北隄他便向南，明清注意南道他又改北了。不過每次大徙移也不是完全突然其來的，細細看來似乎很可找出他的最近趨向，這也可說是對於治水的人們一種自然警告，這是很值得注意的。現在有水文地形種種材料可做參考，這種研究更是必要及有用了。

治河的方法古代既有許多成法，現代雖然太不注意，大約水利專門人材也總有不少方案，詳細研究自當期之專

家。姑就粗淺的地理觀察來看，似乎可將問題分作三大部份。第一是黃河本身問題。黃河頂活動的部份也不過是從汜水到東阿一段，長約三百五十公里。應該在南北二岸修分水渠以分水勢及砂量，並以溉田，築極堅固的隄岸以防潰決，並且可將淇水丹水等清流在相當地點引入黃河以助衝刷泥沙力量，如此則這一段似乎可以保全。第二是山東的汶泗諸水以及連河往攪擾黃河下流而助其爲害。似乎很可以因利乘便濬深並開寬運河，與若河匯通處設閘善爲節制，一方面容納衆流并以助黃河泥沙的洗刷，又一方面即以恢復南北水運，即在近代經濟上亦是極有益的。第三是濟南以下的河道，也只有修渠築隄善爲防範而已。因爲華北及江淮流域兩方面實在都不歡迎黃河的改道，所以我們還是希望黃河仍走現在河道的好。咸豐五年到今還不過七十八年，大約地形狀況還不至於非改道不可。瓊代如有王景，還可再見漢唐的安靜景象。所以黃河雖已警告我們他的改道的可能，我們還應該想法留住他不要搗亂纔好。

二二，八，二〇 北平

關於民族復興的一個問題

希 聲

記得那是十七年的夏天吧？中山大學放了暑假我同一位德國朋友從廣州北返。他要去遊那「六代興亡國」的南京，這當然是他受了中國詩的鼓動。我那時也未去過，自然就同意了。我們住在當時頂時髦的西成旅社。白天出去弔古，晚上回來喂蚊子。一直住了四天，他可再也住不下去了。原因不過爲此：河溝的水他不敢喝，旅館的飯他不敢吃，而最沒有辦法的是，旅館的毛廁他不能用。這不免使我笑他們的近代文化把人弄的不濟了。但等著罷，他會使你驚奇。一天下大雨，因爲幾日就想洗澡，他于是乎站在簷溜底下，來個天然的冷水浴。這雖未櫛風，而實在沐雨了。他雖習慣於近代衛生的設備，難得的是，他并未失掉初民時代的強健與精神。比之我們先失掉初民的蠻勁兒，生活尚未進到近代化的何如？也算是難得了罷！

晚上坐在只有尿管并無清風的天井中，我們談起中國詩，他給了一個最後的批評，是讀中國詩總覺得「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當時真真的驚了一跳，至今這印象還頂深。不錯，中國的一切一切，都帶着衰老的氣息風——燭殘年的衰老！

這裏引起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現在大家所希望的民族復興，到底可能不可能。在生物學上講，一種有機體到衰老了，是不會還童的。民族呢？雖在它的生育與發展上，有些類似有機體；但它到底只是有機體的集體，而本身不是有機體。況它生命的延續，全在新生物與舊生物的代謝。假使我們相信環境對於生物影響的重要，則每一期新陳代謝之間，都有一個復興的希望。那就是說：以新環境來造成新生命。如是則問題也就不在民族復興的可能與不可能，而在于能不能造成民族復興的新環境了。

假使這個民族，在物質環境方面，弄的它營養不足，它的身體就會日趨于衰老。而在精神環境方面，又多束縛于不適用於生物發展的，種種初民時代道德觀念的遺囑，當然也會把它的有新生命的後嗣，弄的少年老成。于是人未長成，而精神已先衰老了。在這種環境中生生相授，總使民族復興的口號吶喊得再響，而民族復興的希望也去得更遠。

物質環境的改造，無疑的得由經濟改造作起，這不能不有賴于政治之努力，而精神環境的改造，却大部份是思

想界與文學藝術的責任。誠然，在一個「窮斯濫矣」的物質環境中，還講不到精神環境，更何有於改造。也如一個衰弱的身體講不到精神的健康是一樣。不過，話又說回來，人民在精神長此的頹唐衰弱下去，他根本就沒有信念與志願去戰勝天然及外侮，那裡還講得到物質的建設！總使其飽食終日，也不過養得胖胖的像個填鴨，蹣不到二步就蹲在地上不動了，噪什麼民族復興呢！

所謂精神環境，並沒有什麼深高的義意。只不過去掉那些妨礙人生發展的古生物遺說，把人生看得平常點，讓它在不違背生物原理的道路上，必然的向前生長。簡單的說，也就是個較健全的人生觀念。

記得幼時有一次放學回家，在路上碰到另一羣小朋友攔住了去路，一個紫黑臉，生力充足的小子挺身出來挑戰，其餘的在後面吶喊。我記起家訓與校訓，只好低下頭繞路向前走。誰知不行，他們吶喊趕上來，還雜以笑罵。怒，也許是生物可貴的性能吧？我一怒就把一切的「訓都給忘掉了，記起來我那時讀了最得意的武松鴛鴦腳。于是我撒步作個跑勢，那紫黑臉小子一頭撞過來，我回身享他一脚。那知再抬第二腳時踢個空，我就摔在平地，那小子也蹲在那裏捧了肚子叫媽媽。而那一般烏眼雞似的觀衆

可滿了意，也就一哄而散了。這事本來就算完結，誰曉得竟會有人報告我的父親，說我在外打架。這打架二字的罪狀，會氣得我的父親不問理由就要懲罰。幸而那次又是祖母保駕，我藏在祖母背後半天不敢探頭。不過奇怪的是，我記得很清楚，在吃晚飯時，我的父親酒吃到有些陶然之後，他自己笑了。他笑着對我的母親說：「這孩子不弱，只那一跤跌的丟臉。」

是的，我相信人不會為有自衛能力得罪父親的。高興的是本性，不高興的是這及老民族積弱的一種習慣，這習慣要你斯文，要你少年老成。要你戒之在門。這習慣會積漸養成個唾面自乾的民族，對外不抵抗的民族，就使會生氣，也是無精打彩的不得生，而且又健忘。一般衰老的象徵！

不，這還不算民族的致命傷。與此相類而更根本使民族衰弱的，是一般的才子佳人觀念。這觀念的根抵太深，至今還不能斬除淨盡。

提起才子，便會使人想到臉白得沒有血色，腰弓的像隻青蝦，活是一幅多愁多病身。最好是能寫幾句白話詩表示多愁，會吐幾口血表示多病。這樣才得到佳人的愛憐。佳人呢？不用說是嬌小玲瓏，弱不勝衣了。還得加上點病態

譬如說，不爲什麼就會發愁；一陣心酸就會掉淚。這樣也才能得到才子的傾倒。這些在舊戲中的小生小旦，舊小說裏的公子小姐，還正在給社會不少的榜樣！

大家以爲這種觀念已經過去了嗎？我有點懷疑，我認識幾位朋友，他們擇配很嚴，但是擇來擇去，最後愛上的總是癆病胎子！恐怕在下意識中這種民族性太深了罷？連自己都不知道。

這問題看去似不重要，其實它根本能影響一個民族的強弱。就因爲：沒有一個女子不願意作男子理想中的女人，也沒有一個男子不願意作女子理想中的男人，無論是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也不管肯承認與不肯承認，事實只是如此，至少是在年青的時候。

如果女子喜歡才子，則國家必多病夫；男子喜歡佳人，則國家必多病女。如此多病的民族，復興的希望也就微乎其微了。

講到復興，中國民族有古時，却是有點蠻勁的。只看古人稱贊男子，不曰『有力如虎』，便曰『孔武有力』。即稱贊女子，也是不曰『碩人其頤』，便曰『辰彼碩女』。『子南戎服超乘，可得美婦；曹交九尺四寸，自慚食粟。直到漢魏時候，東方朔上書，自誇長九尺三寸。魏文

帝在他的典論裏也自詡八歲能騎射及與鄧展比劍一事，可見那時的才子也還不是病夫。及至何晏顧影，沈約多病，瓊樹玉山，南朝風雅，這風氣方轉變了。而這民族從此也就衰弱下去，對外族侵略毫無抵抗能力，只伸着好頭頸讓旁人來砍罷了，其唯一征服外族的方法，是讓他們入居中土，同受腐化。及至他們中聰明點的都變成才子佳人，他們也就完事一椿，不足有爲了。

要民族復興，雖得有點生勁，這盤大機器才發動起來。男子雖不能上馬殺賊，下馬草檄，也不要弄的翩翩然像深秋黃葉一般，經不起一陣風霜，那裏還講得到執干戈以衛社稷？女子總不能投杼從征，也不要弄成個病西施。那也許好看點，但如此江山，誰又有多少工夫看。

我們並不要什麼軍國主義，只不要病國民主義就算得。大家本不妨弄的健全點，只是一念之差，吃了才子佳人的虧。我想一個粗大的男子，不應當在女子跟前自慚形穢，女子也不應當見了他使嚇一大跳。同樣的一個健壯的女子，不應當在男子跟前感覺蹣跚不安，男子也不應當見了她便向後轉。男子並不是專生給女子看的，女子自然也不是專生給男子玩的。色雖是天性，但美醜只是人下的定義。病態也許有一種美，但那只是病態的嗜好。況且生物

的責任，第一得先能自保，第二才是傳種。種且不保，傳於何有？其實，人生在男女之間，本可成立一種健全的美感；男女之外，也還有更要的生存問題。這只是一個頂自然的人生觀念。而環境移人，小孩子是無成見的。

高中畢業生國文程度一斑

佩弦

本年清華大學入學試驗，平滬兩處參加的共二千二百多人。作者與幾位同事担任看國文試卷中的作文；本人所看的約有四百五十本。看時大家討論，並隨手摘記卷中別字。現在將閱卷後的感想寫出來，也許可以供高中國文教學參考。這裏並不完全是作者個人的意見，但作者願負完全的责任。再則這裏僅僅是一些零碎感想，不是精密統一的結果；那要大規模地做，不是倉卒間所能辦到的。

這回的題目是「苦熱」「曉行」「燈」「路」「夜」，考生只要選作一個，文言文白話均可。但作文言的很少。五題中選「苦熱」的似乎最多，其次是「夜」，其次是「曉行」；選「燈」「路」的最少。這些題的用意在看看考生觀察與描寫的能力。從前我們也出過此議論題，但看起卷來，總是許多照例的泛而不切的話。我們想高中畢業生

今後粗男壯女，會不會代替了將來的才子佳人？那全在社會的觀念改不改。而民族復興中的一個問題，就在這一念上頭。

所知道的也許還不夠發議論，所以變變樣子，給些小題目，讓他們在日常生活裏找點自己的話。但他們大多數還是發照例的議論，自己似乎並沒有話說；做「燈」便說燈有菜油燈，煤油燈，電燈，做「路」便說有路泥路，石子路，油路，其他別無精義。不發議論的也有，却往往只將題目輕輕一點，便成了開去、來一大段不相干的故事或不相干的談話。譬如「夜」罷，就說夜裏想到一件故事，而這故事裏毫無夜的影子。譬如「曉行」罷，就說早晨走到田野間，遇見一個農人，訴了些苦處，嘆息而歸，也全不提道早晨的樣子。自然我們並不妄想人人能做美文，但希望說些切實的話，所謂「言之有物」。至於運用文字，也極少熟練的；幾乎每句都有些不順的句子，加上滿眼的別字。大部分文從字順的，（雖然沒說出甚麼東西）至多怕只有十分之一。

「苦熱」的「苦字」，除了幾本例外，都被當作形容詞看；或解作既苦且熱，或解作苦的熱。北平考生做這個題，總是分兩面立論——「閩人」雖也熱得難受，但可以住洋房，用電扇，吃冰激凌，還可以上青島，北戴河去。「窮人」的熱可「苦」了，洋車夫在烈日炎炎的時候還得拉着車跑；跑得氣喘汗流，坐車的還叫快走，於是乎倒地而死。這一回卷子裏，洋車夫可真死得不少。上海考生做這個題目，也分閩人窮人兩段，但多說到洋車夫氣喘汗流而止，不再說下去。在北平的人到底比在上海的人老實些。但有人說北平的洋車夫確是比上海的苦些；大概也有關係的。做「夜」的也常有分閩人的夜與窮人的夜的。做「曉行」的雖因早晨的鄉間不大會有閩人而拉扯不上去，但也常將農人的窮苦與苛捐雜稅等等發揮一番。

這種恨富憐窮的思想，是這回南北試卷裏的普遍思想。我不說根本思想，因為看出來這並不一定是考生諸君自己真正相信的思想。凡相信一件事，必知道得真，議論得切；但卷子裏只是些人云亦云的門面話，像是那兒檢來似的。有一本卷子文後有小注云：

看見夏丏尊先生所著之文章作法上說，文須從小處描寫；又讀諸雜誌上謂時代漸趨於普羅文學，生遂追時

代潮流效夏先生之語而作此。

第一層並未做到，這本不容易；第二層却一做就做到了。「追時代潮流」這一句話，我想可以說明這回卷子裏大部分恨富憐窮的思想。我們知道這是近年來最流行的思想，「諸雜誌」確是多說的這個。青年人誰不怕落伍？怕便非「追」不可。這個思想自然不止於恨富憐窮，但他們並不想真個見諸行事，所以只要得其大意，便於談說，就成。見諸他們行事的，怕還是別種思想，那是在他們家庭裡社會裡多少年培養起來的。那才是他們的基本思想。那種思想固然也可轉變，但單是雜誌卻沒有這麼大力量。所以就卷子論卷子，我們不禁想到這種恨富憐窮也不過一種洋八股而已。看見來大部分的考生似乎是既不自已張開眼看，也不自已按下心想的。而他們都是高中畢業生。因此我們不能不疑惑高中的教師真個盡了他們的責任。

教學生能自己觀察，自己思想，本來很難。上講堂東引一個文學家，西引一個文學家，這兒檢點兒，那兒添點兒，可以說得天花亂墜。學生也樂意聽。可是東風過耳，聽完了除了幾句口頭禪，還有什麼留着？理想的教師不但想到學生的耳朵，還想到他們的腦子。他得先將自己所要講的仔細想過，再和學生認真討論，即使面紅耳赤也無妨

也得讓學生認真多讀書，養成他們自己的判斷力。無論精讀泛覽，要讀要覽才有用；一紙書目，雖天花樣翻新，只是裝修門面罷了。精讀更須讓學生一字一句不放鬆，在可能範圍內，務必得其確解。「讀書不求甚解」一句話，照字面講，最易誤人，尤其是青年學生。這回卷子裏有「陋巷小胡同」「風所流的才子」等話，都是向來不求甚解，才至於此。

現在青年學生的通病是大而化之，不拘小節。他們專講興趣而恨訓練；看國文教師只是新思潮的販子，所有的新思潮他都得來一手兒。國文教師為供給這種需要，也便到處張羅，專心對付；樂得些不看筆記，不改作文，只天上講堂去開開話匣子。大家彷彿都覺得不通的文字不要緊，寫別字不要緊，張冠李戴不要緊，指鹿為馬不要緊；其實他們也並非真個甘心如此，只是怕麻煩，不上勁兒。「事事等興趣，興趣不常來，來了不常在；只好麻麻糊糊一氣。這回卷子裏像「莫之能也」「亦不覺其以為苦也」「嗅（臭）汗滿流夾（夾）背」「飽嘗足了」等句子不在少處。又作者看的四百五十本中，粗粗計算，有別字六百九十七個，重複的無數。其中因形聲相近而誤的三百零八個，因聲近而誤的一百七十二個，不成形體或增減筆畫的

一百四十五個，因形近而誤的五十九個。有些錯得離奇：如「旗袍」作「妓袍」，「蚊子」作「蛟子」；又如「吵鬧」作「噪鬧」，是將「吵」誤作「噪」，又將「噪」誤作「噪」；又如「袒裼裸裎」作「坦蒂裸陳」，四個字只對了一個字，「蒂」字是因誤讀「袒裼」的「裼」字，又寫成了聲近的「蒂」字。這都是平時讀書不留意又少練習之故。（又如「苦熱」一文，寫天熱常說攝氏七十度，八十度，直到一百三四十度。這種常識怎麼會錯，都因不肯用心記，只曉得有個某氏寒暑表，以為就夠用了）。

許多人說，現在高中學生的國文程度遠不如二十年前的中學生了。這好像所謂「一代不如一代」，其實不然。先前中學生國文好，是家庭的力量而非學校的力量；那時的國文教師實在無教學法，只照本宣揚，學生不會得益處。現在家庭裏大概都是新人，忙於自己的職業，無暇管這件事；國文教學法雖長足地進步，却又很少人認真實行，學生程度當然就差了。但這是有辦法的。中國文字，誠然難學，從前人十年窗下，也只練得這一種手藝；現在學校裏功課多，好像有些來不及。不過教學法既進步，又有文法修辭及詞詮一類書，幫助了解，（新出字辨一書，辨各種別字頗詳，也是有用的工具書。舊書也有這一類，但不

易得）只要教師不將就學生，督促他們實行多看多讀多作；作了不怕改，並且隨時個別地指點，總有功效可見。

聽聽人家罵我們的話

君達

遠東時報—英文科(Far Eastern Review)—是美國人所辦，被日本人收買，專替他們做國際宣傳的。他對於中國當然沒有好意，他的言論當然決非公平。但他們既以為強詞可以奪理，我們也應該聽聽他們是怎樣的說法，也許有幾節可以叫我們觸目驚心。

最近一期的遠東時報內節錄日本人川上所著的『滿洲國，紛爭的產物』英文書內的一章。其中論到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的主要點時，有下列的議論：

『報告書內有下列的一個建議：』

既然下列各條件非有一個強固有力的中央政府不能實現，則適當解決的最後方法便是暫時的國際合作，來實行中國的內部改造。

這幾句話真是黎頓報告內最重要的話。這個條件如不實現，其餘幾十萬了都沒有實際意義。詞句之間已極顯明除非中國能有一個統一的，穩固的，有效的中央政府能夠遵守法律及條約，使得外國政府可以信用，

則黎頓報告書內所建議的中日新約的訂立，滿洲警察的組織，自治滿洲的成立以及日本軍隊的撤退等都是無從談起。其實這個真理用不著像黎頓調查團那班漂亮的外交家，軍事家，政治家和學者辛辛苦苦來發見。日本在二十年前早已知道。但黎頓調查團也能承認此說，當作一件新鮮發見，報告於日內瓦及世界人之前，日本亦覺可以自慰。

但是十九國委員會却並不理會，一跳便判定不管一切只要日本從滿洲撤兵。連黎頓所說撤兵以前要先組織有效警察的話都不理會，撤兵以後的紛亂如何處置都不考慮。那十九位高明的代表先生一定以為日軍一撤，滿洲便可享受和平秩序與幸福。這種太簡單的的思想，黎頓們都不會同意的。

姑且假定國際聯盟會採納黎頓的報告書，願意擔任建設中國的工作，作為解決滿洲問題的第一步，那便怎樣呢。當然，中國決不肯接受日內瓦的幫助，而

且以爲侮辱，如此則黎頓的建議便成爲空中樓閣可望而不可接的了。

但假定中國肯接受這種辦法，中國的確因此改造成功，政治改良，人民安樂，比日本教導的『滿洲國』弄得更好，到那時候『滿洲國』定要自動取消獨立，重新加入中國了。但是中國如此廣大，改造工作究竟不是可以立刻成功，至少必須數年乃至數十年。在此期間，何妨讓日本來訓導滿洲引上近代化的道路。同時中國在國際指導之下如黎頓所建議的也許也有進步。到底那方面進步的快，那到是很有趣的。這種競爭也許可以使雙方更加努力。如果中國競爭得勝，建設成功，我敢說『滿洲國』一定不要日本訓政而回到中國的老家。反之，假使中國常常是繼續紊亂而『滿洲國』則很快的進步，那末中國的四萬萬人也許都願意做溥儀先生的臣民，誰知道呢？

這很可做我們的當頭棒喝。中國人在此時候，再不努力恢復秩序，認真做事，真是毫無心肝了。

同期遠東時報內還有一篇不具名的論文，題爲『滿洲國的獨立地位』。他把首便引用黎頓報告書內講中國內亂和共禍的二段如下：

『現在的中央政府尚須努力爲他的生存奮鬥。有一時表面上算已統一了。但等到幾個大軍閥聯盟成功向南京進攻時，這個表面都不維持了。雖然他們沒有成功，但他們失敗之後仍有不可忽視的潛勢力存在。而且他們從不承認舉兵反抗中央政府是一個叛逆行動。他們不過以爲各派之間一種競爭，由不在中央的一派起來反對偶然在首都而爲外國所承認的其他一派。

.....

他（指共產黨）已成爲國民政府的勁敵。他由他自己的法律軍隊政府和地方。此種情形爲任何國所沒有。

.....

過渡時代不可避免的騷動發生一種輿論的力量，也許要繼續使政府對外政策受其束縛。政府一天不能統一或建設成功，便一天要受這種困難。中國在對外關係上民族主義的能否實現，全看他們在自己內政上是否能盡近代政府應有的責任。除非這二項條件能够做到，國際衝突，抵制外貨以及外國武力干涉的危險還是繼續難免。』

遠東時報便從此大發議論，可想而知，不必再譯。但他還有一段他自己的說法，讀之真覺髮指。摘譯如下。

『南京政府以前靠一個外國（指俄國）的幫助而得到

政權，現在他却在對這個聯合所發生的勢力而努力爲他的自己生存而奮鬥。他自己還沒有站穩，國際聯盟偏要用國際幫助來推廣他的勢力於其他各省。

「滿洲國」何嘗不可爭此征服中國的權利。廣東可以聯合莫斯科，「滿洲國」也很可以聯合日本。但「滿洲國」政府與人民都不願意向國際承認的南京政府爭長城以內的治權。「滿洲國」只願在自己範圍內獨立，而從這個「反抗中央不算叛逆」的亂國脫離出來。

「滿洲國」也不能算是叛逆，但是與南京政府平等。因爲南京政府本來沒有統一各省，所以「滿洲國」獨立也不是叛逆。

滿洲舊軍閥與南京所訂的協定並不能對「滿洲國」的政

還是心理與人的問題（歐洲通信）

閔仁

府及人民有效，而使他們承認南京的主權。這是兩個軍閥間分地的私約，並未得到滿洲人民的允許。……而南京的代表却在日內瓦要求國聯，華盛頓條約的九國，凱洛克條約的各國甚至于全世界都起來以實力擁護這種私約，而壓服向來對南京獨立和南京平等的滿洲。

這種替「滿洲國」辯護的話，真是理屈詞窮，醜到極點，維費盡筆墨，我們可以斷定沒有一個對他表同情的人。但是罵我們中國的不統一和假統一，却不能不使我們想想。誰叫我們的軍人和黨人，此疆彼界，不顧大局，只爭私利呢？



在獨立評論第三十九號上，叔永先生有篇『評國聯教

育考察團報告』一文，讀之甚爲敬佩。惟關於報告書第二章的討論似乎尚有商酌的餘地。茲謹就『蠹測』所及，用政高明，並順便試談一點對於中國改造問題的『管見』。

考察團云：『此輩（中國的）教育家，恒持一種理論

，謂今日之歐美，實爲近代科學發展之結果；故中國僅須采各國在科學上與專門技術上之設備，其文化程度，即可與歐美並駕齊驅。……吾人恒謂此種理論爲一種荒謬的主張。近代之科學與專門技術，並不會產生現代之歐美；反之，歐美人之心理，實產生近代科

學與專門技術，並使其達到今日優越之程度』（國立編譯館譯文）

叔永先生評論道：『此種雞與雞蛋先後產生的爭論，似乎使我們大大的失望。如其近代歐美的文明，不是由科學得來；反之，近代的科學，是由歐美人的特殊心理發生，那末我們提倡科學的主張，還有實現的可能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固然不能如某教育家的主張，說歐美的科學，只靠各種專門技術上的一切設備，却也不能說只有歐美人的心理能發生科學，配研究科學。科學的種子，萌芽在西方，但牠能培養移植於世界任何處所，只要有適宜的土地與養料就行了。我國自來沒有科學，可以證明我們沒有科學的種子，但不能證明我們沒有適宜於科學的土地與養料。考察團的這一個說法，使我們明白土地與養料的重要，格外留心去培養，却不能使我們認為科學與我們無緣，聽其失敗，放棄。這是們們應該明白的。（頁二〇）』

讀完這兩段文章以後，我們劈頭應當發生一問題，即：什麼是歐美人的特殊心理？所謂心理者是何所指？如果這問題不先加剖析，恐對於考察團的好意，不免多少有些誤會，或者至於有負厚誼與高情。『心理』本是一個大名詞

，內容當然複雜得狠。在這撲朔迷離中，我們可以舉出牠的這樣這樣，同時也可以指出牠的那樣那樣。不過稍稍玩味考察團本文的語意，再輔證以高鼻子他書相類的說法，似乎是指對於人生的態度，對於自然的態度，或者是指某幾種他們所通有對於治學行事作人的態度（本文特別注意此點以與叔永先生討論）。反之，牠似乎完全不是指他們天賦的聰明或特殊的能力。倘若我的解說不錯，則考察團的說法，狠有若干的真理存在。爲什麼呢？且看下回分解。

據研究差異心理的人告訴我們說，種族間的差異，遠不及個人間差異之大。這種淺明的事實，作教育考察的學者，諒不至於不知而陷於俗見的謬誤。所以這點用不着討論，我們也用不着驚疑。實際上只消拿國人留學歐美實際工作者——許多無根底無誠意甚至醉生夢死者除外——的成績來一比，即足證實國人的智力，並不亞於白種。所差者是環境不同，設備不同，教育不同，方法不同而已。不過智力雖在『伯仲之間』，然如何用法，如何發展，則大相逕庭。以個人的觀察所及，普通的中國人，大都在小的地方使用聰明：例如玩點小手段，搗點小鬼；說話不負責，做事更不負責。腦袋油滑，靈活似猴；日觀四面，耳聽八方。只要有機可投，便投；只要有腳可縮，便縮。便宜專會

檢，行爲複雜萬分。對人慣習說謊以應付，做面子以敷衍。表是表，裏是裏。你以詐來，我以僞往，相習成風，恬不爲怪。這種情形官場中更是顯著。

一般西方人不然。他們比較老實，比較簡單，比較直率，比較認真，比較負責。說幹就真幹，說不幹就真不幹。一是一，二是二，乾乾脆脆，爽快快快；做錯了直認，少有抵死不招而扯謊。權利義務分得清，直直正正地作人。他們不取巧，他們也真笨。據說德國人走路可以轉直角，別人叫他做「方頭」，然而方頭的成績却名聞「天下」。他們做什麼的就做什麼：畢生一事，不亂想，不改性，不心多亂廢，不愛隨使適應環境，更不會「暮楚」而可以「朝秦」。簡單一句話，他們的社會好似一座磚樓，由許多固定的方塊組成；中國的好像一羣阿米巴，亂糟糟的小東西，忽然這樣變，忽然那樣轉。不過他們雖然少行小鬼小智，雖然少用許多心思來對人，却用了不少的智慧來對事。結果其事往往正如周易卦象的象辭：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在積小時誠然別人也照例不注意，然而到了高大時，却便不愁沒有人來讚美，豔羨，仿效與追隨。這本是人之恒情

，毫無足怪。社會本是只看結果，不問原因的。不過如果要問原因，那種「愚不可及」，那種「百折不回」，那種「揠着梅子樹不換肩」的恒心和毅力，便是其中很重要者之一。

恒毅二字在我國，雖然不是一枚新鮮奪目的名詞，却是一生成功必不可少的原素。孔老夫子說得好：「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中庸也似乎說得對：「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又說：「君子之道，闇然而日彰；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又對子夏道：「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如果不嫌囁嚅，還可以加上左氏的「貞因足以幹事」，周易的「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我們中國的老生常談如此，細數起來，可以至於指不勝屈。不過這些家常便飯似乎都吃厭了，如今我們再來看西方有無相似的理論。假如有，也許較爲時髦，有味。

法國十八世紀的博物學家和著作家碧峯（Buffon）說：「天才是一種長時間的忍耐力」。十九世紀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巴爾撒克（Balzac）說：「所有人類的能力，是一種忍耐心和時間的組合」。再看纔死不幾年的美國大發明家愛狄生（Edison）道：「天才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

，我們更可以悟得其中的『三昧』了。但是，知道是一回事，能否實行又是一回事。請問在偌大的中國，在三千年的歷史中，在四萬萬的圓顛方趾內，究竟能找出若干真是爲理想而一直幹到底的傻子？尤其是現代？四十年如一日的孫中山，有幾位？『二十年忠於所業』的秉志（參閱翁文灝先生作的中國的科學工作（有多少？）但在另一方面，實行『有奶就是娘』的嘍囉，動輒倒戈的丘八，搖身一變以至百變千變的政客官僚，却如蟻如蛆，黑壓壓的一大羣。蟲之數，不知其有幾千百萬也！不過有人還可說：這此東西雖是沒人格，但與中國科學的不發達無關，何害？是，我們就承認無傷，就把直接或間接的惡影響不算數。但就科學界的本身來看，也使人不能不失望。在獨評第三十六號上，孫逸先生早已替我們舉出幾例以概其餘了。他說：學地質的可以做交通或教育部長，學化學的可以做教育廳長，學天文的可以做公使，學電機的也可以高興幹別樣。試問這風一來，那地質，那化學，天文，那『科學之神』，還會死心踏地地來找着他們去有所發明，有所貢獻嗎？更還能苦苦央求他們能到頭有驚人的成績嗎？西方科學家信大的造詣，大概不是這樣自己鑽出來的罷？

愛狄生，是我們所最崇拜之一。如果我們翻開他的傳

記一讀，上面那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便立刻可以得着明瞭的解答。狠不幸國人有一通病，即自己已有錯，往往自己不願承認，而要諉之於他人或社會。這宗毛病，心理學上叫做『托理』（Rationalization）。我們常常聽得改行的人說：中國社會使人用非所學，學非所用，不得不爾。我們又常常聽得尙未改行的人說：中國學校的設備不完，生活無保障，要使人發明或，貢獻，勢不可能。關於第一類愛「跳亂壇」的人，我們請他注意：社會固可以影響個人，但個人又不曾不可以影響社會？只要真能吃苦，窄路亦未嘗不可以走通。十分高明的人物，他不但受社會的壞影響，還要以善影響給與社會。如果自己爲卸責起見，便將罪過推之於社會，自己好像毫無可責似的，驟看似乎是夠漂亮了。殊不知他已承認甘敗下風，即無異於自儕於行尸走肉之列。孟老先生說得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持此以例彼，則一經波折，便隨流飄蕩，以至終爲社會所同化者，那自然是細細么麼，不足齒數了。關於第二類敷衍混的人，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內說得狠痛快。他道：

如果把各國的思想史科學史詳細翻閱起來，一定可以

看出當那些大思想家大科學家作出他們的大發明大發

現的時候，他們所服務的機關，設備未見得就怎麼完善；他們的生活，未見得就絕對安定。昨天我聽傅孟真先生說，曾經得過訥伯爾獎金的物理學大家布萊格（Bragg）先生，他的研究室在一個很卑下的房子裏面，即使晴天而光綫亦不充足；外邊又爲公衆打靶的地方，終日煩囂。他這樣的實驗室，北平任何大學的也要比他的高明。但是，他竟在那樣的地方作他很重要的發明』（獨立評論第三十七號第十八頁）

就攔開大思想家大科學家不說，我們只看看西方普通的大學教授，請問有幾個不是鬍子雪白了還是孳孳矻矻繼續不輟地工作？他們精益求精；他們一輩子是學生，他們承認知識無窮，時力有限。然正惟其無窮，正惟其有限，所以應當拚命趕路，不敢怠荒。其結果成爲權威（Authority），自無足怪。反過來，試一回顧我們的所謂知識階級，請問又有幾位不年紀青青的便淺嘗而輟止呢？不以寶貴的時光去兼課，打牌，聽戲呢？西溼先生說，據 Tastrow 的統計，四十七至四十八歲，是著作家出產最偉大傑作的年齡。真如先生說，哲學家的成熟在四十歲後；萊布尼茲更晚一點，在五十歲後。梁任公先生說：古今中外大學問家，四十歲以前多作預備工夫，成就總在五六十歲。文學家藝

術家依賴天才，可以早有貢獻。若用科學方法研究學問，必須經過相當的時間，受過許多的磨鍊。牛頓於臨終時說：他所知道的東西不算什麼，不過等於在海濱拾得一枚貝壳而已。這話可以代表西方人對於知識取積極進取的態度。反過來，吾國的大哲老子告訴我們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其後莊子又說：『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這可以表示我們東方人對於知識取消極割捨，甚至於取偷懶的態度。中國文化自周秦以至近代，骨子裏受自然主義的流毒很深。西方導源於希臘，雖中世紀有一千年的黑暗時期，然文藝復興，即又緊接上去，繼續對於宇宙探尋寶藏猛勇精進的態度。由此可見東西人對於求知的意識，原來就很有差別。『匪今斯今，振古如斯』；『其所從來者遠矣』。

（未完）

勘誤

本刊第六十三，六十四兩期，登載嚴仁廣先生「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闢謬一文，其中數字等為手民排誤甚多，甚為抱歉。茲特為列表校正，請讀者注意。

勘 誤 表

期數	頁數	上或下	行數	字數	誤	正
63	12	上	15	6	為	及
“	14	上	2	18	因	用
“	“	“	16	17	反	及
“	16	下	3	5	27%	2.7%
“	17	下	19	9—10	社 會	會 社
64	16	上	14—15		494,3070,000	494,307,000
“	“	下	7		827,017.000	27,010,000
“	“	“	“		31¼	31%
“	“	“	8		826,727,000	26,727,000
“	“	“	9		38,085,000	38,058,000
“	“	“	9		67%	70%
“	17	下	6—7		6 628,348,71	6,628,348.71
“	“	“	9—10		7,065,713 04	7,065,713.04
“	“	“	19	2	概	慨
“	18	上	18	5	「逃」字應刪去	
“	18	下	1	3	沙	紗
“	“	“	11	20	斷	斷
“	“	“	15—16		前任局	前任當局
“	“	“	16		「鎖」字應添於十七行尾	
“	19	上	19	17	於	計
“	20	上	9	9	開	聞
“	“	“	20	6	Wintir	Winter

中央外交方針如何轉變？

君衡

本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載南京專電說據外交界說『中央外交方針有轉變之醞釀』。又據晚報消息，『華北時局已由軍事問題而入於政治外交。此次蔣、汪、黃對華北全局佈置已歸一致。惟須俟宋回國，依循國際趨勢』，經『重大會議之後，方可確定』。我們看了這條關係重要的新聞已後，不禁要問，政府外交方針是向那方面轉換呢？

回想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政府的對日外交已經幾次轉換方針。在最初的時候，政府順著輿論高唱『爲玉碎的不交涉主義。此後榆關失陷，政府又宣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張。及至長城血戰，平津告危，黃郛氏膺命北來，與日方交涉以求華北之保全。政府屢向民衆聲明，對日祇作軍事協定，不作政治交涉。在已往二年間政府既經從絕對不交涉的方針轉變到軍事妥協的方針，現在倘若更進一步，轉變到政治交涉的方針，似乎是可能的事。我們試看素持強硬態度的外交部長羅文幹氏已由政府准其卸職，視察新疆；日方宣傳將回國任職的張學良氏已由當局電令暫留國外；日方認爲『對於樹立中日正常關係將有甚大供獻

』之前駐俄大使廣田將來華與蔣介石以次之要人自由懇談；——這些消息雖然不足證明政府將要從以前矯飾的搖頭外交轉變到誠意的點頭外交，但報紙所傳外交方針轉變的方向似乎已有蛛絲馬跡的可尋。

假如政府果然有意開闢對日的外交途徑，我們還要問：政府的政策是（一）放棄國聯國際而對日妥協呢？或是（二）仍舊繼續請求國聯援助的方針而同時求日方之諒解呢？『信賴國聯』是九一八以來政府一貫的態度；實際上的效果雖尚無着落，而道德上的援助不能說是不大。在道德方面中國似乎已有不可背棄國聯的責任。就近來的事實看，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的成立，五千萬美金借款的成立等等足以證明政府的外交眼光仍舊是向西方注視。再者在目前中國軍事失敗，日本佔據東北的時候，對日妥協或不免同於對日屈服。以東北數省之地拱手讓入，不但政府無此膽量，恐怕有關係的列強也不能默許。所以純然東向的外交是不可能的。我們希望政府中人不至於冒昧地作這樣危險的轉變方針。

但是求援助於國聯，求諒解於日本，又何嘗是容易的事？國聯技術合作已引起東京的大聲『警告』；美棉借款也使日本加以注目；宋子文氏在歐美的行動意義和結果如何尙不可知，却早已使東京方面得着不快的感覺。總之，照日本看來，中國應當信服『亞洲的門羅主義』；向歐美求援即是與日本絕緣。自從日本退出國聯以後，中國求助於國聯也被認爲決心反抗日本的證據。不但如此：榆關事變之後日美關係亦漸見緊張。美國海軍之長期屯駐於太平洋岸，海軍預算之增加，墨西哥馬格達列那灣海軍根據地之設置等等都被東京認爲對日備戰的事實。中國求援於歐美，更是故意與『帝國』作對。

在此種遍地荆棘的外交途徑中覓取一條兩全的出路，當然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我們却不可知難而退。現在我們急待解決的外交問題正是在歐美和日本不合作的情態之下，中國如何自處？在一般人看來也許以爲日本與歐美強國衝突，誰勝誰敗，可以預測。現在兩方面既已發生了裂痕，我們正好採用從前『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勇往直前地聯歐美以抗日本；這樣一來，或可促成太平洋上的大衝突，中國借此出一口怨氣。這樣看法，雖然痛快，却不免有似是而非的弊病。第一，我們要知道現在中國國力如

此之弱，國際地位如此之低，並不足以左右世界的政治。日美間是否果然發生衝突，非中國外交手腕所可防止，也非中國外交手腕所可促成。我們外交上的問題不是：要日美衝突或不要日美衝突？我們所應當考慮的是在國際風雲緊急的時候中國應如何自處。日本倘然果與列強衝突，中國是否可以受着實惠，不在乎日本是否失敗，而在乎戰時和戰後中國本身的能力如何。假使彼時中國的情形仍與現在一樣——也許較現在更壞——恐怕我們要遇着許多更爲困難的問題。假如中國有選擇國際局勢的權利（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們似乎應該希望國際間的衝突不要爆發太速，讓中國有相當的機會去作準備。第二，列強的衝突不過是將來一件可能的事。在衝突未來之前，我們不可『望梅止渴』，而必須圖謀眼前現實局面的應付。現在切身的問題是如何使中國具有立國最低限度必須的條件而足自存——如何整頓政治，充實軍備，豐裕民生。我們建國的事業更切於復仇的事業。從一方面說，我們可以暫時忘了失陷的東北，絕不可片刻停止建設和充實國力的工作。東北問題是必須有公正的解決，但是現在中國還沒有解決此問題的能力和資格。現在只有對內力事有益的建设，對外力避無益的損失：要做到這兩方面的事，必須善於運用國

際的形勢，避免衝突，覓取援助。

假如我們上面所說的話不是完全錯誤，我們可以斷定

中國目前外交的方針應當是：不可放棄國聯和國際，亦不

必與日本衝突或決裂；前者求其援助，後者求其諒解。俗

語說『兩姑之間難爲婦。』現在的中國正不得不勉爲其難

，以求一條自救自全的出路。我們必需表明與國聯技術合

作只是求解決中國自身的建國問題而不是直接地反抗日本

。東京人士儘可不必驚惶憤怒，我們也不必因東京的警告

而退縮。我們不但要使東京了解求助歐美並非抗日，更要

說明與能夠自主自強的中國解決問題，較比在中國紊亂情

形之下與列強解決更爲合理，穩妥，有益。假使日本不可

以理喻，始終崇拜武力萬能的信條，太平洋上的國際正面

衝突或者終不能免。這種不幸局勢造成的能力和責任，操

諸日本而不在中國。在這幕悲劇未揭開以前我們也只有走

這一條比較有益的外交途徑——向國聯和國際求可能的援

助，對日本求必要的諒解。

所謂政府外交方針的轉變，是否向着我們所指出的途

徑，須待此後事實的佐證，方可判明。至於如此外交方針

的轉變是否有實行的可能？實行後是否有益於東亞的局面

，只有看我們的政府能否利用一縱即逝的時機努力於中國

自身的建設，和日本方面是否能臨崖勒馬，放棄極端黷武

的政策。紐約本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哈瓦斯社電載荒木貞大

的談話，一方面希望恢復日本原有陸軍界之傳統，一方

面又大唱日美諒解之說。（分見二十日天津大公報及二十

一日北平晨報。）日本真正外交方針如何，尙是一謎。我

們希望中央好自爲之，不要鹵莽輕脫纒好。八，二一。

復興農村與農民負擔

守愚

一個農村崩潰的實例

農村經濟的衰落因於數十年前，農村社會，普遍的

崩潰，却是最近幾年的現象。沿江海的省份，近城的農村

，農民的收入，年年縮減，生活年年困苦。內地的省份，

僻遠的鄉村，農民不但有田而不肯耕耘，或耕耘而不敢收

獲，連房舍都賣掉。甚至昔日的村落，如今祇賸破瓦頹墻

，房樑屋柱，或賣或燒。數十戶的村落，或至人煙絕滅。

數百戶的農村，或祇餘十數。這種現象，不但內地如陝西

甘肅河南如此，即安徽山東河北亦是如此。所差別的，祇是壞的程度，所大同的，却為一般農民，無論其為大農中農小農田主佃農，都覺困苦若非常，强悍的挺而走險，老弱的坐而待斃。所以剿共而匪愈多，捕盜而盜賊愈盛。

最近政府方憬然覺悟，知道中國的農民，固然能耐勞忍苦，而目今則農民的忍耐性，已迫近最終點，將有爆發之虞，所以有復興農村委員的組織。剿匪總司令部，亦三令五申的，告誡中政人員，注意農村狀況。私人方面，更有許多鄉村實驗區的組織，作小規模改良農民生活的試驗。可是復興農村經濟，改良農民生活，事體鉅大，方法繁雜，沒有規定辦法以前，更須切實明瞭農村崩潰的原因。這些原因，無論政府人民，都有陳述，其中苛捐雜稅一點，不獨為大家公認，即政府當局，亦公開承認。更就農民本身設想，最受痛苦，最為迫切，最易認識的，亦不過苛捐雜稅。記得大公報於鄒平鄉治運動會議的前夕，還發表一篇論評，敘述調查苛捐雜稅的種類，和農民的負擔的重要。作者於去夏曾隨同人往陝西考察實業，目睹農村崩潰真像，農民困苦情形，於地方捐稅，稍有見聞。因此不揣鄙陋，掇要書來，聊以供高談與復農村的參考。祇是遊歷日期，過於短促，並且晤談者亦多顧忌，容有許多遺漏的地

方。幸而最近財交實鉄各部，又有聯合考查西北的盛舉，其目的的一部份正為救濟農村。那末我這篇文章，或許是拋磚引玉，更得到關於地方政府的捐稅和農民負擔的詳細情形，供給我們的參考了。

南鄭的苛捐雜稅

我所遊歷的地方是陝西的中部和南部，就是舊日的關中道和漢中道。我要談的却祇指南鄭一縣，因為範圍縮小，討論起來，可以嚴密些。並且南鄭所得的資料，亦比較的豐富些。南鄭在陝南，是個首縣，氣候雨量，和江南差不多。物產如稻麥棉茶等，亦與江南同。河流港汊甚多。並且陝南不像關中，沒有連年的旱災，偶然大旱，正如我們江浙所謂大旱，今年虧絀，明年亦許有盈餘。交通本來狠便，有漢水通鄂豫。近三四年來，因為共匪佔據老河口，把漢水堵住，南鄭的貨物，不得已便須爬山越嶺，往西安或四川了。所以就氣候物產交通而論，南鄭在中國，是個富庶的縣，是個超越平常的縣。所以農村崩潰，農民流亡，決不能如關中，諉諸天災，實在完全是人禍。而人禍最烈，當然不出苛捐雜稅了。

先談捐稅種類。按財政部國地稅劃分標準。屬國家稅的，在陝西有煙酒印花鹽稅統稅，還有以前的釐金，現在

改名特別消費稅，（這個稅曾經行政院通令取消，可是天高皇帝遠，陝西沒有所見），設關佈卡，一仍舊制。這些國稅，名義上應繳國庫，事實上省府自收自付。屬地方稅直交省庫的，有田賦契稅牙稅屠宰稅牲畜稅斗捐營業稅等。作各縣地方開支的，有各項附加，於田賦契稅牲畜稅屠宰稅斗捐等項下帶征，以及房捐婚証收益費，春台，或青苗會附加各捐。此外還有各種特捐，如烟畝捐，省銀行股本攤款，省庫券攤款，不動產契約登記費，剿匪捐。除剿匪捐和四成煙畝捐，供地方駐軍外，其餘掃數直繳省庫。更有當地隨時籌舉的捐，如地方維持費，民團或保護團費，路過軍隊支應費，派款催款或查驗委員招待費等。關於鴉片，應分種吸和連賣三方面來講。種就是前面所說的烟畝捐，這個數目是由上派來的，無論實種多少，必須全數繳納。吸另名燈捐。連賣美其名曰善後罰款，每兩鴉片須罰一角八分左右。如新烟上市，價格平低，罰款還可以暫時減輕，以利商賈而裕稅源。這些捐種在南鄭每樣有，還有零碎捐款，無法查詢。

徵收的方法

徵收的辦法，約可分為三類。一為機關征收，如烟酒稅鹽稅特別消費稅田賦善後罰款營業稅等，設有專局，或由縣府直接收取。二為市民承包，如印花稅和牲畜屠宰斗

捐燈捐房租等雜稅，印花稅由商會認額，雜稅由承辦人設局辦理。三為攤派，如烟畝捐剿匪捐省銀行股本省庫券登記費民團費路過軍隊支應費青苗會委員招待費等。攤派程序，自省而縣而區而鄉而糧頭糧戶。攤派方式，則農民係就其田地畝數分配，商人由商會議攤。攤派人員，為省財廳所委，會同縣長辦理，普稱為派款委員。款派以後，復有查驗委員係查驗各地烟畝等捐增減的程度，和款項的收入等。復以款項到期或欠或絀，則又由省或縣派催款委員向各縣各鄉催繳。此項催款委員，無一定人數，亦無一定次數，並且作威作福，魚肉鄉民，稍有不遂，動輒打。每家攤款的數目，由區長鄉長議決呈復，其中難免輕重不公，欺凌老弱。積怨暴發，乃有鄉民聚毆區鄉長，暗殺委員的案子。有好幾起，都是用槍彈掃射平復的。

稅收的概況

凡直轄於省財廳設專局征收的稅，如烟酒鹽厘統稅等，都無法詢查。現在祇把縣府監理的，列表如左：

一、省款（南鄭縣）

- | | | | | |
|------|----------|-------|--------|-------|
| 一，田賦 | 五.三五元 | 二，印花稅 | 五.〇〇〇元 | （實收數） |
| 三，契稅 | 一五.〇〇〇元 | 四，雜稅 | 二七.五二元 | （金額） |
| 合計 | 一〇九.九三五元 | | | |

附計雜稅包括屠宰稅月額一·二三五元六角，牲畜稅月額八八〇元三角，年捐月額六〇元，牙稅計有牙帖七十七張，每張年納稅二〇元。

二，地方款（南鄭縣）

- 一．田賦附加 三三·六〇元 二．契稅附加 二一·七〇元
- 三．牙稅附加（即行捐）九三·〇〇元 四．畜稅附加 五·六〇元
- 五．房捐 六·〇〇元 六．燈捐 七·八〇元
- 七．婚證收益費 五·五〇元 八．煙畝捐附加 三·五〇元
- 九．刑匪費附加 九·〇〇元 十．春台會附加 二八〇元
- 十一．春台會畜屠稅 一一·〇〇元

合計 一四七，六二〇，元

三，特捐（南鄭縣）

- 一，烟畝捐 二一〇，〇〇〇元 二，刑匪費 二一〇，〇〇〇元
 - 三，省銀行股本 二五〇，〇〇〇元 四，省庫券 一〇〇，〇〇〇元
 - 五，不動產契約登記費 八二，七〇〇元
- 合計 五四六·七〇〇元

省款地方款和特捐三項合計 八〇四·二五五元

負擔的分配

要明白負擔的分配，我們先得知道南鄭的人口。這個問題，實在把我難住。不得已，將口頭報告郵政報告和其他報告的數目，求個平均。大約南鄭人口在二四〇·〇〇

〇人之數。拿捐稅總數和人口比，大致每人每年須付捐稅三元三角以上。其中舊稅佔一元，特捐佔二元三角。不過這種數字是極粗略，第一我們沒有把所有的捐稅都攔入，祇就有確實稅收數目計算。第二這種數字，還是表面上談，實際人民負擔，決不止此數，譬如吏胥的舞弊，區鄉長委員等的敲索，尚不在內。如烟畝捐，省府規定本為每畝十元，以六元歸省庫，四元歸駐軍。而就地探詢，則人民實際所出，實及二十元之譜。其餘捐稅可以類推。據陝南熟悉省縣財政的人談起，人民所繳各項捐稅，每元官府所得，僅有四角左右，其餘六角，悉入征收吏胥和當地土劣私囊中。我們還應注意的，就是特捐數目，超過稅二元以上。所以普通人民，對於舊稅，並無惡感，獨於特捐，真是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並且因為大多數捐稅，取自農民，其餘捐稅，間接亦從農民身上榨出，農民的負擔，特別困重。農村破產原因在此，所以我們不憚煩再詳細的研討。

南鄭的農民，約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南鄭的田賦，照陝西舊例，向分民糧軍糧（又名屯糧）兩種。民糧有庫平銀八千八百九十七兩零七厘，軍糧有九千三百八十五兩八錢九分三厘。按現時田地移轉帶糧例，民糧每畝

二分至六分不等，軍糧每畝自四分至七分不等。民糧每畝平均以四分計，得田地二十二萬二千四百三十五畝。軍糧以五分五厘計，得田地一十七萬零六百五十二畝。民軍兩糧合計，田地有三十九萬三千餘畝。其中水田約佔十分之四，旱地十分之六，水田又分爲水田塘水田兩種，以後者較多。但是塘水田遇旱易枯，即不能插秧，等於旱地。

田賦是一個總名，有正銀，有雜項。雜項名目繁多，年久意義難明，我們不必將其一一列出。（不過這個雜項和現在的附加不同，亦許將來這些附加，會變成雜項，統名田賦。）自民國十八年起，田賦加倍四倍，計民糧一兩，正雜附加，共收洋一十八元二角，軍糧一兩，共收二十元〇八分。如民糧四分作一畝，每畝須繳田賦正雜及附加稅計洋七角二分八釐，軍糧五分五釐作一畝，則每畝應繳稅洋一元一角零四釐。民軍兩糧，平均每畝須繳田賦正雜及附加稅九角一分六釐。

除田賦以外隨糧帶征的，還有剿匪費及附加，烟畝捐及附加，其餘如不動產契約登記費省庫券省銀行股本等攤款。最大部分，仍爲農民負擔分繳。爲便利起見，統各以田地總畝數除之。現在我們把每畝田地平均所繳捐稅，分列如左：

四，南鄭縣每畝田地負擔捐稅數

- 一，田賦正雜及附加 〇·九元
 - 二，剿匪費及附加 〇·三元
 - 三，烟畝款及附加 〇·七元
 - 四，省庫券 〇·二五元
 - 五，銀行股本 〇·九元
 - 六，契約登記費 〇·二元
- 合計二元五角二分

這裏我們應注意，就是一，每畝田地所繳捐稅總在二元五角以上。二，許多零碎捐稅，農民直接間接繳納的沒有計入。（因爲沒有確數，）三，鄉鎮自治費團費（如紅槍會黃帶子白帶子神拳硬肚等）和公役需索等，亦未計入。但是光算每人平均負擔，和每畝平均負擔，祇是幾個數字的表現，還看不出負擔的重輕。我們更應研討每畝田地的產量，和產品的市價。看看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得到的賣價，是否够完糧納稅。

南鄭的田地產量，最優的如塍水田，每畝收穀四担，（每担三百二十斤）上折田三担，中折田二担半，下折田二担。地則以種小麥爲最多，每畝產量最多九斗至一石，最低約四斗半，平均約六斗餘。產物田則種稻大小麥菜子或豆類，地則種小麥棉花大豆高粱玉米或芝蔴。按去夏市價，穀一担約值洋二元五角，小麥一担 市價五元。以最上田產量計算，每畝各項正雜糧合計，可得十餘元，上折田

八九元，中折田六七元，下折田五六元。除去額定的捐稅和額外的需索以及人工種籽等消耗外，祇最上田和上折田，稍有贏餘，中折田僅能維持或欠絀，下折田則入不敷出。至於旱地情形，當然更爲困苦。還有一樣，南鄭的田地，約百分之六十，都經佃出，田主衣食靠田租，大致按照分花制度，無論旱潦，主佃各半。按照認花制度，上田每畝納租最高穀二石，中田約一石半，下田約一石。旱地因肥瘠不同，每年每畝上下兩季，共納租麥和租豆二斗至六斗不等，旱潦可酌減。但是田主固然不勞而獲，各項捐稅，却按糧冊着田主繳納，如以平均每畝捐稅負擔來比較，上折田主除去捐稅等，每畝尙餘數角，中下折田主則所得田租，祇租稅一項，使無法繳納，中下的旱地更不必論。其結果便是田主逃荒（其實逃稅），田無主人，公款無着。政府便將田地收歸官有，而公款仍着佃農代繳。佃農初以田主逃荒，田租豁免，似乎負擔減輕，但是不久（荒田免租，祇限一二年），即如田主感覺繳納捐稅之煩重，於是相率而退佃。其情形比較嚴重的，則田無田主，亦無佃農。政府如收棄田，則公款無着。如不收棄田，則招致佃農，極爲困難，追繳稅款，尤形棘手。我們常時看見田野

中，玉米稻穀，成熟過期，還沒有收割。據云就是所謂荒田，不是無產物而荒，是收穫的不足付稅而荒。像南鄭情形，比較還好，荒田不多。別的縣份，荒田有多至總畝數三分之一，而田荒報告，仍源源不絕的送來。農民逃田，鄉村崩潰，原因都是如此。如今大家喊口號，開發西北，我看還是收集流亡，恢復耕地，最爲要着。已經開發的不能維持，還談什麼新的開發。

農民的金融問題

我們談農民負擔，還有貨幣借貸和農民銷耗三個問題，當同時提出討論。南鄭通行的貨幣，硬幣有銀元銅元，鈔幣有省銀行鈔票，富秦錢局和商會發的銅元票，鄉下還有雜貨舖發行的銅元票。銀元市面上不多，銅元都是當二百枚，來自四川，每元換二百個銅元。鈔票和銅元票沒有準備金，隨時都有跌價和停兌的危險。農民除了受金幣跌價的風險外，因爲完糧納稅，都用銀鈔計算，而銀鈔不足，農民便賤價競賣，以使得到銀洋，去付捐稅。這層上吃虧甚大，是農民一種無形的負擔。借貸現在可以說絕無僅有，鄉下農民，一般窮苦，無論城鄉。假使有人肯借，這人的身家，就很危險，不是土匪來搶，便是官府來要，以後攤派各種捐款，必定多多派些。所以利息，高至六七分

，還無人放債。普通借貸，完全是親友情面，決不敢貪圖利息，所謂高利貸，在現在的陝西，真是談不到。農民的銷耗，在南鄭穀米極其便宜，可是鹽價高至每斤三四角，糖高至每斤五六角。衣料自外來，亦極昂貴。因為靛青貴，所以農民的藍布大褂，顏色在藍白之間。其餘外來的品和洋貨，更不必談。這種一方，農產價格低落，一方銷耗品價格漲高的現象，亦是農民的一種無形的負擔。這些有形可以計算的負擔，和無形不可計算的負擔，同時並進，那末農民的經濟，又何得不破產。農村的社會，何得不崩潰呢。

結論

我提出南鄭縣一個例子，來討論農民負擔，祇因他是一個通常的縣份，沒有所謂天災，並且所論的負擔，亦僅限

於有數字可稽考的，實際的負擔，當然不止如此。其餘各省各縣，更有很多不如南鄭的。可是人禍之烈，亦許比南鄭還甚。譬如各種苛捐雜稅，不僅陝西有，就是密邇首都的蘇浙皖贛亦有，其餘內地各省當然比陝西還兇狠的亦有。那末以此類推，目下農村普遍的崩潰，自然是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果報。我在前面說過，苛捐雜稅，決不是農村破產唯一的原因，可是苛捐雜稅，確乎是最重要原因之一。這個背後，當然還有根本的原因，就是軍閥濫招土匪，擴充隊伍了。現在政府大談復興農村，派員調查農村狀況，這些農村崩潰的根源，當然應弄清楚。地方財政，苛捐雜稅的治本治標，不是沒有辦法。要是政府在諱疾忌醫，空談延誤，那末經濟的破產，社會的崩潰，又豈止限於農村呢。

八月廿六日

論 恢復 流 刑

吳景超

北平晨報八月十八日專電，說是前外交總長羅文幹先生，此次奉政府的命令赴新，除却考察西北邊疆實際狀況之外，還負有一種使命。這種使命，是與恢復流刑有關的。據羅先生自己說：

「在司法紊亂之今日，各地監獄設備簡陋，罪犯充塞，政府近雖有減刑明令，終非根本辦法。余此行欲解決者：（一）詳察法院施行刑法之實況，（二）妥謀罪犯移邊築路等生計計劃，及自新辦法。前者將據以

爲修正刑法之張本，後者係整頓司法目前之要圖，將與地方官吏及法院當局，詳籌實際方案。」

羅先生以恢復流刑爲整頓司法目前之要圖，大約司法界中的人是有許多贊成的。八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謂地方法院將籌募十萬元建築看守所，同時登有一段周祖琛院長的談話，據周院長說

『此次籌修新看守所，目的即在疏監，蓋監所簡陋人犯擁擠，不特無法講求衛生，有違人道，即于觀瞻諸多未便，是以新所之設，殆極必要。本人意見疏監以外，更應恢復流刑先制，此點部方近已注意，甚望早日可以施行，以爲改良獄政之嚆矢云。』

總觀羅周二人的談話，可見他們雖然都主張恢復流刑，但其用意，與前代利用流刑的人，是大不同的。中國的流刑，可以說是起源很早。古代的傳說，謂虞舜流宥五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大約就是流刑的一種。不過在魏晉以前，雖然流放的例子很多，流刑總還沒有列爲五刑之一。後魏刑名，才有死流徒鞭杖五種名目。此後歷代的刑名中，都有流刑一種。宣統二年的大清現行法律，列大清五刑，一死刑，二遣刑，三流刑，四徒刑，五罰金。流刑共有三種，一爲二千里，二爲二千五百里，三

爲三千里。遣刑實際便是較爲嚴重的流刑，計有二種，一爲發至極邊足四千里及烟瘴地方安置，二爲發往新疆當差。由此可見流刑在中國的歷史很長，一直到清末民國初年，方行廢除。國民政府的刑名，雖然刑是定爲五種，（一死刑，二無期徒刑，三有期徒刑，四拘役，五罰金。）但已經沒有流刑的名目了，直到現在又聽到恢復流刑的呼聲。我們研究刑罰史的人，對於這種現象，並不覺得希奇，因爲數千年的制度，本不是一下就可使他消滅的。只有漢文帝廢除肉刑之後，歷代主張恢復的人，真是不可勝數，在朝廷中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至少也有十次。現在肉刑總算是歷史上的名辭了，主張恢復肉刑的人，大約是不會再有了。然而流刑的廢止，不過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還有人希望他復活。

以前利用流刑的人，把流刑看作一種很重的刑罰，其嚴厲的程度，只比死刑次一等。在現在交通使利的時代，我們也許以爲旅行四千里不算什麼事，但在以前，這是很可怕的。一路風霜雨雪，這些犯人，能活着達到目的地，已經是很僥倖了。康熙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曾有上諭給刑部等衙門，說「流人多有貧者，衣裝單薄，無以禦寒」。以罪不至死之人，凍斃道途，殊爲可憫。」可見當時的

流犯，在途中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到了目的地之後，犯人是否能服水土，是否可以找到維持生命的工作，都是不可知的，至于精神上的安慰，更談不到。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九日，又有一道上諭給刑部，對於流犯到目的地後的生計，會有下面的觀察：

「朕巡行邊塞，咨詢民間疾苦，東至烏喇地方，見其風氣嚴寒，由內地發遣安插人犯，水土不習，難以資生。念此輩雖干憲典，但既經免死，原欲令其生全。若仍投畀窮荒，終歸踣斃，殊非法外寬宥之初念，朕心深為不忍。」

流刑給與犯人的痛苦，由此可見一斑。但現在主張流刑的人，并非以流刑較徒刑為痛苦，因而主張恢復，只看羅周二人的談話，並沒有主張「報復說」，(Theory of retaliation or retribution)便可證明此點。以前利用流刑的人，還有一個用意，就是他們把犯罪的人，看作一種可怕可厭可恨的東西，不願與他們同在一個社會中生活，所以要把他們「放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安置囚犯的地點，總要擇那人跡罕到的地方，遠如漢平帝會置西海郡，把天下犯禁的人移到那兒去住，近如前清把犯人發遣到新疆，都含有這個用意在內。不但中國如此，就是英國在十七

十八世紀，把犯人送至新大陸，十九世紀把犯人送至澳大利亞，也有同樣的心理。但現在主張恢復流刑的人，也沒有這種用意在內。因為他們都知道邊疆也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且是很重要的部份。據羅先生的意見，送犯人到邊疆去築路，並不是使犯人與中國離開得遠些，而是想靠犯人的努力，使邊疆與中國連結得牢些。

主張恢復流刑的人，既不是想給犯人以更嚴酷的刑罰，也不是想把他們投諸「四夷」，與中國的社會隔絕，那麼他們的用意到底在什麼地方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如仔細分析羅周二人的談話，便可以得到三種可能的答案。

第一，他們主張恢復流刑，是想以流刑為手段，達到疏監的目的。近年犯罪者日漸加增，監獄中常有人滿之患，這是凡參觀過監獄的人，都曉得的。這種狀況，對於犯人的衛生，以及監獄的管理，都發生一種不良的影響，也是極明顯的。所以我們對於疏通監獄的舉動，是極端贊成的。但是疏通監獄，是否一定要恢復流刑，却是一個疑問。本來使獄中罪人減少的根本辦法，是安定秩序，發展教育，改良政治，提倡實業，使人人皆樂于為善，而不去犯罪。不過這種治本的辦法，目前是談不到的，而且遠水救不得近火，這種預防犯罪的辦法，即使目前切實去辦，收

效也在將來，對於今日的獄政，還是無補的。所以我們不得不于治本的方法之外，討論治標的辦法。所謂治標的辦法，在外國行之有效的，最要者有兩種：一是假釋，(Parole)二是緩刑宣告。(Probation)假釋是對於徒刑犯而設的，凡在獄中的犯人，如行為方面有進步，便可于徒刑滿期之前，假釋出獄，但在此時期內，還要受法官的監督，假如無大過失，期滿後便可過自由的生活，假如再犯過失，還是要入獄的。宋元豐中，蘇子容曾建議請依古園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園土，滿三歲而後釋。既釋，仍送本鄉，稽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很有點假釋的意味。不過蘇子容所說的，乃是一種理想，假釋的實行，乃是近代的事。緩刑宣告乃是為尚未入獄的某種犯人而設的。這種犯人，或因年幼無知，或因無意犯法，或因還是初犯，法官覺得加以徒刑，對於他們有害無利，所以讓他們在某種條件之下，回到社會中去。假如在相當的時期內，他們能循規蹈矩，便可完全恢復自由，否則還可以把他們拘回獄中，執行徒刑。致英美刑罰制度的演化，我們便可知道監獄是繼流刑而起的，而假釋與緩刑宣告，乃是矯正監獄的弊病而設。所以由流刑至監獄，由監獄至假釋與緩刑宣告，乃是一種進步

。現在我們如從監獄回到流刑，便是開倒車了。同樣的可以疏通監獄，為什麼不從假釋及緩刑宣告等制度上努力呢？

第二，也許主張恢復流刑的人，是想以流刑為手段達到開發邊疆的目的。開發邊疆，誠然是很重要的，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及最近的新疆事變之後，我們對於這一點都認識得很透切了。但是開發邊疆的方法，應當細心考慮，否則不但不能達到目的，反而要添出一些禍害。我們認為開發邊疆的事業，不是犯人所能勝任的。即以羅先生所舉築路一事而論，我們以為與其發遣一些犯人去築，不如就地徵工為得計。西北連年荒旱，逃亡的人，不知若干，現在還有許多流轉道路中的無業農民。西北缺少的是人材，是資本，并不缺少勞工，至少築路的勞工，是還有的。我們為什麼不利用這些無業農民去築路，同時為他們解決生計問題呢？而且我們以工作的能力來說，根據英美的經驗，犯人總不如普通的工人。理由是很簡單的，一因犯人缺少工作的經驗，二因犯人缺少工作的動機，(犯人工作，每每得不到報酬，即有報酬，數目也是有限的，如國民政府的刑法，規定給與犯人的賞金，徒刑囚不得過該地方普通僱工價十分之三，拘役囚不得過該地方普通僱工價十

分之五。)(三)因犯人的平均體力，不如常人，特別是那些煙犯，白面犯，工作的能力，是很薄弱的。所以讓這些犯人去築路，他們是否勝任，還是一問題，至少我們敢說，他們所築的路，成績一定不如平常的工人。最後還有一點，就是今日的邊疆，在國防上已經佔一很重要的地位，所以我們總希望在邊疆居住的人民，其智力體力以及道德思想，不要在內地人之下。現在邊疆的生活艱難困苦，已經不能吸引許多內地的優秀份子，假如政府還以邊疆為囚犯的尾閘，那麼正人君子，一定要望邊疆而却步了。所以我們如想以流刑為手段，去開發邊疆，結果一定是把邊疆弄得糜爛而不可收拾。

第三，也許主張恢復流刑的人，是想以流刑為手段：達到改良罪人的目的。這種目的，誠然是光明正大的，而且還可以表示文明國家處置犯人的趨勢。因為近來研究犯罪學的人，發現罪人中有一種最難應付的，便是累犯，他們所犯的，每每是一種有期徒刑的罪，期滿出去，不久又犯罪而被拘。由此可見拘禁并不能改良犯人，如想改良犯

人，須在犯人第一次失足時，加以研究，根據研究的結果，定下一個幫助犯人自新的方針，照這個方針進行，也許可以使他感化，回到社會中去，復為良民。所以近代司法界中流行的改良主義，比起懲罰主義來，的確是一進步。但是改良囚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歐美各國，這種責任，是由心理學者，精神病態學者，醫生，法官，社會學者，社會工作家所共同擔任的，而且改良的方法，注重分別的指導，決無一種辦法，可以施諸任何犯人，而發生效力的。流刑不能達到改良犯人的目的，因為他是用一種方法，去醫各種不同的毛病。假如流刑實施之後，管理犯人的人還是一些刀筆小吏，督察犯人的人，還是一些趕趕武夫，結果不但不能改良犯人，恐怕還會加增犯人對於社會的怨恨，將來成為社會上一個更危險的份子。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認為恢復流刑，乃是一件有弊無利的舉動，現在不必提倡，將來最好也不要見諸實行。

歐洲通信

閔仁

還是心理與人的問題（續上期）

美國詩人長漢(Longfellow)的那首生命讚(Apsalm of Life)，讀之請問有幾人不感興奮？這可以代表西方人對於人生的奮鬥態度。縱橫歐陸的拿翁有一句名言道：『難之一字，惟愚人之字典中有之』。這可以表現西方人幹的精神。事實上他們不但有幹的精神，而且有一直幹到底的體力和方法。所以結果雷公投降，電母臣妾，制服天行，以歸人用。浮士德的天使說得好：『惟有不斷的努力者，我們可以解脫之』（依唐君毅譯文）。是的，不努力者和努力而不繼續者，當然只好蜷曲於『司芬克斯』的爪下。不幸中國人就是如此。大多數是懶，是苟且偷安，是因陋就簡，是得過且過，是馬虎敷衍，是只圖省事，是想檢便宜，是崇拜自然，是求神的哀憐與默佑。結果却窮病交加，饑寒並降，不困災荒，便苦盜賊！追因溯源，除了傳統觀念之外，也許還因為身體衰弱，所以意志不強，由於意志不強，所以缺乏毅力；由於缺乏毅力，所以也少有偉大的人格。人格的表現有一特色，或叫做繼續堅持(Persistence)，或叫做始終如一(consistency)如果時常自相矛盾，甚至夕是而晨非，這不僅無人格之可言，抑且無論做

什麼，恐都難於有顯著的成就。所以我以為假如所謂心理是指治學行事作人的態度，則考察團的說法，狠有幾分真理存在。假如西洋文化的意義也可以釋為西方人對於人生和自然的態度——例如無間的奮鬥，無限的追求，和現實主義等等——則陶內(R. H. Tawney)以為西洋科學是西洋文化的產物，而西洋文化不是西洋科學的產物，也未可厚非。因為這不是雞與雞蛋先後產生的問題，只是雞生雞蛋的簡單關係而已。

為什麼說只是雞生雞蛋的簡單關係而已呢？因為就以上的論證看來，似乎真是只有歐美人的心理，纔能產生近代科學與專門技術；反之，因為我們短少那宗心理，所以雖有科學的種子，也發展不出來。巴爾撒克真說得對『所有人類的能力，是一種忍耐心和時間的組合』啊！為什麼我說中國也有科學的種子呢？除散見於各種典籍者不計外，在二千多年以前出產的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六篇，據適之先生的分析，其中（一）有論算學的，例如『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諸條；（二）有論形學（幾何）的，例如『平，同高也』，『中，同長也』，『圓，一中

同長也』，『方，柱隅四謹也』諸條；（三）有論光學的，例如『二，臨鑑而立，景到，多而若少，說在寡區』，『景之大小，說在地岳遠近』諸條；（四）有論力學的，例如『力，形之所以奮也』，『力，重之謂，下與重奮也』諸條，（五）有論心理學的，例如『生形與知處也』，『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諸條……。（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二二三頁）如果適之先生的分析不錯，則叔永先生的說法，恐怕就有點不甚妥當了。爲什麼呢？所謂科學的種子也者，『顧名思義』，似乎應當解作科學知識的微粒，胚子，至多是初步的ABC，而不是指有系統的大著作。科學的系統著作，（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面），我國誠然沒有；但不能因爲沒有發展成爲系統，便說連湮沒的種子也不存在。事實上有種子是一回事，能否發展爲枝葉扶疏的參天巨木又是一回事。『我國自來沒有科學，可證明我們沒有科學的種子』，這在事實上是不相符的，在論理上是不妥當的。

西洋科學之有今日，也是由零星片段的科學知識，經多人經長時間的勞力，漸漸集會整理擴大進化分術改進而成，非從上古即有又精又詳，釐然秩然之完滿系統在也。假如不幸西方也和中國一樣——沒有人繼續向這方努力追

求，任其墜封置之高閣——難道我們生於今日，也可說西洋也沒有科學的種子麼？難道我們也可以將他們上古所得的些微者，也一筆鈎消不算麼？叔永先生續云云『但不能說我們沒適宜於科學的土地與養料』。這裏之所謂土地與養料者不知是何所指？如果所謂適宜於科學的土地與養料，不幸在實際上便是歐美人的特殊心理，則中國沒有科學，正足以證明我們沒有適宜於耕的土地與養料，所以不長。假如有，也許我們發展科學的時代，遠遠在碧眼兒之前哩，西方長時間宗教箝制偉大的勢力，有超於我們東方人之所夢想不到者。再後叔永先生說得對：

『考察團的這一個說法，使我們明白土地與養料的重要，格外留心去培養。却不能使我們認爲科學與我們無緣，聽其失失，放棄……』。

真的，我們今後應當格外留心去培養。不過依我看來，今後所應格外留心去培養者，正是歐美人所以產生科學的特殊心理；我們應該切實反省，在心田上多作灌溉工夫，以使播在其上的種子發榮滋長，不至長如昔日之乾枯不育，使人興濯濯荒涼之感。在我這話的底子裏，是根本承認我們已有科學種子的，也有治科學的才能的——翁文灝先生說：『中國人似乎很有科學的天才……中國科學界中狠有

人富於抽象力』，並舉了些事例以爲證——所差者，缺乏相當的德性，缺乏應有的態度，並缺乏精密的方法而已。所以我們本與科學有緣，今後只待如秉志先生的努力，便有收穫。假如照叔永先生原來的看法——說我國自來沒有科學，便可以證明我們沒有科學的種子，而科學的種子，只萌芽在西方——則我們似乎真是先天不足，素與科學無緣，只好灰心失望，垂頭而喪氣了。事實告訴我們，種子不是可以移植於世界任何處所』的，如果移往的地方之氣候土壤與種太不相宜，並且『壓根兒』就沒有過。例如熱帶的香蕉，你能搬到北冰洋附近去作露天的大規模種植，並有良好的收穫麼？因爲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一則關係於吾人的勇氣與自信，再則關係於吾國科學將來的發展很大，故不可不辦。

復次，依我看來，在考察團的語句中，他並沒有可以暗示我們放棄科學的意味，却很懇切地給我們指出了一條可以達到更大成功的路程。近代的歐美文明，誠然是由科學得來；但再推上一層，他們的科學，是由他們的心理得來（論證見前）。我們不可只羨慕他們可見的結果，還應當效法他們所以有此結果的原因。所謂『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者是也。如不知結網而老是臨淵，則一輩子只

有『過屠門而大嚼』：『饑涎欲滴，饑火中燒』而已。叔永先生驟然看見考察團說近代的科學是由歐美人的心理發生，因之愕然驚詫，怕提倡科學的主張不能實現。殊不知從這方面進取，纔正是實現提倡科學的大道理！否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雖然也可以拿着些枝節，但根株尙未移植過來；雖然可以於富室盆盃養得一花一草，但欲達萬卉葱蘢，詳葩爭豔，滿山盈谷，蜂蝶競飛的佳景，恐尙難能。因爲不在關節處使勁，不抓着頭腦，勢必費力多而成功少。且也無源之水易涸，挹注計非久長。假如不採取歐美人研究科學所需的心理而只提倡其科學，似頗有只采其結果之嫌；假如只學科學與其專門技術，似乎只能得其外表。換言之，即得着了糟粕而尙未得其精華。因之歐美人所達到的『優越程度』，吾人可以永遠望塵莫及。昔人云：

鴛鴦繡取從君看，

莫把金針度與人。

適之先生嘗謂這種行爲是不大度的（北大國學季刊宣言）。如今金針度來了，難道我們還不願細審端詳樂意接收嗎？有人說：『勿羨成功者的成功，但效其所以成功之道；勿笑失敗者的失敗，惟應研究其所以失敗之因』。這是兩

句很扼要狠有經驗的話，我們不可忽略。

總而言之，我以為考察團的說法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種忠誠的坦白的逆耳的諍言，如果我們清切地認諱了，實在除深摯感謝，並努力實行之外，「并無別的話說」。處茲改造過渡時代，我們對於許多事物，都好似在黑暗中摸索：「上一回當，纔學一回乖」；碰壁陷泥，已經多次。如今前面忽然發現了一盞鮮明的指路燈，我們應當高興鼓舞之不暇，怎麼還說「失望」啊！昔人云：「如撥雲霧而睹青天」。良友一言，終身可以受用不盡。故「使我們大大的失望」的話，愚意適得其反。

以上將關於歐美人的心理與成績的討論暫告結束，以下再約略試述解決中國問題的焦點和個人的一種認識。

中國的問題很多，很複雜。要想理清頭緒，抓着命脈，勢非先作點分析的工夫不可。第一步，仍可以粗粗地分為政治的，經濟的，法律的，教育的等等，就中以政治的最為重要。為什麼呢？因為政治是一種支配的力量，領導的力量（Leading force）政治不上軌，則其他的問題均難於解決。即或有人於萬難下努力得點成績，也容易被其一掃而空。建設難，破壞易此理甚明，毋庸例證。第二步於政治問題中，又可略析為內政的和外交的兩大項。兩相比

較起來，外交視內政為轉移，內政當然更為重要。如果內政不修而希圖外交勝利，那是不可能的沒出息的妄想。第三步於內政問題中，又可析為行政的，立法的，司法的，實業的，交通的，軍事的等等，而皆有彙集各種專門人材以努力除舊布新共同建設的必要。不過要做到這層，必須設法對於人的問題有相當的解決，否則勢必行之不通。因為社會是以人組成，事是人在那裏幹。漫云向來是有治人無治法的國家，以歷史的眼光來看，上流的激力不能驟免；就是在法治已成成訓（Tradition）的社會，於那可以伸縮的範圍內，人還不免左右於其間。何況中國在這過渡期中——從人治進到法治，一切規模尚待好人兼能人去建樹纔行——人的問題，那能不加以注意？俗語云：「橋過淮而為枳」，人不成，制度搬過來必然變樣。在政治上我們已將總統制，內閣制，議院制，執政制，均一一試過了。成績如何？我們覺得：以前的各種改革，每每只抓着靴皮，還沒有搔着癢處，好像目光只向前看見了別的東西，而忘記拿起鏡子來照照自己的尊容。民國雖然已快有二十二年的歷史了，然一般公民的程度，視清代有何大異？請問是不是只換了一塊空招牌？『沐猴而冠』的傀儡戲，差不多一直唱到如今。大人先生們在國內鈎心鬥角，奮力

爭權，鬧得很凶，然而讓黃頭髮短腿子在旁邊看來笑得要死。所以人不變而只變制度，是沙上建樓臺，一切改革均將成爲泡影空談。結果自欺欺人，有政無治。有文電上儘管像煞有價事，在實際上却幾乎等於零。久而久之，黑白混淆，民衆眩惑。大公報說得好：『好活說盡壞事做盡』。其實也怪不得，蓋『黔驢之技，技止此耳！』這是換湯不換藥的大壞處。

蔣夢麟先生在新教育一卷五號發表『改變人生態度』一文，末尾道，『凡此若非從基本上改變生活的態度做起，東補爛壁，西糊破窗，愈補愈爛，愈糊愈破，怎樣得了？』吾實深佩其有卓見。最近他又曾追溯吾國改革運動的略歷道：『五十年來，由武器革新而至政治革新運動；由政治而至社會革新運動；自社會而至思想革新運動。其間雖無鴻溝之可分，但其肇端大端，屈指可數。歷次轉變其方向雖不一，而其原動力只是一個：就是於外患迫切之中，怎樣爲國家生存。其初試爲武器，武器無效，再試爲政治，政治無效，三試爲社會革新，社會革新推動之不易，四試爲群眾運動；群眾運動屢試而成強弩之末，五試爲思想革命。』（獨評第四十號第十二頁）由此可見國人也漸漸返觀自身，注意到人的問題了。爲什麼這個很重要，

的樞紐的問題，發現反爲較晚？而枝節的較爲次要的，注意反爲較早呢？蔣先生亦已指出其原因之所在。他道：

『人類的習慣，凡欲解決一問題，必先注意其顯而易見者而嘗試之；嘗試而失敗，乃進而求其隱而難見者。由淺入深，由流而源，都從經驗中得來』。

思想隱於心裏，的確不如武器政治社會之容易看見；再則他是難於捉摸的東西，所以大多數人簡直注意不到，就是少數人也還逃不了認識發展原則的支配——先具體而後抽象。而今而後，吾輩當知所勉矣。

英國經濟史家陶內先生說得好：『中國政治的上軌道及經濟的進步，最後要靠中國人民思想的改變』（見蔣廷黻先生譯『中國的教育』一文首）。譯者於榆關剛失陷時，看見許多大學生便開會討論提前放假，停止考試，並要求學校担保生命安全等問題，氣極了，說：『中國的大患，不在榆關，是在我們的心裏』！細細想，還不是麼？這心病是該治了，再不治更不得了。不過比較上生理的病好治，心理的困難。因爲個人既受過去習慣的支配，不易改；社會又有風俗拘束難於移。此人的問題之所以急待解決而又一時不能解決者也。人的問題不解決，中國的前途，無論在表面上如何有希望，在骨子裏總不能不令人悲觀；

就有翻身的機會，也會一再錯過。現在寇患已深，國勢日蹙。然古語有之：『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擱開種種不談，單以軍事來說，禦侮也要有人纔行。丁文江先生曾大發感慨道：『甲午中日開戰時，我們海軍的噸數船隻都在日本之上。何以海戰我們弄得一敗塗地？足見單有武器，沒有能運用武器的人，還是不行的』。他又說：『中國上上下下都是些低能的國民，都不知道新式的國家應該如何組織，如何統治。其中有許多人受的教育太粗淺了，人格沒有經過相當的陶鑄和修養，致利慾當前的時候，免不了要受誘惑。這是我們今天不能抵抗日本的根本原因』。請問，這根本原因，還不是人的問題麼？

宋子文於熱河輕輕斷送後，說中國的軍隊必需現代化，否則無抵抗之可言。又有些人說：不但軍隊要如此，行政組織及整個國家均要如此，方可圖存。如果『現代化』的意義即是『歐美化』，則切不可忘記了於武器，交通，城市，組織以及其他等等之外，人的本身，人的心理，也要歐美化纔行，否則還是不澈底。我到不是說人的問題解決了，便一切『豁然頓愈』。不過這是一個狼緊要的關鍵，也可以說是改造的焦點，不容忽視。

至於如何解決人的問題的問題，現只能約略提說兩點：即一方面要注意才智（包括知識與經驗）的增進，一方面還要注意品格的提高，即道德的修養，纔行。呆頭木腦的滿清官僚不成，自私自利的民國政客軍人也要不得。前者主要是知識不夠，結果可以喪權辱國；後者主要是利令智昏，結果也還是可以辱國喪權。兩者相差無幾，事實上等於『一邱之貉』。今後要想做真正嶄新的人物，一定要智德兼備纔成。否則只有才智，其禍國殃民的程度，也許尙爲紅頂花翎者所不及哩！蓋利弊相生：利大者害亦恒大也。才智譬如一把快刀，可以用來切菜，亦可以用來無故殺人。當今多人鄙棄道德，蔑視這民族生存社會組織的一重要原素，區區竊以爲未可也。以愚見所及，社會越進步，公共事業越發達，人們的道德須越高纔行——尤其是公德。否則勢必一場糊塗，還不如老子理想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更寧性回到猿猴猩猩茹毛飲血的時代之爲妙。最好不要高談什麼好聽的主義，夢想什麼世界的大同了。簡言之，道德是兩腳動物營共同生活必不可少的一因子，惟方式可以不同，可以修正，可以改進而已。這也許是我個人不大時髦的偏見。

二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附 答

叔 永

閔仁先生由歐洲寄來萬言長書，討論科學與中國的大問題，我們讀了十分高興。對於國聯教育考查團報告書中心理二字的解釋，我們和閔仁先生沒有甚麼不同。閔仁先生說，黃人的智力並不亞於白種，國聯教育考查團報告書的心理二字，似乎是指對於人生的態度，對於自然的態度，或者是指幾種他們（西方人）所通有對於治學行事作人的態度，而不是指他們天賦的聰明或特殊的能力。這些說法，我們是完全同意的。

閔仁先生接下去，便說西方人的人生態度，是老實，直率，負責，認真，有恒，肯幹等等，結果是征服天行以歸人用。中國的人生態度，是油滑，懶惰，苟且偷安，因陋就簡，不負責任，專檢便宜，結果是窮病交加，饑寒併降，不困災荒，便苦盜賊。總而言之，西方人的態度，是科學的態度，（因為科學必須要真實），牠的結果，便是科學的出現，發達，與其民族的繁榮昌盛。中國人的態度，是反科學的態度（因為中國人最喜歡虛偽偷巧），結果不但沒有科學發

生，而當前的種種災難，也就由之而起。這種看法，我們也是同意的。事實上，我們所提出的鴉與鷄子的問題，正是承認西方人與中國人這種心理的——即態度上的差異，並非指西方人有甚麼特殊的天賦才能。因為在教育考查團的報告書中，在我們的評論中，始終沒有提到天賦才能這一類的話。我們以為心理這一個字，無疑地是指普通做人行事的態度而言。如其因為文字上不曾解釋明白，引起了閔仁先生的誤解，那是我們覺得抱歉的。同時在這一方面，我們沒有甚麼不同的意見，也就很明白了。

我們要和閔仁先生討論的，是關於所謂科學的種子問題。閔仁先生說，『所謂科學的種子也者，顧名思義，似乎應當解作科學智識的微粒，胚子，至多是初步的ABC，而不是指有統系的大著作』。同時引了墨子的經，經說，小取，大取諸篇的說話來證明我們科學種子的存在。這些說法，我們自然也是早已聽見過的。不過我們的意思，以為凡是一個種子，在牠的本身必須具有發達生長的生機與潛能，不僅是

一些零星片斷的微粒。因此，說到科學的種子，歷史家雖然常常溯源到希臘的亞基米德 Archimedes，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等等，但嚴格地說來，我們以為須推重中世紀以實驗為學的洛皆培根 Roger Bacon 和近世紀提倡歸納論理的弗蘭西斯培根 Francis Bacon 在與批評斜塔上證明重力定律和用望遠鏡證明天文現象的蓋理略 Galileo 諸位先生。因為這幾位先生的方法和理論，給我們開了一道為學求理的新途徑，我們只要不是愚蠢如非洲的黑人，循了這條路徑，便可以得到科學的結果。反之，在這些先生們的方法和理論未出世以前，只是希臘時代的片斷智識，只是中古時代的宗教迷信，何嘗有甚麼科學？我希望這一番話可以使我們的意思明白。我們的意思，不但中國的墨子莊子淮南子抱朴子之流，中間偶然有幾句講到力學物理化學的話，算不得甚麼科學的種子；就是文藝復興以前的歐洲，文化燦爛的古希臘，他們的成就，也合近代的科學截然兩事。因為他們的觀點與方法，和近代科學不同，所以發達的路徑，也就不免分道揚鑣了。我們這一層話，也許和近人常常稱說的理論不盡相同，但是我們以為談近代科學問題，這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至於一種學問，何以忽然於某時代某民族之間發生，而於他時代他民族之間則否，則大部分要看民族的特殊心理，或者可以說民族的癖性 Temperament，小部分要看偶然的機運。我所謂癖性，自然是指上文所說的老實，認真，積極肯幹等等；我所謂機運，便是指的偶然有一兩位哲人大師，開了一條為學的大路，可以讓百千後學循着前進，如像到了新大陸，寶藏無窮。東方大師所指給後學的途徑，是向社會上討生活，是謀一個人的獨善，是向內發展的，所以他的限度不久就達到了。西方大師所指給後學的途徑，是探討自然界內的奧妙，是征服天然，是向外發展的，所以他的領域正在逐日擴大，絕不見有一個止境。自然，成功復召成功，這種探討自然征服天行的態度，漸漸的也應用到一切社會問題上去，那便成了目下的世界局面。不過探本溯源，我們不要注意到普通一般的態度，心理，而忘記了這些新方法新論理的起點——這是我所指的科學種子。

由特殊心理到科學方法，在西方是一貫的，閔仁先生說，這不是雞子與雞的先後問題，是雞生雞子的问题。這個話是對的。可是我們如承認中國人的心理

自來是不科學的，那末，說到介紹科學到中國來，便成了雞與鷄子的先後問題了。不過我們以為這不足為慮。一個民族在智識上的進步，各有所偏，這是天生的差別，所謂『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世界大通的時代，我們儘有截長補短的可能。我們平常所吃的葡萄，玉米，那一樣不是從外國來的？我們說科學的種子可以移植於世界任何處所，只要有適宜的土地與營養料就行。我們所謂土地，自然是指一般民族的智識程度，我們所謂營養料，自然是指社會上對於科學

的信仰與扶助——合一般人乘對於為學治事的態度在內的。歐美人先有了特殊的心理（依照教育考查團的說法）或科學的態度（依閔仁先生的說法）而發生科學，我們只有欽佩，只有羨慕。我們因為缺乏科學的態度，却只好借重西方科學的方法——科學的種子，來改革我們的心理，彌補我們的缺憾。這是我們當前的責任，也是我個人的主張，不知閔仁先生以為何如？

二十二，八，二十八，

本 刊	前 數	期 的	要 目
<p>第六十一號</p> <p>這一星期 論妥協並答天津益世報 再論銀協定 智識份子下鄉難 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批評 讀一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後</p> <p>蔣廷黻 守愚 吳景超 周炳琳 黃平凡</p>	<p>第六十四號</p> <p>造亂與止亂 農收局——條智識份子下鄉之路 中國的雜誌界 論博士考試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 關謬（續）</p> <p>任鴻雋 吳景超 畢樹棠 胡先驥 嚴仁廣</p>	<p>第六十二號</p> <p>這一星期 中國應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君達） 政府與娛樂（廷黻） 經濟建設與技術合作 一九三二年滿洲國對外貿易之一瞥 關謬</p> <p>君 達 嚴仁廣 劉學濬譯</p>	<p>第六十五號</p> <p>黃河的警告 關於民族復興的一個問題 高中畢業生國文程度一斑 聽聽人家罵我們的話 還是心理與人的問題（歐洲通信）</p> <p>詠 寬 希 馨 佩 弦 君 達 閔 仁</p>

我們目前對於中央最要的希望

蔣廷黻

宋子文氏一到上海，國人對他的期望可說是與他所受的歡迎作正比例。第一，華北的政委主席黃郛氏及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氏都在南方等着他，望他能給華北相當財政的援助。這種期望是極自然的，並且也是極正當的。冀察二省現處兵多民困的境遇，非得中央的援助是不能度日的。何況這兩省都是衝要的邊省？內部的安寧及人民的富庶在在皆與國防有關。不過近數月來，華北的當局只能顧

已表示關懷。我們希望宋氏拿二年前防堵長江的精神來治理黃河。或者河北及察哈爾二省的裁軍能與治河並行：一部份的治河費用就可同時作為編遣費用。

目前，不能顧將來。原有的軍隊，不問其戰鬥力如何，紀律如何，功罪如何，概給以保存。此外土匪，偽軍，義勇軍新收編者亦在不少。為權宜之計，勢不得不出此：這是我們應該原諒的。同時此種局面若不整理，中央無源源接濟的能力，也沒有源源接濟的道理。中央的接濟，事實上，道理上，不能不遞減。我們希望華北當局對華北的軍隊，不問其系統如何，專按其各部之戰鬥力，紀律，及對國家的功罪，定一個縮編的方案，分步的但嚴厲的去執行。

此外國人對於宋氏的期望甚多，我們不必列舉，我們自己對於宋氏回國以後的中央也有一種期望，我們認為是最重要的。我們期望中央從此更加團結，汪蔣宋三人的合作更加密切。

第二，黃河水災的救濟及水流的防治也是迫不及待的。所可幸的，中央對此已有相當的注意；宋氏歸國之初亦

中國問題之大，及其方面之多，無須我們贅述，國人早已知之。汪蔣宋三人各有其特殊經驗和地位，合作以應付這嚴重的時局或能濟事；分化則中央在國內及國際上的權威則必大遭減殺。

宋氏這次在歐美的活動引起許多無根的誤會。這種誤會不但在日本發生，連在國內也會發生。日本的誤會值不得多辯，因為宋氏實際所作到的不過兩件事，促進國聯技術合作及棉麥借款。國聯與中國的合作限於技術，且起始在九一八以前。無論有無中日的衝突，中國借外資及外國技師以求建設是勢的所必行的，是中國近百年歷史趨勢。

至於棉麥借款，在美國方面，是一種農村救濟政策，我恐怕此中沒有絲毫幫助中國抗日的意思。美國政府全盤的政策，不分外交內政，都是以經濟復興爲其大前題。說美國別有作用者實際自己別有作用。在中國方面，雖汪蔣宋三人屢次宣言棉麥借款只用於建設，我恐怕實際作不到。現在中央財源如此枯竭，用運又如此浩繁，事實上這批借款不得不部份的，甚至於大部份的移作政費及救災與救荒的費用。以國聯技術合作及棉麥借款爲中國政治之新轉機者都是神經過敏。同時國人對宋氏在外國的活動也不免無中生有，過事誇大。有人以爲宋氏在外國不必如此招搖，如此宣傳。殊不知在此宣傳的世界，不宣傳則不能活動。宋氏的宣傳亦有出于不得已者。同時宋氏的宣傳大部份不是自己宣傳，是爲國家及政府宣傳。當宋氏在倫敦的時候，泰晤士報的社評，一則曰南京政府爲中國惟一有希望之政府，二則曰蔣宋政府以往成績尙差強人意。於此可知宋氏並不是在外國出個人風頭，爲自己抬高身價。

誤會除開，政策又怎樣？現在汪蔣宋三人是否有政策的爭執？先就外交言：據我們所知，中國目前所能有的外交政策就是汪先生近幾次在國府紀念週所發表的。我們目前談不到復仇，因爲談是空談，空談只能有害而無益。我

們不但內部的充實剛在起始，就是外交的運用亦剛在起始。除非內部充實，及外交聯絡到相當程度，唱高調者都是誤國者。在宋氏出國的時候，國內輿論尙未盡去掉客氣；政界領袖尙不敢公開的說：目前的工作在充實內部，不在似戰非戰的抵抗。現在國內的空氣大不同了。唱高調者也不唱了。以宋氏的精明斷不至落伍。就內政言，目前的急務，無疑的，在力求團結，在避免一切風波。宋氏歸國之初，即以團結勉國人，這可以推知宋氏在外所受的激刺，和他自己的態度。現在汪蔣宋三人近來的言行，似乎在內政上也沒有什麼政策的衝突。我們所希望的，是由汪蔣宋三人的合作，進而達到西南合作的結果。

政策如此，利害又怎樣？關於這一點，局外的人不應有所揣測。不過我以爲就三人各自的事業言，合作有百益而無一害，分化有百害而無一益。國人近二十年來飽嘗了要人爭執的苦頭。現在一聞爭執衝突，無暇來分別是非，總是一句判語：爭執者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對。三人以自己的政治生活爲重自然不願自絕於國人。但是講合作，不能不行分工。管兵者不能兼管財政；任財政者，不能兼握兵權；總其成者，務須盡調劑之責，理大綱而不問細則。同時若三人以國事的成敗爲目的，置個人的成敗於度外，則進一步的團結與合作不難現了。

注意兩種入學考試的副產物

逸民

每年七八兩個月是全國各學校忙着招考新生的時候。

學校一般的考試，學期的或學年的，現在不是一概蠲免，便是有名無實（這個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例外），而入學考試却是異常鄭重，絲毫不苟，差不多沒有一個學校不是這樣的。在一般考試退化的時候，居然還有絕不含糊的入學考試淺存着，嚴格的甄別男女少年求學的能力，與以差別待遇，也可謂「慰情聊勝無」了。

招考新生的情形，各學校各有不同。在中小學校裡，一切自然簡單，若在大學校裡，頗是一樁大事。登廣告，接收報名，預備試場試卷，如果在兩三個地方招考，還須派專員到外埠主持考試，通告教員出試題，如果教員懶惰，還須發信一再催促，印刷試題，為防備試題的洩漏，還須用十二分安全的方法，保持秘密，監督考試，請教員閱卷，計算並登記分數，種種手續，十分費事費錢。所以在大而闊的學校裡，為招考新生而動員盈百，動款逾千，並不算什麼稀奇的。入學考試，在教育上實在是一個大典。研究教育的人，如果拿他做一個題目來研究，一定是值得

的。如果有好事之徒按科學管理的方法將考試的全手續都規畫清楚，採用最進步的智慧測驗的方法，並最合理的計算分數的方法，將各種考試的內容，做出精密的設計，一定是教育上最有價值的工作。這種規畫與設計對於學校的事務與經費都可以節省，即對於選拔真實的材能，也必有不少的幫助。

如何改良現在的入學考試，是一個大的問題，如上所說，是有待於研究，設計的。我現在所要說的是在現在考試制度之下，可行，應行，而學校當局向不注意，或不肯注意的幾個問題。以下所說，特別是對於大學，至少是高中程度的學校。如果與中學有關係時，自然也提出。

第一是發表試題。我不知道為什麼緣故，在學生受入學考試的時候，題紙一概都不許拿出，在考試之後，學校也絕不肯將試題發表。我委實不知道。在學校方面，或者——這是我的揣測——恐怕有什麼試題會引出外邊無聊的指摘與批評。自從報紙上設了所謂讀者論壇與教授外史之後，教育界或者發現了不安，不願多惹是非。但這個怕外

邊指摘，不足成爲秘密試題的理由。如果試題是合理的，又何必怕什麼批評。另一個揣測，或者學校怕在發表試題以後，應試者使用來爲揣摩之工具。這個怕懼也是毫無理由的。在八股文科舉時代，揣摩列爲大忌，（參看張之洞的輜軒語）。因爲文章本無定評，各人之嗜好不同。所以考生如偵知考官之脾氣迎合考官的心理，而放棄他自己的學問文章，便是沒出息。現在的考試，是考試智慧，知識與能力。都可以用客觀的標準去判定。由試題的解答可以看出應試者在這三方面的造詣如何。假如中國歷史試題是述項羽一生之事蹟，當然與項羽論完全不同。前者祇要正確的客觀事實的陳述即可及格，後者則完全是主觀的論斷，褒之貶之，從心所欲，祇要文章做得好，（特別是在八股文裏），道理雖然「狗屁不通」，也許可以及格；至於文章的體裁，或質素，或典雅，或駢麗，則更變化繁多一依考官的好惡。這都是給人揣摩的機會，而現代考試所無的。從此看來，發表試題在現在，並沒有什麼流弊。不特沒有流弊，反而有極大的好處。第一，發表試題可以報告社會這個學校所希望的學生，是能夠滿意的答復這些試題的。不能答復這些問題，不配做這個學校的學生。第二發表試題可以使應試的學生知道如何預備各種功課，預備到

何種程度，才配到這個學校來應試。如果自己看了試題覺得不能做出滿意的答案，便應該多費些時日去預備，免得白來應試。試題的披露是宣布學校招考的標準（普通學校招生，雖然也列學科的標準，但學科的標準太嫌籠統，試題所顯示的標準，則較精確。科學的進步，在乎求精確，何以考試上不必求精確呢？），也是給預備應試的準備一切的標準。我所以主張自今年爲始各大學，各專科學校，將本年一切考試的題目都發表出來，並且以後每年都如此辦理。這些試題，都在那裏，都是入學考試的不必再加工作的副產物，發表出來，並不繁雜，又何樂而不爲呢？

第二是發表應考者的統計。每年在各大學校報考的人數，不得而知。我想在大學報考者至少總在一萬五千以上，在各中學報考者至少十倍於此（這兩個數目完全是我的臆測，未必，或者可說一定不會正確，但與本是無關。）關於這十幾萬的投考者，有許多的事實是值得我們知道的。聽說本年清華大學招考新生，報名者在兩千以上，我們就極願意知道他們男女所占的比例如何，他們男子平均年齡是多少，衆數（mode）年齡是多少（女子年齡不必問，全是十八歲），他們都是何處籍貫，何處的何種學校畢業等等問題。如果這樣的統計各學校都可以精細的做出，

他可以告訴我們下列的有用的事實。

- 一，學生的男女的比例
- 二，學生的年齡
- 三，學生的籍貫
- 四，學生的學歷
- 五，學生家長的職業
- 六，學生的志願
- 七，落第及及格學生的以上各項的分配

這些都是研究教育，研究社會最難得的，最有價值的資料。在現在中國統計資料貧乏的時候，各學校每年如能得這一類的統計做去，公諸社會，那真是功德無量。這個統計的原料都有報名單與入學志願書上。不過是招考新生的副產物，祇待取用罷了。外人常批評中國人無能力，寶藏委諸地而不能利用，像這種資料，也可以說是學術的寶藏，而教育家，社會科學家怠惰性成也竟棄棄不用，可勝浩歎。我應該聲明這種資料所揭示的事實並不是專為滿足我們的好奇心，他還有極重要的意義。現在就拿學生的籍貫來說。假使我們從多少大學的統計，可以看出各省各縣各市的應試的與及格的學生的比例分配來，我們便以測知各地方的教育情形，或者可以說是文化情形。而丁文江氏

根據二十二史的中國人才分配的研究也就不能專美於前了。籍貫的統計有的人或者已嫌他有毛病，但我相信他也有相當的重要的價值，值此處暫且不論。再拿學歷來說，假使每個學校可以將應試者及及格者的學歷及二者之比例每年宣布一次，我們多少可以看出各中學或小學校的情形。最近有人告訴我歷來清華大學的入學試驗及格的，以北平師大附中與天津的南開的投考者為最多。還有人告訴我，有一年武漢大學招考新生，結果在湖北省中學畢業的竟無一人被錄取。這兩種消息正確與否固然待考。如果我所主張的統計能夠做出，便可一目了然。我們不特能夠知道那個學校的畢業生入大學的機會多，並且還可以知道那個學校的畢業生及格的機會少，或竟無機會，除非他們以後教法改良進步。從此看來，這種統計頗有促進中小學教育的力量。那些辦理不善的中小學或者不歡迎這種統計，但是為得罪幾個誤人子弟的教員，而謀整個教育的進步，救濟無數的青年繼續受當今惡劣教育的影響，又何樂而不為呢？

我在上邊所舉出的兩個提議平淡無奇，但從他的意義看來，都異常重要。我懇切的希望各學校當局接受這兩個提議。製造統計或者較為費事，但在大學裏，有的是統計學教育學的大教授們，何不用來訓練他們的學生們，練習

製作。在中學校裏，教員中當亦有曾受統計訓練的，似乎也未嘗不可試作。

整頓教育與考試制度

鳴岐

近數年來，因為中國現狀之混亂，有一部分偉人策士認為清混亂之源，必從整頓教育入手，其有迷信教育為萬能者。於是整頓教育之聲，高翔雲表，瀰漫全國。除教育當局屢有整頓之計畫外，在野的教育專家或關心教育者，亦都爭論不休。言學風之壞和學校腐敗情形者，要以旭生先生的『教育罪言』各篇，（分載獨立評論二十五至三十八各期）說得最痛快。但他欲以農村教育代替一切，引起吳景超先生的不同意。（見獨立評論第四十期農村教育與都市教育篇）。最近君衡先生又有『如何整頓大學教育』的位論（見獨立評論五八，五九期），他主張大學教育要在培養治學人材，與專門教育分途并進，藉以反對教育職業化的論調。我對於他這一點主張完全贊同。其他論點，略可不敢苟同處，以下順便論及，但也無關要旨。我的根本主張是要廢除大學校內一切欽定的考試，代以國家學士碩士等考試，為整頓我國大學教育之入手辦法。廢除考試的理論，大教育家哲學家杜威已曾述及，附和者亦大有人

在，此處無暇談，且不必談。我所要說的，是在藉此整頓教育，與主張學校應嚴格考試整以頓教育者，恰相反對。現在中等學校畢業考試，已用會考制代替個別學校的考試，不贊成的當然有人，但我覺得會考制為優。今歲蘇魯皖湘等省及上海特別市舉行會考，縱有一二處發生風潮和弊竇（如洩漏試題等），要非會考制本身之弊，而由於舉行者之不力。若以國家學士碩士等考試代替大學畢業考試，其制與會考略同，但不強迫大學生去應學士等頭銜考試，聽其自由應考，舉行自亦較易。現就鄙見所及，認為廢除學校考試，藉以整頓大學教育者，約有下列幾點可言。

（一）不良的學校可以自然淘汰，無煩教部三令五申，今日言整理，明日談改革。蓋學生進大學，無論其為求學問，為謀出路，結果對於一紙畢業文憑，無不樂於求得，其却而勿受者，實在少之又少幾等於零。尤其是進不良的學校，大半係文憑主義者。今將學校考試廢除，任何學校不得發給文憑。學生之欲得文憑者，可自由向國家考試

機關要求學士碩士等考試。如此辦法，則學生之爲求學問或謀出路者，自然願進良好大學，無待証言。即欲得文憑者，亦將發奮努力，改進良好學校，以備其數年後易於考得學位。因此，不良學校的學生數目將日見減少，其係私立者，將無學費以維持其存在，其屬公立者，將無面目以自存。教部淘汰不良學校的方法，以此爲最簡單。

(2) 學校內無謂的風潮，可以減少，學風亦可改善。近數年中的學潮，原因固甚複雜，各校雖各有其原因，但學校的考試亦往往爲釀無謂風潮之起因。學生求知者雖多，但對於學校考試根本不贊成而迫于不得已應考者，和不用功的學生一樣地畏考。所以一遇着可以不考的機會，反對考試者，總是佔多數。比如今年榆關事件，北平學生南歸者甚衆，當時論者輒詆學生爲不愛國而逃走，其實與其謂爲不愛國，不如謂其不愛考之較爲近情。不然，四五月間，倭兵迫近舊京，各學校之絃誦，爲何不輟呢？如果學校考試廢除，求知的學生，無非所願的考試事件來騷擾他，一定格外用功，成就也愈大。爲功名或麪包的學生，也要用功讀書，以期金榜題名，得一學士或其他學位，藉此問世。如此學生安心讀書者多，無謂的風潮，亦無從起。學校的考試廢除，學生選修的科目比較自由，對於不景

仰的先生，也可不去聽講；真正的飯桶教師，自然會被淘汰，用不着驅逐的方法，以掀起意外的風潮。即有名的教師，也得時時提起精神講學，免得這一堂敷衍，下一堂將無人上課。如此師生交相勉勵，學風將蔚然丕變。旭生先生的罪言，至少要減去大半，豈非至善？

(3) 一切所謂整頓教育的枝節問題，可以免除。黨國要人登高一呼曰「停辦文科……」，一般人士應之曰，「教育職業化一，而教育當局今日下令曰，「某校或某學院某科停辦或停止招生……」，明日又下令曰，「任何學校招生，文法科學額，不得超過理工等科……」。今年大學校招生，即有理工科學生特別多，文法科特別少者。所有以上的言論，命令，行動，鬧得烏烟瘴氣，枝節橫生，究非根本辦法。若以國家給予學位及高等考試等方法以資整理，則辦法統一，事半功倍。如國家需要農工醫等技術人材，於舉行學位考試時，將此等科目學位名額增多，因此取得理工科學位較文法科爲易，學生耳目爲之轉移，於投考大學時，自必加以決擇。再國家舉行高等考試時，如需要理工人才，儘可招考理工等科人員，將文法等科停止若干年，不予考試，如此則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不出數年，學風必不然一變，無待教育當局之枝節整頓，

而習文法者，自然減少，習理工者，自然加多。（文法科與理工科學生多寡的是非問題，不在本篇討論之列）。

現時國家給予學位之考試既未舉行，而高等考試於舉行第一次考試時，即未考試農工醫等科目。本年十月將舉行第二次考試，又未將農工醫等科目列入，（據大公報八月二十日所載：考試種類，（甲）普通行政人員，（乙）財務行政人員，（丙）教育行政人員，（丁）會計人員，（戊）統計人員，（己）外交官領事官，（庚）司法官……）。是國家教育機關，命令注重農工科，而考試機關，不聘用習農工科者，不啻廢除農工科。益見國家行政方針的衝突，南轅北轍，究竟到甚麼地方呢？

復次，廢除學校的考試，代以國家學位的考試，則一切學校派別與門戶之見，亦可免除。學生肄業之學校雖各列，但取得學位之機關則屬同一，可藉此引起以前「同年」之觀念，無形消滅其學校派別之暗潮。這是整頓教育的副產所得品，也有點用處。

至學校廢除一切考試後，招生的考試，也不必一定舉行。凡中等學校會考及格者，皆得自由入任何學校，唯某校因某教室或試驗室容量甚小者，對於報名過多之學生，可加以甄別試驗。學校之課程與設備一概仍舊，并可因時

更改，學生所習科目與肄業年限，悉聽其自由。如有肄業一年或二年，欲往社會某機關工作者，學校只給以肄業證明書，填注肄業年限并所習科目。如學生要求某種學科成績證明書，則應先期向學校要求給以考試。學校雖一年舉行成績考試一次，非欽定的，乃由學生自由參加，毫不勉強。不過欲參加某種學科考試者，應上課或實習若干小時，方可准允。

學位考試之機關，并其如何組織，非本篇重要論點，曾見某報載有是項言論，以健忘故，容待檢討。不過我所主張的學位考試機關，不僅考試學士，作一大學會考機關，即碩士博士的學位考試，亦由是項機關辦理。以後留學生儘管往外國讀書，而學位應由本國給予，這是整頓高級教育的應有的主張。

最後還有一點要聲明的，我主張以國家給予學位的考試來代替學校的考試，讀者必以為這不是恢復科舉制度？我對於科舉的攷試是不反對的，只反對以前的科舉科目，全屬文學辭章之類。現在的高等攷試科目以社會科學為限，其偏而不周，與以前科舉同弊，我也是反對的。同時我并非主張以國家給予學位的攷試來作大學學生唯一的出路。大學生有天才，專心治學而不屑于應學位攷試者，只要

有所表見，社會也當予以敬仰和鼓勵。蓋主張廢除學校一切欽定的考試，正爲有天才而努力的學生除一大妨礙。

一九三三，八，二六於北平

第三國際的戰略

震東譯

目下中國的共產黨活動與第三國際有密切關係，是人知道的，可是第三國際自己的情形是怎樣，却少有人能知道。本篇的作者爲 Joseph Barnes，是太平洋國際學會美國分會的會員，曾經幾次遍遊蘇俄，遠東及歐洲，并曾在蘇俄住過兩次。他研究第三國際政策多年。本文譯自 The Annals of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七月出版號，可供留心第三國際事迹者的參考。——編者

自從世界工人首倡聯合以求擺脫枷鎖以來，至今已八十五年了。他的創始人，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的作者，在今年五月正爲全世界的千百萬的信徒紀念他的死期五十週年。在這個長時間中，卡爾馬克斯的思想受過不少的奇異的變化。大凡一個教義的解釋總免不了曲解與修正。然而，到歐洲大戰時爲止，那第一次宣言裏的要點中只有他的如國際主義才沒有受過一切派別的偏扭。原來這世界

一切工人的大團結和世界革命的兩個目標，是千百次革命運動與多次國際聯合的基礎。

當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雪維克黨奪獲了俄皇的統治權的時候，馬克斯的學說方纔從他的辨証法唯物論譯成爲有統治力的命令與教條。那時一批曾經居住維也納，紐約，瑞士等地的革命家，正想要把他們的國際主義實用到斯拉夫，阿爾墨尼亞，蒙古，土爾其，和愛斯基莫士等等的帝國去。廣義地說來，他們自己在家裏的地位方纔穩當，立刻又去應付世界上各種族國家的問題。經過多年的密秘活動，他們獻身於國際的，全世界的工作。現在他們雖然在一方獲得了勢力，但圍繞四圍的各種民族，依然不願接受他們的榜樣。俄國共產黨因爲被飢饉，機械的缺乏，和要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求生存所逼迫，不得不與自己的信仰拚命掙扎。這個掙扎就是第三國際的歷史。現在，在革命運動以內和以外的人，頗有不少的認爲第三國際已失掉了

他的國際意義了。

第三國際的由來

這個建制最早的根源，脫不了革命的國際主義之相沿的模型。在歐戰期中，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士瑞的 ZIMMERWALD 與 KIENTHAL 兩地。有一小羣革命領袖和擁戴他們的同志，代表了差不多各戰國，在那裏集會，反對戰爭。從那個小小的瑞士村落裏，這一羣被人忘却了的亡命者，起來反對戰爭的領袖，號召兩對方的工人叫他們放下武器，自然是比較容易的。本來他們除了自己的理想而外，不負什麼責任。其中只有一位列寧是真有信仰的，以為對權力的負責不是一個空想，而是差不多在他手裏把握着能實現的事體。

三年以後，一九一九的三月，當那一夥亡命者中的多數人又重新會聚正式成立第三國際的時候，是在莫斯科，就在克母寧 (KREMLIN) 的地方了。那時只代表了十二國，但在這十二國之中，有一國的革命已成了過去的歷史而和其他一些國家理論上之不可能者相去已遠。至一九二〇年七月，第二次世界會議開會時，國際的根基更為擴大，有三十七國參加，那時紅軍已到了瓦薩城外，外國干涉的危機已經過了，而白軍剛被有組織的勢力驅逐出俄國境

地。在這次會議閉會以前，設立了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的合機關，一個世界革命的總指揮部。

這個總指揮部的機關，就留在莫斯科，他的領袖們是從俄國的各等人才裏選拔出來的，在各國代表當中只有他們是經過了一次火的洗禮的。所以在蘇聯掌握政權的人，即是指導在他處爭奪政權的人，事屬當然了。這到現在仍是這樣，而且明白俄國的背景，實在是了解第三國際的戰略最重要的一點。牠在俄國共產主義政府的命運與世界革命的策略二者之間成立了一個密接的連環，而且在許多重要方面，變化了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所給與世界革命的國際性質。

目的和組織

這種俄國的代辦制，無論他的真實重要為何如，從來沒有任其是破壞了國際組織的方式，這方式從開始以來，就把第三國際奉為世界革命的領導。會章上述明國際共產黨是——

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導與組織者，努力爭取無產階級的大多數和貧農的廣大層，為世界無產階級專政之建立而奮鬥，為世界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之建立而奮鬥。

這個說法現在依然不變。飄揚於勞動節的莫斯科之宣傳旗幟上，仍是用各國文字寫着這些話。現在有五十多個國家派了代表去參加第三國際的幹部。五十位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中有五俄個國人。在組織的形式與目的上，他的國際之名倒也未會破損過。

雖然，在這個國際裏也有一些特點伏在他形式組織之下，而深切地影響到他的國際性質。有位英國的學者曾經說過，他好像羅馬的天主教堂。民主中央制的原則，在這個國際組織裏面，和在每個會員團體裏面一樣的普遍着。換言之，即各國的黨部並非自動的單位，而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的附屬部份而已。政策可以自由的討論，到了表決的時候，就絕無再議與反對的了。那個時候，一個議案如已通過，一個政策如已決定，抗議是嚴厲的禁止的。這些決議就付交各國的共產黨和他的黨員去執行。無論有什麼犧牲，他絕無猶豫地履行這種訓練。共產黨人在這個進程中被人屠殺得不少，同時意見分歧也發生得如像野草。然而，他的首領們並不動搖他們的決心，在主義與實踐兩方面鐵的紀律都得同樣的保存着。

自然，這已是把大權放在少數人的手中了。在世界大會休會的時候，大權是授與在莫斯科會集的執行委員會的

。然而一個五六十位會員的幹部，也不容易指揮如意。更進一步的中央集權，是由一個主席團和其中的一個政治書記所支配。這就是世界革命的策動機關之最後一部人員了。

至於共產黨的領袖們，他們自己就是野戰將軍，實行他們早經計劃好的戰鬥策略。這些策略就不是十分嚴格的了，如像德國的共產黨，在議會中占有一百議席，在意大利，匈牙利，中國，日本等處共黨組織，則被認為不法的秘密活動，只是一個簡單的策略就不敷應用。本來五十多個出席第三國際的各國家內都各有他不同的問題。再者，特別在西方，許多共產黨的活動，都借表面組織來進行，要想用這些方法來影響同業組合，以及青年，智識份子或農民等，因此就發生了各種不同的問題。要應付這個局面，自然不能不有一些彈性的方法。同時第三國際的作用，依然是信仰的保障者和正統派的公斷機關，而且他的議案依然決之於莫斯科。

所謂正統派者，和一切激進的社會思想一樣，已成為一種信仰的形式。積半世紀以上之理論的探討與兩位不倦的哲學家，馬克斯和恩格斯，的辛苦，在俄國革命多年前，正統教義已經訂入有力而又明白的條件裏。只是，他

們并不知道二十世紀的情形。因此要求適合於近代的世
界，須把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基礎加以擴充，這就是列寧的
著述所貢獻於正統派馬克斯主義的一個工作。在他的財政
資本論和帝國主義的分析中，以及他的社會革命的動力說
中，列寧把馬克斯主義採用來以適合他自己的時代。

影響遠東的列寧理論

在這些修正中的首先一個，對遠東，就有很深的意義。
據列寧的理論說，帝國主義為工業國家的工人與殖民地
被壓迫的人民兩者間之聯合，造就了一個經濟的基礎，也
就是中國，日本和太平洋沿岸各地的一切共產黨工作的根
基。這個修正的重要不容易過分誇大。東方革命已由有階
級意識的製造業工人而推廣到大多數的農民和蠻族了。歐
戰以後從歐洲東漸的，民族主義思潮，理論上，變成了一
個有勢力的聯盟。被資本制度所剝削的無產階級，理論上
，也在中國為帝國主義所剝削的苦力中發見了一個同志。

這不僅是馬克斯主義的一個修正而已，這也是第三國
際歷史中一回戰略上的重大的變遷。在波斯，中國，印度
，或者日本，早已有過許多的分子在等待這個消息了。因
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興趣是淺薄而淡漠的，也如他們對
於共產主義的了解一樣。但他們對自由，對民族自決的慾

望却是個很重要的力量。這兩種希望是共產黨允為他們爭
取的。孫中山之與莫斯科聯合，結果遂有第二次中國革命
，那時引誘他的不是馬克斯而是列寧了。

第三國際自開場以來，從沒有放鬆過與他的這等機會
。甚至在他們自己的西北利亞領土還未恢復以前，俄國的
宣傳機關就已到了中國。在第三國際內設立的第一個永久
部門就是他的東方區分部。中國和日本的學生都邀請到莫
斯科去，蒙古的部落也送到特別的訓練學校，并且一個全
體的戰略計劃也規劃出來了。一九二五年，中山大學在莫
斯科成立，專收中國學生，而俄國的教師也在中國的黃浦
軍官學校工作起來。

因第三國際在莫斯科的關係，列寧的理論立刻以事實
的證驗而得到最高的法定地位。在一次真實的農民鬥爭情
形之下，他的判斷證明了是正確的，他的處理方法也得到
了成功。這對於革命運動之重要迥非習見於一般紙上空談
者可比了。列寧在統治俄國的時候，同時成為世界革命的
領袖，他的黨從也未放棄過他的指揮地位。結果就是國際
共產黨是在一批革命素有經驗的頭等人物指導之下的。還
有一個更重要的結果就是蘇聯與第三國際的命運是相互緊
連着的。

戰略的變遷

因為上面所說的關係，在蘇聯歷史中的兩大劃分點，同時標誌出第三國際發展中的主要轉變。第一個是一九二一——二二年列寧所引用的新經濟政策，一個對內爭鬥的戰略上的退步。因為飢饉，內戰，和爲了修正布爾雪維克黨最初採行的軍事共產程序中所生的障礙等等的關係，列寧迫不得已施行一時緩衝之計，讓私有貿易仍然復活。幾乎在同時，也爲了同樣的原因，第三國際也有武力的弛緩。在一九二七——二八年，緩衝的時期已經達到了目的之後，俄國的領袖們就採行了他們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的奮鬥，這個奮鬥至今仍繼續着。第三國際也在他的政策上經過同樣的轉變。一九二二年所採用的與其他工黨的「聯合戰綫」被拋棄了。世界革命的戰略大大的變更了，新的方略，直到現在，成爲許多辨難的主題。無論左翼共產黨所謂的第三國際已經死亡的話是否正確，總之他是大大的放棄了從前行動的方法了。要了解這個新開展的意義，須先回溯到他發生的背景。

第一次戰略的變更是在一九二一——二二年，是歐戰

當然的結果。戰後歐洲局勢的混沌，至使已維里亞與匈牙利有蘇維埃組織之可能，雖爲時甚短，但很嚴重。在德，意，芬蘭等國的叛亂，已經有效地壓制住了。在遠東，一九一八年日本的米亂，是東方人對布爾雪維克失望的開始。所以外面的世界，也如蘇俄國內一般，要求穩定就必須一個戰略上的退步。

這次退步，在俄國國內叫做新經濟政策，在國外叫做「聯合戰綫」。這個政策最先在一九二一年底爲國際第三次世界大會所採用，在與其他工黨合作的羣衆當中遺下了教育工作和宣傳的深入兩特點。在西歐這政策包含得有與社會民主黨合作的普通戰綫。在東方，他是與民族主義新興的勢力相聯合的。直到一九二八年的第六次大會爲止，這個聯合戰綫爲全世界共產黨政策的基調。主義的迷信暫時忘掉了，第三國際的忠實黨員和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以至民族主義的愛國者，都攜手合作起來。這自然純粹是共產黨戰略的一種。一位英國的自由黨人曾借了拉興（RACINE）的話來描寫道：「我擁抱了我的敵人，但最好是把他扼死。」（未完）

新都隨感錄

布口

府委—中委

我六月底南下省親，全車南下者有某國府委員。隨從簡單，和普通乘客一樣。到浦口時，來站歡迎者，也不過三五人。這樣冷淡情形使得我想起去年在察哈爾採集時的經驗。我們住在蔚縣小五台山中一個小廟內。這個廟離村鎮五六里，附近沒有人家。一天夜裏，忽然聽得牆外人聲喧雜，山門打得鼓響。我心裏很有一點戒懼，疑惑是盜匪光顧。過一刻，人聲漸漸的向我們院內來，又聽見步鎗拖地的聲音，我覺得我的疑心也許證實了。正在想自處方法的時候，外邊有一粗暴的聲音嚷快起來。因為我是領隊，只好硬着頭皮起來開門。立時進來一位武裝『全志』，很嚴厲的問我們是幹什麼的。我看樣兒不像是綠林的英雄，就將我們的護照給他看。看過後臉色比較緩和一點。我就問他，爲什麼在深夜到荒寺中來巡查？他說晚間區公安局得到蔚縣縣長的電話，說有一位由南京下來的中委到察哈爾調查實業明日要來逛小五台山。區公安局長派他們來清查一些，此地是否容留有什麼閒雜人等，免得明日中委來

逛山時發生不便。接着說，你們既有公事那沒有什麼，就掉頭而去。

到了第二日我們一早起來，正預備出外採集，已聽山門外人喊馬嘶。廟中各處佈滿崗位。隨後陸續的來了許多穿長衫及穿中山裝的人們。聽說全是些什麼科長，局長，區長，科員等不下二三十人。我的同伴要瞻仰中委的丰采，我們就變更計劃，等他一等。可是左等右等也不見消息。我們只好出發工作去。回來後聽說這位中委坐了特製的小轎上山，在寺中逛了十餘分鐘就下山去了。中委的威風到現在還是歷歷如在目前。我的感想是寧願在南京遇到府委，不情願在鄉間遇到中委。

中山馬路

一個人到了新都，第一件引起他的注意，就是中山路。中山路非常之寬，共有五條路合在一起。中間是快車道，快車道的兩旁是慢車道，慢車道的兩旁是行人道。快車道和快車道之間是栽植的道路蔭樹。行人道用洋灰造成。快車道鋪的柏油面。慢車道鋪的碎石塊，狼有點不平。快

車道上不許慢車行。人力車，馬車算是慢車。（慢車道不曾修好的地方，人力車可走快車道）在新都坐人力車逛中山路狠有一點不舒服。所以一班慢車階級的朋友們頗以爲苦。我勸他們應該知足，有這慢車道走，已經算是萬幸了。我去年旅行的時候，由涿鹿縣到蔚縣的桃花堡，那兒壓根兒就沒有路。車馬從河底下走。因爲北方的河不下雨就是乾的，坐的是騾車。我因爲多年不坐這玩意兒，頭也不知道碰多少次。在半路上忽然遇了一陣很大的暴雨，車夫趕快的把車趕到河岸邊一塊較高的地方停住。不到一刻，忽然聽得乾河上游洶湧的水聲。混濁的黃水，就同萬馬奔馳，直滾而下。立時平地水深數尺。雨止後一二小時水少退，纔能起程，在水中繼續的趕路。如雨再大一點，或者再長一點，我們就得在露天過一夜。不小心時性命全有點危險。中山路的慢車道還覺不平，真是從何說起。

中央醫院

中央醫院建在舊皇城，現有尙未完全落成。從外表看規模和北平的協和醫院不相上下，還許宏大一點。真可替新都人士慶幸。可是我看了這樣新醫院，自然而然的想到去年察哈爾的情形。我們旅行時經過許多疫癘蔓延的村莊，簡直沒人管，我們帶去的十滴水成爲惟一的救濟藥品。

受過科學訓練的醫生，在這些地方不但未曾見過，恐怕聽見全沒聽見過。現在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醫生，全在大商埠或大城中行醫。在小縣份只有一些落伍的看護，和一班速成醫校卒業生，辦的野雞醫院。在村鎮上連這一班半瓶醋的醫生全沒有。就是在大城裏的醫士，也只爲閩人看病。我有一位朋友住在天津，有一天請了一位天津比較「紅」的醫生來看病。看完後一位老媽向某醫生說，河邊船上有一位老娘兒們，病得很重，請您去看一看。從我的朋友門口到河邊不過十幾步路。這位醫生一聲不響，跳上汽車嗚嗚而去。我希望衛生署諸公，于籌辦中央醫院，或上海醫院之外，也替大多數人想想辦法。

公共體育場

公共體育場在陵園東部，有網球場，國術場，棒球場，田競賽及足球場，跑馬場，及露天游泳池。每場四週都用洋灰建築的看檯。這真可算是東方偉大建築之一。但是距離市民太遠。從新都中心廣場新街口坐公共汽車來此需車費三角，來回就是六角。往來非常不便。去利用這偉大建築的人很少。去年游泳池開放的時候，只有「快車」階級纔能享受這種權利。因爲人太少，今年就沒有開放，池中也沒放水。我去觀光的時候只見池的一端積了少許雨水

，污濁異常。其他各競賽場中草有半人深。聽說中央圖書館，中央博物館也要建築在陵園中。我真有點莫明其妙。我的朋友告訴我，在體育館的附近有一計劃中的住宅區，前面十餘幢房屋就是。因為現在在該處造房者都是中委。新都的人都認為中委住宅區。我這纔恍然大悟。原來這許多建築，並不是為市民公用的。是一方面用來點綴陵園，一方面供各位中委奔走之餘來健身怡情的。

孫陵

孫陵在小茅山舊址，明陵的西邊。非常偉大。陵前有石牌坊一坐，牌坊後有一二里長數丈寬的洋灰甬道。數百級的石級。中有碑亭一座。最後是享殿，殿後是陵墓。兩旁草地，四週圍牆。氣魄偉大。美國國父華盛頓的墓簡直

歐洲通訊

對於國事的一點意見

記者先生

若說東北四省已亡，只有束手以待全國之淪亡，此之謂自暴棄，我所不取的。印度全國已淪亡一百多年，尙圖復興，詎可暫亡四省，即抱全國淪亡的悲觀呢？對於非

夠不上相比的資格。就是西邊的明陵也有一點『小巫見大巫』。如果真有天堂，二位民族英雄相見的時候，朱先生一定要向孫先生說，咱們君主專制的君權究竟不如你們黨治之下的黨權，我悔不生在五百年後！

總起來說，新都有寬闊的馬路，壯麗的新洋樓。真不愧為新時代的中華大國的首都。如果有一位西洋「阿木林」到南京來游歷，依照指定的路線走一蹓，回去一定要寫一篇大文章來恭維我們。說中國進步真快。南京並不比柏林華盛頓差。可是讓一位知道中國國情的人看得，恐怕要將這些『新建設』當作摩登『荷花大少』的西裝。他知道這是用借債和當當得來的錢，做的這一套騙人自騙的外場。可是家內妻兒老小，窮得赤身露體，餓得口裏淌清水！

現代和無組織與敵人一拚的主張，謂之紙上談兵，我所不忍提倡的。第一，一國復興，不在一拚，是在長期的團結和準備。治大國若烹小鮮，豈可將國事孤注一擲呢？第二，暫亡四省而謀復興，究竟較諸全國淪亡之後而復興

爲易。那末，今後國事，當作什麼主張呢？我的主張是「九分內政，一分外交。」外交並非幻術，其原意就是商議。商議不必專指紛爭以後的談判，亦指先見紛爭的將趨激烈，藉商議而和緩或消弭之。後者之商議，乃是外交之上乘。如俄之出售中東路，我國之錦州中立提議以及華北停戰，均是指後者之商議而言。許多國人，只知焦頭爛額之外交家，不知曲突徙薪之外交家，所以國民外交知識可謂幼稚。不過外交無論怎樣活用，此刻不能靠外交以收回東北四省，我所以說「一分外交。」此後四省之能否收復，全國之亡與不亡，繫於內政。對於內政之設施，千頭萬緒，但有一個根本要點，萬不可忽略。這個要點是什麼呢，就是學術能在國內獨立研究。現在政府的政策，與國際合作，從事各項建設，作爲臨時辦法，無可訾議的。不過一國學術，不能在國內自行研究，自求前進，那末一國之政

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的設施，總是落後的。舉個例子說罷。我國要抗日，紙大夫——俗稱士大夫，就是引經據典說廢話的人們——慷慨激昂，何濟於事呢？我們要有現代式軍隊軍艦以外，還要有戰事實業和戰事科學。那才可以與敵人背城借一。像現在的局面，軍器軍火，輸自外國，飛艇戰艦，在本國修理亦費事，有了抵抗，決不能長期的。所以貴刊第五十二三號合刊詠霓先生所說的，在國內對於科學有真實的貢獻，亦能逐漸養成專家，「這便是領導中國踏上現代化路上的最必要的第一步」真是一針見血之談，我亦以爲內政設施最必要的第一步。對於今後我國之前途，悲觀固速亡國，樂觀亦不能興國，惟有在這「領導中國踏上現代化路上的第一步」上先做工夫，方足以救國。國內不少憂時愛國的志士，想必能同情此言。

辛白 七月二十三日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全報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插圖，精美印刷，實爲平中第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報價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每月五角
（日本）每月一元
（南洋）每月一元
（海外）每月一元
零售每份五分

九一八—兩年以後

蔣廷黻

一切嚴重的國難都是國家和民族的試金石。我們若要知道一國人民的知識程度，組織能力，習尚與人生觀，我們最好的法子就是看這民族如何處置一個嚴重的國難。至於政府及軍隊，更用不着說，在國難之下，其強弱優劣都日然而然的暴露出來了。

九一八就是我們民族這樣的一種試金石。

爲計畫民族的前途計，我們也應該知道我們自己的長短成敗，應該知道在文化的過程之中，我們現在已經跑到什麼地點，以我們的本質，我們能否跑到最高的目的地。我們現在看看這中華民族，在九一八的試金石之下，表現什麼樣的民族性。

先論軍隊。因爲軍隊所受的試驗最深，又因爲軍隊就是民族的縮影。

我們的軍隊，從器械，組織，訓練，精神看起來，就盤說，簡直是一堆大混沌。飛機，汽車，洋車，大車，平輪的人力車，以及駱駝驢馬；野炮，機關槍，手流彈，大刀，以及高射砲；從上古人所用的器械到最近代人所用器械，無所不有，那一樣都不齊備。單就步槍一門說（

步槍是兵士作最基本的器械），我們軍隊裏面有江南製造局的，漢陽兵工廠的，鞏縣兵工廠的，德州兵工廠的，太原兵工廠的，奉天兵工廠的，以及歐美日本各國來的。同是國產，有些採用德國的式樣，有些採用日本的式樣，有些採用捷克的式樣。同採用一國的式樣，有些用四十年以前的模型，有些用最新的模型。若把我們軍隊理的物質設備各種各樣抽一個標本，堆在一處，我們就有個很好的博物院。甲午之役——將近四十年前敵人給我們第一次試金石的時候——我們的武器，就內部的參差不齊說，雖已够亂了，還不及現在的亂雜；就與敵人軍器比較說，四十年前，我們與他們相差無幾（這就陸軍說，若論海軍，我們那時只有過而無不及），現在我們與他們相差太遠了。我不是說，我們這四十年來全無進步。進步是有的，不過敵人的進步比我們更快，並且他們的進步是有組織，有計畫的；我們的進步是全無次序的。實際近七十年來，日本政府對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軍事，一貫的強行統制，而我們則一貫的敷衍遷就，聽其自然；偶有提倡，亦是朝令夕改，漫無計畫的提倡。

軍隊的器機如此，其組織和精神亦復如此。有些軍隊中央要調到前線去的，不受調動，有些又自告奮勇。在前線的兵士，有些見敵則退，甚至於未見敵人就退了；同時有些軍隊是敵人的飛機，大炮，坦克車所能打死而不能打退的。這兩年之內，我們一方面有熱河可憐可恥的崩潰，另一方面又有淞滬，喜峯口，冷口，南天門的可敬可悲大奮鬥，大犧牲。在九一八的試金石之下，我們知道我們的軍隊，論組織和訓練，雖差得很遠，但論本質，論練軍的人力原料，我們這個民族並非老大腐化，實在尙能大有作爲。比這點還要緊的是這兩年來軍隊意識的變遷。兵士現在知道凡爲民族奮鬥的，民族必擁護之，甚至於崇拜之。在這兩年之內，兵士們始知道勇敢和犧牲的無上光榮，始知道當兵的民族意義。因爲社會的敬重，兵士從此將自敬自重了。

次論政府。最使我們痛心的是政府事先的毫無準備。我們的外交部，在九一八以前的半年，簡直是在那裡作夢。我不知道外交當局是爲自己的標語所麻醉，還是因爲忙於向民衆鼓吹，向政府黨部作報告而無暇看國際的風雲呢？稍有外交常識的人都應該知道取消協定關稅和領事裁判權不是中國的大難關；東北問題才是中國的難關。九

一八事情發生以來，政府在對外上大致還不錯。訴諸國聯，雖只得着道德的勝力，但我相信，這道德的勝力是有無上價值的。並且以中國現在的國勢，要得着實體的勝力是萬萬作不到的。得着了道德的勝力，我們不能不歸功於外交當局，尤其是我國歷次的出席國聯的代表。倘若在十年之內，我們內政的成績能趕上這兩年來外交的成績，那時候，我們一定看得出道德的勝力的價值。

政府在對內上的成績確又差些。除最近半年外，政府始終不肯負責任。錦州中立區之未能成立，雖大半由於所謂民衆——實在是一般士大夫——的盲目，政府的不肯負責，不敢負責實亦是要緊的原故。政府的要人，在過去這兩年之內，明明知道不能有局部的交涉和妥協，但無人敢說老實話，良心話，無人敢不逢迎民衆。不過此中亦有可原者，在九一八事件爆發的時候，南京政府本身就在狂風暴雨之中，一不小心，大事就去了。世人常怪政府的不和戰；殊不知和則政府必被推倒於內，戰則政府必被推倒於外。要政府宣佈或和或戰者，其志並不在和，更不在戰。不過欲借和戰問題以倒政府而已。一般人民，爲感情所衝動，不知此中的作用，遂隨聲附和，在野領袖既以政客手段對政府，政府亦只好以政客手段回答。

中國政府，在九一八的試金石之下，居然不但未被推倒，反而因之鞏固。這是天下的大奇事。近百年來，世界各國倘對外有重大的損失如東北四省，其政府無有不被推倒者。大戰後，戰敗各國的革命就是目前的例子。我國則不然。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的政府反比二十年九月十八日的政府要比較穩固，此中原故頗難索討。我想第一是民族意識的進步。我們究竟覺得在此嚴重國難當中反起內鬩實在是不像樣子，說不過去。第二是武人的明理。我們文人罵武人已經成了習慣。實在他們的愛國心並不在我們文人之下。並且他們的思想比較簡單，大是大非反而容易判斷，因之更容易受民族意識的薰染。第三，國民黨究竟有充分民衆運動的經驗。黨員既從民衆運動出身，他們對付民衆運動的手段總比舊官僚要勝一籌，所以歷史家常說惟獨出身革命者能制服革命。第四，恐怕要算汪精衛先生的處置，在二十年的冬天及二十一年的春天，他肯在嚴重國難之中出來任事；這一點頗能使人信服。後來對攻擊政府者，他回答總是：如有人願來負責，他就可以走開。這樣一來，反對者還能有什麼立場？最近這半年來，他的言詞更能負責了。人家批評塘沽協定，他居然說，塘沽協立完全由他負責。人家批評妥協，他就說我們現在不配談報

復。在全政界皆「聰明人」的時候，汪先生之不願作「聰明人」給政府加添了不少的力量。

南京目前算是站住了，但離現代化的政府還甚遠呢！政府在這兩年之內所暴露的亂七雜八也就夠了。行政的效能和廉明並未因國難而加增。步法不整齊，組織不緊密，處處皆可以看得出。前途如何，還要看現在人人所講的團結和建設究竟能否實現。

至於民衆呢？民衆在九一八試金石之下所暴露的性質是與軍隊和政府一樣的。論感情，知識，品格，民衆也是包古今中外而兼有之，內容是極參差不齊的。在這兩年之內，民衆極悲涼的犧牲和極滑稽的虛偽，極純粹愛國的行動而又參以小政客的手段，或極卑鄙之事業而加以愛國的粉飾，我們都一幕一幕的看見了。比之四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今日中國的民衆究竟進步多了。在甲午戰爭的時候，無民衆慰勞軍隊的事情；這一次捐錢的捐東西的，爲軍隊作東西各大城市都有了。上一次，學生只知公車上書，反對和議；這一次除到南京請願外，尚有造烟幕彈，銅盔，及實際在後方修路，或到前方去作戰者。總而言之，民衆意識的進步是毫無疑問的。和這點同樣要緊的，中國新的知識階級，從這兩年的經驗，大大的感覺軍事應該知識化

，科學化，於是願以其科學訓練及特殊知識貢獻於軍隊者亦日見其加多。

回顧這兩年我們對這嚴重國難的處置，我們若說中國前途定有希望，我們却無把握；若說中國的前途絕無希望

技術合作應從何處作起？

叔永

此次宋財長歷聘歐美各國，有兩個結果頗引起世界的注意：一是美國的棉麥借款，一是國聯的技術合作。棉麥借款雖也轟動一時，但牠所與外界的刺激，似還不及技術合作的厲害。爲了技術合作，我們的隣人曾經覺得有發出一個警告的必要。國內憂深慮遠的言論界，有時也大聲疾呼的說這就是共管的先聲，若不勝其憂懼之情者。其實技術合作是怎麼一回事，大家怕還不十分清楚。若清楚了，不但不須觸觸過慮，恐怕還嫌其合作程度的不夠。我們現在要說明合作的重要，不可不先探討一下恐懼合作的心理是從那裏來的。

第一，中國自近百年以來，成了西方帝國主義的犧牲者。凡是我國與歐美各國的交涉，不論他們是巧取或豪奪，無不以喪失權利結局。我們既成了驚弓之鳥，若有人說

，事實又不盡合。我們有奮鬥的天能，且有奮鬥的機會。這天能是否會繼續發展到充分的程度——非到充分的程度不能濟事；這機會是否會被我們利用，到充分的程度，這些問題全在我們的手裏。

西方也有有任俠尚義的人，一心以扶危定傾爲目的而無其他自私自利之動機存乎其間，我們幾疑其爲不可能。所以一說到請歐美人來幫忙，我們便有虎入羊群之感。其實在現在的列強間，我們也不敢斷定絕無掛羊頭賣狗肉，以詩禮發塚的強盜。我們不見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國政府提議與國聯其他之專門機關各專家爲更有效益的合作時，當時日本的芳澤代表即聲明『彼深信國聯將及時邀請日本參與襄助改造中國之工作，如指派顧問之時，尤宜注意』。這明明告訴我們日本對於這種襄助我國的計劃，不過認爲達到他的二十一條中第五項的另一途徑而已。國聯的會員國中有這樣野心勃勃的國家，也難怪我們不能坦然高枕，信任不疑了。

第二，國聯的有效組織成立在歐戰議和以後，所以牠

的使命與目的，還不能充分為我國所了解。無論世人怎樣的罵國聯，牠的組織是以和平為目的而不是以侵略為目的，這是我們應該承認的。咄其如此，以侵略為國是的日本，雖然曾經加入了國聯，終至於不能不退出。所以現在的國聯與二十年前我們所謂「國際」，不能視為一物。又如其「共管」可以成一個名詞的話，國聯共管也不能與國際共管并為一談，原因便是國聯共管是由我們自動請來的，而國際共管則必是由於強權者的強迫。復次，共管與合作，當然又有極大的區別。最大的理由，便是合作有我們自己參加在內，共管恐怕只有被人管理的分兒。這兩個分別弄清楚了，我們似乎用不着談到國際合作，便現出談虎色變的樣子。

明白了恐懼心理的不必要，然後可以說國聯的技術合作應從甚麼地方做起。

我們以為目下中國的問題，不是一兩件事的興辦或改良問題，而是整個行政機關的現代化問題。這種需要是顯然的。第一，以中國幅員的廣大，要全國立刻振作起來應付當前嚴重的局面，是不容易做到的。可是我們若有一個現代化的政府，勵精圖治領導人民來做真正建設的事業，也未嘗不可收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中國的一切事業都不免為舊社會的腐敗習慣所浸染支配，而在政府裏面為

尤甚。這些腐化根子，若不設法鏟除，甚麼交通計畫，實業計畫，都難有成功的希望。我們不看見前清開辦的招商局，漢冶萍鐵廠以及種種官辦的工廠嗎？有那一件現在算是近代實業，在那裏維持着他們的地位的？他們失敗的原因，由於計畫的失策者占其小半，由於管理的腐敗者占其大半。所以我們以為國聯的技術合作，若希望於中國的前途有切實重要的貢獻，最好是從管理技術上做起。

現代化的特點在那裏？第一要重效率。效率不是組織大，說話多，而是以較少的用費，較短的時間，得到較大的效果。現在中央以及各地政府的普通現象，似乎每辦一事，設一機關，必有大批不相干的人，如蟻蟻附羶，隨之而至。當局的人，也許因為真正才難，也許因為舊社會的習慣在那裏作祟，對於這些人不能不敷衍。於是不到幾時，這各機關便為這些不相干的人所充滿，使你感覺到所謂新機關的設立，並不是為要辦一點新事業而是為這一般人添飯碗似的。關於這一層，我們不必列舉某某機關來作證明，因為這不是我們的論旨。我們現在要說明的，只是一個普通的現象，那便是：人浮於事與濫用私人。這兩層都是與現代的效率觀念根本不相容的。

現代化的第二個特點是要有組織，而組織也是以能發

生最大的效率爲目的的。在第二十五期的本刊裏，君達先生曾經討論到行政機關改革的必要。他指出中央行政機關，大多數可稱爲模範的官僚衙門。他們組織的不合理，第一是政務與事務不分，第二是事務的分配不合實際，第三是有整部的預算而無分別的預算，第四是一切事務只有行又而無實事。他對這些弊病說的極其詳盡，我們狠希望政府當局能夠注意到這一點。他最後談到現在進行的特殊事務，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現在這些重大的建設事務，仍用司長科長的行政制度去經營呢？還是另創什麼比較健全有效的組織？

照目下的實際情形說來，似乎這個問題的解決，趨向於後一路。於是有經濟委員會的組織，和許多由歐來華的專家在會內工作。現在所謂國聯的技術合作，其實不過是舊事重提，或者可以做到進一步的擴充。不過我們要問的，一個政府的組織，是不是可以這樣此疆彼界，劃定某某機關是新事業，應該維持相當的效率，某某機關是舊局面，不妨聽其腐朽敗壞。若果如是，不免發出兩個弊病：一個是重床疊架，一個是彼此牽掣。以前交通部和建設委員會的爭執，就是這兩個毛病的表現。目下經濟委員會興辦的事業，有公路，水利，衛生，蠶絲等等。這些事，在政

府的組織中都有相當主管的官署，我們絕對看不出有特別組織一個機關來管理的必要。如其因爲國聯合作的原故，須要一個新式的組織，於進行上方纔便利，那末，我們要請當局注意的，凡是政府機關都有實施新式組織，增進辦事效率的必要。政府既知舊式的組織不適用於現代的新事業，就應該實行澈底的改造。如其政府當局不知如何改造的方法，那末，何防直捷爽快的請教國聯的行政管理專家，先從整頓我們的政府機關入手？

我們的主張，不但計劃新事業，改良舊組織，要歡迎國際專家的合作，於必要時，並且可以請他們來監督這些計劃的實行。因爲我們那些濫用私人而爲人設事的壞習慣，要我們自己改除則甚難，叫他人來替我們改除則較易。讀者或許要驚疑，以爲這樣一來，豈不是喪失了我們的主權嗎？其實這種任用客卿的辦法，與主權絕對無關，我們上面已經說明過。若用合作的方式雇用客卿，只能算如明清內朝的利用瑪寶湯若望掌欽天監，尙不能比於前清晚年的用赫德做稅務司。即以稅務而論，設如不給外國人以管理一切的大權，恐怕還沒有目前的成績，而且只要自己有相當的能力，稅務的主權也未嘗不可漸漸的收回了。果然這一層能夠做到，不但君達先生所提出的組織問題可以解

決，就是所謂人的問題，也可以解決一大部分。

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是先之以軍政時期，繼之以訓政時期，方歸到憲政時期，這個方略在理論上是千穩萬妥的。但實行起來，劈頭就碰到一個困難，那便是所謂訓政時代的政治，是不是真夠得上做先生的資格？譬如說罷，我們要訓練人民遵守法律，先得要看看政府是不是依法行事；我們要訓練人民潔已奉公，先得要看看政府是不是廉潔無私。若其不然，政府先無以表率，那能望人民程度

的長進，結果便是訓政時期的無限延長。目下雖然黨外有取消訓政的要求，黨內有縮短訓政的擬議，但此事如果實行，我可以說決不能算爲訓政的成功，只等於宣告訓政的失敗。失敗的原因，與其怪「阿斗」的太不成材，不如說先生的教導無方。那末，何不大家承認事實，大家去請教幾個高明先生，一同受一點訓練呢？我想現今的黨國諸公，都能公忠體國，必不何漢斯言！

第三國際的戰畧（續上期）

震東譯

「聯合戰線」的失敗

近年來革命家中間的許多辯論文章，都是討論這個聯合政策的得失。其實除了證明這是一個失敗的革命政策之外，沒有得到一個甚麼結論。在英國與勞工黨的合作，結果是不可能。俄國工人在一九二六年的大罷工裏的捐助，僅使英俄的邦交更加惡化。在德國，共產黨的選舉能力削弱了，社會民主黨反而強大起來。在美國，一個首領和黨員均薄弱的政黨勉強與未得滿足的農民相聯合，其結果是差不多斷送了美國共產黨的命運。在中國，聯合戰線在最

驚人的規模裏實驗了一番，而結果是整個的崩潰。

中國第二次革命的故事太長了，這裏不及重述。無論怎樣，這部孫中山聯俄容共的歷史，總還得許多時候，才寫得成。關於這一段奇怪的聯合，一個是中國的愛國者孫中山，要想借一個機會依他自己的路線而救中國；一個是在芝加哥，墨西哥，土爾其等地經驗過來的職業革命家鮑羅廷（Michael Borodin）。在政治方面說來這回革命是一個商人階級與農工的合作，以全民族的聯合與獨立自由爲有限定的目標。即使孫中山先生不死，這兩個絕不相伴

的份子之分裂，也是必然的事。但這個分裂直到北伐成功之後方纔發生，而鮑羅廷也留下許多變史在中國的政治地圖上而後拋棄了他古怪的使命越過大戈壁沙漠之野而回到莫斯科去了。自從一九二五——二七年以後，南京政府日漸強大，把共產主義認爲罪惡，犯者處以死刑，於是第三國際所能留存的實際工作，即使不在暗中進行，也只好逃到江西亂山中去了。

至於第三國際在中國的戰略如此失敗的原因，其說不一。正統派的解釋很詳，給了莫斯科不少的安慰，他們說那些年代有如俄國的一九〇五年一樣，不過是最後革命的一次排演。杜洛斯基反對這種批判，以爲這是無誠意的解釋。他說共產黨的聯合國民黨爲時太久，莫斯科的假戰略實破壞了這次連動。雖然，血染廣州的一九二七年不幸的改變，却無疑的是聯合戰線政策的送葬歌。

內政與世界革命

一九二八年左右，在莫斯科有一個很顯然的認識，世界革命已經延緩了。牠的因果在這裏很難分別。但五年計劃，不僅在蘇聯的歷史，即在第三國際的歷史上也是一個重要的分段。杜洛斯基被逐出國。強大的領導權集中在莫斯科少數人的手裏，蘇聯抱負了一個野心的計劃，準備大工業

建設和農業革命。這是專爲社會主義在一國有建設可能的計劃。當一九二七年俄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大會和一九二八年第三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決定這種政策的時候，負責的人已明明知道在俄國以外的革命將必有一個重大的影響。

當一九二七年的時候，俄國的工業差不多已恢復到一九一三年的水平線了，三年以後，就是兩倍，五年以後，已是三倍。在這個進程中最需要的是和平。因爲要得機械的輸入，國際信用是必需的。最後，要把俄國的容貌轉變過來，就不能不把全俄國人民的精力吸收了去。杜洛斯基之以這種辦法爲不合他永久革命的理论，當然是無是怪的了。世界革命仍在過去流傳的標語之下號召着，而一九二八年的莫斯科的精神却與昔日一九一五年在Zimmerwald的宣言相去很遠了。

自一九二八年以來，莫斯科與世界革命問題之息息相關，至今一點不變。第三國際繼續起着他的作用，在*Inventas*與*Pravda*兩刊物中不時有論文專門討論波蘭或日本的共產黨同志的問題。在蘇俄出版物中的篇幅競爭常是激烈非常的。一篇批評消費過大的社論，或者關的一個新工廠建立的敘述常常要占革命討論的上風。

根本上，這個態度是從五年計劃與其所產生的全國偉

大力量之集中上發展出來的。

此外還有幾個原因可以幫助解釋的。非正統派的共產黨，特別是杜洛斯基，常常指出司他林既不能說外國話，又少有在外國去住過，而居然是蘇維埃第一流的出色領袖。他所領導的一黨，不再從壓迫與剝削裏，而是從一個新興國家的先鋒精神裏引誘革命的熱情，這一批人相信自己能夠不說空話而以行為去保障他們一國的社會主義政策。由這種信念所陶養出來的道德熱情自然容易傾向於解決國內的工要問題，而不鶩於在國外領導革命的戰略了。

或者在許多原因中最重要的一個，致使蘇聯領袖們對於第三國際熱情的縮減，就是這必需的對外的和平。所以說即使隣近蘇聯的國家內發生了羽毛豐滿的革命運動，在他們看來也不免要驚惶失措，并非言之過甚。他們正在傾全國收入的資本來建設工業經濟的進程中，蘇聯的財源和人民已經搜刮到可驚的程度。不論任何戰爭，即使爲了革命的原因，必定還要加增這宗搜刮，或則阻礙工業的發展。這兩樁，特別是在蘇聯共和國的近代眼光裏看來，都是國家的大禍患。

遠東的革命情緒

這個政策的變更無論如何解釋，其用到遠東的情形也

全然和西歐一樣。日本的共產黨是認爲非法的，這裏沒有確實的消息可供牠在那裏政治生活中的實際或可能的任務的討論。但從任何方面看來，牠近年是否從莫斯科得到思想或金錢上的幫助，還是極可懷疑的事。日本警察對於所謂「危險思想」之查禁并未鬆懈，而俄國扶助革命的陰謀的謠告却久不見傳聞了。只是日本共產黨之父的片山潛現在仍住在莫斯科，任第三國際的執行委員。據說他已是老而兼病的人了。

第三國際在中國現在的勢力也難於發見。那國中的一大部，居民數約在三千萬至九千萬的地方，現在是在一個稱爲「蘇維埃」的政府統制之下的。中國和日本近來都以此爲理由向世界宣稱說這是給與太平洋恐怖的重心。尤其有意義的是這個政府的共產主義爲俄國所注意比較他國爲多。牠無疑地吸收了鮑羅廷在中國留下的許多勢力，本來也就是鮑羅廷苦心孤詣所造成的土地革命的繼續與加深而已。但是凡研究共產主義的人，無不知道農民革命若不能以無產階級革命，其結果不過是造成一個新的對立階級罷了。

然而事實上那個蘇維埃區域幾次抵禦南京政府的圍剿都很成功。再以最近十年政治紊亂的情形看來，中國共產

黨確已成中國革命的首要組織。國民黨的領袖們自從一八九七年以後，就傾向於舊軍閥的政治觀，三民主義不過是他們的口頭禪，其主要目的，仍是傳統的分贓政治。這必然的結果，便是國內反叛勢力的增加。這個反叛勢力在中國中部形成了蘇維埃區的組織，他的影響，雖然很隱秘，在都市中學生與勞動階級裏却很大，是無人懷疑的。世界經濟恐慌與目前同日本的爭執愈使這種勢力膨脹顯著。

在第三國際看來，前途是有希望的。農民蘇維埃的成立，雖然不算共產革命，但他的可能性仍舊是未盡的。現在俄國勢力不再干預目前的局勢，并非莫斯科認中國革命為不可能，其實正與此相反。讓他自己去，牠會從中國自己的根基裏引力量來，比從鮑羅廷的組織才能裏引來的好得多。目前蘇維埃區域裏的土地革命也許能與上海，廣州，漢口的無產階級取得聯絡。第三國際現在對中國的政策就直接建立在這種戰略上，拋棄與國民黨或其他的資產階級的聯合，只努力於工農運動的聯合與充實。

在太平洋方面其他的地方，第三國際目前的任務更難於估計。暹羅，安南，及東印度等地，他們的政治發展還沒有脫掉反抗帝國主義的鄉村革命的初期。在這種反抗裏

，對於維持左傾的布爾喬亞絕不會有甚麼退讓，而局且部的運動與莫斯科總部之間似乎也沒有什麼很密切的關連。在一九二六年以前，這些地方的革命運動只能刺激一點地方的革命情緒，給統治的歐洲列強一些麻煩而已。從一九二八年以後，這種給與麻煩的動機便不復存在，因為俄國此時最高的願望只是一個和平的生活罷了。

結論

第三國際最新戰略的永久意義，已成爲各派共產主義者激烈爭論之點。第三國際仍舊以昔日共產黨宣傳式的文字發佈命令，頗覺難於測定他現在開展的方向。不過也有幾個結論，於現在，特別在太平洋方面，有相當的確實。第一是許多俄國共產主義者知道了革命不是一件貨品可以輸出的。牠的發生是根源於當地很深的剝削與壓迫。這種信仰能維持多久自不能斷言，不過蘇聯今日國內已有不少的工作去吸收牠所能生產的力量，顧不到外面來了。

再者，在一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已成各國共產黨人爭辯的骨子，無論如何，不能說與世界革命的問題是不相關的。本來由旁人允諾而得一點幫助來革命是一回事，由人的好榜樣而轉變又是一回事。當然，現代俄國的領袖們深信在他們自己的國內建立起共產主義的社會，是準

備的一個最有力量的方法來使各國的工人們由心折而起摹仿。這種信念是否在第二代人取得蘇維埃政權以後，仍能保持其堅固性，還是一個疑問。不過，在目前，這是一個真的動力。

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第三國際的宣傳可稱極活動的一年。他花了三四五，〇〇〇萬元，宣傳總費用的百分之五十，消耗在津貼十七國的共產黨活動裏。最近的數目還未公佈，但今日的俄國共產黨，必定指着一個千萬以上的數目在一九三二年撥到工業資本裏去的，認為是第三國際戰略之最新形式的宣傳費。

最近幾週以來，因為德國發展的關係，第三國際向世界宣佈又有戰線的變更，似乎又回到聯合戰線上了。全

世界的共產黨得到訓令，在限定的目標之下，暫時與其他的激進派和無政治主張的工人團體，如美洲勞動同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ur) 等取聯絡。也許在幾月以後，這個轉變的意義才得大白於世。目前有許多人以為這是一個防衛運動以抵抗法西斯的勢力之發展，特別在德國，與從前取攻勢的聯合戰線是不同的。

最後還有一個結論可以從第三國際的戰略之更改裏得來，雖然這不是莫斯科公佈的，也不是由蘇維埃領袖的秘密洩漏。從同樣的歷史事實，即所以使第三國際採用現在的政業者，知道又將有一個對西方世界的新政策出現。這個變更會使人承認惟一的抵制革命的有效辦法，不是壓迫，不是查禁，而是消滅革命發展的條件。

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嗎？

弘伯

法國里昂大學通信

狠不幸，政治上放任主義的主張，和民權保障的運動

一樣，在歐洲是十八世紀的事，而我們於今朝方步後塵。

更不幸，出現於我們歷史上二千四百年以前的無為主義，

在目下國內，尚有差不多相同的背景，以至於『借屍還魂

』。這不是我們『老博士』的過失，這只是證明黃帝子孫

——尤其是肉食者——真是太不長進，太沒出息，太愛睡

一覺。一睡就睡了二千多年，還不算很久！

只消約略考察老子和盧梭當代政治經濟社會的狀況，

我們對於他們的反感，便不能不說是理所當然。同理，只消約略阻阻如今民不聊生的事實，與夫口位者的腐敗無能，吾人也不禁要喊聲『少息』！所以，我們對於適之先生那篇『從農村救濟談到無為的政治』（載獨評第四十九號）一文，自然要掬深厚的同情。

不過矯枉者常過其正，因噎不可即行廢食。依我們看來，鄙斥妄為是應該的，連有為一筆鉤消是不可的。當今有些『治人者』的設施，不能稱之為有為，只可勉強叫做妄為。妄為雖可說是有為的一種，但有為不即等於妄為。

適之先生說：『現時內地農村最感苦痛的是抽稅捐太多，養兵太多，養官太多。納稅養官，而官不能做一點有益於人民的事；納稅養兵，而兵不能盡一點保護人民之責。剝皮到骨了，吸髓全枯了，而人民不能享受一絲一毫的治安幸福』！這類事實的指陳，幾乎是一字一淚。還有，我國有些地方，『苛捐雜稅之多』，已是『古今中外的得未曾有』。古今中外四字，適之先生曾鄭重聲明是經過考慮纔用的。這是何等地令人心痛！根據上述事實，於是他有下列的方案：

要救濟農村，須減輕捐稅。要減輕捐稅，須從裁兵裁

官與省事三件入手。

今請略評這方案中的三件。

裁兵與裁官，我們是求之不得的。萬一實現了，可以等於如大旱之見雲霓。不過官與兵這些東西，是社會的毒膿；只裁而不為之找出路，則亂子仍舊不免。譬如痼疾未下，則肚子勢難得安寧與秩序。所謂『扶得東來西又倒』，所謂『牛事不發馬事發』者，恐怕就是已經做到能裁的結果。況且因為沒有出路，勢必簡直就不能裁。『笑罵由他笑罵，好官自找為之』。這種名言，他們久已知悉。對於適之先生的垂涕而道者，若輩恐將報以『一笑置之』。其結果在適之先生等於『畫餅充饑』，在太史公可以稱為『垂空文』，在董先生則竟可不客氣諡為『廢話』。所以於提目標外，辦法還得想想。如果一想裁兵與裁官後的善後辦法，無論你屯墾也好，殖邊也好，兵丁築路也好，興辦實業也能，總之政府即不能免於『有為』。不過這個政府當然是個好政府，是最低限能做到廉潔的政府。

至於省事一項，如果適之先生的意思真是要停止一切的所謂建設，則目標上也不敢苟同。為什麼呢？適之先生的主要理由是要我們『睜開眼睛來看時勢』，如今我們便

來看時勢。

看時勢須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是內部的物質條件，例如適之先生已說的人力與財力；一方面是今昔的四週環境

，即適之先生所未提到的國際情勢。內部的人力與財力，富強，必需現代化；要得現代化，必需努力建設；要得努力建設，即政府必需有爲。

，不幸這有爲的認真作事的建設，是官僚軍閥們所不能，亦所不願者。對於適之先生省事的說法，我相信：實際上他們是歡迎的，因為傳統思想使他們如是（這點以後再講），惰性使他們如是。此所以大家高喊改革內政，而內政老是不能改革者也。表面上惟一的可以使他們不歡迎者，是建設的名義取消了，斂財的騙錢的機會也就少了一個了。不信，請再看我們四川的馬路。舉個極小的例來說，從產鹽有名的自流井到富順城，華里不過九十（英里只三十）。在西方可以數月成之者，在我們竟鬧了幾年。爲什麼要延長到幾年呢？因爲樹倒猢猻散，所以辦事人不願那口好飲食，急急於吞下。如果有人把這口好飲食給他們拿走，他們的把戲多得很，消極防不勝防；一轉眼使翻新花樣，另起名目，以來『生財之道』。結果老百姓的錢還是一樣地出，而濼形的建設，可以作爲改良進步基礎的建設，連這點點也會沒有了。我倒不是滿意於他們現在的成績，我是說，出馬路捐比出救國捐，至少還好一絲一釐；害人最凶的是別有用途的預徵，是火餉，是附加，是指名勸募，不是建設費。這是從財力方面看，我們不贊成適之先

，便是絕倫謬妄。不過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收入，大部分是用於軍費，其次是政費，用於建設者寥寥。就在寥寥的建設費中，真正用來作實事者，尤屬寥寥。這可見財力問題的癥結，並不是一文不名的赤貧，乃是尙有幾文而用不得其當；害人的不是建設本身，乃是辦理建設的官僚和摸奪建費的丘八。依我們的意見，消極救濟農村最有效的辦法，只是裁兵與裁官，不是停止建設。因爲在全體比例中，練費實微乎其微。即使全部取消了，於農民的負擔也輕不了多少。況且名符其實的建設，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是生產的不光是消費的；是救民救國所必需的，不光是做樣子出來好看的。所以，如果有朝有日，附庸能蔚爲大國——建費與軍政費易地而居——則中華民國之在世界，也或者，就有抬頭的希望了。爲什麼呢？這理由很簡單明瞭。蔣廷黻先生說得好『一個富強的中國出世之日，就是遠東問題終止之日，此外別無出路』。出路上的要得中國

生的說法的理由。

再就人力方面來講。適之先生之所謂人力，即是指人才。再具體一點說，是指各種的專門人。據我們的看法，專才在現代的中國，誠然不如歐美的『濟濟跼跼』但也不是乾脆沒有。至少是具體而微者，倘大有人在。這些人如果在歐美，給以機會，假以時日，學識漸豐，經驗漸富，其結果成爲優良的專才，殆無疑義。不幸生在中國使不然。中國社會不但不是一個培植專才的社會，並且還是一個毀滅專才的社會。試一而顧既仕，不難找出纍纍的例證。試一聽聽有些苦學的老實人而到處碰釘子享閉門羹以至迫到改業糊口者的悲嘆與呻吟，不難悟得其中的三昧。故這問題的癥結，又不是專才整個的有無，乃是政治上軌道，一則往往『英雄無用武之地』，再則往往『用非所學』，三則當局往往『結黨營私』，致人找事，事找人的方式異於西洋，結果『七年之病』老害，『三年之艾』老無。我們應該督責的是，教主持建設者認真作事，將公事看成和私事至少一般重要，將公款用來和私款至少一般愛惜；不要再掛羊頭賣狗肉，消極不要再毀滅專才，積極還要培植。我們似乎不應該教他們停止一切建設，以至於將成未成的專才，更沒有機會用其所學，更不得不改行亂竄，

而結果更流於必然的毀滅。近年東施效顰，因爲實地建設的工作，非官僚軍閥們所能，爲敷衍門面計，還不得不多少羅致幾個專才，雖然在暗中儘管掣肘。誠然掣肘的機會不算好，但總比那『上天無路，下地無門』要高一籌。適之先生不是說過了嗎？『沒有人才，就須用全力培養人才』。是的，原則不成問題，但實行的方法怎樣？如果沒有方法，則所謂全力培養也者，不免又徒託空談。我覺得，要政府努力從事建設，纔能有培養人才的機會。因爲學泗水須在水中學，學騎馬須在馬上學。去馬與水（停止一切建設）而教人只作紙上談兵，恐至多的良果是『華而不實』。我們在現應該教政府多聘用歐美專家（因爲他們過剩，有的是），仿蘇俄的先例，認真地建設起來，使我們將成未成的專才爲之副。如是在過十年八年，我們也可以『濟濟跼跼』，而人力的問題，也就解決了。假如不走這條路而採用消極的方法，恐在等幾十年乃至幾百年，專家呢？還同現在差不多。建設呢？條件也還未具備。別人一日千里，而我們緩步逡巡，甚至倒退向後。恐等不到若干春秋，而『四百兆』人的大中華，已早在枯魚之肆矣！這是從人力方面看，我們不贊成適之先生說法的理由。

以上將內部的物質條件約略看過了，結果是：該建設

該認真建設，而不是該停止建設，取消建設。所應該取消或停止者，不是建設本身乃是官僚軍閥的那套幹法。以下再來看看關係更重大的今昔四週環境即國際的情勢怎樣

適之先生那篇文章的後面一大半，都是引證漢朝開國六七十年無為政治的來由，經過，及其功效，其意要教今之當局學學乖，以使文景的盛況——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庫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再見於今日。這個期望也許可能，如果時代倒退轉去至少百年以上。惜現在的或

然數很少了。爲什麼呢？漢初只北方有匈奴，其餘東南西三面均無大敵。且匈奴不過與明代的倭寇一樣，只是『打家劫舍』之流，文化上遠非今之『夷狄』可比。今日『四面楚歌』『環階區皆勁敵也』（說別人勁敵，事實上我們還太誇大一點）。且自一八四〇鴉片戰爭以來，經濟侵略，已深入骨髓。只消一看海關華洋貿易總冊的歷年入超數字。便令人何等地觸目傷懷！別的且不談，單看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十年中食糧的輸入怎樣：

年	米		麥		麵		粉		總金額 (以海關兩計)
	量(担)	值	量	值	量(包)	值	值		
1921	10,929,245	11,200,998	81,346	301,805	752,673	3,503,513	15,062,316		
1922	19,156,182	79,874,788	873,142	3,057,807	3,600,967	16,740,497	99,673,155		
1923	22,434,926	98,198,591	2,595,190	99,099,065	5,826,540	27,332,948	134,527,604		
1924	13,198,554	63,218,721	5,147,367	17,689,794	6,577,390	23,687,612	110,626,082		
1925	12,634,624	61,041,505	700,117	2,654,749	2,811,500	14,904,833	78,601,058		
1926	18,700,997	89,844,423	4,156,378	17,965,194	4,285,124	23,712,503	131,522,120		
1927	21,061,586	107,323,244	1,690,155	7,055,667	3,824,764	21,306,338	135,685,249		
1928	12,656,254	65,039,232	903,088	3,338,886	5,984,903	31,464,402	99,842,520		
1929	10,822,805	58,981,045	5,633,846	2,1430,785	11,935,296	62,903,863	143,315,639		
1930	19,891,103	121,234,193	2,762,240	12,830,690	5,188,174	30,345,716	164,419,599		
總額	157,215,642	737,785,750	25,172,529	185,120,442	50,787,331	260,497,425	1,114,275,342		

注意！自命以農立國者，而今十年之內，便已流出了
 一萬萬一千四百二十七萬五千三百四十二海關兩。這宗
 厄，如不趕快從積極的救濟如改良農產，改良農業技術
 便利運輸，濬河造林等努力作去，恐怕是塞不住的。
 工業如此，工業亦然。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美國商務報告
 中美的新式工業比較，略如下表：

類 別	中	美
面積(方哩)	4,282 000	3,743 500
鐵路(哩)	7,000	275,000
電綫(哩)	84,000	1,850 000
電話(座)	10,000	17,000,000
汽車(部)	22,000	22,000,000
郵局(所)	11,000	51 000
煤產(噸)	25,000,000	585,900,000
水電(啟羅瓦特時)	——	17,000,000 000
熔鐵爐(每年熔鐵量,噸)	500,000	45,000,000
生鉄產量	300,000	27,000,000
棉紗錠子(枚)	3,500,000	37,000 000
紡紗機(台數)	25,000	650,000
麥粉(包)	30,000,000	115,000 000
新式工業中的工人	500,000	7,000,000

我國面積，從前比人大五十三萬八千五百方哩，而事
 事均比人小若干倍。東西輝映，能無愧汗！這種國家，如
 老是這樣，決沒有法子能抵制別人的經濟侵略，也決沒有
 法子能不弱不貧。有，是要急起直追，是要積極地幹，是
 要賢明政府的有爲——真正的建設。這真正的建設，不是『
 排場』，不是奢侈品，乃是必需的物事，乃是維持合理的
 生活所必備的條件。現在我們受國際環境的鞭策，須本於
 無爲的精義：『與時推移，因物變化』。不可膠柱鼓瑟，
 一味模仿從前，以爲富庶尙可以安坐而致。因爲現在的世
 界，與從前的『天下』，大不相同了。從前那樣簡單的環
 境，可以用曹參『治道貴清靜』的方法，可以用蘧伯玉『
 以不治治之』(論衡自然)的方法，現在不成了，爲什麼
 不成呢？你要休息，別人偏不要你休息；你要和平，別人
 偏不要你和平；你要睡覺，別人偏要拿腳血筒在你的筋脈
 上繼續不斷地抽；你要偃武，別人偏要拿飛機成羣地在
 你的城市上翱翔；你要修文，別人偏要拿砲艦橫衝直撞地在
 你的內河與沿海游弋。那能容你『國家無事』？又那能容
 你『非遇水旱之災，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
 餘貨財』？況且水旱之災(中國的家常便飯)，就是從前
 行無爲政治的聖手也沒辦法，我們在這方面也久已可憐，
 怎麼還要因循下去？

(未完)

注意 本刊特定優待辦法

本刊為特別優待本年新入校諸君起見，凡直接訂購本刊四十期者，只收報價一元。外地用郵票訂購者，照十足計算，不另折扣。愛讀本刊諸君，幸勿失此良機！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業已售完。現在第二十六期至五十期亦有書無多，欲購從速。特價如下：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二元二角 郵費八分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報價目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新聞」每月一元
「日本及其關係」每月一元
「體育」每月一元
「學園」每月一元
「藝園」每月一元
「社會新聞」每月一元
「外埠通訊」每月一元
「經濟界」每月一元
「教育界」每月一元

第十卷 國聞周報

第三十六期出版

要目

貪污的剝削與民族的前途..... 崔敬怡
柯助密先生評傳..... 王森然
評中央圖書館影印四庫全書草目..... 冷廣主人
赤區土地問題之實際與批評..... 成聖昌
蘇俄外交政策理論與實際的檢討..... 不士
藏園羣書題記..... 傅增湘
記丁冷女士(八)..... 黎君亮
數月的隱秘.....

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

君達

建設！建設！講了多少年，其實現在還是在走初步，甚至一步都還未走。歲月如流，國難愈迫，而中國建設究竟應從何入手，如何進行，身當其局者似乎至今尚無或竹一。甚至借成了一筆外債，如何用法都還在你提一議，我設一策，聚訟盈廷，無所取決。同時，做國民的只常見朝設一廠，夕開一礦的報紙宣傳，而實際上事隔幾年一點沒有結果，因此幾疑一切計畫盡是空談。又只見許多地方大小官吏，借名建設，榨克民財，因此「時代公論」曾發建設亡國之歎，『獨立評論』倡無爲而治之議。當然，此皆憤慨之言，大家皆承認建設的必要，不過歎息現在所謂建設往往名不符實罷了。

中國一切都落後，應該建設之事當然甚多。但是國民的財力有限，辦事人的經驗不是立刻能夠養成，種種原因都指明政府對於應有建設事業必不能一切同時並舉，而必要分區一個緩急先後的次序。譬如開發西北的鐵路，當然隴海路之西安蘭州線，平綏路之包頭寧夏線，甚至於經過蒙古高原的綏遠新疆線，三條路線各有各的好處，都是應該造的。但是五年之內或甚至於十年之內政府的財力決不

能也不必將三路同時並造，事實上必須決定先從那一路造起，其餘置之第二步或第三步再議。如此每種事業便需要一種計畫，不能聽說好的便立刻要辦。

同時，各種事業之間又有許多相互的關係，必須連絡並進，不能獨舉偏廢。所以一國的經濟建設又必須統籌全局，不能過於枝枝節節，一樣一樣的獨立進行。例如實業部要開發華北煤礦，救濟長江煤荒，便不能不靠鐵道部添造運礦鐵路，增多運礦車輛，及減輕礦產運費。反之，如鐵道部要添造鐵路及車輛，又不能不望國內基本工業如份於，自己能產鋼鐵，能做鋼軌。否則修築鐵道之錢，十之七八流出國外，即使款無虛糜，亦將財盡外溢。

諸如此類，極淺明的理由都已證明我們需要一個全盤的——至少是重要事項互相比較考慮過的——建設計畫。現在中國政府的現狀是否能夠如此。就報紙上看得的說，實業鐵道交通各部的計畫似乎彼此各不相關，看不出有什麼連帶關係。不但不相關，而且各部各會有時還同時爭着辦同樣的事業，或同時爭着向同一來源籌款。這顯見事業缺乏一定的計畫，組織缺乏有效的統制。如果政府自身還沒

有統制，如何能希望統制全國經濟。

試看蘇俄五年計畫前後全國實業投資的比例如下表：

	一九二七年度	一九三二年度
實業總資本	一〇〇	一〇〇
工業	一四・〇	二二・八
電業	一・四	四・一
運輸業	一六・六	一七・二
鐵路爲大宗		
農業	四一・〇	三〇・四
農村建築	一七・二	二二・〇
其他	九・八	一一・五

從此可以窺見他們的建設計畫是在努力工業化，尤其是工業電氣化，一方面比例的發展交通，但是對其他方面也並不完全翹置。這是狠可供我們參攷的。也可見一國建設決不能專辦一事不管其他。

爲要得到一個整個的計畫，蘇聯首先設立一個國立計畫委員會（State Planning Commission）他們叫Gosplan，書又有一個最高經濟委員會（Supreme Economic Council）個一，主研究，一個主裁決，最後乃通過于有立法職務的全蘇維埃大會。如此制定計畫，然後各事分部執行。但是五年計畫也並非一定不變，因爲計畫即使周密，實

行起來總有若干差異之處，所以有時候也不能不因時制宜

。但他們事先有預定的指數（如預計工業產額等），事後有比較的統計，所以成敗利鈍，隨時有實在標準，可以作爲根據，用來修改次年的計畫，一步一步的推行。這種制度也很有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地方。中國目前不是完全沒有計畫，有時還感覺得太多，如果各要人桌上的條陳都可以算作計畫。這種計畫是大批有專門學識的人各就自己本行，想到應做之事，提議設立機關籌備進行。各以所學貢獻國家，這本是好事。但政府方面決不能人人皆聽，事事俱辦。至少須加以一番審查，定一種先後緩急的步驟出來。不幸政府各部份也是各自爲謀，隨興所至亂提計畫。所以必須有一個集中審核的機關，將各部份的計畫彙集參証，求出一個系統定出一種實行的次序來，然後方有頭緒，方能實行。在現在形勢看起來，經濟委員會是應該負這種責任的了。但如何能盡這種責任，希望他們要有一種能够利用專門人才的周密組織。

不但各種事業之先後緩急以及互相關連之處須有相當計畫，且還要認清全國的經濟區域的分布，而冀望相當均衡的發達，或定出一種開發及利用的次序。這種地理上的計畫是必要的。蘇俄的五年計畫便是狠注意此點。帝國時

代聖彼得堡附近是工業很發達的區域，但是附近沒有煤礦，動力的來源幾乎全靠從英國輸入之煤，所以蘇俄只發展中等規模的發電廠以維持原有的工業。俄國的中部雖然離四面海岸都很遼遠，但是有多納斯的大煤田及莫斯科附近的泥炭及煤，所以便作為最大工業中心。由此可見工業中心不必定在海岸或江岸，內地也很可以建設工業的。烏克蘭及後高加索本地人往往以離中央太遠易被忽視為言，但五年計畫却已為他們建立極大規模的工業基礎，最大發電廠Dneprostroy有三十多萬基羅瓦特的電力便在烏克蘭。烏拉爾區域是比較遼遠的，但因為那地方金屬礦物甚多，森林又富，正是建設冶金業及化學工業的好地方，所以蘇俄政府也已儘力經營，要造成為重要工業中心。反之西伯利亞雖然有庫斯納斯大煤田，其儲量勝過多納斯五倍，但是因為地理關係，第一個五年計畫中暫不注重，到第二個五年計畫方始設法開發。這便是用全國眼光，分別區域，規定步驟的好例。

所以中國的建設計畫也必須先有全國富源及力源分布的常識，再按照國防地理的觀察，定出一個輕重先後的次序。在這一方面看，近年來似乎只有二種主張，一是建設長江，例如實業部的四年計畫便是以建設長江流域重工業

為中心。二是開發西北，尤其是在失去東北之後，一部份人士更認西北為唯一的出路。但是長江沿岸的工業必需的原料及動力究竟從何供給，如不預先研究，各種事業均有空無憑藉之感，許多計畫現已發見實行的困難。例如硫酸廠總嫌硫磺的供給不夠，鋼鐵廠總苦焦煤的運費太貴。開發西北，究竟能否救濟全國的人口壓迫，或糧食的缺乏，如果希望太大亦難免易於失望。尤其是各區域天然背景不同，開發建設並不能膠柱鼓瑟，全用一樣的方法。除此之外，像動力原料最富人口甚多及交通較便的華北怎樣呢，對此區域之建設事業熱心者之少，狠是近年政治上之一大異事。又如著名富庶的四川，至今還是閉關自足與全國絕少經濟的關係。中國內地真正富庶的地方並不甚多，四川地的及人的經濟力不能發展來補助鄰近的區域，也是狠可惜的事。諸如此類，都是經濟計畫應該注意的問題。

外國人替我們做經濟計畫往往有他們的特別觀點。他們的宗旨常是根據沿海幾處商埠來推銷他們的工業品及吸收我們的原料品，所以他們所擬的各種交通計畫只是推廣幾處有租界的商埠的經濟勢力範圍(Hinterland)。英國人要將粵漢路接到九龍，日本人要將膠濟路延長到山西或陝西

都是這種意思。所以我們應該有我們自己的計劃。我們交通計劃有應注意的內點：一是國防問題，民國十七八年國民政府曾作鐵路計劃，是完全以南京為中心的一個鐵道網，從此而有粵京湘等線。在現勢看起來，沿岸如有戰事，南京是否安全殊不可知。如果國防中心並不在首都，則鐵道計劃也須隨之改變。而且必須能在離海較遠防守較

易之地帶，預備保全南北交通，以便遇有變故，中央不至失去控制南北的可能。二是經濟問題，交通線的用意不但

是由海岸以貫通內地，而且要連貫內地的各個經濟中心。試舉一個小例，西安一帶渭河平原，稍遇災荒常苦糧食不足，漢水上遊漢中盆地則水利豐富絕少荒年，糧食常苦過剩。如何以漢中之粟濟關中之兇，秦漢以來向是中國經濟一大問題。現代不都關中此問題影響雖已減小，但另有一新意義，即關中極宜植棉，棉種最稱優良，俟西潼路通，如多留關中之地以多種棉花，自必先能運他處之糧以供關中民食。即此便見二經濟區域間連貫之意義。以上所說要將四川的富力灌輸到旁的地方也只有靠交通的方法來達此

目的。這樣便應該認識各區域的需要及供給以定互相利用的方法。一國以內各部份脈絡貫通，力量充實，然後開關對外方能應付裕如。歐美各大國的經濟發展便大抵如此，先內充而後外展，故愈發展而愈富。中國向來交通開發及通商推廣皆出被動，皆由外壓而內侵，故愈發展而愈窮。現在我國建設計劃，自應勿失我們自己的立場。

最後要說的是各種建設不可超過實際需要，各款用途務求實在有益。譬如造公路當然是好事，但在民窮財盡之省，經濟上並無需要新式交通之地，也大可不勒捐巨款，以壯觀瞻。又如各機關之收入皆是民脂民膏，同是國家正款，所有用途自應按照經濟建設計劃上之程序，先其所急，儘量用在有結果的事業上去，決不應讓收入機關私為己有，隨便消耗。化公為私固不可，非必要的建築過於華麗的辦公大樓亦未免可惜。如果弄得不急之務隨便化錢，而每逢正當應辦之事，反小事必向財部請專款，大事必向外國求借款，則民力有限，國命已危，建設！建設！中國可能經幾次試驗呢？

對大學新生貢獻幾點意見

蔣廷黻

入大學的人多少有點懷抱，有點志氣。他們入大學的

目的不外為他們理想的事業作相當預備。各人的理想雖不

同，但多數都有一種企圖，這是很明顯的。

究竟我們能為國家，為社會作什麼事，一方面要看我們自己的本能和修養，一方面也要看環境要我們作什麼事。在我們起始預備的時候，我們必須認清我們的環境。

中國的病，依我看來，有兩個。第一，我們是個落伍的國家。外人以飛機坦克車攻我們的時候，我們還是靠上古的大刀以資抵抗。外人用電力油力汽力水力馬力來生財運輸的時候，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們還是靠原始的兩頭腿，兩個手臂，一個肩背的筋骨力量。我們不但物質落伍，在政治經濟制度上也落伍。我們的國家連收稅都不會。西洋十七十八世紀所常見的包稅制度，在今日的中國尚盛行。我們常說打倒帝國主義，但我們最好的稅收機關仍是外人所主持的海關。倘若我們把海關裏面的外人都驅逐，其結果不是國家的稅收減少，就是中外商人的負擔加重。此尚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事。至於大者，如軍閥的割據，簡直是中古的封建變本加厲。我們倘仔細考察一般的用人行政，處處都可以得着封建的臭味。

因為國家的落伍，我們不但內政不修明，以致人民幾全在飢寒交迫之中，並且我們對外也只能聽人宰割。中國與日本究竟為什麼一強一弱呢？主要的原故不外乎日本的

物質文化及一般的政治經濟制度的現代化程度遠在我們的

之上。在近百年的民族競爭之中，凡能利用現代的文化者

則強，不能者則弱。這是近代史的一個鐵律，沒有一個民

族能脫逃的。在最近這七十年，日本的現代化竟超過我們

的現代化，這是我們的致命之傷，也是我們基本的國恥。

在十九世紀的前半，中日兩國同是因閉關自守而落伍的，

同受西洋的壓迫而與其訂不平等條約。我們的覺悟，初步

的覺悟，比日本的覺悟還早。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年

——以後，我國少數的士大夫就知道「洋務」的重要。彼

時林文忠公在廣州聘人翻譯了一部外國地理，譯名「四洲

誌」；他又購置不少的外國船炮。同時姚瑩（號石甫）在

台灣道任內強迫英國被俘虜的官佐作他的世界地理講師；

他得到的那點知識，他視為至寶，即時報聞朝廷。徐繼畲

（號松龕）殷勤的請教傳教士，編出一部「瀛寰志略」。

日本在幕府末年（嘉永到慶應時代），初感覺須有世界知

識的時候，日本的文人就翻譯林則徐的「四洲志」，徐繼

畲的「瀛寰志略」及魏源（號默深）的「海國圖志」。數

年前我在日本的時候，中山久四郎教授曾將其家藏的舊譯

本拿出來給我看。其中有一部的譯者在其序內說過一段這

樣的話（我只記得大意）：學習西洋文字太費力了；幸而

日本人容易學漢文，學了漢文，日本人就能得世界知識了。所以不但日本的舊文化得自中國，即其新文化的入門也是得自漢籍。而今日我們竟落在日本之後！這豈不是我們基本的國恥？其實不待今日；在甲午年中日兩國現代化的程度已經判明了。乙未馬關議和的時候，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曾有這樣一段的交談

李云：亞細亞洲，我中東兩國最爲鄰近，且係同文，詎可尋仇？今暫時相爭，總以永好爲事。如尋仇不已，則有害於華者，未必於東有益也。……

伊云：中堂之論甚愜我心。十年前，我在津時，已與中堂談及。何至今一無變更？本大臣深爲抱歉。

李云：維時，聞貴大臣談論及此，不勝佩服，且深佩貴大臣力爲變更俗尚，以至於此。我國之事，囿於習俗，未能如願以償。……今轉瞬十年，依然如故。

……貴國兵將悉照西法，訓練甚精；各項政治，日新月盛。……

甲午到現在，轉瞬又將四十年。李鴻章對伊藤說的話，江外長仍舊可以拿出來，作爲與有吉公使寒暄之資！

民族的競爭有如接力賽跑。一代跑了一圈，就下場，第二代又接上去。中日現代化的競賽已經七十年，可算兩

代。現在入校的新生是第三代的預賽者。前兩代我方的代表已落後，且落後很遠。我們希望第三代能夠趕上。

新生將來的事業的環境和背景既然如此，他們應該怎樣預備始能負擔這個重大使命呢？

新生的使命既在促進國家的現代化，他們的預備就是預備作現代人，有現代人的知識，現代人的意態，及現代人的體格。這個預備工作又應該怎樣着手呢？

我在上文已經說過：中國的病有兩個。在未討論這預備工作的路徑以前，我應該說明第二種病。

這個第二種病，依我看來，是士大夫階級的破產，知識的破產，道德的破產，體格的破產。最後一種的破產是顯而易見的。中國舊日的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爲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動，足不能行，背不能直，一天到晚在那裏吐痰擦癢。無這些病態者尙要裝有，好像不病不弱就不能算文人。道德的破產比較隱微，但尙用不着顯微鏡。中國舊日士大夫的道德毛病不在其標準不高。我所讀過的士大夫的言論都是極高尚的。不過他們立言是在紙上，好像建築工程師的圖樣。圖樣雖好，倘建築不照圖樣，那不是空費事？士大夫的平面言論和具體行爲是兩不相關的。倘是有一個人要不分大小，事事都照孔孟程朱的教訓作，世

人都會說他是個「迂儒」。名士則不「拘泥」，他們有以自解：「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不過糊塗慣了，就不分大小了。我有一個留美歸國的朋友，在衙門裏面得着一

個「掛名差事」。第一個月發薪的時候，他很覺不安，對自己說：「這錢是人民的汗血，我這月沒有替人民作點事，我怎能接收呢？」足証此人在留學時代曾得着現代人的道德。不過他又感覺不收的困難，於是遂收了：足証社會壓力之大。到第二月發薪的時候，他反只覺薪額太低了：足証現代人的道德爲社會所屈服了。光緒十年左右，中國第一批留學生歸國的時候，他們看見許多外國人沒有過受高深教育而在中國海關居高位支大薪，就憤憤不平。有一個外國人就對他們說：「誠然，孔孟的書，唐宋的詩，你們是懂得，我們是不懂的。甚至斯賓塞及赫胥黎的學說，你們比我們知道多。但是我們也有幾點小小的本領是你們所沒有的。我們每天說辦八點鐘的公就辦八點。我們收五十兩銀子的稅就報五十兩。我們接到上面的命令知道服從。這幾件簡單的事，你們就作不到。」再回到道光年間也有一點証據。當時中日兩國對外人的居住往來都是禁令森嚴的。外人在中國感覺中國官吏的禁令雖多，實際一事不管，倒很自由；外人在日本的感覺日人說到那裏，作到那

裏。他們雖覺得在中國比較自由，但不免心中敬畏日人而鄙視中國人。我常想中日近七十年進步的差別大半就由乎此。

舊日士大夫的知識和求知的方法也有偏重紙面的毛病。我們素來求知的方法是讀書；現在變爲聽講。關於這一點，我的朋友翁詠覽先生曾告訴我一個很妙的故事。話說日本在明治維新初年聘請了幾位西洋地質專家到日本去考察礦產。日本政府派了幾個日本人去陪專家，去跟隨學習。專家跑匿那裡，看見什麼東西，日本學習員也跑到那裡，要專家指出他們所看見的。後來這幾位專家又被中國政府聘請到中國來考察；中國政府也派中國人去陪隨學習。我們的學習員陪了專家到北平西山的脚下，就說：「這是西山，山上的礦一定很多。你們上去考察；我們在山下等着。回來的時候，請你們告訴我們看見了甚麼。」這種求知的態度很够代表我們舊日的士大夫。現在確有相當的進步。學地質的，學生物的，現在甚願出外去實地考察；學物理的，學化學的，都知道拿實質的物品去試驗。這是中國近年最大的革命，最有希望的現象。不過我們的革命還不徹底，尤其是學社會科學的人。我們還是偏重讀書聽講，並且讀的書不是洋書，就是洋書的譯本或抄襲。而講

演者不是講洋書，就是講洋大學裏面的洋教授所講過的洋東西，其結果我們知道十八世紀英國的工業革命，不知道目前中國的工業革命，知道紐約，芝加哥，倫敦的市政，而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北平，天津，南京，武漢，廣州的市政；知道英國的內閣制的運用，而不知道行政院，中央黨部，國府委員彼此的關係。此類的事實太多了：總而言之，因為我們襲用傳統的求知方法，我們知道書本，不知道事實。發表出來，都是些洋洋的八股文章：逞意氣，玩弄之乎也者來抹殺事實。

那末，入學的新生如要擔任起來他們的歷史使命，他們必須掃除舊日士大夫的積習，而養成現代人的人格。第一，選習功課不求多，只求有心得。近年國內的大學有一種極壞的風氣：辦學者及求學者均以爲課程愈多愈好，以致各大學裏的許多學系，其課程之多過於全系學生的數目。湖南鄉下有句俗話 客婆家裏來塊肉，長是够長，吃又吃不得。這句話很够描寫我們的課程表。學生往往有選習六七門者。當然精力不足，其結果一無所得。因為要有心得，我們必須將原物件，原現象，原文件或是親眼看過，親手試過，或是親身到過。第二，學問必須有次第。工具課程如各國的語文，基本課程如各種學術的引論應該提前

學習。我常見學生有不知道歷史常識者要求學史學方法或歷史哲學，甚至高談唯物史觀；不知道生物的構結者要學達爾文學說。近年國內大學的課程表，真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名稱務求新鮮與時髦，內容則不求充實。第三，求學切不可自欺。外國教授常說中國學生不好問。不懂的就隨便的讓牠過去。這是自欺而且自誤。

我們現在要改革國家，要使國家和社會完全現代化。那末，我們就應在學校裏面作起，不要等着我們畢業以後。學校本身就應作一個縮影的現代化的社會。中古的意態，習慣，空氣都不應有絲毫存在於學校之內。現代講法治，尚工作効率。凡遵章而認真辦學的人，學生應該尊敬他們，擁護他們，不要希望他們通融，敷衍。現在實際的狀況正相反，以致凡認真的人都站不住，不認真的人反受歡迎；辦學者無暇辦學，他們的精力都費在對付上。現代的生活日趨社會化，甚至共產化。所以所須的要公德心比任何時代都要多。學校的設備都是公產，大家都要愛惜。近來有一美國學者新自哥倫比亞大學來，他告訴我說。一天他遇着該校圖書館主任 對他說，圖書館某本雜誌不知被什麼人畫的不像樣子，我想一定是中國學生作的，因為他們就好幹這一套。我在外國的時候，曾未聽見圖書館

遺失書籍上百上千者；在中國則司空見慣。這樣的學生將來到社會上去只能流毒於社會。至於體育的重要，那更不要說了。青年的男子應該有大丈夫的氣魄和體質。照我的觀察，中國近代革命最大的成績是女子的解放，可惜我們男子以為做裝雌態是摩登。講到這裡，我連想起學生有病者之多，並且常以得病來求教員優待。英國文學家巴特萊

(Butler)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在這科學的世界，得病者應坐監牢，犯罪者應入醫院。人基本是個動物；不是好動物的人就不是好人。

創造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除非大學的新生願意出現代生活的代價，那我們這個國家，內憂外患交迫的國家是很難有希望的。

美國移民律的將來及其對中國移民的影響

吳景超

從太平洋會議以及舊金山傳來的消息，都說美國的輿論，對於中國移民問題，已經改變了態度。以前他們對於中國的移民，主張閉門不納，現在他們願意把中國的移民，與歐洲的移民，一律看待，一樣的給以相當的歲額。這件事情，雖然還沒有成為法律，但在不遠的將來，頗有成為法律的可能。假如這件事情可以實現，對於中國會發生什麼影響呢？中國的人口，是否將因此而多一條出路呢？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先，我們不可不知道美國近數十年對於移民問題的處置。

美國在十九世紀，因為地大物博，人烟稀少，所以對於各地的移民，一律取歡迎的態度。在這一世紀內，除

却對於中國移民會加以限制外，對於其他各國的移民，始終沒有拒絕過。中國人到美國去謀生，不知始于何時。我們只知道在一八二〇年，美國初辦移民統計的時候，已經有中國人到美國去了。但大批的華僑到美國去，却在一八四八年之後，那時舊金山附近發現金礦，這種消息，由美國的商人，傳到廣東，打動了中國人謀利之心，于是有許多人，便不避艱險，遠渡重洋，到舊金山去發洋財。起初中國人在美國是受歡迎的，因為美國的西部，當時還是一片荒地，處處需要人工開發，中國人肯努力工作，肯耐勞吃苦，在這新大陸上，真是滿足了一種需要。後來美國橫貫大陸的鐵路造成了，東部的人民，因為旅行便利，遷移

到西方去的逐漸增加。同時東部的貨物，因為運輸便利，也逐漸貫入西部的市場。西部的新興工業，受不起東部工業的壓迫，有很多關門的，可是謀事的人因為人口加增的緣故，却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於是，造成一種失業的現象。在這時，中國人便成爲白人的眼中釘了。他們感覺到自己生活之艱難，以爲是由于中國人的競爭而起，多一個中國人，白人便少去一隻飯碗。於是美國的西部，便發生一種排華運動。美國的國會，爲滿足西部人民的要求起見，便于一八八二年，通過第一次限制華工入境的法律。當時的規定，是在十年之內，不許華工到美國去。一八九二年期滿，又延長了十年。到了一九〇四年，美國的國會，想出一個一勞永逸的辦法，便是通過一條法律，永遠不要華工入境，并無期限的規定了。

所以實際上講起來，華工不能到美國去，已有五十一年歷史了。大戰之後，美國通過了好幾次限制移民的法律，但這些法律，與中國移民并不發生關係，因爲中國移民，早有法律規定了。但我們爲明瞭最近的發展起見，對于這些法律，不可不有簡單的敘述。在大戰之前，歐洲移民對美國去的數目很多，有些年份，甚至超過百萬以上。

在大戰時期內，美國政府，因爲本國人口成份複雜，感

到了很多的困難，大戰完畢之後，歐洲許多失業的人，又都跑到新大陸去謀生，于是美國政府，覺得對于歐洲移民，也有限制的必要。一九二一年，便通過一條法律，規定歐洲各國，每年遷移到美國的人民，不得超過一九一〇年該國僑民寓居美國的總數百分之三。一九二四年這個移民律又修改了。修改的法律，有兩點很重要的。第一是百分數的降低，以前是百分之三，現在改爲百分之二。第二是百分數的根據，不取一九一〇年的人口報告，而採一八九〇年的人口報告。第二點的變更，是有道理的，因爲美國的移民，分爲新舊兩種。舊的移民，多來自西北歐，而且大多數是在一八九〇年以前來的。新的移民，多來自東南歐，而且大多數是在一八九〇年以後來的。現在如以一八九〇年的人口報告作根據，來定各國的移民歲額，自然東南歐各國人口的數目，便要減少許多，這正是美國人所願意達到的目的。在這一年的移民律中，還有一條規定，就是凡無資格做美國公民的，不能移往美國。這一條是爲拒絕東方民族而設的，因爲美國的公民法，規定蒙古種的人民，不能做美國公民。這條法律通過之後，反對最力的是日本，我們留心國際新聞的大約還能記得。這條法律，自然也牽涉到中國，可是中國早被美國拒絕了，所以此次并

不感到什麼影響，不過一次兩次的被人家通過法律拒絕，面子上有點難看就是了。

一九二九年，美國又實行一種新的移民律，規定每年美國只能容納移民十五萬人，這十五萬人的分配，應以美國一九二〇年美國人口成份為標準。譬如我們分析美國一九二〇年的人口，發現德國人的成份，佔百分之十六，那麼在這十五萬的歲額中，德國可以佔百分之十六。換句話說，德國每年便可以送二萬四千個德僑到美國。美國的人口來源很雜，移民到美國後，又因通婚的原故，每每在三代之後，便不能保持原來的血統。我們如去分析一個久居美國的人，一定可以發現他的血液中含有好些民族的成份。所以分析一九二〇年美國人口的成份，斷定百分之幾來自英國，百分之幾來自法國，百分之幾來自其他各國，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但是美國有的是專家，行政的當局把這與難題交給專家研究了許多時候，居然也弄了一個答案出來。這個答案，從科學的眼光看去，是否可靠，我們且不管他。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美國現行移民律所根據的原則。假如美國有一天也給中國一個移民歲額，他們一定是根據這個原則出發的。

美國在一九二〇年，共有人口一萬萬〇五百七十一萬

餘人，其中有九千四百餘萬是白人，其餘的一千一百餘萬是有色人種，在有色人種中，黑人佔大部份，共有一千零四十餘萬人。中國人在美國最多的時候，有十萬七千餘人。一九二〇年的人口統計，表示中國人在美國的，只有六萬一千六百三十九人。我們如願意知道美國將來要給我們多少移民歲額，先應問美國一九二〇年的人口，中國人的成份是若干。依我的計算，中國人種在美國人口中的成份，不過萬分之六。根據上面所說的原則，中國的移民歲額，應當是十五萬人中的萬分之六。換句話說，中國人每年可以到美國去的，不過九十人。但是美國的法律，還有一條，就是可以移民到美國的國家，其最低的歲額，定為一百。所以我們現在猜想，美國將來如對中國移民開禁，每年也不過讓中國去一百人，再多的歲額，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決不會因為中國的緣故，改變他們移民律所根據的原則。

由于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到一種感想，那便是：即使美國真對中國移民開禁，對於中國，並不發生影響。中國的人口，號稱四萬萬人。我們的人口過剩問題，決不會因為美國對中國移民開禁而得到解決。因為在四萬萬人中，一百個人真如九牛之一毛，太倉之一粟。這一百個人

有了出路，中國的人口問題，還是絲毫沒有解決。所以從經濟及人口的立場觀察，美國將來是否要對中國移民開禁

。二二，九，十六。

，是無足輕重的。

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嗎？（續上期） 弘伯

（法國里昂大學通信）

事主義——即是無為的政治哲學。這點以後再講。

乘舟西渡，走到蘇彝士，你就會覺得那邊人力的偉大。再進至意大利海峽，看見西西里和靴形半島的尖端那些山林，那些道路，那些城市，你又會覺得這真是西歐，不是東亞。抵馬賽登岸，快車馳於原野，極目之餘，似乎孟子說得真對：『入其鄉，土地闢，田野治』！人民安居樂業，頗有吾人所夢想而未得的景象。然而厥土並非上上，厥民並非神祇。這不能不歸功於他們的政府，善於規畫，善於領導，善於發展公共的事業。西方公共事業的發展，是人民得享幸福的泉源。在發展公共事業的背後，是有職務的國家觀為其根底——即有為的政治哲學。

徐詩哲在幾年前已說過：『在那邊（指蘇俄）人類的活力，幾乎達到了炙手可熱的度數，恰好反照我們這邊一切活動，低落到不可信的地位』。這寥寥數語中，可以看出東西文化的差異，也可以看出雙方政治哲學的背景。如今蘇俄以四年〇三月的工夫，把第一五年計畫完成了，即又進行第二個五年計畫了。我們看看人家的有為，自己能毋慚懼？講無為的老祖宗說得好：

『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這可見第一步最關重要的是要有。沒『有』，則無『無』以為用。後人（不是適之先生）誤解老子，以為無為

回頭看看中國：地土是腴沃的，人民是勤苦的。然而公共事業呢？以前是幾乎等於零。為什麼令幾乎等於零呢？因為二千餘年來，政府所抱的主要政策，是不管事主義，是聽黎民自生自滅的主義。用適之先生的話來說，是省

是什麼都不要幹，結果便什麼都沒有。文化的高低，本視以民族努力的程度為轉移。從殘酷的大自然下求解放，要努力；從帝國主義者的桎梏下求解放，也要努力。不努力，那有自由？那有收穫？那有幸福？現在我們狼藉糕的是

由不努力而來的沒有，是正在吃沒有的虧，是正在受沒有的罪。所謂沒有，質言之，即是太窮。太窮勢必亂。窮釀亂，亂又釀窮。輾轉相尋，以至於近年鬧到潰爛不可收拾，鬧到什麼都說不上。馴至醫國者無方，旁觀者太息，診火打劫者欺凌！我們所得的教訓，還不夠麼？還要再用曹參偷閒的辦法麼？實驗主義者的信徒是要看結果的。試一回顧過去，無爲的政治哲學，結果真是『刮刮叫』麼？

我常常想：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我無爲而民自化等等主張，在從前閉關時代，也許可行，行起來也許是一個『不服藥爲中醫』的辦法。但是，至少是人口問題不能解決。爲什麼呢？在不管事的政府下，人口對於食物，有未超過某限度以前，還可以苟安維持。在這一達極限以後，若再加以災荒，於是便不得不大亂大殺起來。例證如明末的張獻忠李自成，唐季的黃巢，再如秦漢之際『人相食，死者過半』。這就是中國淘汰過剩人口的老法子。歷朝鼎革，其中往往有經濟的原因。撥亂反治，也往往是過剩的數目已行消納。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這原是『理有固然，勢有必至』者。如果我們再照抄老哲學，則一治一亂的舊劇，恐不知將演到何時，而吾人也真不長進！難道過去所得的痛苦經驗，還嫌不足？現在我們

所受祖傳無爲政治哲學的罪，還嫌太少？陶孟和先生說：『一切社會問題，都是歷史的產物』。法郎士(A. France)說：『我們現在的社會情形，是在牠之前那些情形的結果，就像牠是牠以後那些情形的原因一樣。牠靠着從前的，就像以後的要靠着牠一樣』。適之先生是最愛用杜威祖孫的方法者。似乎我們當回頭看看過去這類的史實，然後纔確知將來應該怎麼辦。

我常常覺得：中國文化，表面上雖是儒家居於首席，實際上却中道家的流毒很深。這原因一方面也許是由於孔子親炙過老子的教誨，致其思想中夾有自然主義的成分（例如天何言哉？予欲無言。又如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一方面也許由於黃老之術，在距今二千一百三十餘年前，即已在政治舞台上占勢力，因之於治人階級的思想裏，『源遠流長，根深蒂固』，而成爲一種無形的不成文的典則。真正儒家的正統思想，是繼承周公的有爲主義者。他們講禮樂刑政，講修齊治平，在原則上不應無爲；他們講時中，講自強不息，在原則上不應停止。他們雖然也想無爲，但方法則不是治道貴清靜。試引王介甫批評老子的數語作例。他說：

知無之爲車者，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其所以爲用也。

故無之所以爲軍用也，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之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這是儒家。掉過來再看王充解釋道家的態度道：

黃老之操，身中恬澹，其治無爲。正身共己，而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

這種自和自化自成的治績，在民性上的表現爲苟且，偷安，觀望，取巧，圓滑，不負責，想檢便宜；想吃自來飲食，想因人成事，想得冥冥中的哀憐與默佑。其結果：迷信，守舊，蠢陋，短視，自私，渙散，懦弱，委靡，放浪，骯髒，體衰，株守，膏天吃飯，各掃門戶，縱容壞人，不管閑事，不熱心公益，得過且過，因陋就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日本伊藤博文於中法戰爭後，早就看透了我們的國民性。他說：

緣現當法事甫定之後，似乎奮發有爲。殊不知一二年後，則又因循苟安，誠如西洋人形容中國所說：又睡覺矣。

愛睡覺的劣習不改，五分鐘的熱度不延長，中國真沒有希望。「在今日一切落後的中國」，適之先生還要提倡『最好的（？）撫乳培養的方法是一種無爲的政治，「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以至於無可再損，「恐怕行不得罷？恐

怕爲環境所不許罷？無爲的那種辦法，我們的敵人一定很歡迎！假如政府有出息，不像滿清，果然認真幹將起來，他倒會有點害怕。處於現世政府權力趨於擴張的時代，適之先生偏要我們的縮小到只當警察，這似乎在理論上有點違反世界潮流，在事實上也恐辦不到。理想中的不要政府，理想中的『一切公用事業，一切工商業，一切建設』，都由人民去辦，這在歐美各先進國尙且未能，在我國即刻能成嗎？即使馬上便能，也有流弊。因爲放任主義下發展的結果是漫無系統，不惟很不經濟，抑且互相衝突。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欲後來而居上者不能不事先考慮，預防。要能預防，政府勢又不能不有爲。何況我國是幾千年專制的國家，是人治的國家，現在改爲民國，因爲平民教育未普及，尙且是掛空招牌。如果再加以恢復不識不知的方略，恐再過百年，老大的中國，還是和現在相髣髴，尤其是內地。適之先生注意未？內地至今還有小脚哩！政治是一種中心勢力，是一種引導的勢力（Leading Force）。假如牠真能引導，則進步很快。德日俄均是好例。否則人民完全自動經營的社會事業，不惟慢得要命，且很容易被牠摧殘破壞。你三年五載歷盡千辛萬苦纔創造出來的一點小規模，牠只消一天半日，便可以給你弄得精光。所以這

問題的要點是不能不管政治，是要如何設法改良政府，監督政府；教他們少扯謊，多做事；教他們少爭個人的權利，多替國家社會的生存着想。現在他們實行的是民死主義，不是民生主義；所優爲的是刮錢主義，不是有爲主義。

總起來說，我們對於適之先生的憤慨表同情，對於適之先生的主張有商酌。裁兵與裁官，如果有辦法，我們是贊同的；停止一切建設的省事，我們是反對的。爲什麼要反對呢？因爲我們看時勢的結果，覺得並不是人力財力均絲毫不足以有爲，乃是官僚軍閥們所爲的劣習要改善；四週環境逼着我們趕快向前不能滯滯，不能久等，更不能開倒車向後。中國較之西洋，已經狠够無爲了；無爲的梅毒，早已澈入中國朝野的心肝脾肺腎了，實在用不着再提倡。所應當提倡者，是消極的取締貪污馬虎的妄爲，積極的獎勵福國利民的有爲。無爲的政治哲學，只能行使於悠遠的過去和不可知的未來。在中國現在的國際環境內，不惟不宜，亦且不能。我們的看法，不幸與適之先生正相反。適之先生說：『現時中國所需要的政治哲學，決不是歐美十九世紀以來的積極有爲的政治哲學』。我們說：『現時我們所需要的，正是歐美十九世紀以來積極有爲的政治哲學，而不是二千四百年以前消極無爲的政治哲學』。中國

在現世上，除開烹調一項而外，請問還有些什麼具體物事

可以拿出來與人相較？就說交通罷。別人早已『交際往來，道路無壅』。而我們呢？是『咫尺天涯』，是『太古式的運輸』，是『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別人巴黎到里昂（約合華里八百七十），信隔夜可到；而我們的清華到北平（十二里），信亦隔夜可到！民國十七年，適之先生爲美使館商務參贊安立德（The an Arnold）所著一書（Some Bigger Issues in China's Problems）作序時還說：

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上不如人。不但機械上不如人，並且社會政治道德都不如人。……

後來他又積極主張道：

第二步便是死心踏地去學人家。老實說，我們不須怕模仿。「學之爲言效也」，這是朱子的老話。學畫的，學琴的，都要跟別人學起；學的純熟了，個性纔會出來，天才纔會出來。

那時的論調如此。現在呢？忽然不說該學西洋而要主張復古了！所復的古是秦漢的古，這本是清儒的學風。難道適之先生於考證外也和他們一鼻孔出氣麼？難道『打鬼』的

工作已宣告放棄麼？歷史是不能倒轉的，恢復原狀那可能？從前的自然主義者主張無爲，主張反抗文化，因爲他們沒有注意自然現象和人事現象的差別。即前者是演而不進，後者是進而無已。現在要照抄二、一百年前『政不出房戶』的舊文章，同時又讓『政治儘管齷齪』，而欲再見文景的盛況，那裏可能？那裏可能？韓非說得好：

蘇聯的報紙

（曼城衛報莫斯科通信）

蘇俄革命成功後顯著的進步，就是在俄國內閣讀新聞報紙的習慣非常的擴大與增加。歐戰前，俄國祇有八百五十九種報紙，其中的四百六十七種是在現今的蘇聯境內出版的。這八百五十九種報紙共總銷行二百七十萬份。現在的蘇俄有了五千四百種報紙，銷行約在三千八百萬份。

對於這個數字我們得當心，不然就會受蒙蔽了。五千四百種之中有一千七百六十種是縣屬的機關報，平均每星期出版兩次，又有一千五百六十種是工廠方面的報紙，出版更屬稀少。可是全國閱讀報紙的習慣盛行，是的確的事實。例如現在有一千萬人閱讀非俄語的報紙。這是很重要

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

又說：

是以聖人不務循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我們希望領袖思想界的適之先生不要忘記了這幾句老話。同時也希望我們的政府爭點氣，趕緊革而洗心，回頭是岸，做點良好的成績出來與人看看。 二二，七，十五，

劉學濬譯

的。在歐戰前祇有俄國西部一帶的人閱讀那種報紙。紙現在這西部成了獨立的省治Stateso現在莫斯科要是遇見一大串人排列成行，就許是表示一批報紙到了，販賣報來多賺些麵包。

要是蘇俄不十二分的缺少新聞紙張的話，蘇聯報紙的銷流及篇幅兩方面都一定要比目下的多得多。報館對於新定閱者的總是很不願意接納，並且也常常拒絕。每種報紙都限定不得超過四大張，就是全俄國最大的報紙像 *Isvestia and Pravda* 也受那種制限。平常各報銷流很廣，上述兩報每報閱者約一百六十萬人。*Krestyanskaya Gaeta*『農民

報』有二百萬閱者。其他四十一種報紙誇稱均有十萬以上的閱者。

蘇俄報紙在管理法上與各國所用來指導銷路廣大的報紙的辦法，在許方面是剛剛相反的。在蘇俄管理法下，每報均受制於一種公共的管理，所以絕沒有 Northcliffe 或 Hearst 等人物出來同 Izvestia 及 Pravda 競爭減價售報。

蘇俄報紙對於別的國所謂『人事興趣』(Human-Interest) 的事情，都一律嚴禁登載。一半因為篇幅不夠，一半也因為蘇俄的道德觀之不同。普通一切的犯罪，離婚，及其他一切的壞事絕對不得登載。體育事業有時也登載一點兒，可是誰也找不着關於家庭碎錦，服飾的時樣，社會的短簡，十字迴文及各種行市情形（這行市一事在俄國是不存在的。）因為缺少紙張，所以限制刑罰等物並且連關於書籍文藝音樂等批評介紹的注意都受限制。雖然俄國還有每星期出版的刊物，專門討論藝術與文學的來補救補救。

蘇俄報紙既然不登載各國所登載的東西，那末，到底他們登載些甚麼材料呢？蘇俄的編輯先生怎樣排滿那四大張指定的紙張呢？外國消息在新聞欄內及社論均有相當的注意。政府重要命令，共黨的決議案，全部登載，並加以

詳細評注。各樣集款或集糧的運動各報紙均盡力宣傳。

工業的發達在俄國報紙上都登載用大號字，並且詳細說明一切，以為是天字第一號的重要新聞。可是這種事情在別國則或者視為秘密，或者祇登載在買賣欄內而已。工廠開幕，報紙也總是十分詳細的登載。工業或農業上的困難，也是詳細的說明描寫的。

蘇俄報紙趨向於極端的『身外事物』(Impersonality) 是 Karl Radok 的外交批評， Mikhail Koltzov 的文藝小品和 Deni 及 Efimov 的銳利的諷刺畫，都是莫斯科大報著目的特色。在各省治的報紙，因為黨的裁制及紙張的缺乏，所以都趨於極端的標準化的劃一，毫無生氣。

在蘇聯獨裁政體之下，一星兒一點兒的關於政治經濟上的異議也絕對不容於報紙上。可是各報有所專長。例如 Izvestia 專長於普通蘇聯新聞，Pravda 則努力於黨的新聞。軍隊，商業聯合會，共黨青年聯合會等團體，均有他們各個的特別報紙看。至於工業上及經濟上的問題，就在兩個中央每日新聞登載。這兩個報紙即 Economic Life 與 For Industrialisation

據正式的聲稱，蘇俄聯邦已有百分之九十能認字的人，在一九二〇年祇有百分之四十而已。這種事情很難証實

，不過蘇俄竭力於剷除文盲的運動，尤其是在近數年間，增的原故。俄國市鎮有許多報紙，篇幅不多，內容劃一。已經發生了顯著的成功，而認了人的增多正是報紙銷路突。他們的最大功用，也許就是在補助全國的識字運動罷。

本刊前二	第六十七號	我們目前對於中央最要的希望 注意兩種入學考的副產物 整頓教育與考試制度 第三國際的戰略 新都隨感錄 對於國事的一點意見(歐洲通信)	蔣廷黻 逸民 鳴岐 震東譯 布白	第九一八——兩年以後 技術合作應從何處作起? 第三國際的戰略(續) 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嗎?	蔣廷黻 叔永 震東譯 弘伯
期的要目	第六十八號				

注意 本刊特定優待辦法

本刊為特別優待本年新入校諸君起見，凡直接訂購本刊四十期者，只收報價一元。外地用郵票訂購者，照十足計算，不另折扣。愛讀本刊諸君，幸勿失此良機！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本報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現已售完。現在第二十六期至五十期亦存書無多，欲購從速。特價如下：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本報」每月一元	「國內新聞」每月一元	「外埠通訊」每月一元	「經濟界」每月一元	「教育界」每月一元	「體育界」每月一元	「學園」每月一元	「藝園」每月一元
----------	------------	------------	-----------	-----------	-----------	----------	----------

商務印書館編印 小學生文庫



— 主編者 —
王雲五
徐應昶

「獨立評論」第六十九號

介紹小學生文庫 給賢明的家長

甲、我家有幾個小孩子，要我買些可看的圖書，不知有什麼相當的可買？

乙、最近商務印書館有一部小學生文庫第一集，復可買的！

甲、不知內容究竟適用不適用？

乙、有一本目錄，可以一目瞭然？

甲、我家的小孩子程度不齊，一部書未必深淺都有罷？

乙、小學生文庫就是有這種好處，淺的也有，深的也有，而且分門別類有四五種之多。愛看語文文學的有一百六十六冊，愛看自然科學和應用技術的有一百五十九冊，其餘科目，無不按照我國兒童的需要情形，為適當的支解。

甲、恐怕小孩子看不懂罷？

乙、不全書都是語體文，很容易閱讀，而且插圖很多，兒童越看越有興味。

甲、要多少錢呢？

乙、很便宜，現在正售預約，五百冊書紙要四十五元。論理是很便宜，不過要我一次拿出四十五元，還

甲、有些為難。

乙、不要緊。他們有分三期交款辦法，第一期交廿四元，第二期交廿三元，這就便宜了。最好叫小孩子把買吃物的買玩具的錢，節省些下來湊湊，養成他們自動省錢的習慣。如果他們原有儲蓄的錢，提出來，也是很正當。還有一個法子，親友中開手女多的，聯合起來買一部，各使子女輪流閱讀，不是更經濟嗎？

甲、這個方法很好，我決計要去預約一部。

乙、這真是為兒童造福了！

預約辦法		預約價	開數
出書期	本年十一月及十二月各出二十冊，共一百五十冊	一次交四十五元 先交廿四元，第二期書時各交十三元	一、七、十、元
截止	本年十一月及十二月各出二十冊，共一百五十冊	三次交	元
郵費	各行書局		
郵費	各行書局		
郵費	各行書局		
郵費	各行書局		

定預館書印務商向

贈閱目錄 函索請附 郵票一分

華北危機的責任

叔永

塘沽協定究竟有些甚麼條文，始終未經我們政府公布。但據官方的聲明，除當時已在各報上發表的幾條外，絕對沒有甚麼秘密條件。就這五條的協定而言，牠有一個取大的漏洞，就是不會保留我方在所謂非武裝區內的剿匪權，識者早已料到以後無窮的隱患，皆即潛伏於此。千尺之堤，壞於一蟻之穴，在他方或者是有意為之，在我方則這樣顯而易見的危機，事前竟未曾防備着，不能不認為是當局者的疏忽了。

所謂危機的潛伏，在甚麼地方呢。據一般的觀察，不外下列幾點：

一，灤東及平北一帶非武裝的區域，既為我方兵力所不及，則原在這一帶地方的偽軍，土匪，及一切不逞之徒，勢必盤據滋擾，為所欲為。這樣，在這一帶居住的百姓們已經够受了，而在政府方面，除了乾受不能維持治安的不自之冤外，亦別無辦法。

二，灤東及平北一帶的非武裝地帶，在我雖形格勢禁，在彼却息息相通。那末，凡是關外的便衣隊，浪

人羣，鬻匪，軍人，無不可以自由出入，俟罇而動。我們要置之不問嗎？則時時有受威脅的可能。要想設法消滅之嗎？則除收編以外亦別無辦法。但收編則愈編而愈多，且亦不過養癰貽患，終竟有潰決的一天，結果仍不是一個辦法。

三，到了這個時候，我們表面上撤退長城線的敵軍，必且藉口我們不能維持秩序，藉口我們違反停戰協定，掉轉馬頭，長驅南下，重作威迫平津之舉了。

這種觀察，在一兩月以前，似乎只是一個悲觀的豫測，在最近的一兩星期以內，則漸漸的以實事展現於我們的眼前。在最近兩星期以來，灤東一帶的土匪，大有化零為整，咄咄逼人的氣勢。據大公報的北戴河通信，海陽鎮的老耗子（即張魁元）近與石門寨自稱東亞同盟軍的郭亞洲聯合，聚衆七八千，聲言將假道海陽以逼撫寧昌黎，進取唐山，與李際春軍聯絡而謀取平津。這是第一項預測的實現。又在兩三天以前，素在灤東以抗日號召的方振武軍隊，忽然假道熱河由古北口長山峪一帶以入冀北。且入據懷

柔，聲言將與滬東匪軍聯絡以圖擾亂平津。這又是第二項預測的實現。所不同的，方振武，吉鴻昌等部，似乎尚未取消抗日旗號，不便遽認爲「滿洲國」的便衣隊而已。至於第三項預測的實現，大約爲期亦不在遠。我們不看見二十三日晨日軍的飛機已經光顧北平的天空，放散『警告方振武軍及其聯合之諸軍』的傳單嗎？這個傳單明言『從嚴要求』『方軍長須立刻開始撤退至協定綫以南之地區』。『倘或屆期尚未完全實行撤退，則關東軍即刻興師，斷然討伐』。但他不似懷柔或密雲去放散，却到北平來拋擲。這一個傳單，明明不是豫備給方振武軍看，而是豫備給華北當局們看的。他明明知道，方振武軍已經由抗日而變爲抗中央了（見各報所載方軍的標語），那末，他限定他往協定綫以南的地區移動，即無異送僞敵的軍隊到我們的境內。所以如果方振武也照傳單行事，即無異於第三項豫測的變象的實行。如其方振武軍不照傳單行事，那末，他們不妨又照傳單所說，『即刻興師，斷然討伐』。所以我們說第三項豫測的實現，大約爲期不遠。我們瞧着罷！

不過，世間的事情，唯有那處心積慮，操縱縱指示權的，應該負最後責任，無論怎樣玩手段，變戲法，是不能一手掩盡天下耳目的。塘沽協定，是一個城下之盟，我方

不能有磋商條件的餘地，無可諱言。唯其如是，在彼方尤有表示至誠，努力遵守的義務。塘沽協定的條文，雖然極其單簡，但有兩層的規定，却又是極其明白的。那便是：

（三）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不超越該線續行追擊，且自動概歸還至長城之線。

（四）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及以東地域內之治安維持，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

照這些條文看來，協定區內的治安，當由中國警察機關負責，即不能由他國的某種機關代爲負責。即使協定區內的治安，果然有了問題，日本可以警告中國的警察機關，要求牠積極行使職權，何用裝出狎獐面目，發那「即刻興師斷然討伐」的暴言呢？況且老耗子，郭亞洲，方振武，吉鴻昌輩，號稱幾軍，實不過少數烏合之衆，設非有人爲之庇護，我政府的力量，固不難一舉而加以殲滅。所以華北大局，設不幸再有擾亂，這個責任應由某方負之，不是顯而易見的吗？

然則我們的政府當局，便一點責任沒有嗎？那當然也不能如此說。我們的當局在停戰協定的時候，不曾保留停戰區內的剿匪權，這是一個大疏忽，上面已經說過了。其次則按照停戰協定，我們在這一帶區域內，有維持治安的

警察權。這種維持治安的警察，并無一定限制，當然須以能實行維持治安爲度。所以這一帶地面治安發生問題，我們的警察，即有隨時增加的必要，不幸我們在接收戰區的時候，警察的組織即未能充分與地面需要相應。目下政治當局，似乎更忙於茶壺內風浪式的爭鬥，把真正的對外交地方的大事，竟置之腦後了。這樣的使地方上的土匪，與

不得意的軍人，互相聯結，寢成巨患，將來或竟爲敵人藉口之資，這不是我們當局應負的責任嗎？亡羊補牢，猶未爲晚，我們希望當局急起直追，即運用塘沽協定的條文，以講求消弭華北危機的方法，不要牽延推諉，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纔好。

二十二，九，二十五，

外交與輿論

蔣廷黻

單靠外交，我們當然不能救國；忽略外交，我們確能誤國。近年國人頗能了解這個道理，所以對於外交極爲注意。日報及雜誌差不多每一期都有討論文字。專論外交的雜誌及譯著亦日見其多。大學裡而有關於外交的課程也設了不少。這都是好現象。因爲我國輿論的勢力確在長進之中；關於外交，政府當局尤其不敢過於拂逆民意。錦州中立區的失敗及中日軍事協定不能成立於熱河失守以後而成立於平津危在旦夕之際，這都是政府顧忌輿論的證據。既然如此，國人的國際知識愈充足，其議論將更有價值，更有補於國事。倘輿論有勢力而無知識的根據，他一定會成一種暴力，這是很危險的。大戰以後，歐美人士知道輿論

左右外交是不可免的事，於是竭力求輿論的知識化。他們除在學校及期刊上加倍的注意國際關係外，且設立專門的研究機關，如英國的王家國際關係研究所（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及美國的外交協會（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

我國關於外交的輿論有好幾種不健全的現象。在無事的時候，人民是不大注意外交的；一旦有事，輿情總是十分激昂，有如狂風巨濤，以致政府對外緊急的時候反而要費其大部精力來對內。惟因平日不研究，所以到國難的時候才專感憤用事。九一八以前，國人的視線，如同外交部的政策，均集中於關稅主權的收回及領判權的取消，而東

北問題反而置之度外。倘平日我們有相當的研究，我們就會知道東北問題是我國外交的最難關，不可一日忽略的；我們在恢復關稅自主及取消領判權的努力的時候，就應該顧到東北不出亂子。九一八以後，國人反對錦州中立區，反對接收幣原所提議的五條，都表現我們平日對於東北問題沒有深切的研究，不知道這問題的複雜和嚴重。

因為我們對於外交的注意是臨時抱佛腳的方式，所以我們的知識是片面的，零散的，一知半解的。為日報及雜誌撰稿的人，上焉者跑到書館裡翻翻英美的雜誌，東扯西湊，加上一點愛國的情感；下焉者則全靠感情的衝動和筆鋒的尖銳。英美雜誌上撰稿者有許多就只知時事，不知時事的背景，而我們以更不知背景的人來拾他們的唾餘，其結果當然是更不像樣子。外交的底蘊不是這樣所能得到的。現在每一外交問題往往牽動世界全局，而這全局又是各國的歷史傳統，經濟狀況，地理環境，以及輿情潮流積成的。一隅之見斷不能洞察全局。

輿論不健全，在無論那一國，都是危險的。在中國更加甚。中國國力的薄弱不容我們對外有絲毫的失當；有了禍患就跟到來了。並且在內部未完全統一以前，黨派的競爭常不惜拿外交的問題來作打倒政敵的資料。原來我們

就不甚明瞭國際的形勢；加上黨派有作用的撥弄是非，我們就更加糊塗了。

中國輿論不健全的责任，大學應負一大部份，因為製造輿論者，尤其是關於外交的輿論，不是大學裏面的人，就是曾由大學出身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幾全在美國及歐西留學生的手裏。他們定學制，編課程，領導研究的時候，於有意中無意中受他們教育的支配。譬如歷史：我們大學西史的課程總是偏重英美法德而忽略日俄；甚至於在國立的大學裏，歷史系有絕不設立日本史及俄國史者。有之，課程少，學生亦少。一國的歷史就是一國的履歷。我們平素交友及辦事都知道第一步是打探對方的履歷。在國際關係上，也是如此。我們大學的歷史系反忽略最與國家興亡有關的日俄：這是一個不可原宥的罪惡。語言文學亦然：我國的大學以英文為第一外國語或者是出于不得已，但第二外國語何必一定是法文及德文？就中國的環境說，俄文及日文豈不比法文德文更加重要麼？我們大學的經濟系也偏重英美法德的經濟狀況及經濟思想。除此以外，大學對於外交並沒有盡教育责任的計劃。各院各系均各自為政，各掃其門前雪。因為外交（或國際關係）不成一系，就無

人過問了。其實如所關各系，如外國語文，政治，經濟，歷史，地理，連合起來，很能附設外交專科，養成一般人才。這是易舉的事，所費者多在計劃而不在金錢。

其次國內的日報也應負一部份的責任。據我所知，我國大都市的大報及通信社至今還沒有常川駐外的訪員。牠們的國際新聞還是全靠外國的通信社如路透社，合衆社，哈瓦思，電通，及新聯社等。這不是個辦法。我們知道此中頗有困難，最要者莫過於經費。我以為大都市是的大報，可以把國際新聞擱在營業競爭之上，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國際通信社。

外交部的責任也是不能脫逃的。我們試問：我們的外交部對國人的外交知識會有什麼貢獻？外交部發表了什麼有價值的材料？甚至外交部的代表出席各種會議作報告的時候尚不知利用機會作點教育工作。外交部的情報處從來不會影響國內的輿論。牠所供給的材料多半是些官樣文章，且多是陳腐的。國人對之或是不注意，或是不信。外交部在平日不能造輿情；遇事則為輿情所壓倒；平日不思提倡外交的研究，遇事則歎惜國人之不見諒。這是不下種而反求收穫，天下沒有這樣便宜的事。

因為國際情形的複雜，要想多數知識階級的人——民衆

更用不着說了——能明瞭外交，這是根本作不到的。所以關於外交的輿論非有指導不可。我們若思想人人充分發表他的意見，堆積起來就有健全的輿論，這簡直是作夢。在國民程度很高的國家如英美法德，外交的輿論尚不能靠自由言論；在中國那更不必說了。倫敦的泰晤士報，因為國際新聞的豐富和正確，且因其與政府通聲氣，對於外交一發言論，不但英人重視之，即外國人亦重視之。關於外交，泰晤士報簡直是英國輿論界的未冠之王。有這種領袖，然後輿論不至雜七雜八。巴黎的時報在法國的輿論界也有同樣的地位。歐戰以後設立的專門研究外交的機關就是指導輿論的好方法。美國的外交協會及英國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均是輿論的好指導者。這兩個機關的出版品都在輿論界有權威；就是不贊成的人也不能不加以注意。

中國現在的輿論，在外交方面，既有相當的勢力；國民的程度在短期內既萬不能提高到能了解國際的形勢，我們更加須有指導者。指導的方法不外兩種，一種是創造一個中心報紙，一種是設立專門研究機關。第一個方法在中國很難實行。日報大受交通的限制，所以面積較大的國家不能有中心報紙。且中心報紙的地位是歷史的產物，非短期內政治的力量或金錢所能憑空造的。所以我們不能不採

用第二種方法，靠一個研究所來作指導者。此舉的成功亦有其條件。第一，研究所必須是一個純粹學術機關，絕對的站在超然的地位。倘研究所帶了絲毫黨派的色彩就不能得社會的信用，且其研究成績必為黨派意見所蒙蔽。第二，研究所的人員必在學術界已有相當的地位，在一種學術上實受過科學的訓練，對外交的研究實有學術的興趣。第

三，研究所應顧到日俄英美法德各方面，且不可專重與中國直接有關的問題。

倘大學，日報，外交部能各盡其責，又有一個專門研究外交的機關作全國的指導者，我相信國內的輿論必能日見健全。

統制經濟與全國經濟委員會

守愚

一個國家干涉私人的經濟行為，加以限制，與以指導，像這樣的統制，歐美和我國，早為成案。譬如公司銀行的註冊限制，鐵路輪船運價的規定，農礦工業航業的鼓勵獎勵，以及個別企業擴充程度的法律上約束等，都包涵限制指導的意義。一個國家認為私人經濟能力有限，或事關

，逐漸鞏固，在進行期間，直接或間接的，強迫全國國民，遵守計畫，努力實行，像這樣的統制，都是最近七八年的現象，亦就是時人所談的統制經濟。但是先就統制兩字來談，實是個舊有觀念和方法。

社會幸福，因而提倡國有事業或收併私人產業，而改為國營，這樣的統制，在中國目前也有很多例子，前者如官辦鐵道和煤鐵鑛等，後者如招商局南潯廣韶等路的收歸國營。一個國家運用國家的力量，規定具體的計畫，確立生產的方向，改良生產的方法，加速生產的數量，增進財富分配的平衡，使人民生活程度，逐漸上升，人民謀生的途徑

在蘇俄工業計畫沒有實現以前，大家都認統制經濟為社會主義家一種幻想。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和人民，都覺得他違背人情，不可實現，亦不許其實現。可是自從一九二八年蘇俄實行五年計畫以來，成效斐然（根據蘇俄前全國最高經濟評議會委員長的計算，自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三年之間，工業出品增加百分之八十九，農田畝數百分之十八，就蘇俄全國產量而論，三年之間，

由世界各國中的第五位，一躍而達第二位，頭位還是美國（可是當時還祇認他是叨資本主義國家的餘光。自一九二九年各國商業恐慌後，繼以衰落平疲，工人失業的人數，動逾數百萬，適巧自由主義最強，資本主義最固的國家，如美英德等，失業情形最烈。所有大企業家，銀行家，目睹慘落情形，都束手無策，反而蘇俄不但無失業，並且事浮於人，意大利亦比較的平穩。於是歐美各國的政府當局和人民，起初疑恨經濟統制的，現在逐漸覺得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方法固然是精良，生產的方向或漫無針指；人民生活程度固然是優越，却沒有永久維持這種程度的能力。換句話說，就是財富分配，或不適當，統制經濟，亦許是於無法之中的一個救濟方法。邇來美國許多資本家社會主義家的種種統制計劃，和歐西人民的理論研討，都是幾年來經濟衰落的反響。在我們中國，這個時髦名詞，忽然的幾月之間，這樣風起雲湧的，我疑是歐美海風帶過來的餘波，碰着頑石，激成大浪，不是實際研究蘇俄實業計劃，或意大利團體經濟（Corporate Economy）的結果。

實行真正的統制經濟，有幾個先決條件，有幾個目標，更有幾個必須的方法。所謂先決條件，第一是心理的準備。既云統制，當然是含有強迫性，要是高唱自由主義，

明談或暗著着公私利益一貫的思想，以為個人的經濟行為，其切近的目的，固為私人利益，其結果則公眾都得到好處的，根本就反對公眾制裁。好在這個思想，五十年來，已漸失勢力，公眾制裁的法律，亦日漸習慣。但是心理的準備頗不容易。如不利用統制經濟，而借機會謀個人更大的利益固難，犧牲向認為應得的個人利益更難，受公眾制裁，不拘成見，不從僻好，而惟以社會利益為前提者尤難。第二，政治思想的障礙。一個散漫成性的國民，和民主政體的國民，同樣視政府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贅疣。政府的職權，希望他越小越好，越少越好。可是統制經濟的實行，適巧必須大增政府權力，經過長久時間，方見成效。在這裏便可起個大爭執。就是一，政府人員，是否都是大公無私？二，政府人員是否都是「超人」，高瞻遠矚，明察秋毫，凡一切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的問題，都可代人具體的永久的解決，並且解決得都適當？就是說政府當然與人民合作，可是參與合作的人少，不參與合作的人多，還是一個可以代表不可以代表，「超人」與非「超人」的問題。第三，國家政治和經濟主權的完整。無論統制經濟為的是改良生產，或改良分配，當他執行時候，必須無外力的干涉，如武力佔據，治外法權，條約合同的束縛，

商業金融的操縱等。否則，生產未改良，計劃未成功，反而引起強鄰猜忌，加緊武力干涉，經濟競爭，人民枉自犧牲，未獲統制經濟的福利，却實受財力的損失。第四，內戰的消弭，和政治比較的安定。這層不必細說，無論什麼大小事業，建設復興，都以此為大前提的。

所謂目標，便是注重生產，還是注重分配，還是生產和分配都注重。生產落後的國家，最要的是如何能達到某種物質的文明，和民生國防物品的供給。譬如俄國，當前的問題，便是如何使全國農工業機械化？主要的物品，如何求自給？所以他的目標，完全是確定生產的方向，改良生產的方法，加速生產的數量。蘇俄的政府人員，是公開承認他們的生產，拿美國作標準的。至於分配，蘇俄雖然是奉行共產主義，但是各級工人所得的享受，並不平均。譬如工廠工人待遇最優，農民和用腦工人便相差很遠，農民中間還分好幾級，待遇各有不同。所以目前蘇俄的分配問題，還沒達到「各人依所需要而享受」的原則。事實上因生產不足享受亦不能不有限制。譬如美國，生產的方法，精良超絕全球，生產的方向，因為自由主義的影響稍有畸輕畸重，彼此紛歧的趨勢，可是不難糾正。生產的數量，則自十九世紀末季以來，早已超過國內人民的需要。

所以在美國目前經濟衰落的期間，大家公認癥結所在，是財富分配的不均，因而引起生產的過剩。所以美國要是實行統制經濟，其目的當在解決分配問題。譬如意大利，所謂團體經濟，便一方以國家力量改良生產方法（如利用水力，使工業電氣化等），一方創制各項團體法，改良人民生活程度，財富分配，和人與人間的共同生活。

所謂方法，最要的第一，便是強迫權。統制經濟既然包括一個具體的計劃，一定的期限。要是在這個期限內，使計畫實現和成功，必須統一人民的意志，限制個人的經濟自由權，使各部份工作，均同向一個目標，分途並進。計畫難免就進程中，觀察形勢，稍改途徑，但決不容個人自動，依其卓越或怪僻的意見而更改。這個強迫權，在民主國，有向國會取得的必要。如美國羅斯福總統所用的方法，祇能算七分勸誘，三分強迫。或無論民主君主，以獨裁方式出之，如蘇俄的斯丹林，意大利的莫蘇里尼，德國的希脫拉。

第二，便是計劃。按照蘇俄經驗，工業計劃，並非幾個當局的憑空幻想，乃是各業各團體各研究機關貢獻各種事實統計意見計劃，而另由國家設計委員會綜合研究之，整理之，權衡他的輕重，分別他的先後，連綿各業的工作

，規定產量的分配而成。大致計劃分長期的和短期的兩種。短期每年規定各業各廠生產數量資本流動金和工人工資等。長期計劃有的五年，有的十五年，按照短期計畫每年實現的成績，而預測將來生產的方向和變率（譬如頭個五年計劃，原定自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三，後來因為進步很快，縮為四年）。各項計劃又可分為分業和分區兩種。分業係按照各業的特殊情形，而定一種縱式或橫式組織和生產的標準。分區係按各區經濟地域的大小和特點，而定他的生產的活動。所以除了全國計劃委員會外，又有省，城，鄉，計劃委員會。不過低級的計劃委員會所有計劃，均須高級的整理綜核，所以很少衝突，或重複的地方。蘇俄統制經濟的目標是生產，美國的統制經濟目的在改良分配，計劃當然不同。我提出蘇俄，祇是舉一個例子。但是我們應注意的，蘇俄各項計劃，統由共產黨人，自行決定，國外技術人員，祇是限於實際技術上的指導，關於計劃的方針和政策，不令預聞。

第三，國外貿易的統制。這裏所講國外貿易，不光指國際收支，而特重貨物的輸出入。輸出有特殊的目的，便是借此得到國外的款項。輸入亦有特殊目的，便是拿國外所得的款項，購買國內生產必須的工具，或外國技術人員

的聘請，因為輸出入有特殊目的，所以貨物的流動，於其品類及數量，都加以特別限制。因此如蘇俄常有令本國人民轉輸輸出小麥，而購入短期不能生勁的機器的現象。這種現象，大概在積弱久貧、生產落後的國家，如要短期內大增產力，是必不可免的，蘇俄並非例外。在統制的人看來，是一種方法，在人民看來，是一種犧牲，因為不但不能隨意用洋貨，並且亦不能隨意多吃多用本國土貨。

第四，生產的統制。生產當限於民生和國防的需要品。而以力能全國自給為目標，所以生產出來的物品，即使成本數倍於外國，亦必提倡。在機械化期間必須注重工業，於農業注重大農田和利用機器。各項產品數量的分配，不圖目前的適宜，長謀永久的解決。至於各業的組織資本流動金工資產量等，統於計劃中，預為分配定額。

第五，金融的統制。實業譬如機器，資金譬如油。機器的動的率統視油量的多寡而定，所以某項工業，需要若干資金，悉由國家銀行酌量分配。分配的標準，當然不問某項工業的贏虧，而在該業應加提倡的程度。

第六，商業的統制。無論躉售或零賣，對於各項重要日用品，都應有時間上和地域上適當的分配，以免各地異時過剩匱乏的弊病。

第七，勞工的統制。生產既定有方向，那末各業所需的人數不同，因為生產完全看他是否重要，不問他瀕虧，所以工人的流動，亦不應看工資的高低，而在工業的需要。這裏便須政府來干涉了。工人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多少受點制裁，失却職業的完全自由權。

我們看了以上實行統制經濟的先決條件，恐怕在中國，祇能成個時髦名詞。論目的，當然我們祇能注重生產，分配問題，現在談不到。談方法，在這種四分五裂的局面下，獨裁最多限於一隅，強迫力難期生效。統制國際間貨物流動，則限於條約。統制生產，須防他國傾銷，破壞計劃。統制金融，則我們的中央銀行還未十分健全，不能發揮他應盡的特別職責（如控制信用，調劑金融，預防恐慌等），反而和普通商業銀行爭生意。比較有力的私人銀行，活動範圍，大都限於地皮債券和標金，和工商業甚少密切的接觸，有力的輔助。談起農業，我們亦聽見過幫助政府，復興農村，可是大多數都是口惠而實不至。談勞工，我國不是無人，問題完全是技術的訓練。談計畫，我們向來祇有閉門造車不問事實的空談，絕對沒有腳踏實地的計畫，政府亦從未向人民徵求經濟計畫，要想計畫，甚至施行計畫的方針和政策，還得求教外人。在這幾種情形之

下，施行經濟統制，前途真是暗澹。可是全國經濟委員會，却已於統制經濟聲浪中產生了。據本日報載，將來還有好幾個某某業的統制委員會。

據我看來，全國經濟委員會，不是實行統制經濟，祇是借用這個時髦名詞。他的工作，就好處說，限於（一）以後各機關提出計畫，有個負責的總核機關查查內容，看看有無款項可辦。至於計畫實施，有無妨碍，能否生效，因為沒有統制的太多，當然難以預測。換言之，或可免重床疊架，虛設機關，空糜國幣的弊病。（二）所謂某某業統制委員會，他的極大限度，或僅能指導如何改良生產和銷售的方法，整理及連綿各個營業的方針，和生產的方向。換言之，就是調劑生產和消費的關係。雖然，俗語說，天下事必有個起頭，或者全國經濟委員會，方在嘗試作統制經濟的初步工作，那末我們有幾個希望。一，與其請外人代作計畫，或召開經濟會議，通過數十百條不相干的議案，海闊天空，不着邊際，不如先徵集國內工商學界可以貢獻的工商事實統計和計畫，由政府彙核，先行擬一草計劃，再請國外專家諮詢意見。二，與其所謂技術合作，僅限於遊行報告，不如多請次要專家，作實際技術上的指導，使國人得摩做練習的機會。三，與其完全注重技術，不若

騰出一部份精力，改良中央稅制，和地方捐稅。前者宋子文氏自掌理財政以來，已做到「簡單化」三字，已是不可磨沒的功績，制度化尚須努力；後者中國數千年來不能解

決的問題到了今日，更加紊亂，民生不聊，秦半由此。其餘初步工作，僅僅經濟一項，即已不勝僕數，國人嘗試目靜觀該會的發展與實施。

九，廿四日，清華園，

養材與用材

希聲

碰到有人從南京北來，自己也不知怎地，大概為希望心所驅使罷，總照例的會問他在南京所得的印象，也照例的會得到你不用問的答復！久了連這問也自知是多餘的了，就只問問南京的天氣！

最近有位朋友北來，大概他感覺到這不問的冷淡罷，他嘆口氣道：「你只知道政治設辦法，你不知道學生的思想更沒辦法！」我還是冷冷的說道：「政治與社會的現狀如此，他們的思想過激點，並不算希奇的事。」他說：「我不是指那個。以前多數的學生，總抱些高尚的理想。無論是談到社會，學問，作人，他們總有一串很高的希望在前面。雖是理想中帶些稚氣，然而國家的希望，還是放在他們的希望上。現在不了，大家不談理想，放棄希望。最時髦的是交際同奔營！你看，將來國家的希望在那裏！」談這話的朋友是個年青人，他自然與年青人接近的。

雖難斷定這話的真實到如何程度，但總使我驚慌了。

年青人清高的理想，正是培養他作人作學問的一種清泉，一種陽光。雖然以後總證明這只是理想，還須事實的煅煉。然而這是一種必經的過程，一種寶貴的原料！況且一個國家的現狀愈不佳，愈易使人把希望放在將來；假使連將來的希望都無處放，那不獨是失望，簡直是絕望的悲哀了！

但這現象雖嚴重，而造成這現象的原因並不是不可以移掉的。其原因維何？顯明而簡單的，就是畢業後失業的問題。每年暑假時，社會裏平添許多走頭無路徘徊私門的青年！記得有幾位都是那般像似抱歉的說：「以前在學校只知念書，一點聯絡也沒有。現在畢業纔弄的沒辦法！」這是怎樣聞之痛心的話！而造成青年這般的心理，分明是社會的罪惡。誰使他們走頭無路來？

理想的教育是人盡發展其所長；理想的政治是所長盡得其所用。而在養材與用材之間尤須有相應相求的聯絡。

試看我們的今日，理想的政治是在夢中，理想的教育是在鏡中，至於養材與用材的聯絡，連夢中鏡中也都不找到！結果是：多少需要專門人材的機關求人而無人；多少失業的人求事而無事，這並不是個很小的錯誤。假使這種情形之下，講建設固是緣木而求魚；便是講道德也怕是緣魚而求木罷？

再長此因循下去，所謂整頓學風，養成高尚人格，怕都不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欲揣其本，竊以為有應注意的幾件事：

一，現在不是又在講以建設求統一嗎？建設不但要有計劃，有財力，尤須有人材。計劃作好之後——可行的計劃，需用各項專門人材若干，應即責令各校就其環境與設備分別養成。如此則不但建設有了準備，便是教育本身也有點生氣了。至于學生則更知所奮勉。國內有幾個切合需要而辦理較好的學校，學生畢業後都有職業，他們在學校，從不聽說鬧風潮，出校後作事也都得到社會的信任。要整頓學風，培養德性，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二，國家既設考試院，不但考取的人必須錄用；而錄

用的人也必經考取。假使能辦到這一層——其實是應當，那時競爭就以學問不以撥營，作事靠本領不靠親戚。且因而學校必多用功的學生，事務必多盡職的人員。于是乎學風不必整頓而良，德道也不必提倡而高。

三，各地之中等以上學校，應合組一職業介紹機關。一方面調查訪問各機關及各營業所需要之人材，一方面各校合商供給社會需要之方法。對未畢業學生供其顧問，對既畢業學生盡其介紹。如此則學校與社會，才有聯絡，而求學與作事也有關係。

至于學生方面也應注意兩件事：（一）自非家道素豐，則求學皆是職業的一種預備。不可徒慕純粹科學及文學藝術的美名，結果弄到靠不為職業的學問求職業。職業既找不到，找到了也犧牲了學問。（二）人生本沒有畢業的時候，學校畢了業，社會剛入學。不可以書本的學問，渺視社會的經驗。結果使社會視學生不易合作，竟杜絕了自己的生路。聽說有幾個職業學校辦不下去，其原因是畢業的學生也居然士大夫，自以為是有學問階級，不能與舊商人合作，結果是人家不與他們合作。職業的學生無職業，職業學校也就無生路了。專門職業猶如此，其他的，恐怕更容易染這習氣了。

總之，教育是國家一種政策的基礎。我們要把國家放在什麼希望上，教人的與受教的皆應當向那希望作預備。養材而不能，或求用而無專長，這損失在個人為小，在國家為大。

蜀遊雜感

胡先驌

今秋八月中國科學社，在重慶附近之北碚溫泉公園開

年會，會畢承四川善後督辦劉湘電邀會員往成都，至各機關參觀講演；嗣復沿岷江而下至嘉定，攬峨眉烏尤之勝；歸途復得縱覽叙府瀘州各大都市，舟車所屆至數千里，為期幾一月。同人足跡所至備受各界盛大歡迎，抵成都時，各團體郊迎典禮之隆重，尤令同人慚感交并。而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募集基金，尤蒙楊劉二軍長首為之倡，慨捐巨款，備見軍政界各領袖提倡科學之熱忱，與以建設救國之決心。作者躬逢其盛，耳目所及，對於蜀中政局利弊興革諸端，自謂頗有一得之愚；為酬答蜀中各界之盛意起見，不惜以極誠懇之態度，為無忌諱之陳述；苟此文刊布之後，於蜀局有幾微之匡救，則亦不負蜀中人士對於科學社同人之重大期望焉。

況且，在一種失業的恐慌中，要想養成高尚人格，當然是不可能。既不可能，與其痛哭流涕於世風之日下，人心之不古，何如求其原因，想個根本點的辦法？

○ ○ ○ ○ ○

(一) 四川傑出人物盧作孚及其所經營之事業

此次入川科學社社員皆乘民生實業公司所派之民貴專輪。作者年來為西部科學院組織植物採集隊聘任植物部職員等事，已數數與其創辦人盧作孚通函；至與盧君晤面，則初次尚在漢口民生實業公司辦公室中。盧君為一貌若五旬，鬚鬢蒼白，短小瘦弱之人，其目光冥然而遠，其聲音清而尖銳，一望即知其有理想家，而非現實主義者。蓋其辦事之熱忱，舍己私人之精神，有大類宗教改革者，故其事業進步之速，亦出人意表也。

盧君昔日并未受何等專門教育，然其才智過人，久為楊軍長森所識拔，在其部下任事有年；終鑑於在政府任職，受政潮之牽率，每每勞而無功，遂毅然從事社會事業。盧君有二大事業，一為民生實業公司，一為峽防局。先是

嘉陵江小三峽一帶，以其地位於數縣交界之處，爲盜匪之通逃藪。盧君出任峽防局長後，乃辦團防，首將盜匪肅清。繼乃經營北碚鎮市政，禁賭博，禁鴉片，辦中小學，立醫院，設民衆俱樂部圖書館等。近數年國內外學術機關入川者採集動植物標本研究地質學者踵相接，盧君皆派練習生從之採集。後乃創立西部科學院，籌設農事試驗場。計西部科學院中已成立者，有動物植物地質化學數部，雖凡百草創，然已漸有規模。其經費概出於捐募，捐募不足則不惜出於借貸。今科學院之二萬金巨廈，即借款建築者。其植物與昆蟲採集隊，已深入西昌會理川邊青海各處，成績爛然可觀。似此身非科學家，處蹶蹶之經費狀態之下，而提倡科學不遺餘力者，吾國殆只盧君一人焉。其自治成績之卓越，固不僅其轄治之區域內，無盜匪烟賂之蹤跡，其所辦之學校與通俗教育尤有朝氣。其所創辦之溫泉公園，竟使盜匪匿藏肉票之窟窟，一變而爲重慶附近最美麗之避暑區域。近且議在溫泉附近之縉雲山上創設植物園。作者有意在北平創一植物園，數載於茲，尙無眉目，而遠於數千里外在作者指導之下之植物園在最短時期內，即可實現，可見在適當領袖人物領導之下，百事皆易於成就也。

至其經營民生實業公司之成績，尤爲可驚。先是川江

自通輪航以來，行駛川江之輪船，多屬招商太古怡和日清諸公司。川人自組航業公司者固亦有人，然以經營之不善，虧累日鉅，幾於全體崩潰。盧君首創民生公司，始於合川，初於民國十四年募集資本以兩萬元爲度而實收不過八千元，用購行駛合川重慶間小輪「民生」，復在合川設立電燈廠。「民生」輪營業有利，乃於十六年增收資本至五萬元。嗣後又增購小輪，設立機械工廠。後乃與各輪船公司合併，至二十一年遂有輪船二十一艘，行駛渝涪渝合渝叙渝宜渝申五線。以管理之合理化，故雖在四川紊亂之政局，崩潰之經濟狀況之下，其他輪船公司營業日有虧累，民生公司航業尙日有欣欣向榮之狀。通常各輪船之管理皆委託於商人階級之買辦，故上自買辦下至茶役皆營私舞弊，無所不至；民生公司各輪之經理，乃多以中小學校長教員一類人物任之，故弊絕風清，氣象迥異。某輪在昔日由宜昌航行至重慶，每次須煤一百六十噸，自歸民生經營公司後，則耗煤之量減至每次六十噸。昔日茶役每月收入以千百金計，狎妓豪賭，有如紳富，今則此風絕迹。又該公司自創辦以來，從無一輪遇險，而他公司之船，則時以觸礁聞。凡此種切，皆可證明盧君一人之人格，與其苦心之擊畫，有以使黑暗沈沈之四川社會中，逐漸發展方輿之

曙光也。

盧君之辦社會事業，並不忘情於四川政局之改革。二十一軍劉軍長曾屢邀其任航務處長，固辭不已，乃任斯職，而以何君北衡爲之副。迨何已得劉之信任，則辭職而薦何爲繼。現在何實爲彼政界中之替身，而亦劉部下最有新頭腦之人。此次『安川』軍事告一段落之後，盧君即遊說諸軍閥巨頭勸之息內爭，以共趨建設之途；以彼在社會上地位，其言論殊爲軍人所重視。此次科學社在重慶開年會，即彼所主張；彼且說劉湘電邀中國工程學會於明年暑假中國經濟學會於後年暑假入蜀開會，冀有以一洗四川各界陳腐昏瞶之空氣，而稍收腳踏實際之建設功效。吾嘗謂川省執政者有若盧君者五人而四川治，中央執政者有若盧君者十人而中國治。惟可慮者，四川之惡勢力，是否爲有心人如盧君者所能克服；而盧君食少事繁，各種事業均未穩固，是否能永不崩墜。王陵基師長曾與盧君戲言，汝之事業，余以一排兵可破壞之無餘，四川政局之可危，盡在此一語之中也。

(二) 四川之軍人

四川號稱魔窟，而魔窟中之羣魔，厥爲軍人。考其所以成此羣雄割據之情態者，自有其特殊原因在，其癥結楊

軍長森嘗爲作者慨然言之。四川軍閥之養成，在驅逐滇軍及推倒劉成勳之後。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固皆劉成勳部將也。劉湘楊森皆一度有統一全川之勢而皆失敗。蓋蜀中各將領，昔日大都爲同學或同僚，故官階雖有高下，而心理上毫無服從隸屬之觀念。在上者不能以紀律制裁其部屬，苟軍規稍嚴，則他人競謀以重利以誘之背叛。楊森之失敗以此，而每次內戰期中所以政治方式解決者，皆用此術。且一次背叛，一次升遷，苛征暴斂，放僻邪侈，在上者皆不敢繩之以法。故中下級軍官最喜內戰，蓋內戰一開，則升官發財之機會至，而戰爭之危險并不大，不足顧慮也。在會爲軍閥巨頭者，并不欲輕有內戰，能統一全川固佳，否則但求保持其固有之防地，亦足竊號自娛。至於師旅長，則爲達其領袖慾，有待時而動之意。在團營長，則子女玉帛之慾尙未滿足，尤喜趁內戰以肆其混水撈魚之技倆矣。此種心理不能剷除，則四川軍閥之禍，永不能滅。故目前統一之局面，殊不可樂觀。在今日防區之大者凡四（劉文輝已完全失敗），大防區之下之各師長，又有造成小防區之勢。將來在適當之情勢下，不難再演分崩離析之局也。現在劉楊鄧田諸巨頭鑑於共匪之禍，以及民力之久困，頗有厭戰之意。劉湘得勢，楊鄧田諸人咸願在彼卵翼之

下促成統一。第統一之後劉湘是否能永保持其領袖地位，使其部下聽其約束，酌量裁軍，共事建設，則殊不可知耳。

在諸巨頭中，楊森最勇於建設。在四川市政與馬路，成爲軍人中最時髦之點綴品者，實楊森開其端。楊在諸巨頭中頭腦極新，不甚殖產，是其長處。其短處在一意孤行，作事未免操切，而當其從事其理想中之建設時并不顧人民之担負能力如何。故二十軍戍區內正附糧稅亦已徵至四十四年。劉湘爲人沈著有遠識，不殖產，無內寵，在軍人中實爲難能。在其防區內，人民比較能安居，政治比較有條理。其不動聲色，據重慶地勢以充實其軍實，同時截奪他人之武器，實其成功之主要原因。二十四軍防區內人民苦於劉文輝虐政已久，對於二十一軍大有後來其蘇之仰望，苟彼能利用此種心理，以全力求蘇民困而以物質建設爲裁兵裕財之道，則或能步廣西李白之後塵也。然其僚屬中尙少確有遠大政治眼光之人，彼個人對於現代政治似尙未得真切之認識，其迷信神權，尤非大政治家之風度；彼是否能肩此安川巨任則尙不可知耳。至於各軍師旅長中有卓識者頗不乏人，若劉湘能一秉大公導之於建設之途，四川兵匪未必不可泯也。

(三) 四川之政治

四川政治之腐敗，在全中國中殆爲罕見，大約惟張宗昌時代之山東可與後先輝映。無論何項機關薪俸均極廉薄，類皆不足以養廉，於是服官者多在軍部中謀一顧問諮議等挂名之職以資調劑，或則一人身兼數職，方足自贍。如此欲求能認真辦事或廉潔奉公，殆無異南轅北轍矣。一切建設事業皆爲弊數。四川以多馬路公園著稱，然馬路建築費每里多至五萬元，較之建築鐵路且數倍之，而車輛破爛，運費昂貴，厚取於民，而於民生毫無裨益。甚且故意破壞舊有之石路，使道路泥濘交通斷絕迫鄉民自動釀資修造馬路，而先時以造路名義所取於民之捐稅則以飽私囊焉。縣教育局長每年收入可多至萬元，建設局長舞弊之情形稱是。銀行發行鈔票，可有重號者；師旅營長可自鑄錢幣，校長之辦女學有專爲召學生侑酒而設者，爲調劑軍人，乃使之兼任縣長；凡此種種怪現象殆惟四川政界爲有之。又所辦建設事業多徒具空名而無實際。事前毫無精密之設計，事業與經費，每不相稱。如辦一中心農事試驗場，每年經費只三萬餘金，辦一中心工業試驗所經費視農場更少。甚且如劉文輝之辦鍊鋼廠，其規模視一尋常私人組織之機械廠尙不若。故謂四川一切行政與建設機關，不啻皆作官

弊弊虐民之場合，亦非過言。如此則在川局統一之後，即 根本之覺悟，則民困不蘇，亦徒為共黨驅除而已。
令軍閥之禍可除，若政治組織無澈底之改造，智識階級無

(未完)

本刊前二
期的要目

第六十八號

九一八——兩年以後
技術合作應從何處作起？
第三國際的戰略(續)
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為的政治哲學嗎？

蔣廷黻
叔永
震東譯
弘伯

第六十九號

經濟建設中幾個重要問題
對大學新生貢獻幾點意見
美國移民律的將來及其對中國
移民的影響
我們還需要提倡無為的政治哲
學嗎？(續)
蘇聯的報紙

君遠
蔣廷黻
吳景超
弘伯
劉學濬譯

注意 本刊特定優待辦法

本刊為特別優待本年新入校諸君起見，凡直接訂購本刊四十期者，只收報價一元。外地用郵票訂購者，照十足計算，不另折扣。愛讀本刊諸君，幸勿失此良機！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一期至二十五期合訂本，業已售完。現在第二十六期至五十期亦存書無多，欲購從速。特價如下：

甲種 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 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 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購者請指明何種，可寄款向本社購取。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有「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藝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全報新聞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插圖，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報價目

「本報」每月一元
「社論」每月一元
「外埠通訊」每月一元
「體育界」每月一元
「學園」每月一元
「藝園」每月一元
「經濟界」每月一元
「社會新聞」每月一元
「教育界」每月一元
「新聞」每月一元
「副刊」每月一元
「專電及特訊」每月一元
「插圖」每月一元
「精美印刷」每月一元
「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月一元

救國的幾個先決問題

杯水

時至今日，除因未受教育毫無民族意識，或為私利所囿甘心賣國，或為特殊宣傳所蠱惑盲唱打倒國家界限的人們外，一般有普通常識的中國人，對於打救這個有數千年光榮歷史，為我族命脈所託，而現在眼看將為強隣完全吞噬的祖國，大概是沒有不贊成的。不過僅僅贊成，還是不夠，還是不能救她。真要救她，還須有堅牢的決心和敏捷的方法。決心是一切意識行為的起點，是一切偉大事業的發動力。若是沒有決心，或有之而不能持久，那便和沒有一樣。但是光有決心，任憑它怎樣堅牢，若是沒有適當的方法，還是不濟事。孟子所謂「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就是這個道理。現在上自黨國領袖，下至一般民衆，都在談救國講決心，不過這個國究竟能得救與否，還是一個疑問。沒有決心固然不行；有了決心而無適當的方法和敏捷的手段還是不行。

一時的決心是不難有的，不過要持久却不容易。西俗過年時有人常立所謂「新年的決意」，想從新年那天起，將個人的一切或某種不良習慣或缺點完全改掉。不過在事

實上「新年的決意」真能實行者，殊不多見。這自然是因為那些不良習慣都是根深蒂固，非有極強的意志和極順適的環境是無法改掉的。國家和個人一樣——有時或者更難——要創造一個新生命是不容易的。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來的歷史狠足證明這個不容易的道理。有時是因為沒有充分的智識去下決心，有時是因為沒有堅強的意志去實行決心，有時是因為沒有適當的方法去輔助意志，而最大的病根乃在有種種惡習慣在那裏搖動決心，懈怠意志，腐蝕方法。此等惡習慣不除，一切救國計劃都將徒託空言；此等惡習慣不除，只有預備作日本或其他國家的順民，勿再自欺欺人，談甚麼救國救種。

此等惡習慣，舉其大者，約有以下數端。

一曰私。中國的事情可說表裏不如一是公例，表裏能如一是例外。表面上一切事總是為公，骨子裏大部分總是為私。社會上普通事情已是如此，政治上的事情尤其如此，一個政策，一個問題，名義上總是為國為民，實際上十九乃是為私為己。這在宣傳學沒有發明以前早已如此，

宣傳學昌明以後更是變本加厲，靡有底止。因此，不但初來中國的外國人和初出茅廬的青年對於中國事情的虛虛實實是莫名其妙，就是一般久經世故的人們，除非遇事特別打聽，格外調查，也是不敢輕予置信，也是要大打折扣，不然，就有被騙的可能，就有上當的危險。結果，凡是政府提倡的事業，大家對之總是沒有信用；凡是官廳號召的計劃，人民聽見總是裹足不前。在政府地位的人，對於這種現象，不但不責備歷來和現在統制階級的假公濟私，營私肥己，使人民失掉信心，反怪人民不愛國不熱心。試問湯玉麟統制下的熱河人民叫他們怎樣愛國，怎樣熱心？今日一般擁有實際統制權者慎莫謂我比湯玉麟好，這不過是個程度問題，其間相差並無好多。湯玉麟平日最大的罪惡是橫征暴斂，民不聊生，試問現在全國除了極小極小部分外，那一省不是橫征暴斂，那一處是民能安生？

中國大部分的士人對於作官本來就有寓商于仕的觀念，不過在從前，因為社會組織不同，經濟情形不同，就是剝削，總還有個界限。貪官污吏雖然到處皆有，不過因有法律的束縛和習慣的限制，總是顧忌多端，不能暢所欲言。到了現在，社會一切舊組織相繼崩潰，法律習慣道德人格盡歸烏有，而經濟壓迫和浮華風尚日甚一日，于是一般

貪婪成性，寡廉鮮恥，與豺狼狐狸異形同心的人們——其實可稱為動物——到處毫無忌憚的搜括，敲詐，剝削，榨取。此輩所過之處，萬事皆廢而彼獨富，萬民皆瘦而彼獨肥。和界中的高樓大廈頗多此等官僚的住宅，外國銀行的儲蓄半為此等軍閥的金錢。政府天天說整頓官規而官規愈壞，人民年年望澄清治而吏治之澄清愈無望。弄到現在，鄉下是兵匪不分，城裏是官盜莫辨。雖然一方面有共產黨的威脅，一方面有農村破產的恐怖，一方面又有外患的壓迫，眼看大好河山盡將陸沉，而這些唯利是圖的惡性寄生虫還在那裏依舊的或加倍的營私，舞弊，剝削，榨取！拿生物學的眼光來看，這似乎是死亡的普通象徵；拿理智和情感來說，這乃是一幕大悲劇。

二曰懦。大概係因人口過剩經濟壓迫的關係，弄得許多人好像非營私不足以生存。大概又係因人口過剩經濟壓迫，再加上兩千多年來禮讓教化的涵育和所謂黃老之學的腐蝕，又弄得一般人皆成懦夫。這個懦性在社會及政治上的表現便是遇事不敢照常識的指導，理智的昭示，道德的要求，法律的命令，乾脆的簡單的去解決一個問題，而必須盤馬彎弓，鉤心鬥角，紆迴曲折，拖泥帶水的走上一個大圈子，才覺得滿意。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的處世秘

以是不尚剛而尚柔，不好走直線而好走曲線——不愛直截了當的做正面文章而愛旁擊側敲的做偏而文章；中國人的政治習慣是不好講道理而好論人情，不愛循規矩而愛玩手段，不以光明磊落爲可貴而以鬼鬼祟祟爲必需。這樣辦法的結果當然是把原來很簡單，很容易，在極短時期內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弄得狼複雜，很難，經過長時間後還不見得做得到。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來政治上大部分的失敗和糾紛都是爲着這個道理。

固然，在物理和事理上說，剛強不能代替柔弱，直線不能代替曲線，人情有時不能不講，手段有時不能不用。不過這其中都應該有一個相當的限度。若是一個民族完全沉溺于柔弱，醉心于曲線，束縛于人情，奴役于手段，甚至拿柔弱完全代替剛強，拿曲線完全代替直線，處處講人情，時時用手段，見推崇道理者便指爲迂闊，見循規蹈矩者便笑爲傻子，那麼，這個民族一定是得下了一種狠嚴重，狠可怕，狠危險的毛病。這個毛病畢竟有無治法，實在不容樂觀。

一個民族，同一個個人一樣，大概在少壯時期，因爲身心健強，是好直好勇好走光明的大道。到了衰老時期，因爲百病纏身，精力不够，連太陽光都害怕，不能不走黑

暗的曲徑。黑暗中走慣了，看見太陽的強光更害怕。今日中國官僚政客和依附官僚政客爲生的人有幾個不是在黑暗中冥行，有幾個不怕見太陽光？

三曰僞。中國的文人向來是尙空談不務實際，而今日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文人尤甚。凡是到過南京，稍稍明瞭政府工作情形的人，都知道上自中央委員，下至各部次長，每日自朝至暮都是忙個不休。忙些甚麼？開會。開會的結果如何？決議。決議的下文如何？無。所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真是一語道破。孫中山說知難行易，他的信徒偏偏組織了一個政府極力証明他這話不對。這並不是講笑話，因爲這是國民政府這數年來唯一的成績。有時似乎還嫌決而不行不够積極，于是又開會，又提議，又決議，把從前的舊決議完全推翻，又來一個新決議。若是這個仍舊決而不行的新決議是最後一次，那還可說，不過它那裏有那樣好的命運。此種辦法除了拿從前梁任公所謂「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去看外，別無更善意解釋。假如有一个外國人從來沒有到過中國，而且完全不知道中國現時統制階級這種習慣，忽然坐飛機到南京將國民黨歷屆全國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會議，國民政府，以及各院各部各會歷年來所有的決議案，除了那些重

複和衝突者外，翻閱一下，我想他一定以為這個國家已經治理得很好，狠上軌道，狠有條理，而且或者還要驚奇的自問這樣一個國家爲甚麼不能抵抗日本，爲甚麼還要被日本人叱爲無組織，非國家。

標語口號永遠不兌現，決議案大部分不執行，這恐怕是國民黨當國的罪名。不過平心而論，好一點的國民黨員雖然不一定是像他們自己所標榜的先知先覺，自然也不一定是不知不覺；他們的知識才能，以全國的領袖人材論，大概總在水平線以上。現在別人，連知誰才能在水平線以下的人在內，都感覺到標語口號永遠不兌現是不行，決而不行是死路，難道他們自己不知道？若是已經知道，何以還是繼續的製造不兌現的標語口號，依舊的決而不行？難道政府是製造標語口號的機器，不製造便要毀滅，決而不行是維持壽命的最妙方法，若行便要夭折？話又說回來，這些道理我們都知道，政府自然也知道。知之而不改，知之而故爲之，所以是僞。不過政府的品性是人民的品性的返照。有怎樣的人民，便有怎樣的政府。人民若真實，政府何從而虛僞。政府的虛僞誠可怕，人民的虛僞更可憂。

四日懶。此處所謂懶是指普通所謂不認真。不認真的原因自然不一定是懶；凡上文所說的私，懦，僞，均可

爲不認真的一種原因。有時是因有私心作用，不能認真；有時是因怯懦成性，不敢認真；有時是因敷衍面子，不認真。完全因懶惰而不認真者恐怕還是少數，大部分的不認真是有研究的，是很費周折的。不作一件事有時比作一件事所費的工夫還要多。初出茅廬的青年和賦性豪爽的人在這些地方很難成功。社會上往往聽見人說某人的失敗是因他太認真，某人的不成功是因他太爽快。因此，一般滑頭官僚和所謂漂亮政客才有了他們的特殊價值。敷衍，通融，不認真，在中國已經成了一種科學，已經成了一般人的第二天性。一個民族，除了個人的利害問題外，一切都不認真，它的前途安能叫人不着急！

近年來中國許多事業的失敗，原因雖甚多，但不認真是其中之一。許多中國人自己多年辦不通或辦不好的事情，外國一辦就通就好；反之外國人辦得很成功很有希望的事業，一到中國人下裏，便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這其中並不一定是知識和經驗的關係，有時外國人的智識和經驗還在中國人以下，他們能成功的秘訣就是認真，我們失敗的原因就是不認真。也可說，他們成功的道理就是因爲他們文化幼稚，不懂得我們的敷衍學。

除了上面所說的私，懦，僞，懶，四種惡習慣外，還

有一種情形足爲救國的障礙。這種情形就是愚。愚自然不能算是習慣。習慣是一種勢力的存在，愚是一種能力的不在。惡習慣大部分是道德問題，愚完全是智識問題。

要救國不但要有道德的資格，還要有智識的資格。今日國家事事弄到破產的情形，一方面固然是因爲自私，怯懦，虛僞，不認真種種毛病在那裏作祟，一方面也是因爲必需的智識太缺乏。因爲沒有必需的現代智識，所以許多人老是，而且也只能，在那裏胡說，亂叫，瞎嚷嚷，永遠抓不住問題；他們自己或者以爲是救國救民的良策妙法，其實不是知人說夢，就是隔靴搔癢，再不然，就是鹵莽滅裂，胆大妄爲，與真正救國工作都是毫無關係或有害無利的。愚病不治，國事前途也無大多希望。借材異地，利用客卿，只是一時一事的治標辦法，絕非永久的大規模的治本辦法，因爲客卿只能作我們的僱員而不能作我們的主人。

。假如我們是處在閉關自守，與外國沒有關係的時代，那我們就是再腐敗，再不爭氣，再墮落，也不過是一個民族內部的盛衰問題，至多換上幾個朝代，不久還是要撥亂反正，恢復常態，那就是效率再小，收效再遲，也無多大關係。但是現在却不然。現在我們不但是藩籬盡撤，門戶洞開，海陸空三面受敵，毫無自衛能力，而且是東三省和熱河的版圖已經變了顏色，北方受重大威脅，南方隨時皆可糜爛，只待國際風雲一起，立刻就有更大的國難到來。亡國的慘痛，從前以爲是一種聳人聽聞的理論，現在轉瞬就會變爲鐵硬的事實。在這個當兒，假如我們還是依舊的自私，怯懦，虛僞，懶惰，愚蠢，那便是甘心亡國，只有預備作亡國奴，還有甚麼話說。假如我們還有半點聰明，半分良知，能在最後一分鐘內覺醒，知道國亡後公利不存私利亦將無所依附，那麼，就應該從現在起將上邊所說的各種惡習慣和缺點加速度的律改掉，努力向前奮鬥，能有一分效驗算一分，能有兩分算兩分。果能如此，縱令這個國不幸一時救不下，將來總還有翻身的日子，何況國際形勢無定也不見得一定救不下呢。此中關鍵全看我們努力的程度如何，願大家本着所能有的智識趕快無私的，勇敢的，忠實的，認真的向前做去。

帝國主義與常識

蔣廷黻

我們中國的文人——知識階級——素重文字而輕事實，多特識而少常識。所以我們好講主義，易受主義宣傳的麻醉。自國民黨出師北伐到九一八，全國佈滿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的標語。當時我們把一切國計民生的困難都歸罪於帝國主義者，把外人的一言一動都看為帝國主義的。因為作這種宣傳者有不少的共產主義的信徒在內，於是帝國主義就成了資本主義的別名，好像世界一日有資本主義就一定會有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末日就是帝國主義的末日。現在還有人拿這種論調來博民衆的歡心。

帝國主義究竟是什麼，學者的意見很不一致。所有的界說多少帶點主觀的成見。我們雖談了多年的帝國主義，連這問題的複雜我們尚未看出來。大英之統治印度，法蘭西之統治安南，日本之統治高麗：這都是帝國主義的表現。關於這一點，意見大概是——一致的。不過印度，安南，高麗究竟是獨立好呢，還有繼續受外人的統治好呢；印度，安南，高麗一般的人民的日常生活，自受外族統治以後，是日趨於窮於苦呢，還是日趨於富於樂呢；關於這些問題，現在不能有客觀的，科學的答覆。換句話說，就

是我們承認某種現象是帝國主義的，其善惡利害還是有問題。我們拿什麼標準來評斷帝國主義的善惡呢？有些人說，不問其成績如何，外族的統治都是惡的。因為統治本身是民族生活最基本的一部份；剝奪一個民族的統治權就是剝奪牠的生活的一部份。並且一切的統治都是為統治者謀利益，不是為被治者謀利益。還有些人說，治權本身沒有什麼大了不得，左右施治權者是少數，受治者是多數。從多數看起來，統治者是甲是乙，是本族或是外族，是不關緊要的；關緊要的是統治的成績，如社會的或治或亂，及經濟的或窮或富。依這個看法，我們就可以請人民投票來定帝國主義的罪惡。譬如印度：我們是否可以拿印度全國人民的票決來定英國統治印度的好壞？英國人必說：現在的印度人既不知未受英人統治以前的痛苦，又不能預料獨立以後的艱難，且因受了獨立黨多年宣傳的影響只知感情用事，所以票決不足為憑。此說雖似強辯，然不無根據。中國人大概是反對中國作印度第二的，但是有不少的中國人，絲毫未受英人的逼迫，自動的搬到各地的英租界去住，甘心的脫離本族一部份的統治而接受英人的統治。這不

是民衆意志很好的一個表示，表示英人的帝國主義是善的麼？

以當時當地的被治者的立場來評帝國主義的善惡已經是件不容易的事。這是上文所要說明的。不過除了這個立場以外，我們還須注意歷史的及宇宙的利害關係。中華民國，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北自蒙古，南到兩粵，東起魯東，西抵帕米爾的大中華民國，也是帝國主義的產物。從歷史的及宇宙的眼光看來，這個產物是人類之福呢，還是人類之禍呢？究竟亞東成爲一個中華民國好呢？還是分爲無數的戎國，狄國，苗國，楚國，越國，蒙古國，西藏國好呢？如果我們承認成爲一國是較好，那末，我們祖先對戎狄苗越所行的帝國主義是有功於歷史的。現在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帝國主義的產物，都是由於一個中心民族兼併其他無數民族而成的。大英帝國不消說了；就是不列顛島之成爲一個政治單位也是帝國主義的產物。蘇俄——東到太平洋，西到波蘭，北至白海，南抵黑海的蘇俄——很明顯的是列寧的祖先，費了千數百年的努力，併吞了無數民族，然後成立的。過程中所有的慘無人道的戰爭是史籍班班可攷的。我們聽見過蘇俄反帝國主義的宣傳，我們沒有聽說蘇俄要放棄西比利亞，中央亞細亞，及黑海以北的土地

。爲共產主義着想，蘇俄還是以不放棄帝俄的遺產爲好。從歷史的及宇宙的眼光看，似乎也是國度愈大，人類愈好；某時代國之大小就可以作那時代文化高低的標準。

我們在上文內僅僅討論最明顯的帝國主義，就是以一族而統治他族。我們的結論是：這無疑的是帝國主義，但而善惡利害還須待攷。但是帝國主義不僅有一種方式。因爲政治及武力的侵略不一定要到統治的程度然後算得帝國主義。日本雖說「滿洲國」是獨立國——其獨立的最好表現就是日本承認其有與日本立約的權利——我們不能不說日本對中國及「滿洲國」所行的是帝國主義。關於這一點，我想國人是無異議的。若然，蘇俄在外蒙古所行的也是帝國主義。此中不同的就是東北的人幾全是漢人，外蒙古的人幾全是蒙古人，所以我們若要原諒蘇俄的話，我們可以說：東北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主義的衝突，外蒙古問題是蘇俄帝國主義和中華帝國主義的衝突。至於蘇俄在外蒙古所行的是帝國主義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爲外蒙古原來是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單位之內，經蘇俄的努力，現在已經圈在蘇俄的政治經濟單位之內去了。

比日本在東北及蘇俄在外蒙的帝國主義還要隱微一點的是英國在波斯及埃及，美國在喀利平羣島及中美小國的

帝國主義。普通的時候，這些國家有政治自由；到非常的時候，英美必出而干涉。更次的要算美國在北美各國的勢力。最次的就是列強彼此間的壓力。華府會議的時候，英美聯合逼迫日本承認五與三的海軍比較。日本人說，這是英美的帝國主義。日俄戰爭的時候，德國趁機逼俄國訂立有利於德的商約。俄人也說，這是德國的帝國主義。列強所加於弱小民族者未嘗不想彼此相加，但是在普通的時候因為勢力均衡無能為力而已。一旦均衡動搖，強國對強國亦能加以壓迫和侵略，亦能行帝國主義。戰後德國所受的痛苦並不亞於中國近年所受的痛苦。在這個世界立國，國都是洪水，同時又是堤防。究竟是甲國向乙國泛流，還是乙國向甲國衝洗，要看甲乙雙方水勢大小的比例及堤上高低堅弱的比例。誰是帝國主義者，誰是受壓迫和侵略者，實無永久固定的形勢。

除了政治及武力侵略以外，現代還有所謂經濟侵略，文化侵略，及主義侵略。我們受過近幾年的宣傳的人都以為這些現象是極明顯而簡單的帝國主義。其實這些現象都是極複雜的。我們先就經濟的侵略說。外人在中國的投資是侵略麼？是帝國主義麼？若說是，那末歐戰以前，法國在俄國所投的資本比法國在中國或安南所投的還多，豈不

是法國對俄比對安南還更行帝國主義麼？彼時英國在美國所投的資本反過於在中國所投的資本，那就証明英國對美國是行更厲害的帝國主義麼？若說國外投資不是帝國主義，我們知道這種投資往往使受資的國家變為投資國的政治的及經濟的附庸。收買別國的原料來發展工業是帝國主義麼？若說是，那末美國收買日本的生絲，日本收買美國的棉花是美日相對的行帝國主義；日本現在決定不買印度的棉花是日本對印度放棄帝國主義；俄國現在努力推銷石油於國外是斯塔林甘心作帝國主義的犧牲品。若說原料與帝國主義無關係，我們知道原料的尋求往往引起國際的衝突，一弱國而有大宗原料往往誘進外人的侵略，如中國，波斯，及戰前的土耳其。在別國佔商場是帝國主義麼？若說是，那末因為戰前俄國是德國的一個好商場——彼時德國賣給俄國的製造品比賣給中國的還多——德國就是對俄國行帝國主義？現在英美之間的製造品的交換很多，這就是英美相對行帝國主義麼？若說不是，我們又知道工業發達的國家非在海外找商場不能度日，並且這些國家的外交及軍備許多是以維持或奪取國外商場為目的。總結以上所說的，我們可以說，國外投資的機會，國外原料的獲得，及國外商場的謀取可以成爲帝國主義。也可以不必成爲帝國主義。

在中國講帝國主義的人，尤其偏信唯物史觀者，以為投資，原料，及商場是帝國主義的唯一的動機。我相信這

國之間的經濟衝突或者還須更甚於今日。照我看來，人類的末日才是帝國主義末日。

三者是近代帝國主義很要緊的動機，不過我以為這三者不必一定要採取帝國主義的方式。這是上文要說明的。不然，一切的國際的經濟交換都是帝國主義的了。我更不相信，除此三者之外，別無帝國主義的動機。滿人之滅明而建大清帝國不是帝國主義嗎？十七世紀的滿人有什麼資本可投，有什麼工業要在中國找原料和商場？通通都沒有。蒙古人之滅宋而建元朝也是這樣的。照我們所知道的，自古石器時代到現在，沒有一個時代，一個民族，一種經濟制度，沒有行過，或試行過帝國主義。人類的起始就是帝國主義的起始。生物學家或者還能更進一步的說，生物的起始就是帝國主義的起始。至於說，資本主義的末日就是帝國主義的末日，我也不相信。現在世界上的一個大衝突就是有些國家有過剩的土地而不許外族移民，如加拿大，澳大利亞，及美國。在這些國家最反對日本人及中國人移入者，不是資本家，反是當地的勞工。蘇俄現在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他願將其富源供給於全世界嗎？倘中國的國際貿易，也如俄國一樣，由國家經營，中蘇之間就不會有衝突嗎？倘世界各國都行共產，都由國家經營貿易，彼時國與

至於文化及主義的侵略，我們也須分清，那是有作用的侵略，那是自然的交換與做效。如果英美法德人士捐錢到中國來傳教是帝國主義，那末蘇俄供錢給第三國際在中國來宣傳更是帝國主義。如果外人到中國來設立學校是文化侵略，那末中國人到外國去求學的都文化的漢奸。在現今世界，那一國都多少作點宣傳的工作。日本現正預備派人到美國去加勁宣傳。英人在美國，美人在法國，法人在意大利，意人在德國，都正進行宣傳。誰是帝國主義者，誰不是帝國主義者，頗不容易分別。

一切的有作爲的，向上的民族都在那裏求自己的政治，經濟文化勢力的澎漲。古代如此，現在亦如此。倘甲的勢力澎漲與乙的相等，如日美，日俄，英美，法德等國之間，甲乙的關係就是平等的，通常的國際關係，我們不說甲乙之間有帝國主義存在。萬一甲的勢力澎漲過於乙的，如列強與中國之間，那末帝國主義自然而然的就來了。這是一種天然現象，無所謂善惡。如要談善惡和責任，那末強者與弱者是同等的須負責。我們只能求我們的澎漲能與外來的澎漲抗衡；不能求外來的澎漲的取消。取消或限制

任何民族的澎漲就是取消或限制牠的生活。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不求自己的澎漲，而徒怨天尤人，咒罵彼帝國主義者，這是自暴自棄、更加招人的鄙視和壓迫。

專門人才的統計

今年春天，我參觀國防設計委員會時候，就感覺到調查專門人才實在比調查其他國防上需要的資源還要重要。有了專門人才而國家不知道，就無從充分利用，這是專門人才的不幸，而亦是國家的重大損失。據我個人所知道，政府方面，很少注意到這種工作——既沒有調查，更沒有統計，更說不到怎樣有計畫地愛護和培養。

記得一二八以後，南京成立了一個技術合作委員會。我們除了開過幾次會以外，並沒有什麼成績。當時中國工程師學會因為感覺到專門人才調查的需要，曾經發出一種通知，請各會員填寫自己對於國防上的專長和戰時願意擔任的工作。這自然是一種急來抱佛腳的辦法，但還是學術團體自己辦的。

今夏政府又下了一個大決心，要繼續派留學生到英、美去深造，理由是因為感覺到專門人才的缺乏。據管理中英

我所講的不是什麼哲學或歷史觀，就是最普遍的常識。我們這個民族到了這風雨飄搖之中，最可怕的，是在未得到特識前，就放棄自己固有的常識。

顧毓琇

庚款董事會和清華大學招考留學生的科目看來，我們知道鍊鋼，造鎗炮，造飛機，造軍艦，造炸藥等等人才，都還是我們這個老大國家最需要的。這種需要誰都承認，但是我們要問：從前留學生中間有學過的沒有，學過的有多少，回來以後做了什麼事，成績怎樣？這些答案，我恐怕不容易正確地找到，因為我們缺少詳細的調查和統計。

據最近清華大學畢業同學錄的調查，學過採礦冶金的六十一人，學過航空的十人，學過造艦的五人。從他們現有的職業看來，學礦的有過半數在礦界服務，學航空的不及半數，而學造艦的就幾乎沒有一個人造艦。

又據美國麻省理工大學中國畢業同學錄的調查，中國同學中學過採礦冶金的凡十六人，學過造艦工程的二十一人，學過航空工程的十三人。這個學校的造艦科係同美國海軍部合作，航空科係同航空部合作，所以這兩科在全美

國是很重要的。這二十一位造船工程師同十三位航空工程師的出路，我想應該是國家十分關心的吧。

未來的人才要培養，已有的人才，應該先有詳細的調查和統計，我們覺得這是國防設計同國家建設上必要的任務。

關於專門人才的統計我現在可以建議下到幾個辦法：

- (一) 由政府就專門的需要，徵求各種專門人才的統計。
- (二) 由各學會編具各會員專長及志趣的統計。
- (三) 由各大學就其畢業生的專長和服務情形編成統計，並逐年增訂。
- (四) 由留學外國之各大學中國學生畢業同學會編具統計印行。

關於第(一)條辦法，當李潤章先生做教育部長時，似乎曾經調查過一次。調查方法是由教育部行文各省教育廳，再由教育廳行文各縣調查當地的專門人才。調查的結果我沒看見發表，但是據我推測，縣政府根本就不勝任做這種調查的任務，何況所謂專門人才又難得回老鄉呢！

關於第(二)條辦法，我想各學會只要有了健全的組

織，很容易做到。例如上面所說中國工程師學會所做的調查，可惜做得太匆促，並且只限於戰時工作一方面，所以還應從新調查，加入平時工作和研究的現狀，方可以得到更完備的材料。我們希望從此可以知道中國工程師的大概情形，他們學科和職業的分配怎樣，他們是否都在做本行的工作。

據二十一年十二月工程師學會所編訂的會員錄，會員總數一千三百餘人，在上海的最多，有四百人，南京三百人，天津武漢各一百多人，濟南北平杭州各八九十人。這種會員錄上，對於各種統計的數目都沒有，這恐怕亦是一班會員錄同學錄的缺點。

我手頭沒有農學會的會員錄，但是我相信如拿他們調查的材料整理一下，亦可得很多有用的知識。到底多少人學過農，國內畢業的多少，留學外國的又有多少？我們有多少農作物的專家，更有多少人研究過土壤肥料？

在學問日趨專門的現狀之下，我們要承認決不能一人而盡知天下事。我們的交遊無論如何廣，我們仍然只會有不完全的認識和了解。政府倘若對於國家的人才決心重視，那第一步工作，便是要認識自己的人才。

第(三)條辦法，可由各國立大學先辦起，私立大學

亦可自由舉行。這種調查不但供給國家人才的統計，並且對於學校發展的前途亦是很有幫助的。例如從清華大學本年六月出版的畢業同學錄裏，我們可以得到下面的事實：

在二千多人畢業生裏，學法的人數最多，占百分之二十八；學工的第二，占百分之二四；此外文占百分之二十，理占百分之十五，商占百分之七，醫農各占百分之三。在一千四百多確知職業的人數裏，在教育界及學術機關服務的占百分之四十五，政界占百分之十五，工商及金融界百分之六，鑛界醫界及建築界各占百分之二左右。清華從前是一個留美預備學學校，所以除了新制大學畢業的五百多人外，大部分是留學美國的。這一千五百個留美學生的學科分配同職業分配，便是很好研究的資料。

據交通大學二十一年四月印行的畢業生調查錄，該校上海本部畢業的工科學生共九〇三人，電機最多，計四四三人，土木機械各約二三〇人。唐山分院畢業生共四六六人，他們都是學礦冶或土木的。上海同唐山合起來，共約一千五百人。交大有二十七年的歷史，北洋還要老一年。北洋除了最早有法科外，幾乎完全是工業學校。他們的畢業生，亦總在一千左右。交大北洋再加上其他工專工學院畢

業生的調查，我們就可以得到工科畢業生的大概情形了。

第（四）條辦法，或者可由在外國各學校的中國同學調查編訂，他們可以利用各校註冊部同學錄的資料。倘若國內已有同學會，如倫敦大學同學會，哈佛大學同學會等，則在國內調查，想來亦很容易。兩年前美國麻省理工大學的中國學生編了一本同學錄。從這裏我們知道有三百八十一位同學在那裏讀過書，最早的在一八七七年，最新的調查到一九三〇，亦有五十多年的留學歷史。從科目的分配論，電機最多，計七十九人，化工六十三人，機械五十九人，土木四十八人，亦都不少。我們再從去年底出版的麻工上海同學錄看，總數約在一百人。還有二百八十位同學在那裏？是否大都在京漢平津？是否都在做工程師？這從一校的留學生而論，亦是很值得研究的。美國的麻工同國內的交大北洋有同等的性質。這些國內外大學畢業同學的統計，我認爲是很重要的——至少同礦產調查糧食統計一樣的重要。

關於留法勤工儉學回國學生的調查，我在寫這篇文章時候得到劉仙洲先生供給的材料。據他調查所得，保定育德中學所辦留法工藝預備班的畢業生赴法留學的成績比較最好。這種畢業生共計一百三十六人，其中湖南籍占三四

十人，北方籍約一百人。在北方籍的一百人裏，留法學成回國的至少已有六十多人，現都服務於華北各省的工程界和教育界。在十一位紡織工程師中間，五位現在工廠裏，三位任政府技術人員，一位教書，兩位在籌辦織呢廠。在十七位機械工程師中間，十一位在工廠服務，並且對於機器製造已經有很好的成績。（在東北兵工廠造載重汽車的毛詔青君，便是此中一位。）學飛機的三位。一位在航空

蜀遊雜感（續）

（四）四川之經濟

中國各省之經濟，以連年之兵燹災荒，固盡感困難；但除陝西歷年困於旱災外，因人謀之不臧而經濟幾陷於絕境者，則惟以四川為甚。四川以軍閥割據，爭擁巨兵之故，租稅之重，全國無其倫比。前清糧稅固輕，但至今日，前清規定糧銀一兩者，加至二十六元五角餘，而在二十四軍防區內，一年照上舉之數，竟徵至十二次之多，尙有他種捐稅在外。在巴縣徵糧亦每年四次，每次每糧一兩徵至三十八元。故僅糧稅一項，取之於民者每年已達一萬七千萬元。就地徵收之鴉片稅亦有八百萬元。而關卡林立，自

署，一位在汽車廠，一位在鐵工廠。學電工的六位，兩位在電燈廠，兩位任政府技術人員，兩位教書。在調查的五十位中間，有三位改學數學，兩位研究生物，所以由工轉理的大約十分之一。

本文的統計數目字，只是從手頭有的材料臨時整理出來的。我希政府同學術機關漸漸注重到人才統計的工作。關於培養專門人才的意見，留待以後再討論吧。

胡先驥

萬縣至成都沿河設卡二百八十餘處。此項釐金，全省在三千萬元以上。至中飽之數，則尤無可計數矣。租稅如此之重，為任何省所未見。因稅收過重，至一切土產無論為原料或精製之品，成本皆過高不能賤賣，而造成巨大入超；其間接影響於農民之生計者，較直接重稅為尤大。又每因追租過嚴，使農民節衣縮食賤價出售，造成農產不自然之過剩狀態，因之農民生計愈劣。復以此為主因，使農民不得不高利借貸，而債臺因以日高。再以此故，乃使自耕農破產而成佃農，佃農之耕地以競爭劇烈，而面積日小；至終年下胼足胝，不能溫飽。惡因重疊，遂使農村經濟，日

就崩潰。再加以弊制窳劣，銀幣多至二十種，銅幣多至十五種，使農民竟鋸刻竹片以代錢。而鈔票濫發（聞二十一軍所發之糧稅契券多至一萬萬元），使在民國二十年中以通貨劣幣膨脹逾量的故，一百元之積蓄至今日只值五元。此種無形之敲精吸髓，其惡毒尤在苛捐雜稅之上也。若非四川土地異常肥沃，物產異常豐饒，人民異常良善，則早已激變為流寇世界不待今日始有赤禍矣。然在川北貧瘠之區，人民已無負擔之力，故有鄉民請求赤匪入寇之事。苟非赤匪殺戮過多（赤匪有四十八殺，故鄉民畏之如虎）則全川赤化必易於反掌也。

（五）裁兵與屯墾

四川兵禍政治與經濟之情形，如上所述。而政治經濟之窳敗，亦以兵禍為主因。故川局統一之後，欲求長治久安之道，首在裁兵。然上級軍官擁兵自衛，中下級軍官方欲利用內戰以圖升官發財，在此兩種心理狀態之下，欲求杯酒釋兵權殆非易事。劉湘固抱有飯大家吃之哲學，且已屢有此種表示；然以其平日著名之權謀，是否有法盡釋群疑，使人信其誠，則尚在未可知之數。竊謂宜從本軍入手，令部下採精兵主義，汰弱留強；則他軍或可效法。被汰之部隊，可使之屯墾，寓兵於農，效法廣西之李白。按川

西一帶北自松理茂，南至西昌會理峨馬雷屏，幅員數千里，土壤肥沃，森林蒼鬱，礦產豐富，全國殆罕其匹。峨馬雷屏四縣，半為夷區，即此已足消納屯墾軍數十萬人。而川西南一帶氣候炎蒸，農產尤富；夙有「開了萬担坪世上無窮人」之諺。廣東產之萬壽果與蕃石榴，竟可生於其間。故苟拓殖得宜，則西南一區，可以植棉，可以種蔗，可以畜牧，其殷富不必在資內各縣之下也。

四川裁兵屯墾，問題不在退伍士卒之安插，而在如何滿足軍官之大欲。以余所知，四川軍官正式俸給均甚廉，除有機緣攫奪非分財物外，皆不能有何積蓄，一旦裁兵，必至軍官之生計斷絕。為消弭反側計，竊以為若從事屯墾除士兵計口授田應至相當數目外（至少一人五十畝），軍官亦宜各按其官階之崇卑，加等授田（如什伍長授田百畝，排長二百畝，連長三百畝，營長五百畝，團長一千畝之類）。其不願受田者，可以領取礦區，則軍官之物質慾望可以滿足。如是一面使無產階級之士兵，一躍而成小地主，一面效法左文襄屯墾新疆之法，徵集少女，為士兵之匹配，第一年假以資金使購耕牛種子農具；待室家既立，安土重遷之時，其長官雖欲弄兵從事內戰亦不可得矣。此項民兵，以有產之故，自重之心增高，其捍衛地方之念，亦

因其殖產之情形而累進，不難變勁旅，一彈指間腐朽可化為神奇，而軍閥之禍自泯矣。在成都時，曾以此意與楊軍長森及某師長談及，皆極諱其議。某師長且云，苟劉督辦許我者，我願躬爲之侶，劉督辦幸有以促成其事哉。

四川裁兵猶有一困難，即爲軍官者一旦兵權既失，地位亦即隨之，昔曰藉兵力壓迫他人者，今且受他人之壓迫。昔有某師長，自動將兵權交出，後乃被其他有鎗階級所欺陵，幾於不能存活，至今軍人咸引以爲戒。又有某師長，奉已久解兵柄，從事農耕，乃以不能安居，終至迫爲馮婦。此種情形，在主持裁兵之人，不得不特加注意，庶反側可安，而後患可絕。沙中偶語，雍齒以俟，有雄才大略者，古今類能見及此也。

(六) 政治之澈底改革

四川政治組織之根本不合理，上文已言及之。目下四川主持民政之人，對於現代政治尙缺乏真切之認識，不免囿於現處之環境；有所興革，亦支節而爲之，殆難與言澈底革新四川政治，使之近代化，合理化也。九一八以還，吾以爲吾國當局有一最大覺悟，即不但自承物質科學與工農技術不如人，竟首自承行政經驗不如人，而有聘請國聯

專家改良政制之擬議也。四川政治組織之效率極低，若余爲甘君者，即不聘請國聯專家，亦宜聘請省外政治學者，將四川政制澈底改造。去其冗濫，增其廉俸，慎其任免，嚴其考績；必也使任職者無事蓄之憂，得失之患，勤廉必賞，貪庸必懲，則宦途自清，民困自減，中飽免而財政可裕，冗員汰而政費可減。此外技術與教育人員，尤須任用專業之人，使之久於其位，則政治氣象當煥然一新，而亂源自泯矣。鄂贛兩省，吏治素窳，自蔣委員長積極整頓以來，已有長足之進步，所謂風從草偃，轉移風氣，固非難事也。

(七) 實行統制經濟

四川經濟情形之惡劣，如上所陳，殆較任何省爲尤甚。改革之道，首在實行統制經濟，爲全盤之規畫。今日執政柄者，似未必有此才識，是宜延聘專家，爲立方案。統制經濟之道，約分開源節流二端。以四川政治情形而論，節流殊非難事。四川租稅每年逾二萬萬元，苟軍事政治改革有方，有此半數即甚充裕。內戰既泯，軍額既減，大可閉關求治，不問中樞之政爭，則購買軍械之費可大節省，無寧移此以建設可應軍事緩急之工業，如硫酸廠鋼鐵廠機械廠摩托廠之類。苟租稅裁減一半，同時嚴厲取締中飽

，則民困自蘇，社會購買力可以增進，出口進口貨數量皆可增加，而凋敝之經濟可以重振矣。

與節流相類似者另有二要政，一為整理貨幣。宜先與中央政府商酌鼓鑄大量中山像銀幣（費歸四川省担認）將一切劣銀幣以平價限期收回，同時自鑄一種銅幣，將一切劣銅幣收回銷毀。一為設立一規模極大之農民銀行，專以調濟農村經濟。此行可發行大量紙幣，將以前之糧稅契券及他種紙幣概行收回，使川省除中央中國交通數國立銀行外，省中惟此農民銀行，有發紙幣之權。幣制統一，則農民不至受惡幣與錢商之剝削，而有農民銀行以通緩急，自不至為土豪所魚肉矣。

開源最要之方略，首在聘請國內外專家調查四川省之富源與力源，為全部精密之設計。方案既定，乃按年施行，庶不至各種建設徒勞無功，而得收實效。川省當局最喜建設，軍人尤甚。公園馬路幾於每縣有之。然全省除運煤之北川鐵路外，竟無一里之鐵路，本末倒置，莫此為甚。又如二十一軍方以巨款託某洋行聘請某國工程師測探自流井一帶之石油礦，而該工程師所根據者，乃地質調查所刊布之自流井區域地質調查報告。若以此事託地質調查所担任，吾知其成績必較佳，費用必較省也。余此次曾向劉

督辦建議組織四川全省富源調查利用委員會，以四川省政府數要人及省內外農工商專家若干人為委員，為大規模之調查設計。若我國人才不足，則添聘國外專家為之輔，期以三五年即可作成可以實施之精密報告。此外宜設四川省統制經濟委員會，聘請全國著名之經濟學家，或巡請全國經委員會聯合國聯技術專家製成可以按年實施之設計畫，如蘇俄五年計畫者，量力次第舉行，則建設不至陷空談之弊，不糜國帑而實效可觀矣。

以言具體方案，吾以為首在建築鐵路。在完成川漢鐵路之先，首宜築成渝鐵路以利川東西之交通，使川西之商品，易於向長江下游輸出。此路之修築，土木工程師盛紹章已有極精密之方案。苟積極著手，五年之內可告成功，則川省政治經濟胥將受其影響矣。次則宜連合西南各省修築欽渝路以通海口，又可延築成渝路以接滇越鐵路，亦通海道之策，海道一通，四川經濟情形又將丕變。滇省貧瘠，百業未發展，若以成渝路接滇越費力不多，不但可以開發川邊，且可促進滇省之發達也。

交通而外，宜求農業之工業化。凡有一重要特種農產，即設立一種大規模之工業，使原料變為精製品。內江一縣每年產蔗糖七千萬斤，某年產至九千萬斤。資中每年產

糖五千萬斤，威遠亦產數千萬斤，此尚係用土法榨取劣種蔗而得者。是宜糾合省內外之資本，在資內一帶建大規模之製糖廠。四川每年棉紗布疋入超四千五百萬元，而川東北一帶植棉成績甚佳，在建昌道一帶似亦可大規模植棉。是宜面一推廣植棉，一面興辦大規模之紡紗織布廠，以求抵制外來之紗布。四川產茶之地有八十一縣每年產額約三四十萬担。是宜一面改良栽種之法，一面設大規模之茶廠以製紅茶，否則西藏華茶市場終將為印茶所奪。四川本為產絲區域，但近年絲業頹敗，絲織品過遜江浙之出產。據蠶桑專家言，中國絲業不能與日本競爭者，並非經濟上原則不如人，實人謀之不臧所致。是宜改良育種與紗織，庶可重振四川之絲業。野蠶絲業在四川尤有提倡之必要。他如利用川西之森林造絨，利用川東之桐油造油漆，開烟廠以造捲烟，皆農業工業化之法也。苟能如此，不必談鹽業礦業之開發，四川即可增加財富若干倍。不但可以抵制入超，且可供給西南西北各省之市場矣。

興辦大工業之前提有二。一為政治之安定，使各界可投巨資。在今日情況之下，有鎗階級巧取豪奪之巨額資財，尚不敢以之在本省興辦大企業，遑論其他階級。若四川政府不能保障大規模之企業，則開發四川必無希望。一為

企業管理之科學化。吾國之經營上商業也，非官僚化即家族化。不圖管理之效率如何，每種企業之主要職員，大都為大股東之親戚故舊。不能任總經理者使任總經理，無司會計之訓練者使司會計，一若資金自能經營，不勞專業之人處心積慮者然。國人尤無羣策羣力，服從衆議，共組大企業之能力。故每一人可致巨富，而公司鮮能維持至於永久。經營大企業之能力，以廣東寧波無錫數處之人為有之，在精明有餘，誠樸不足，過圖近利，缺乏公德之四川人，此種經營大企業之能力，殆至薄弱。吾以為在四川興辦大企業，必須吸收多量外資，而以經理之權委託於省外有大規模企業經驗之集團或個人。目下游資積存上海者有一萬萬元之多，南洋華僑亦受世界經濟凋敝之影響而營業不振。吾以為在四川興辦一種企業如糖廠烟廠紗廠之類，本省可出半數之資金，他一半則向省外或華僑募集，而總經理總會計及大部分重要職員，皆以外籍富有經驗者任之，本籍資本家但居董事監事之地位。則人事上之困難可免，而亦可逐漸養成四川人經營大企業之能力也。

興建設事業有密切關係者，厥為養成專門技術人，與提創科學研究。吾聞劉督辦昔日亦信任留學生，追試之以事而失敗，乃對於留學生漸不信任。某次在某處訓話，竟

詆科學爲洋八股，此四川留學生有負於劉督辦者也。實則在今日科學突進之日，談建設與大企業，刻刻不能離科學。在歐美各國，每一大工業，必附設有研究所，以一等科學家任其事，研究之結果，不但對於應用科學，能收奇效，即重要之純粹學理，亦每每因而發明。中國企業家信任科學而收奇效者亦自有人，范旭東之經營永利鹼廠是也。范君之事業，除久大精鹽公司永利鹼廠外，尙有全國獨有之黃海化學試驗所。襄在爪哇，見其茶商合資經營之茶業試驗場，糖商經營之糖試驗場，橡皮商經營之橡皮試驗場，每歎西人優勝華人劣敗之非偶然。故欲建設四川之大企業非同時設立各種專業試驗場所不可。惟事涉專門，非匆匆在國外觀光數年之留學生所能勝任，甚至非粗有研究成績而經驗不宏富之某科博士所能勝任，無寧以巨資聘請國外學者主其事，而以有相當研究能力本國學者爲之副，以求養成其經驗以爲他日取而代之備。蘇俄五年計畫成功之偉大，即用此策，永利鹼廠之成功亦半由於此也。此外純粹科學之研究，亦宜盡力提倡。中國礦業與工業，現在與他日受他質調查所純粹科學研究之賜，殆難窺縷。現在西部科學院雛形粗具，儘可盡力扶植之，使爲四川純粹科學研究之中心。楊軍長森捐資二萬元建築西部科學院之理

化研究所，劉督辦撥公債九萬餘金以其利息補助西部科學院之常年經費，其遠識自較國內其他軍人出一頭地。然科學研究費款殊巨，杯水車薪，無濟於事。以西部科學院之事業，雖十倍此數，尙不敷用。幸毋視爲洋八股，但圖敷衍盧作孚之一面子，則四川科學研究之前途或有亨乎。四川缺乏專門技術人才，爲不可掩之事實。以政局紊亂之故，少數確有專門學問之人才，類皆不願牛驥同皂，寧在外省服務。其最少數在四川重慶兩大學任教職者，咸迫於環境之不良，大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感。以視蘇俄革命成功之日，列寧首先下令維持巴夫洛夫之生理試驗室，其賢不肖奚啻天壤之隔耶？四川所辦之大學與工農專科學院，設備程度視外省辦者皆有遜色，且多年未派留學生，以養成真正之專門人才，而以不肖之留學生失去信用之故，留學生在社會上服務並不較在省外大學畢業者占優勝，故出國繼續高深研究者極少。此種狀況若不加糾正，將來大企業發達之時，將益有才難之感。是宜充實大學與專科學院之人才經費與設備，以優俸聘請省外之學者使任教職；在大學與專科學院設立研究所提創研究；指派或考試川籍在省外大學畢業生而曾在研究機關服務者，資遣留學指定之科目，而規定須回本省服務；提高中學基本科學與外

國籍之程度，務使四川省內之大學與專科學院之程度，決不在省外著名大學之下；則專門人才可以養成，足供他日大規模建設之用矣。現在四川辦大學尚未上正軌，重慶大學欲以三萬元辦農學院，即其著例。重慶生活昂貴，類似上海，教授薪俸利優，則衆目睽睽，視爲汰侈，遂使理學院長兼數學教授，每週竟須授課至二十餘鐘，具見辦學者與一般社會之缺乏常識也。

(八) 結論

四川物產之豐富，全國殆無其匹，素稱富庶之江浙，擬之不管小巫之見大巫，惟廣東或可與之頡頏。礦產之富既已甲乎全國，而土地之肥沃，農產之衆多，殆溫帶任何區域所未有。當車行資中內江之時，入望邱壠坡陀，寸土必耕，具見四川農民之勤，爲全國之冠。苟作「四千年之農夫」之美國金教授，得漫遊川南，吾不知其景仰吾國農民之忱，將至何種程度也。成都平原。泉甘土肥，彷彿華北而肥沃過之，或東三省可與比擬；而尤奇者在成都一方可種南土之柑橘，一方可植美國之蘋果，至叙府瀘州一帶，則閩粵之荔枝，龍眼橄欖，蘋婆皆能蕃茂，惟品質稍劣耳。江津之柑橘，滿坑滿谷，入望皆是，至代食橘肉而剝橘皮與橘絡者，反可得工資，會理且產萬壽果與蕃石榴

所未見者甘蔗與鳳梨，然未必在川南不能種植之也。加以川西之大森林，資內之甘蔗，四川之農產殆駕美國之加利福尼亞而上之，或惟墨西哥與爪哇可與彷彿耳。而野生卉木之繁，尤爲世界之冠，至有花國之稱，天之厚川人者可謂至矣。徒以人謀之不臧，遂使二十餘年紛亂靡已，民生疲敝，經濟崩潰，至於此極，此川人之奇耻大辱也。現在中國政治，正徘徊於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國民黨之理想政綱，爲緩和之社會主義。處今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短兵相接之際，以積弱之中國，欲求苟全於兩大之間，亦惟國民黨之理想政綱爲最適宜於國情。以中國共產黨不肯舍棄其暴力政策之故，遂使政黨不能並立，因之中國之安危愈繫於四川政治之良窳。現在赤軍已據川北，川軍勦赤，能否操勝算殊未可知。苟政治不改良則雖一時倖勝，他日赤禍亦終有爆發之一日。苟共產黨得據有全川而得其資源，據其險要，則殆無撲滅之望；而中國形勢必至小部分爲蘇維埃共和國，大部分爲列強所瓜分。或則在赤匪尙未據有全川之時，國民黨爲生存計將傾中央軍全力以弭川禍。二者居一，四川軍閥必無立足之餘地。苟四川當局尙欲保全其相當之地位者，亦惟有一面迅速定川亂，一面積極建設，以建設之成績，求自治之權利耳。苟能如此，在中央政府素抱以建設求統一之策，亮亦不至干涉之也。徘徊歧路，何去何從，四川當局要人，尙有以三思之。